

# 基督教化與 世俗化的掙扎

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研究

1900~1922

張志偉 著



史學叢書  
002

# 目 錄

上海青年會會址遷移圖 .....	ix
<b>自序</b> .....	<b>1</b>
<b>第一章 導言</b>	
第一節 青年會與近代中國 .....	10
第二節 研究題旨及方法 .....	17
第三節 全書結構 .....	36
<b>第二章 華路藍縷 —— 上海青年會的草創與發展</b>	
第一節 自西徂東 .....	42
第二節 草創經過 .....	49
第三節 早期發展 .....	59
<b>第三章 宗旨的嬗變 —— 從人格模造到「人格救國」</b>	
第一節 「人格出產所」 .....	83
第二節 青年會的政治化 .....	99
第三節 救國論的揭櫫 .....	115
第四節 「人格救國」芻議 .....	138
<b>第四章 繁華背後 —— 青年會眾生相</b>	
第一節 留學生與文化適應 .....	148
第二節 政商界名利場 .....	157
第三節 進身之階 .....	173
第四節 望子成龍 .....	182

第五節 休閒娛樂 .....	190
第六節 世俗化的危機 .....	205
<b>第五章 求才(財?)若渴——徵求「會員」運動</b>	
第一節 徵求會的緣起 .....	225
第二節 徵求會的操作形式 .....	240
第三節 徵求會的成效評議 .....	269
<b>第六章 理想與現實之間——「人格出產所」的打造之路</b>	
第一節 會所建造運動 .....	296
第二節 艱巨的打造歷程 .....	306
第三節 「大白象」工程 .....	335
<b>第七章 結論——基督化與世俗化的掙扎</b> .....	355
附錄一 中國青年會與「三育」話語——「德育」、「智育」、 「體育」 .....	407
附錄二 全國協會歷任會長 .....	465
附錄三 全國協會歷任總幹事 .....	466
附錄四 中國基督教青年會(市會)成立年份 .....	467
附錄五 上海基督教青年會歷任西幹事 .....	469
附錄六 上海基督教青年會歷任總幹事 .....	470
附錄七 上海基督教青年會歷任董事部一覽表(1903-1922) .....	471
引用書目 .....	479
縮寫表 .....	513
索引 .....	515

# 圖表目錄

## 附圖

附圖1-1	青年會引領青年步入教會 .....	23
附圖1-2	青年會打造通往教會的道路 .....	23
附圖2-1	上海青年會早期租賃的會所 .....	60
附圖2-2	北蘇州路會所的大堂 .....	61
附圖2-3	遠眺北蘇州路會所 .....	61
附圖3-1	青年會參與社會改良運動的宣傳漫畫 .....	91
附圖3-2	青年會以德育、智育、體育培養青年的人格 .....	97
附圖3-3	青年會改造青年人格進而貢獻國家 .....	98
附圖3-4	救國方略的範式轉移 .....	126
附圖4-1	青年會饒富功利色彩的宣傳漫畫 .....	166
附圖4-2	上海青年會的社會網絡 .....	172
附圖4-3	青年會夜校學生上打字班的情形 .....	176
附圖4-4	四川路會所大堂 .....	193
附圖4-5	四川路會所閱覽室 .....	193
附圖4-6	會員打撞球的情形 .....	194
附圖4-7	上海青年會游泳池開幕的報導 .....	204
附圖4-8	四川路會所的開幕盛況 .....	206
附圖5-1	徵求會的宣傳漫畫 .....	263
附圖5-2	徵求會各隊隊長的照片 .....	267
附圖5-3	徵求會得勝隊伍的照片 .....	2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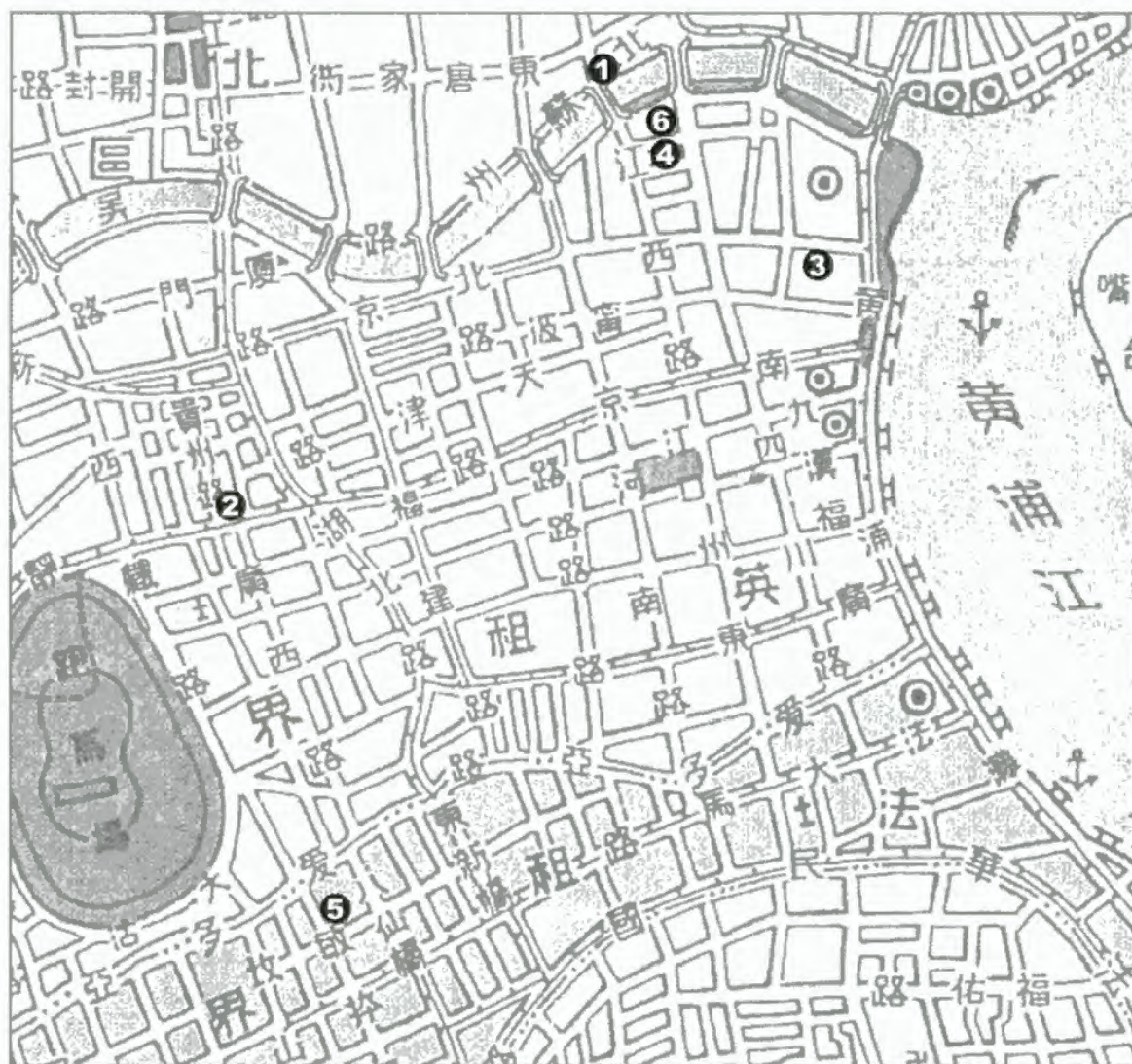
附圖6-1	青年會會所自北美移植至中國各大城市 .....	295
附圖6-2	1869年落成的紐約青年會 .....	297
附圖6-3	青年會會所的建築風潮在1910年代方興未艾 .....	303
附圖6-4	四川路會所 .....	319
附圖6-5	童子部會所募捐運動的宣傳漫畫 .....	323
附圖6-6	四川路會所及童子部擴建位置圖 .....	324
附圖6-7	童子部會所 .....	330
附圖7-1	基督教青年會為青年步入教會的階梯 .....	390

## 附表

附表1-1	青年會全國大會資料（1896-1920） .....	15
附表1-2	上海青年會開展的先導性工作 .....	32
附表1-3	青年會十年來的重大變化（1917-1926） .....	39
附表2-1	青年會早期的人事布局構想（1898） .....	46
附表2-2	上海青年會創會成員背景 .....	55
附表2-3	上海青年會創會成員關係 .....	56
附表2-4	上海基督教的統計資料（1901） .....	66
附表2-5	上海青年會經費支出（1901） .....	76
附表2-6	上海青年會經費支出（1903） .....	76
附表2-7	上海青年會會費收入（1901-1903） .....	80
附表3-1	上海人口統計（1852-1927） .....	84
附表3-2	民國初年艾迪、穆德主持的布道大會 .....	115
附表4-1	上海外僑總會一覽 .....	150
附表4-2	講道會出席人數統計表（1901-1907） .....	155
附表4-3	上海青年會夜校課程時間表 .....	175
附表4-4	上海青年會夜校學生人數（1901-1921） .....	181
附表4-5	上海青年會中學學生人數（1903-1921） .....	189

附表4-6	交際部活動出席人次 .....	201
附表4-7	體育部設施使用人次 .....	205
附表4-8	董事會下設的委員會及委員人數 (1911) .....	211
附表4-9	同宗／同志會員人數統計表 (1901-1922) .....	219
附表5-1	中國青年會會員人數 (1917-1925) .....	223
附表5-2	上海青年會經常賬目收支情況 (1900-1907) .....	226
附表5-3	第一屆徵求會規則 (1908) .....	236
附表5-4	第一屆徵求會成績 (1908) .....	239
附表5-5	上海青年會經費損益表 (1901-1908) .....	239
附表5-6	上海青年會財政收入結構 (1907-1908) .....	240
附表5-7	歷屆徵求隊長背景 (1908-1922) .....	243
附表5-8	1922年上海青年會徵求會組織架構 .....	248
附表5-9	歷屆徵求會會期及目標 (1908-1922) .....	251
附表5-10	徵求會獎賞細則 (1922) .....	254
附表5-11	1922年徵求會各隊分數比較 .....	259
附表5-12	1922年徵求會歷次公布分數及百分比 .....	261
附表5-13	歷屆徵求會徵得會員 (1908-1922) .....	270
附表5-14	徵求會會費佔經常支出百分比 (1908-1922) .....	271
附表5-15	1922年徵求會目標預算詳情 .....	282
附表5-16	民國初年社會團體舉辦徵求會舉隅 .....	286
附表6-1	四川路會所捐贈 1,000 元或以上者 .....	308
附表6-2	建築經費匯兌情況 (美元兌銀元) .....	316
附表6-3	童子部會所的估價與得標價 .....	329
附表6-4	美元匯兌銀元的走勢圖 (1882-1931) .....	335
附表6-5	寰球中國學生會董事部成員 (1906-1925) .....	350
附表7-1	中國基督教青年會 (市會) 的增長趨勢圖 .....	360
附表7-2	中國城市青年會同宗／同志會員人數統計 (1922) .....	394

## 上海青年會會址遷移圖



- ① 北蘇州路會所（上海郵政大樓現址附近）
- ② 南京路會所（上海第一食品公司現址附近）
- ③ 北京路會所（現址待考）
- ④ 四川路會所（浦光中學現址）
- ⑤ 八仙橋會所（上海青督教青年會現址）
- ⑥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會所（虎丘公寓現址）

本圖底圖來源：〈上海市街圖〉，喻守真等編著：《全國都會商埠旅行指南（全一冊）》，再版，下卷（上海：中華書局，1926），102 頁之次（局部）。

# 自序

我和基督教青年會的因緣可以追溯至約 1999 年，當時剛離開大學校園不久，由於參與一個歷史考察研究計畫，曾前往位於香港上環的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會所參觀，得知會所內的室內運動場、泳池、懸空鑊形跑道等設施均為香港首創，著名的文學家魯迅也曾在青年會舉行演講。回想當日，我對於青年會在近代中國社會曾經產生的重要影響，仍是不甚了了。孰料幾年後，我竟然隻身遠赴美國的青年會檔案室爬梳檔案——青年會甚至成為我第一部學術著作的研究課題。

早在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唸本科時（1996-1999），我已對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抱有濃厚興趣，曾經寫過一篇有關晚清基督徒王煜初的畢業論文，並期望將來唸研究院時做一個有關民國時期的基督教研究。本書的寫作，即緣於我在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兼讀碩士課程期間（2003-2007）撰寫的碩士論文。在構思論文題目時，我曾向當時在香港建道神學院任講師的邢福增博士徵詢意見。他提及中共建國後成立的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其中不少的骨幹成員均來自青年會，此現象值得加以研究（抱歉要說，現在研究業已完成，至今我仍未能全面解答這個問題）。於是我便開始翻閱中外學界有關中國青年會的著述，初步的發現是，過去的中國青年會研究主要是一些通論性的著述，對於為數眾多的城市青年會仍未有作出深入的個案研究，於是決定循此方向展開探索。



即或是再有意義的研究課題，也得有堅實的史料基礎，否則只會淪為空中樓閣。當時我瀏覽了剛出版不久的《中國教會文獻目錄：上海市檔案館珍藏資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得知上海市檔案館藏有不少青年會的檔案資料，其中尤以上海青年會的材料最為豐富；此外，我也同時向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喀晤茨家族青年會檔案室（Kautz Family YMCA Archive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查詢，也得到上海青年會的資料較其他市會更為全備的訊息，遂初步定下研究上海青年會的計畫；接著，在沒有任何人脈關係的幫助下，我去信向上海青年會（西藏南路現址）方面查詢，獲得該會提供特地為我整理的青年會資料目錄，其中一些更為上述兩所檔案館所無，並允許我前往查閱，以數位相機拍攝記錄。我和上海青年會之間的糾纏便自此展開。

對我而言，上海青年會並不是一個容易駕馭的研究課題。與我過去所做的人物研究迥異的是，上海青年會是一個規模龐大的組織，上世紀二十年代的會員有近 5,000 人，其中牽涉的人和事不知凡幾，這也意味著有待蒐集的潛在史料多如牛毛。此外，上海青年會曾不同程度介入多種社會啟蒙或改良運動（體育、衛生、教育等），任何一樁運動都足以成為一個獨立的研究課題；加上有關上海史的中外專著汗牛充棟，對於我這個少不更事的門外漢來說，要倉促步入「上海學」的研究廟堂自然是舉步維艱，非大加惡補不可。

但更大的難題還在後頭，基本上我當時所知悉的有關上海／中國青年會的原始資料（如《上海青年》）都無法在香港尋得，這意味著我得花上相當時間前往上海和美國蒐集資料，才有望完成這個研究。一般的研究生固然可以利用長假期赴外地找資料，但對於當時白天在香港中央圖書館文獻特藏組工作的我來說，如

何在工作、上課以外，利用極有限的時間，蒐集、細讀資料，撰寫論文，一直是令我困擾不已的難題。

值得一提的是，這個研究為我帶來了很多寶貴的「第一次」。為了蒐集研究資料，我在 2004 年 4 月的復活節假期首次赴滬。在不足十天的旅程中，我在上海青年會翻閱發霉、塵封的舊刊物，由白天到晚上，拿著數位相機將資料一頁頁的拍下。由於攝影經驗不足，我碰上了不少從來沒有設想到的問題，例如記憶卡和電池不敷應用、相機過熱，以及調控光暗、相機搖晃等技術問題，致最後拍攝的數千張「照片」有不少模糊不清，無法辨識內容。此外，我亦初次見識到上海圖書館、上海市檔案館等國內機關的辦事作風，學習在時間有限的情況下，仍然要保持耐性，才能期望有所收穫。當然，誠意不一定能感動人心，館員說資料不能複印，便是不容上訴的最後裁決。我曾為此氣沖沖地提早離館。

2005 年 3 月，我再度赴滬兩星期。由於吸收了前次經驗，我的拍攝技巧大有進步，並多帶了一部數位相機，每日在上海青年會內一日千「照」。是時，上海市檔案館已由仙霞路搬到外灘，氣象煥然一新，前次不允許複印的資料，如今竟然可以全本複印，頗有柳暗花明之感。同年 6 月，我耗盡所有的年假，再額外申請無薪假期，隻身展開為期十八天的美國之行，前往明尼蘇達大學查閱中國青年會的檔案。至今仍記得初抵檔案室時，由檔案員 Dagmar K. Getz 帶往低溫的檔案儲存庫（儼如冷藏庫），以及由儲存庫調出冷冰冰的文件的情景。這些都是井底之蛙的我不曾經歷過的。

我的碩士論文在拖拖拉拉的情況下，最後足足用了四年時間

才完成。在這個年頭，要花上四年光陰才能勉強拿得一個碩士學位，即或能見容於朋輩的奇異眼光（又在寫論文……），我也得為曠日持久的學習尋求自我開脫。曾有同學向我進言，勸我快點完事，無謂耽擱太久。我當然了解同學的好意，但仍是冥頑不靈，依然故我。任憑是再理智的人，也有意志薄弱的時候，要在堆積如山的資料（我在美國複印回來的資料至今仍有一半未翻閱過，希望將來有機會再續前緣）面前，長期維持高昂的作戰狀態，避免再而衰、三而竭的情況出現，在執行上並不容易；尤其當來自四方八面的各種要求、責任紛至沓來，而我卻無法在有限的時間裡同時妥貼應付，有時候的確有裡外不是人之感。坦率的說，我雖然看到自己走學術道路的可能性，但卻不得不承認個人存在的種種不足和限制，只得在理想和現實之間匍匐前行。本書雖然只是一部囫圇吞棗的小作，但它卻盛載著我至今仍能自詡的堅持和熱情。

歷史人物總是無法超越他們所身處的時代，歷史著述的作者又何嘗不是呢。我在 1999 年離開大學校園，正值亞洲金融危機、SARS 的後遺症迭次浮現的年代，除了經濟下滑、房地產泡沫爆破以外，香港很多志願團體或教育機構因為政府資助減少、捐款驟降而陷入困境（員工首當其衝自不在話下）；令人更感慨的是，這些本來滿懷理想、使命的組織或機構，在經費導向的指導原則下，不得不樂此不疲地參與各種開拓財源的遊戲，甚至是走上「大躍進」式的產業化道路。本書當然不是針對此等現象而作，但要是上海青年會昔日的歷史經驗有助啟發我們思考（當然談不上解決）基督教組織或機構，乃至於其他宗教型非營利組織（NPO）在踐履使命的過程中，如何在順應時代潮流的同時，避免走上與本來的宗旨有所乖違的道路，我想：這大概便是它在學

術意義以外的研究價值吧。

我的碩士論文可以修訂付梓出版，委實教我感到萬分喜悅，它除了代表幾年來的研究成果獲得肯定外，也實現了我一直以來期望擁有一部屬於自己的學術著作的夢想。我謹借這個機會說些感謝的話：沒有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嚴謹、獨立的評審機制，我的出版夢大抵至今仍無法實現。在此特別感謝「史學叢書」主編陳弱水教授的賞識，兩位匿名評審對拙著提出既細緻又寶貴的意見，以及編輯湯世鑄先生在編輯、出版過程中所花的心力和時間。本書曾向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投稿，兩位匿名評審也給予不少精闢的意見，在此致以謝意。我的同事朱敏翎小姐在本書的出版前夕義務為我校閱一遍，得衷心感謝。當然，得由衷指出的是，礙於我的學養和能力所限，本書在個別觀點或資料上難免存在粗疏謬誤之處，懇望學者前輩慷慨指正。

這個研究先後得到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2004-2005)、中國跨國關係研究中心(2005)，以及美國明尼蘇達大學 Clarke Chambers Travel Fellowship(2005)的經費資助開展滬、美之行，謹此一併致謝。此外，要是沒有上海青年會總幹事吳建榮先生的大力支持，單是在上海市檔案館瀏覽(時間)或複印(金錢)數以十年計的《上海青年》(遑論是《青年進步》、《同工》……)已是不可能的任務。現居美國的前上海青年會幹事駱維廉(W. W. Lockwood)的外曾孫 Peter M. Yeo，將他那篇有關駱氏與上海青年會的畢業論文，以及他收藏的青年會檔案和駱氏太太的家書一併慷慨餽贈，讓我在赴美以前對青年會檔案先有第一手的認識。我在美國青年會檔案室查閱資料期間，得到現已退休的檔案員 Dagmar K. Getz 極大的幫忙，尤其是允許我在閉館以後繼續瀏覽資料；她的繼任人 Ryan Bean 也在我申請授權使用圖片時提供

了不可或缺的幫助。

此外，美國多所大學的圖書館或檔案室的多位工作人員亦曾仗義相助，將館藏有關上海青年會的資料郵寄給我。這些資料雖然沒有一一引用，以及收錄在徵引書目裡，但仍得在此向這些專業的工作人員申謝。他們包括哈佛燕京圖書館（Harvard-Yenching Library）的 Ellen McGill、德堡大學檔案室（DePauw University Archives）的 Linda Y. Butler、洛克斐勒檔案中心（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的 Monica Blank、美國聯合衛理公會歷史檔案室（The General Commission on Archives and History for th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的 Dawn Patterson，以及春田學院檔案館（The Springfield College Archives）的 Paige W. Roberts。

客旅在外，承蒙接待的確是難能可貴的事情。在我兩次訪滬期間，均得到上海青年會幹事施健小姐協助查閱資料，並替我安排訪問原上海青年會總幹事黃祖貽先生。此外，透過舊同學周維思小姐的介紹，也得到她兩位在滬居住的表妹范明珠小姐和范明珍小姐的熱情款待。我在造訪明尼蘇達大學期間，意外認識了康考迪亞大學聖保羅分校（Concordia University, St. Paul）歷史系教授 Paul Hillmar，他的博士論文研究美國克里夫蘭（Cleveland）青年會（該會與上海青年會關係密切……）。Paul Hillmar 除了惠贈他的著作外，他的一家對我的起居照料可謂無微不至，令孤遊在外的我在枯燥乏味的故紙堆以外，獲得既溫暖又真實的美國生活體驗。

不能不提的是，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多位師長的熱心指導，以及為我帶來的種種啟迪。在師隨何傑堯博士的四年間，由於我不常在校，故沒有太多機會親領教誨，這不啻是一樁憾事；

惟幸我每次遞交的文章，均得到他的細心審閱和指導，並在我還未寫好論文結論以前，鼓勵我尋找途徑出版，教我體會到吾道不孤。他關注近代中國城市存在的種種複雜和矛盾的現象，啟發我留意上海青年會內部複雜和多變的面貌。洪長泰博士有關漫畫的研究，引發我注意刊登在《上海青年》上的漫畫，並探索圖像藝術與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可能性。陳建華博士對「革命」話語的研究，亦成為我探討青年會「三育」話語時的重要參照。

作家陳冠中嘗言：「我就是不慎看了幾本書，被罰走了三十年的幽徑。」並同時作出忠告：「啊，同學們，你們要小心大學的第一年，特別要小心那年看的書。」（陳冠中：《我這一代香港人》，增訂版（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頁147、149。）吾生也晚，來不及記取陳冠中的善意叮嚀。打從大學本科伊始，我的閒暇讀物便是現任香港建道神學院院長梁家麟博士和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副教授邢福增博士的史著，我雖然不曾成為他們的入室弟子，但他們卻是我後來踏上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這條「幽徑」的啟蒙老師。毋須諱言，我深受兩位才、學、識、德兼備的學長前輩嚴謹的治史態度所影響，並矢志以他們為學效的楷模。他們曾就本書初稿或個別篇章給予寶貴意見，也得在此一併致謝，以誌其事。

最後，我在這裡也想感謝父母多年來的養育之恩，以及容許我在未經諮詢他們的情況下，選擇唸一門不賺錢的學科。他們是本書之能成就的遠因。這個研究的初始階段，基本上與我的新婚生活相重疊，所可能產生的結果當然可想而知。撇除新婚的英國蜜月旅行以外，婚後首次和妻子淑芬外遊的地點便是上海。在滬期間，她除了協助我在上海青年會進行拍攝工作（她肯定是少數逐年逐頁翻閱過《上海青年》的其中一人）以外，亦在檔案

館替我逐字抄寫資料（翌年我趁她不在的時候，即二話不說將該份資料全本複印）。我曾想：要是她喜歡逛的是巴黎的香榭麗舍大道，而非上海的南京路，本書大概便無法寫成。多年來，她一直陪伴我追逐她並不完全明白的理想，與我一同經歷人生旅途上或大或小的風風雨雨。她對我長久的忍耐、支持和鼓勵，教我銘感於心。要是這本微末小作在學術上有任何貢獻（哪怕只是丁點兒）的話，我期望她亦會感到與有榮焉，無悔下嫁這個既沒有心肝，又不懂溫柔的「史佬」。

2010年3月29日

張志偉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 第一章 導言

二十世紀初葉，在義和團亂事平息以後，基督教經歷了自 1807 年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入華以來未見的黃金時期；而其中基督教青年會（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MCA]，下稱「青年會」）在中國各大城市方興未艾的發展趨勢，更是極具代表性的說明。然而，較鮮為人知的是，在中國青年會運動表面的風光背後正被深重的身分危機（identity crisis）困擾不已：

青年會這樣的組織，蓄意在那裡呢？豈是單做個講善書、日夜學、遊戲場、俱樂部的集合所嗎？那麼目下講善書的場所林立，日夜學的興辦，遊戲場的發達，俱樂部的精進，完備美好各臻其妙的多的很咧，何用這年費鉅萬、勞精勞力的青年會，與人家互競長雄呢？如此青年會的蓄意在那裡？<sup>1</sup>

青年會的事業究竟是甚麼？有人以為青年會是慈善機關，凡關於慈善的事業，青年會都應當作；有人以為牠為教育機關，凡牠的設施，莫不為要造成「完人」；有人以為牠不過是社會與教會間的段階、介紹人，教會既已有了交誼禮堂，青年會就可不必存在了；甚至有人以為衛良佐治

---

<sup>1</sup> 楊益惠：〈基督教青年會是甚麼（續第三期）〉，《上海青年》第20卷第15號（1921年5月13日），頁7。



〔George Williams〕所倡的那種宗旨完全不適宜於現世。總而言之，我們對於這根本的問題，似乎缺少深切的覺悟和澈底的見解。<sup>2</sup>

上述對青年會的身分和定位存在茫然無知的困惑若出自社會人士口中，或許只是反映了青年會在宣傳工作方面尚有改善空間；但這種質疑卻不約而同地出自理應最了解青年會宗旨的資深幹事口中，箇中的情況便顯得殊不簡單，值得我們從塵封的檔案史料中，重新檢視這個對於過去中國青年會研究者來說，似乎是再清楚不過的「根本」問題——究竟，青年會是甚麼？「青年會是甚麼？」這個提問背後進一步反映甚麼問題？

本書主要探討的是，二十世紀初年中國青年會運動所遭逢的身分危機的來龍去脈，並進一步揭示這一場目光遠大的基督教信仰運動，在中國社會逐漸走向世俗化的發展歷程。

## 第一節 青年會與近代中國

### 一、肇始於英美

1844年6月，青年會於英國倫敦創立，由喬治·威廉（George Williams）為首的十二名布店文員發起，前身為一個祈禱小組，成員分別是來自當時四個主要基督教宗派的平信徒（lay men）。青年會以基督信仰改善當時在職青年的個人道德和社交生活為宗

---

<sup>2</sup> 陳立廷：〈對於青年會的新年感想〉，《同工》第37號（1925年1月），頁3。陳立廷在別處亦說：「青年會事業昔盛而今衰，引起社會一般人與一部分同工對於青年會事工發生懷疑（青年會是甚麼）。」陸幹臣編：《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少年事業幹事討論會紀錄》（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少年部，1927），頁59。上海市檔案館檔案，U120-0-40。

旨，作為對工業革命衍生的社會及道德問題的回應；早期活動除了舉辦聖經班以外，亦在租賃的房子中設立圖書館，舉行演講及教學等活動，並由專職幹事（secretary）主理。迨至 1851 年，青年會先後擴展至英國、蘇格蘭和愛爾蘭等地的十六個城市。<sup>3</sup>

肇始於英國的青年會運動，不久也被來自北美造訪青年會的人士移植回國。1851 年，加拿大蒙特婁（Montreal）和美國波士頓（Boston）先後各自成立首個青年會。1854 年，美、加兩國合共二十二個青年會代表於美國水牛城（Buffalo）召開會議，決議成立一個以獨立、平等與合作為宗旨的青年會聯盟組織。翌年，來自九個國家近百名青年會代表於巴黎組成世界青年會聯盟（World's Alliance of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通過《巴黎本旨》（Paris Basis），作為會員國共同信守的信仰綱領。

青年會雖然發源自英國，但在美國的發展更為蓬勃。<sup>4</sup> 1860 年，美國已有 205 個城市設立了青年會，會員人數更高達 25,000 人。迨至 1879 年，北美青年會正式成立青年會國際委員會（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下稱「北美協會」），總部設於美國紐約。北美青年會早期的事工內容不一，並未形成任何常規或定制，但仍以宗教活動為主。直至 1866 年，紐約青年會總幹事麥克班尼（Robert R. Mcburney）正式提出以改良青年的德育、智育、體育和社交的「四重計畫」

<sup>3</sup> C. Howard Hopkins, *History of the Y.M.C.A. in North America* (New York: Association Press, 1951), p. 6.

<sup>4</sup> 「英倫一隅雖為青年會發祥之地，而會中事業之發達，則實遠遜於澳美二洲，此亦耐人尋味者也……」〈世界青年會之現狀（節錄中華教育界）〉，《上海青年》第13卷第21號（1914年6月12日），頁2。另參 C. Howard Hopkins, *History of the Y.M.C.A. in North America*, p. 23.

(fourfold program) 以後，青年會遂確立以會所為中心的事工計畫 (a program which centered around a building)，並以 1869 年於紐約落成的現代青年會會所作為起點；<sup>5</sup> 其影響不僅及於北美青年會，更透過北美協會在十九世紀末推動的海外工作 (foreign works)，擴展至世界各地。

早在 1903 年，梁啟超在日本出版的維新報刊《新民叢報》便有報導說：「又今世界基督教最有力之團體，為美國之基督教青年會，其會員之數，三十萬人，其資產有六千萬圓云。」<sup>6</sup> 及至二十年代，青年會在世界各地的發展更有如日方中之勢：「自英子爵衛廉佐治發起青年會以來，考其歷史雖不過七、八十年，而其發達現象實足驚人，三角形之旗幟範圍及於全球二十三國。」<sup>7</sup> 毋怪乎傳教史家賴德烈 (Kenneth S. Latourette) 後來評價青年會的歷史地位時說：「在十九和二十世紀，基督教青年會構成了基督教驚人的活力的其中一項最值得留意的表達。」<sup>8</sup>

## 二、移植至中國

打從十九世紀中葉伊始，中國作為西方基督教世界最重視的宣教地區，不僅構成北美協會海外工作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更是持續投放最多資源的單一國家或地區。<sup>9</sup> 事實上，早在北美協

---

<sup>5</sup> L. L. Doggett, *Life of Robert R. McBurney* (Cleveland, OH: F.M. Barton, [1925]), p. 87.

<sup>6</sup> 〈世界各教之人數〉，《新民叢報》第32號 (1903年5月)，頁6 (總頁110)。

<sup>7</sup> 〈入會之益〉，《上海青年》第19卷第9號 (1920年3月26日)，頁5。

<sup>8</sup> Kenneth S. Latourette, *World Service: A History of the Foreign Work and World Service of 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New York: Association Press, 1957), p. ix.

<sup>9</sup> Kenneth S. Latourette, *World Service*, p. 245.

會派遣「西幹事」入華開展青年會工作以前，中國各地已有一些非正式的青年會活動。自 1885 年開始，先後有三個學校青年會（當時稱「基督會」<sup>10</sup>）於福州英華書院、北通州潞河書院及杭州育英書院分別成立，創辦人均為學生時代曾參與青年會活動的西方傳教士。當時各學校青年會的組織均十分簡單，除了每星期舉行宗教集會外，主要活動為讀經、傳道等，個別的學校青年會之間彼此獨立、互不聞問。

恰好在同一時期，北美協會正為開展海外工作進行訪問調查，並派遣巡迴幹事魏夏德（Luther D. Wishard）於 1889 年和 1890 年兩度來華，調查中國各地學校青年會的活動情況。1890 年，魏夏德在上海舉行的全國基督教會議上曾經發表演說，表示北美協會願意與寓華的傳教士一同為中國的福音化（evangelicalization）而努力。<sup>11</sup> 大會最後通過一項決議：「贊成基督教青年會之宗旨，並聯合商請北美青年協會選派代表來華，根據美國青年會之經驗，提倡同樣之事業於中國。」<sup>12</sup> 在魏氏寓華期間和返美以後，北京、煙台、上海、漢口、天津等地的傳教士先後向北美協會提出設立青年會的邀請。魏夏德最後的調查結論是：「認為北美各青年會負有協助中國，締設有力之學生青年會於全國之義務。」<sup>13</sup>

迨至 1895 年 10 月，北美協會始正式派遣首位西幹事來會

<sup>10</sup> 1896年6月出版的《基督會報》可為佐證。

<sup>11</sup> D. MacGillivray ed.,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Being the Centenary Conference Historical Volume*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7; reprint,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1979), p. 597.

<sup>12</sup> 余日章：《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史略》（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27），頁1。

<sup>13</sup> 余日章：《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史略》，頁1。

理 (David W. Lyon) 來華開展青年會工作，並以天津作為發展學校工作的起點，「以其時天津教授西學之各學校，組織頗有系統也」。<sup>14</sup> 1896年7月，北美協會學生部總幹事穆德 (John R. Mott)，以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 (World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 發起人的身分應邀來華，進行為期三個半月的訪問，期間與來會理巡視了中國各地的教會學校。<sup>15</sup> 穆德訪華所獲得的重要成果是，在原有的三個學校青年會以外，另外新成立二十二個。他同時出席了在11月3日至5日於上海召開的青年會全國代表大會 (即後來定期舉行的青年會全國大會，詳見附表1-1)，當時共有二十二個學校青年會代表出席，會中正式成立全國性的統籌組織「中國學塾基督幼徒會」，發揮聯繫及指導各地學校青年會的作用。<sup>16</sup>

1900年1月，上海作為試點，設立了首個城市青年會，標誌著中國青年會的工作重點，由城市學生逐漸擴至在職青年的重要里程碑。來會理後來回憶發展城市青年會工作的因由時說：

方青年會之來華也，自信對於學生界，負特別之使命。至1901年之冬，乃覺欲為學生界造福，須採較新之方法，否則青年會工夫，勢將僅限於教會學堂之內；此外中國各地極有勢力之學生團體，將無以兼顧之。此等學者，

---

14 來會理：《中華基督教二十五年小史》（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20），頁3。有關來會理的生平，可參梁士純：〈來會理博士之去思〉，《同工》第89號（1930年2月），頁2-5。

15 有關穆德在世界基督教學生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可參王美秀：〈試評基督教學生運動中的穆德〉，《世界宗教研究》第4期（1987年12月），頁67-81。

16 John R. Mott, *Strategic Points in the World's Conquest: Th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s Related to the Progress of Christianit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Y.M.C.A., 1897), pp. 133-151.

附表 1-1 青年會全國大會資料（1896-1920）

屆次	舉行年份	舉行地點	各地代表出席人數
第1屆	1896	上海	36
第2屆	1899	上海	54
第3屆	1901	南京	156
第4屆	1902	上海	200
第5屆	1907	上海	343
第6屆	1912	北京	437
第7屆	1916	上海	-
第8屆	1920	天津	1,500

資料來源：〈召集全國青年大會〉，《民國日報》，1920年3月7日，第3張，第10版。

散佈各省，數約在百萬以上，未容忽視也。又開闢商埠之各地，每多已受教育之子，青年會允宜對之作有力之服務。<sup>17</sup>

自此以後，隨著北美協會陸續派遣西幹事來華，加上中國各地不同社會人士發出邀請，城市青年會先後於中國各地設立（見附錄三）。由於青年會的工作已擴展至在職人士，加上韓國和香港均相繼成立了青年會，並派出代表加入中國青年會運動，1902年5月，中國學塾基督幼徒會在舉行第三次全國大會時，遂易名為「中韓香港基督教青年合會」：

一因青年會，不惟設於學塾，並設於商賈〔城市〕，故將

<sup>17</sup> 來會理：《中華基督教二十五年小史》，頁5-6。

學塾二字刪去，名為青年會，冀彼此聯絡，均得裨益；一因高麗、香港各有青年會，合併為一，故更名曰「中韓香港基督教青年會」。<sup>18</sup>

迨至 1912 年，「中韓香港基督教青年會」易名為「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組合」；1915 年，再易名為「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下稱「全國協會」）。

青年會傳入中國之際，適值中國社會轉向西方尋找富強之道的當口。青年會除了積極引入西方文化（如科學、衛生、體育）外，亦致力推展各種社會改良活動（如歐戰華工服務、平民教育、公民教育）；其所鼓吹的「人格救國」主張，更成為新文化運動期間，國人尋求救國出路的選項之一。<sup>19</sup> 1920 年，青年會的足跡已遍及中國 17 個省份，先後成立了 30 個市會及 170 個校會，會員人數逾 50,000 人，成為二十世紀初年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基督教團體之一。<sup>20</sup>

---

18 〈青年大會聚於上海紀〉，《青年會報》第 3 冊（1902 年 9 月），頁 5b。是次會議通過的章程，可參中韓香港基督教青年會公定：《中韓香港基督教青年會典章》（上海：中韓香港基督教青年會，1902）。

19 詳參梁家麟：〈五四前後新文化思潮與基督教〉，見梁家麟：《徘徊於耶儒之間》（臺北：宇宙光出版社，1997），頁 212-228。

20 「近年來基督教青年會進步甚速……」阮湘編：《中國年鑑》，第 1 回（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臺北：天一出版社，1973 重印），頁 1991。另參 Kenneth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29), p. 584.

## 第二節 研究題旨及方法

### 一、研究取向

青年會與近代中國的種種因緣，很早便已成為作家筆下的創作素材。<sup>21</sup> 當然，歷史學者並不讓他們專美，對於青年會在近代中國的歷史發展和貢獻，亦從不同的角度加以討論。<sup>22</sup> 總的來說，過去的研究主要將青年會置放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國社會改良運動兩種宏觀歷史脈絡下理解。

#### (一) 清末的改革氛圍？

從跨文化角度研究中國青年會的學者常有的論調是，清末的改革氛圍為青年會在中國的發展提供了難得的契機。左芙蓉以下的說法頗具代表性：

青年會在中國的初期事業非常順利，除了美國方面的因素以外，中國國內的形勢巨變也起著有利的作用。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因此，滿清統治者和文人學士對於西

21 參Jean Fritz, *Homesick: My Own Story* (New York: Putnam, 1982); John Hersey, *The Call* (New York: Knopf, 1985). 兩位作者的父親均為青年會西幹事，其中以後者最為人所熟知。可參John K. Fairbank, *China Watc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27-34; 陳瑞紅：〈文化壁壘間的苦澀人生——試論赫西的長篇小說《召喚》〉，《懷化學院學報》第22卷第4期（2003），頁57-60；張弘：〈中美文化關係研究的一種模式——以赫西的小說《召喚》為個例〉，《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期（2005），頁86-92；陶飛亞：〈講述「新傳教士」的故事——《召喚》解析〉，收入陶飛亞：《邊緣的歷史——基督教與近代中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277-299。

22 詳參左芙蓉：〈中國基督教青年會歷史研究述評〉，吳梓明、吳小新主編：《基督教與中國社會文化：第一屆國際年青學者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2003），頁411-434；陶飛亞、楊衛華：《基督教與中國社會研究入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頁124-130。



方宗教的態度也逐漸開始改變。這就為青年會在中國的發展營造了一種良好的氣氛。<sup>23</sup>

也就是說，中國青年會之所以在二十世紀初年取得空前的成就，乃是當時宏觀的歷史條件使然。<sup>24</sup>

持平而言，這種說法當然不無道理；但它並不足以充分解釋青年會能在當時各種思潮或主義中脫穎而出的原因。此外，過分強調中國青年會運動乃是清末順天應人之舉，除了容易陷入歷史決定論的桎梏外，更容易給人過分浪漫化的印象，嚴重忽略了青年會創始時期所面對的艱鉅局面。上述首位入華的青年會西幹事來會理嘗以「探險時代」來形容早期青年會的發展情況：

此時期〔1895-1901〕以嚴格而言之，可稱為探險時代。……除了少數之中國基督徒外，青年會三字絕少知者。青年會處此時代，正有類暗中摸索，企得光明也。<sup>25</sup>

事實上，正如賴德烈指出，中國青年會所推動的「四重計畫」，並非依樣葫蘆從北美青年會複製過來，乃是中、西幹事按中國的

---

23 左芙蓉：《社會福音·社會服務與社會改造——北京基督教青年會歷史研究（1909-1949）》（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頁61。但她在後文又帶點自我矛盾地說：「萬事開頭難，北京青年會初期的事務極其繁多，人手又非常缺乏。」（頁66）

24 另參Shirley S. Garrett, *Social Reformers in Urban China: The Chinese Y.M.C.A., 1895-1926*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2, 45; Kimberly A. Risedorph, "Reformers, Athletes and Students: The YMCA in China, 1895-1935" (Ph. D Dissertation,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94), pp. 5-9; Jun Xing, *Baptized in the Fire of Revolution: The American Social Gospel and the YMCA in China, 1919-1937* (Bethlehem: Lehigh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Cranbury, NJ: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 1996), p. 48.

25 來會理：《中華基督教二十五年小史》，頁3。任夫回顧中國青年會早期情況亦說：「青年會發軔之初，各界多未深悉其性質與內容，以故取旁觀態度而不與合作，此第一時期也。」任夫：〈十年來吾國青年會之重大變化〉，《青年進步》第100冊（1927年2月），頁243。

實際情況加以調整。<sup>26</sup> 要是歷史潮流不為人的意志所轉移，中國青年會運動的蓬勃發展乃是當時的大勢所趨；那麼，青年會中西幹事在具體的歷史場景中所作的反省和努力，便很容易被學者忽略或低估。長期參與青年會工作的顏惠慶，特別強調青年會獲得成功的多重因素：「青年會所以如此的受我國人民歡迎愛戴，當然是因為宗旨的高尚，成績的完美，辦法的新穎合時，以及幹事的有才具，有熱心。」<sup>27</sup> 這種見林不見樹的偏差最容易在跨文化或宏觀的論述架構中得見。

在二十年代以後，中國社會經歷劇烈的轉變，從前有利青年會發展的歷史條件相繼失去，青年會的影響力亦大不如前，學者在跨文化的分析框架下，亦容易傾向從外在的環境因素，說明青年會運動無可避免面對失敗的命運。左芙蓉便說：「毫無疑問，青年會在中國的失敗，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最主要的原因還應從跨文化的角度去考慮。」<sup>28</sup> 邢軍認為：「……正是變化中的社會和政治環境使得社會福音最初成功、但最終失敗。」<sup>29</sup> 這種說法當然並非無的放矢，但它最大的問題是，對於青年會運動本身存在的內在問題，似乎視若無睹。事實上，我們只要稍稍翻閱

<sup>26</sup> Kenneth S. Latourette, *World Service*, p. 252.

<sup>27</sup> 顏惠慶：〈三十五年前的上海青年會〉，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編：《力的創造：上海青年會三十五週年紀念冊》（上海：上海基督教青年會，1935），頁7。謝扶雅亦說：「雖云青年會事業，適應時勢之需求，要非該會自身有積極進取的服務精神，決不能推擴以行遠，如置郵而傳命也。」謝扶雅編著：《基督教青年會原理（草版）》（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22），頁45-46。

<sup>28</sup> 左芙蓉：〈中國基督教青年會歷史研究述評〉，頁428。作者這篇文章（頁423-429）被大幅度和幾近一字不漏地剽竊到一篇碩士論文去。詳參劉子楠：〈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與中國近代教育〉（福州：福建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未刊稿，頁12-15。

<sup>29</sup> Jun Xing, *Baptized in the Fire of Revolution*, p. 17. 譯文摘自邢軍著，趙曉陽譯：《革命之火的洗禮：美國社會福音和中國基督教青年會（1919-193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7。

二十年代全國協會出版的《同工》雜誌，當不難發現中、西幹事對於青年會內部的種種問題，不乏深入的自我反省和檢討（詳見第七章）。過去學者所做的宏觀研究，對於這些微小的時代聲音，似乎並未予以足夠的關注。

## （二）社會福音？社會改良？

不少學者談及青年會對於二十世紀初年中國社會所產生的影響時，往往會提到各種社會改良運動取得的成績，並將其背後的因由，訴諸十九世紀末在美國興起的社會福音神學：

美國社會福音 → 中國青年會 → 中國社會改良運動

左芙蓉便嘗言：「青年會在近代中國社會的活動，均是受此〔社會福音〕神學的影響。」<sup>30</sup> 邢軍也曾指出：「社會福音事工給中國基督教青年會的社會改造提供了青年會需要的自由主義選擇，或說提供了具有競爭力的思想。」<sup>31</sup> 事實上，社會福音本身可以是一個動態而非靜態的概念，青年會在詮釋和應用的過程中，也可以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不同關懷。有研究十九世紀末興起的美國大學青年會運動（college YMCA movement）的學者指出，它的神學思想便先後經歷了關注個人福音的保守福音主義（conservative evangelicalism, 1858-1888）、強調個人和群體的道德改良的自由福音主義（liberal evangelicalism, 1888-1915），以及關注社會公平的多元自由新教主義（pluralistic liberal Protestantism, 1915-1934）三個階段。<sup>32</sup>

30 左芙蓉：《社會福音·社會服務與社會改造》，頁19。

31 引自邢軍著，趙曉陽譯：《革命之火的洗禮》，頁60。

32 詳參David P. Setran, *The College"Y": Student Religion in the Era of Seculariz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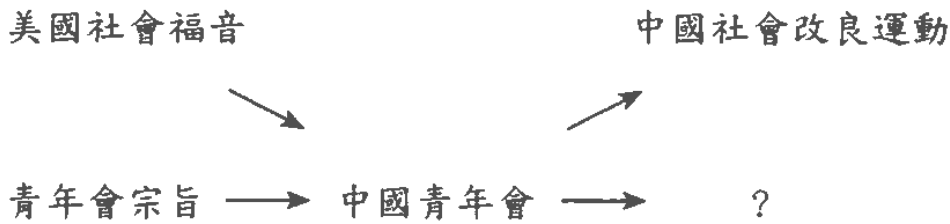
我們當然無需將此「三階段論」應用到中國青年會的發展歷程上，並對兩者作出整齊的排比或對照。筆者這裡倒想指出的是，籠統且一以貫之地以社會福音來詮釋青年會在近代中國的發展，除了有欠精準，也必然將原來綿延起伏的歷史面貌變得平面化；此外，與進步主義時代的美國比較，近代中國的國勢危如累卵，中國基督徒能否樂觀地認信天國可以立時降臨至人間，已是一大疑問：

二十世紀的中國教會並無真正的「社會福音派」，那些主張以福音救國的根本與十九世紀末盛行的社會福音派並無直接關連；雖然驟眼看來他們有某些共同的主張，但骨子裡卻是兩碼子的事。活在二十世紀烽煙四起、民不聊生的中國，再樂觀的人想怕也不會像「進步主義時期」的美國那樣，相信天國可以實現在地上吧！他們之所以積極地參與文化改造、社會建設，與其說是朝向某個由信仰提供的烏托邦理想而奮鬥，不若說是針對不能不設法營救的社會現實——總不能袖手旁觀、總得做點事吧，而信仰只為他們提供面對現實的理據與精神動力。用社會福音派的理論來詮釋他們的實踐，必然緣木求魚，難有所得。<sup>33</sup>

即或我們不談社會福音論的有效性，過分強調青年會在近代中國社會實踐方面的貢獻，亦容易將中國青年會運動簡化為單純對政治、社會問題的回應（「挑戰——回應」），嚴重忽略了中國青年會可以擁有本身的發展議程（agenda）：

---

<sup>33</sup> 梁家麟：〈梁序〉，謝龍邑：《委曲求全？：吳耀宗的生平與救國情懷》（香港：基道出版社，1995），頁X。



事實上，中國青年會在不同層面的社會實踐，理論上均指向引領青年加入教會：「青年會之本旨，乃引人信仰真主，為入教之階梯。」<sup>34</sup>（附圖 1-1、1-2）；至於理想和現實間存在多大程度的落差，當然值得我們再作討論。但可以肯定的是，任何將中國青年會運動矮化為單純的社會改良運動（哪怕帶有基督教元素），要不是存在捨本逐末的危機，亦勢將妨礙我們更全面認識本來的歷史面貌。

### （三）機構化

David P. Setran 新近的研究同時揭示了青年會研究者過去較少留意的一點——就是青年會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美國大學校園經歷了由一場「運動」轉向一個「公共機構」（from a movement to an institution）的發展歷程。在穆德主政的年代（1888-1917），透過大規模建造提供全面服務的會所（full-service buildings）、聘用受薪職員，以及承擔學生服務的責任，青年會分會（chapters）漸次成為美國大學校園內的公共機構。<sup>35</sup>事實上，這種「機構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的描述既適用於同期北美城市青年會的情況，<sup>36</sup>而同樣的發展模式亦在穆德推動下移植

<sup>34</sup> 《青年會第一次幹事會報告》（上海：基督教青年會，1912），頁26。

<sup>35</sup> David P. Setran, *The College "Y": Student Religion in the Era of Secularization*, p. 247.

<sup>36</sup> 詳參Super Paul, *What is the YMCA? A Study in the Essential Nature of 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New York: Association Press, 1922), pp. 15-22.

附圖 1-1 青年會引領青年步入教會



圖片來源：*"Another Years Progress 1913"*, *Annual Report of 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of China* (Shanghai: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of China and Korea, 1914), p. 15.

附圖1-2 青年會打造通往教會的道路



圖片來源：*Annual Report of 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of China for 1917* (Shanghai: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of China, 1918), p. 9.

到中國的各大城市。如孫科在三十年代所說：

基督教青年會者，凜遵基督教旨以服務社會之機關也。是以所至之處，必首倡慈善，募集基金，大邑通都，層樓聳峙，儼居社會之中堅，而為青年之總匯。<sup>37</sup>

姚西伊曾批評，過去的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基本上一直採取「社會—文化」取向（social-cultural approach）。<sup>38</sup> 要是將同樣的描述應用於中國青年會研究的討論之上，筆者則以為過分偏重「社會—文化」的研究取向，容易令我們忽略青年會作為一個機構本身既多元又複雜的內部生態面貌，例如中國青年因何加入青年會？青年會會員的社會成分（social composition）是甚麼？青年會的財政狀況如何？青年會日常的運作經費從何而來？青年會內部的日常運作情況是怎樣？青年會會所的興建過程是怎樣？……事實上，這些在宏大論述中看似微不足道的問題，對於青年會的當事人來說，不僅是平日最教他們耗費心神的事情，甚至可以說是與青年會存亡攸關的頭等大事。<sup>39</sup>

事實上，不少研究美國慈善機構的學者，已將「機構化」作為一個機構的發展過程（process）來審視。研究十九世紀美國聖經公會（American Bible Society）的 Peter J. Wosh 嘗指出，學者對美國不少慈善機構的成立及早期歷史非常關注，然而對於它們

---

37 孫科：〈青年會與中國民族〉，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編：《力的創造：上海青年會三十五週年紀念冊》，頁8。

38 Kevin Xiyi Yao, *The Fundamentalist Movement among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1920-1937*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3), pp. 2-3.

39 王棟在她2007年出版的廣州嶺南大學研究中，探討了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者很少注意的財務管理問題。Dong Wang, *Managing God's Higher Learning: U.S.-China Cultural Encounter and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Lingnan University), 1888-1952*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7), pp. 87-106.

的演變歷程卻所知甚少。尤其是較少歷史學者關注一個有特定目標的組織，如何因應本身的存續需要，以及回應客觀的需要和機遇，在經營手法上採取新的形式和結構。他指出：「了解這個過程特別來得重要，因為這些業經轉型的機構，而不是原來的組織對美國人的生活常常施以影響。」<sup>40</sup> 同理，中國青年會在愈趨「機構化」的過程中，如何在近代中國的宏觀與微觀的歷史環境相互激盪下，在踐履使命與本土實踐之間拿捏分寸，逐步建立起自身的組織文化及行為，而不是將美國青年會的宗旨使命原封不動地全盤移植或照單全收，似乎更能反映複雜多變的歷史面貌。因此之故，本書嘗試採取「反求諸己」的研究進路，從內部組織（internal organization）的角度來檢視中國城市青年會的運作機制，從而揭開有關青年會的身分危機的謎團。

## 二、個案研究

如所周知的是，中國幅員廣大，中國青年會運動當然不可能不因地制宜，從各地的實際情況制訂具體的政策方針。誠如左芙蓉所說：

…… 因此，將城市青年會的發展擺放到其所在的區域和城市  
市中加以研究，探討青年會在不同城市的社會變遷中的角  
色以及其互動關係，應該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sup>41</sup>

隨著中國青年會運動的基本面貌、線條輪廓愈益清晰，進行較深入和細緻的城市青年會個案研究，將有助我們進一步了解整個運動的細部肌理及骨骼結構。事實上，近年有關城市青年會

<sup>40</sup> Peter J. Wosh, *Spreading the Word: The Bible Business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

<sup>41</sup> 左芙蓉：〈中國基督教青年會歷史研究述評〉，頁430。



的研究已日見其多，先後已有多位學者撰文討論有關漢口、<sup>42</sup> 太原、<sup>43</sup> 北京、<sup>44</sup> 長沙、<sup>45</sup> 廣州、<sup>46</sup> 天津、<sup>47</sup> 廈門、<sup>48</sup> 寧波、<sup>49</sup> 杭州<sup>50</sup> 等地城市青年會的不同歷史課題。不過，就研究深度而論，在眾多的城市個案研究中，當以左芙蓉有關北京青年會的研究

- 
- 42 梅川：〈抗戰前的漢口基督教青年會〉，《武漢文史資料》第2期（1994），頁167-170。
- 43 梁藝府：〈太原基督教青年會〉，《文史月刊》第5期（1997），頁169-172。
- 44 楊靖筠：〈北京基督教青年會與女青年會〉，《北京聯合大學學報》第16卷第3期（2002年9月），頁11-15；杜玉梅：〈新中國成立前北京的基督教青年會〉，《北京檔案史料》第4輯（2006），頁268-286。
- 45 李陵：〈基督教青年會落戶長沙原因探析〉，《邵陽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第1期（2002年8月），頁71-72；李陵：〈長沙基督教青年會前期活動述評〉，《湖南行政學院學報》第2期（2003），頁73-74；李陵：〈長沙基督教青年會與湖南抗日救亡運動〉，《求索》第3期（2005），頁192-194；李陵：〈長沙基督教青年會抗戰時期的難民救濟工作〉，《船山學刊》第3期（2005），頁90-92。
- 46 申芳：〈廣州基督教青年會在抗戰期間的社會服務事業〉，第二屆「基督教與中國社會文化」國際年青學者研討會宣讀論文（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2004年12月9至14日），未刊稿；盧海標：〈廣州基督教青年會在韶關的愛國救難活動述評〉，《五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8卷第1期（2006年2月），頁39-42；盧海標：〈廣州基督教青年會的「四育」活動和國難服務述評〉（廣州大學人文學院碩士論文，2007），未刊稿；盧海標：〈廣州基督教青年會抗戰前活動述評〉，《宗教學研究》2008年第2期（2008年6月），頁106-111。
- 47 詳參收錄在羅世龍主編的《天津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與近代天津文明》（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一書內的多篇文章；另侯杰、王文斌：〈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與近代中國城市社會——以天津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為例〉，《理論學刊》第6期（2007年6月），頁92-96。
- 48 余丰：〈簡論廈門基督教青年會對民國時期廈門社會事業的促進作用〉，《臺灣源流》第40期（2007年9月），頁122-139。
- 49 任衛華：〈寧波基督教青年會研究〉，《寧波廣播電視大學學報》第4期（2007年12月），頁122-125。
- 50 周東華：〈青年會與民國初年浙江的社會公益教育〉，《江浙學刊》第4期（2009），頁198-203。
- 51 詳參左芙蓉：〈主流與邊緣：北京YMCA社會服務角色的歷史考察〉，卓新平、薩耶爾（Josef Sayer）主編：《基督宗教與當代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頁197-211；左芙蓉：〈北京基督教青年會的歷史研究現狀與檔案資料綜述〉，《北京社會科學》第3期（2004），頁47-51；左芙蓉：《社會福音·社會服務與社會改造》。

用力最深，她以社會福音、社會服務和社會改造作研究主線，從檔案資料的掌握、個別專題的探討，進一步撰成獨立的專論。<sup>51</sup>

左芙蓉的《社會福音·社會服務與社會改造：北京基督教青年會歷史研究，1906-1949》勾勒了北京青年會自二十世紀初年，以迄中國共產黨建國前的歷史發展，對於我們了解北京青年會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創生和發展，當然不無貢獻。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作者運用了藏於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喀唔茨家族基督教青年會檔案室（Kautz Family YMCA Archive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有關北京青年會的檔案資料，有助填補中文資料闕失不詳的地方。不過令人意外的是，有關北京青年會最基本的中文參考資料，如該會的定期刊物《北平青年》竟付諸闕如，<sup>52</sup> 全國協會的出版物（如《青年》、《青年進步》、《同工》等）亦一概從缺。<sup>53</sup> 不難想像的是，這樣一部涵括四十年的歷史專論，無論是基本史實的敘述，抑或是在此基礎上進行的立論，均難免有捉襟見肘、左支右絀的弊病。<sup>54</sup>

筆者在這裡推薦唐日安（Ryan Dunch）的《福州基督徒及近

52 部分《首都青年》、《北平青年》和《北京青年》皆藏於上海市檔案館，參上海市檔案館、美國舊金山大學利瑪竇中西文化歷史研究所合編：《中國教會文獻目錄：上海市檔案館珍藏資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176、179-180。

53 其中有關北京青年會的記載，可參〈北京青年會〉，《青年》第15卷第4號（1912年6月），頁156；京會：〈北京基督教青年會之歷史〉，《青年進步》第40冊（1921年2月），頁81-82。研究青年會體育事業的蔡政杰曾坦率地說：「以青年會的機關雜誌——《青年進步》雜誌為例，筆者遍尋臺灣各圖書館，僅在中華福音神學院發現零星四冊，在此狀況下，對研究內容之完整性必有所限制。」蔡政杰：〈非基督教運動（1922-1927）對基督教青年體育事業發展之影響〉，《國立臺北師範學院學報》第16卷第2期（2003年9月），頁285。

54 筆者對該書所作的評論，詳參張志偉：〈評左芙蓉：《社會福音·社會服務與社會改造：北京基督教青年會歷史研究，1906-1949》〉，《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第8期（2008/2009），頁119-123。

代中國》（*Fuzhou Protestants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hina, 1857-1927*），該書雖然不是一部專門研究青年會的專著，但是卻在堅實的中外青年會史料的基礎上，花上不少篇幅論及福州青年會在二十年代以前的發展情況，以及其與近代中國國家建設的關係。其中的深刻論述與精闢見解，較不少城市青年會個案研究有過之而無不及，也在不同程度上補充或印證了本書的部分觀點，饒富參考價值，惜該書未為多數青年會研究者所注意。<sup>55</sup>

與上述的城市青年會研究不同的是，本書以上海青年會作為研究個案，在中外檔案、史料的基礎上，試圖追溯一個城市青年會在二十世紀初年中國獨特的歷史場景下，如何在上海這個近代中國城市創生、發展，並進而對社會發揮影響力的歷程；與此同時，透過揭示上海青年會在實踐使命的過程中，徘徊在基督化與世俗化之間所面臨的困境，讓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了解基督教在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的過程中較鮮為人知的一頁歷史。

這裡要強調的是，與其他城市青年會比較，上海青年會有以下特點，值得我們加以注意：

第一、上海青年會為中國城市青年會運動的揭櫫者。北美協會巡迴幹事魏夏德在 1890 年訪華以後曾這樣說：

在上海，我們如能創立一個極著成功的青年會，（我相信是可能的），那麼對於香港，廈門，北京，及其他已與基督教接近的城市，當然能給予一個極好的模範。<sup>56</sup>

---

<sup>55</sup> Ryan Dunch, *Fuzhou Protestants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hina, 1857-192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sup>56</sup> 來會理：〈中國青年會早期史實之回憶〉，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編：《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五十週年紀念冊（1885-1935）》（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1935），頁185。

以上海青年會作為試點，進而將青年會複製至中國各大城市，一直是北美協會的事工發展策略。上海青年會於1900年創立，為中國第一個以在職人士為服務對象的城市青年會，後來亦成為其他城市青年會的範例：

在青年〔會〕運動中，牠〔上海青年會〕有第一個近代式會所，第一個體育館，第一個游泳池，第一個公共體育場。牠首先開辦職業學校，商業學校，首先提倡講演會，音樂會，辯論會和研究班等。體育方面，如田徑賽，籃球，網球，足球，排球等……推其原始，是由〔上海〕青年會首先介紹到中國的。<sup>57</sup>

舉全中國青年會，以上海為最大，成立最先，辦法亦最完備，今童子會之建設，亦為他處之先進，則上海一處，將來可為全國青年會模範，其影響所及，詎不大哉！<sup>58</sup>

1922年出版的在華傳教事業調查報告這樣說：「上海——這是全國最大的市青年會。……這個城市青年會在一個很特殊的意義上獲得了社會的信任。」<sup>59</sup> 誠如西幹事駱維廉（W. W. Lockwood）所說：

在商業、教育及宗教領袖的眼中，上海〔青年會〕的失敗將會預示很難在別處取得成功。上海〔青年會〕的成功則

57 駱維廉：〈過去三十年的回憶〉，《上海青年》第33卷第6期（1934年2月13日），頁3。

58 〈創辦童子會緣起〉，《上海青年》第11期第16號（1912年6月13日），頁3。「……所以本會的一切事宜，都是為全國各市會的模範。」陸幹臣：〈本會今後五年事工設計〉，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編：《力的創造：上海青年會三十五週年紀念冊》，頁53。

59 中華續行委辦會調查特委會編：《中華歸主：中國基督教事業統計（1901-1920）》，中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修訂重印），頁784。

顯示，我們在別處努力獲得成功的加冕，將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sup>60</sup>

可以說，我們要真箇了解近代中國青年會運動的歷史面貌，上海青年會不啻是開啟這扇歷史之門的金鑰匙。

第二、上海青年會除了在硬體設施方面成為其他城市青年會的楷模外，其培訓出來的青年會幹事，更為中國青年會運動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軟體資源。早在1908年，上海青年會已被選定為全國各地青年會幹事最早的一個重點訓練中心：「上海為華洋薈萃之區，故駐滬青年合會以本會為書記〔幹事〕習學之地。」<sup>61</sup> 駱維廉後來回憶：「凡當時業已成立的城市青年會，幾無不遣派人員到本會來練習。」<sup>62</sup> 駱氏在1909年談及訓練華人幹事的工作時說：「或許再沒有其他途徑，可以讓我們〔上海青年會〕作這麼多，來倍增我們的影響力（multiply our influence）」。<sup>63</sup> 他後來在1922年更指出，在過去的十五年裡，經上海青年會訓練出來的幹事已逾100人。<sup>64</sup> 這些幹事在上海青年會受訓後，不少均返回母會任職幹事，<sup>65</sup> 少數甚至成為後來的總幹事。<sup>66</sup> 後來出任廣州青年會以及全國協會總幹事的梁小初，即為首批在上海青

---

<sup>60</sup> Annual Report of W. W. Lockwood, 1909, p. 158, AQRBV.

<sup>61</sup> 〈書記習學之課期〉，《上海青年》第10期第33號（1911年11月23日），頁3。

<sup>62</sup> 駱維廉：〈本會三十五年的歷史沿革〉，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編：《力的創造：上海青年會三十五週年紀念冊》，頁74。

<sup>63</sup> Annual Report of W. W. Lockwood, September 1909, p. 162, AQRBV.

<sup>64</sup> Annual Administration Report of W. W. Lockwood, 1922, p. 4, AQRLF.

<sup>65</sup> 「漢口將次設立青年會，現已派盧君春芳來申，參考本會一切辦法，以便回漢照行。」〈信徒應承擔之責任〉，《會務雜誌》第10期第5號（1911年3月17日），頁2。

<sup>66</sup> 「該會總幹事即前本會書記李鍾藩君也。」〈南京青年會之發達〉，《上海青年》第14卷第8號（1915年2月26日），頁3。徐可陞後來亦成為蘇州青年會總幹事，參周承澤：〈徐可陞君之演辭略記〉，《上海青年》第19卷第40號（1920年12月31日），頁8。

年會受訓的幹事（見附錄三）。可以說，在中國青年會運動中，上海青年會在培育幹事人材方面委實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第三、眾所周知，青年會為中國近代多種社會改良運動的先驅。在華工作逾三十年的駱維廉，回顧上海青年會過去所走過的路時指出：「中國有許多改良社會的事業和運動，大部分是曾在青年會服務或曾受青年會訓練的人所提倡的，各地然，上海尤然。」<sup>67</sup> 他在 1920 年曾較仔細枚舉上海青年會在不同範疇所開展的十九項先導性工作（見附表 1-2）。可以說，上海青年會除了扮演近代上海各種社會改良事業的拓荒角色外，同時透過各地青年會的模仿，或幹事的培訓，間接對近代中國青年會，乃至於其他社會改良事業作出貢獻。這方面的獨特貢獻既是其他城市青年會無法與之比肩，亦是上海青年會作為個案研究的重要意義之一。

第四、是上海青年會在北美協會海外工作中的戰略地位。上海青年會是遠東地區最大的青年會，會員人數、經費預算、會所空間、學生人數、幹事人數、健身班人數、學生聖經班人數均為東亞第一。<sup>68</sup> 對於北美協會而言，它經常被賦予不平凡的任務及意義，例如上海青年會會所便被視為日後遠東各地青年會建築會所時的範本，使之有例可循；上海青年會會所成功建造的範例，亦使北美協會日後在亞洲各地募建同類會所時變得更為容易。<sup>69</sup> 可見，研究上海青年會的發展歷程，除了具有個別城市青年會的獨立研究價值外，更有助我們管窺北美協會對中國（甚至東亞）青年會運動的政策方針和策略部署。

67 駱維廉：〈過去三十年的回憶〉，《上海青年》第33卷第6期（1934年2月13日），頁3。

68 W. W. Lockwood to Mr. Nichols, 5 August 1920, p. 2, COR.

69 Secretary of General Administration to Robert E. Lewis, November 25, 1903, p. 2, BR.

附表 1-2 上海青年會開展的先導性工作

範疇	活 動 內 容	
教育	夜學 (Evening education)	體育 (Physical education)
	商業教育 (Commercial education)	郵差學校 (School for mail carriers)
	晚間講座 (Evening lectures)	科學講座 (Science lectures)
	教育講座 (Education lectures)	政府演講 (Lectures on government)
	國語拼音 (Classes in simplified Chinese)	
宗教	男士宗教聚會 (Religious meeting for men)	男士及學生聖經 (Special bible study for men and boys)
社會 服務	推廣健康的運動 (Health campaigns)	社會服務 (Social service)
	貧困兒童義務學校 (Free schools for poor boys)	社會及道德改革聚會 (Meetings for social and moral reform)
文娛 康樂	圖書館和閱讀室 (Library and Reading Room)	成人及學生文娛活動 (Recreational features for men and boys)
	運動場 (Playgrounds)	聯誼會 (Socials)

資料來源：W. W. Lockwood to Mr. Nichols, 5 August 1920, 2, COR.

但教人遺憾的是，上海青年會在中國青年會運動中舉足輕重的地位，似乎與學者對她的關注程度顯得不成比例。有關上海青年會的歷史，無論是被置於近代上海社會文化史，<sup>70</sup> 抑或是宗教

70 陳伯海主編：《上海文化通史》，下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頁1203-1204；吳建榮：〈構築社會環境·謀求NPO發展——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的發展歷程〉，《城市管理》第5期（2003），頁26-27。

史研究的範疇內，<sup>71</sup> 多限於一般性的論述，遑論給予恰如其分的評價。因此之故，本書的寫作亦期望能夠填補近代上海社會文化史，乃至於宗教史的某些研究缺環或空白。

### 三、史料應用

過去全國協會對於青年會文件檔案的保存頗為重視：「本協會之書籍文件檔冊，皆當保存於事務所。」<sup>72</sup> 及至1931年，為紀念中國青年會成立五十週年誌慶，全國協會更提出徵集青年會史料的呼籲。<sup>73</sup> 當然，後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國青年會的檔案資料多已喪失殆盡，為後來學者的研究工作增加不少困難。<sup>74</sup> 謝扶雅晚年回憶說：

我和青年會有四十年的關係，尤其是任職總會十易寒暑，深切知道中國青年會的大量文獻資料，存在於上海總會和各地區的分會，其中出版者不及百分之一、二，而這些出版品流出在海外者絕無僅有。我今行年九二，本文全憑老邁記憶，粗率寫出。但願有志後起，能憑此一鱗半爪之崖略，得有搜索中國青年會史料的機會，寫作一部較詳盡的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史，則對中國近代史的裨益豈可勝計？<sup>75</sup>

71 阮仁澤、高振農主編：《上海宗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頁944-947；姚民權：《上海基督教史（1843-1949）》（上海：上海市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上海市基督教教務委員會，1994），頁146-150；孫金富主編：《上海宗教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頁474-481。

72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章程》（出版資料不詳），頁5。

73 胡貽穀：〈徵求青年會史料通函〉，《同工》第101期（1931年4月），頁26-27。

74 參Jun Xing, *Baptized in the Fire of Revolution*, pp. 216-217; Kimberly A. Risedorph, "Reformers, Athletes and Students: The YMCA in China, 1895-1935", p. 24.

75 謝扶雅：〈基督教青年會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地位與貢獻〉，《傳記文學》第257號（1983年10月），頁127。



令人欣喜的是，近年在上海市檔案館及美國舊金山大學利瑪竇中西文化歷史研究所的努力下，將上海市檔案館所藏逾 3,785 冊有關中國教會文獻的目錄整理出版，其中不少為二十世紀上半葉全國協會和各地青年會的出版物；<sup>76</sup> 此外，上海青年會（西藏南路現址）至今仍存有許多全國協會和上海青年會的出版物，部分更為上海市檔案館所無。這些彌足珍貴的史料，當然有助我們開發中國青年會研究的不同課題。

對於本書而言，在青年會的各種刊物中，尤以上海青年會出版的《上海青年》（1903-1954）最具參考價值，該刊前身為《上海青年會報》，創刊於 1903 年 9 月，為通報會務消息的刊物。翌年 3 月，該報為更切合創設原意，易名為《會務紀聞》。<sup>77</sup> 1907 年 10 月，再易名為《會務雜誌》。<sup>78</sup> 及至 1911 年 4 月，復易名為《上海青年》，並增加篇幅。<sup>79</sup> 同年 6 月，更將每月首期改作月報，並擴充內容。<sup>80</sup> 及至三十年代政局動盪不安的環境下，該刊所出版的內容、篇幅即或有所縮減，<sup>81</sup> 但卻從未間斷發行，甚至在中共建國以後，該刊仍一直出版至 1954 年。<sup>82</sup> 《上海

76 參〈序〉，上海市檔案館、美國舊金山大學利瑪竇中西文化歷史研究所合編：《中國教會文獻目錄：上海市檔案館珍藏資料》，頁 3。有關青年會的資料，見頁 146-198。另外，亦有學者在較小規模上做過這方面的工夫，參趙曉陽整理：〈中國基督教青年會初期史料選〉，《近代史資料》總第 109 號（2004 年 8 月），頁 101-146。

77 〈會報改名〉，《會務紀聞》第 2 冊第 2 號（1904 年 3 月 4 日），頁 1。

78 〈大典紀盛〉，《會務雜誌》第 5 期第 18 號（1907 年 10 月 18 日），頁 1。

79 《上海青年》第 9 期第 10 號（1911 年 4 月 21 日），頁 1。

80 〈增刊月報之先聲〉，《上海青年》第 9 期第 15 號（1911 年 5 月 25 日），頁 3；〈發刊辭〉，《上海青年》第 9 期第 16 號（1911 年 6 月 1 日），頁 1。

81 參胡道靜：〈上海的定期刊物〉，《上海通志館期刊》第 1 卷第 1 期（1933 年 6 月），頁 205；〈本刊啟事〉，《上海青年》第 31 卷第 10 期（1932 年 4 月 28 日），頁 1。

82 就筆者所知，目前以上海市檔案館所保存的《上海青年》（1903-1954）最為完整，為前上海青年會幹事楊益惠於 1965 年捐予上海青年會；至於如何轉藏於上海市檔案館則仍

青年》的出版年月，大體與中國青年會運動相始終，無論是全國協會抑或各地市會、校會的定期出版物，均無法望其項背。《上海青年》更可能是目前存世最完整的一套中國城市青年會會刊，為了解近代中國城市青年會面貌最具史料價值的材料。

此外，全國協會出版的多種定期刊物，包括《青年會報》（1902-1905）、《青年》（1906-1917）<sup>83</sup>、*China's Young Men*（1906-1916）、《進步》（1911-1917）、《青年進步》（1917-1932）、《同工》（1921-1932）等，亦為饒具參考價值的資料。<sup>84</sup> 它們的內容除了有各地市會的消息報導外，亦包括了全國協會推展的各種運動，及中、西幹事對青年會會務和時局的討論，有助我們了解全國協會與上海青年會的關係。

中國青年會運動源自北美協會，截至 1950 年前後，該會派出西幹事約 170 人遠赴中國各地成立青年會，西幹士在華活動期間須定期向位於紐約的總部匯報工作情況，他們的報告和往來書信等資料大部分藏於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喀唔茨家族基督教青年會檔案室。檔案室所藏的中國青年會檔案約分為七大項，包括：（一）歷史和背景資料；（二）年度和季度報告；（三）全國大會；（四）書信和報告；（五）會所檔案；（六）主題檔案；

---

待考證。楊益惠：〈附頁〉，《上海青年會報》，第1卷第1冊（1903年9月25日）。此外，上海青年會至今仍存有大部分的《上海青年》（1913-1930、1933-1936、1938-1954，部分不完整）。

83 據汪原放憶述：「《青年》雜誌怎麼會改名《新青年》的呢？我還記得，我的大叔說過，是群益書社接到上海青年會的一封信，說群益的《青年》雜誌和他們的《上海青年》（周報）名字雷同，應該及早更名，省得犯冒名的錯誤。」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上海：學林出版社，1983），頁32。汪原放在這裡所指的《上海青年》，相信應是指全國協會出版的《青年》雜誌。

84 有關它們的介紹，可參范頤誨：〈青年會對於文字的貢獻〉，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編：《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五十週年紀念冊（1885-1935）》，頁34-37。

(七) 期刊。<sup>85</sup> 這些檔案資料在研究中國青年會，乃至於中國近代史的價值均已為學者提出，在這裡不擬再作贅述。<sup>86</sup>

### 第三節 全書結構

本書共分七章，除了導言和結論以外，分別由五個獨立單元組成。筆者無意採取通史式的撰述取向，卻著意就上海青年會幾個不同的歷史面向作專題式的探討，仿如在上海青年會裡裝設幾面虛擬的鏡子，將不同的歷史面向作共時的呈現，盡可能展示一幅複雜多變，以及更接近原貌的動態歷史圖像。<sup>87</sup> 當然，礙於筆者能力所限，加上部分史料闕如的關係，本書所呈現的大抵仍是某幾個蒙太奇式的場面；未及細察的或明或暗的角落，以及尚屬模糊不清的鏡像（如城市青年會與全國協會之間的聯繫；中、西幹事之間的關係）便得留待其他學者努力了。

第二章先回顧北美協會在上海傳教協會的呼籲下，派遣西幹事赴滬創辦青年會的背景和經過，亦會述及期間計畫的調整，輾轉創立的歷程，以及早期發展的概況。筆者不同意有關中國青

---

<sup>85</sup> 有關檔案的詳細目錄已上載檔案室網站，可參"Records of YMCA International Work in China", <http://special.lib.umn.edu/findaid/html/ymca/yusa0009x2x4.phtml>，2010年7月30日瀏覽。

<sup>86</sup> Dagmar K. Getz, "YMCA Historical Re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Pre-1949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吳梓明編：《中國教會大學歷史文獻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5），頁419-423。部分資料更被翻譯成中文，參江文漢著，黃天霞譯：〈1939年江文漢延安訪問記（參拜延安聖地）〉，《檔案與史學》第4期（1998），頁4-11；陶德滿（Lawrence Todmen）著，左芙蓉譯：〈陶德滿致鮑乃德函〉，《民國檔案》第3期（2004），頁40-42。

<sup>87</sup> 這裡的說法啟發自Virgil K.Y. Ho, *Understanding Canton: Rethinking Popular Culture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364, note 4。

年會早期在華發展一帆風順的說法，指出上海青年會草創時期，中、西幹事如何在不理想的外在和內在環境下筚路藍縷，建立起會務的基礎；亦會論及上海青年會在創會初期早已存在的種種內在隱憂。

第三章討論青年會的「三育」理念在落實到上海的具體歷史場景裡轉向政治化的歷程。筆者會先交代二十世紀初年在上海社會道德敗壞的氛圍下，上海青年會如何引入美國青年會有關「人格出產所」這一套嶄新的模造青年人格，以及改良社會的理念，並論述該理念背後所反映的解決社會問題的取向，以及所派生出的「三育」活動程序，在本質上與社會福音存在的矛盾關係；倒是強調在本土救亡的時代訴求下，「三育」的內容在實踐上愈趨政治化；加上民國初年基督教救國論的狂飆，上海青年會藉著培植青年人格，進而改良社會的理念，最終不得不隨著時代的巨輪步入救國論的廟堂。

在第四章裡，筆者嘗試以較動態的手法透視上海青年會的內部生態。啟蒙與救亡的訴求，固然是上海青年會之能招徠會員的重要原因，但卻不是歷史圖像的全貌。在這一章會進一步揭示的是，形形色色的會員（留學生、政商名流、青年學生、在職青年）分別帶著各自的關懷加入上海青年會，千差萬別の入會動機如何影響青年會的內部形態。最後會指出的是，在功利主義主導的增長趨勢下，上海青年會存在愈益嚴重的世俗化危機。

第五章交代上海青年會在財政緊絀的背景下，從美國青年會引入「徵求會」這種嶄新的徵求會員運動的經過，並對徵求會的內容、特點，以及具體操作情況作詳細的討論。上海青年會在引入徵求會以後，改變了該會的內部生態，會員隨之大幅增加，並

帶來持續增長的經費收入；但是種種流弊亦由此而生，會員素質每下愈況，徵求會降格成為庸俗的募捐活動，對上海青年會的社會形象構成極負面的影響。

對於青年會而言，青年會會所的意義並非單純的硬體建設，而是被視為一座「人格出產所」。在第六章裡，我們會先交代在青年會會所背後有關「人格出產所」的理念，以及會所建築運動由北美擴展至中國的歷程；繼以上海青年會興建四川路會所和擴建童子部會所作為例子，說明興建「人格出產所」是一項既繁複又耗費不菲的工程。它在未出產擁有完全人格的青年以前，已為財政向來不大寬裕的上海青年會換來鉅額的債項，新會所落成後更為該會帶來更沉重的財政負擔。上海青年會的營運方式愈趨商業化，世俗化的發展方向亦只得進一步加劇。

第七章的結論部分，筆者嘗試以上海青年會的歷史經驗作為研究取樣，為二十世紀初年的中國青年會運動勾勒出一幅粗糙的歷史圖像。我們會從組織行為的角度入手，就前文提出的觀點加以系統的綜述，並析論在「青年會是甚麼？」的問題背後，所反映的青年會定位不清的問題。筆者以為，青年會宗旨不明、會員素質參差、入會動機蕪雜、歸屬感薄弱等問題，在在構成二十世紀初年上海青年會（以及中國青年會運動）進一步發展的潛在危機。二十年代非基督教運動對青年會造成的打擊，可說是將這些潛在已久的毛病進一步引發出來而已。

至於研究時限方面，則以 1900 年上海青年會創立，以迄 1922 年非基督教運動爆發為止，主要的考慮是：1922 年為中國青年會運動的一個重要分水嶺（附表 1-3）。在經歷是年 4 月爆發的非基督教運動以後，青年會雖不致於立時由盛轉衰，但她的發

附表 1-3 青年會十年來的重大變化 (1917-1926)

年份	市會	校會	會員	幹事 (中、西)		市會經費 (收入、支出)	
1917	28	145	41,480	230	98	444,740.08	433,045.65
1918	28	159	49,225	240	103	499,935.96	463,258.89
1919	30	169	45,500	279	108	575,197.00	-
1920	31	184	58,957	361	104	750,556.00	687,479.40
1921	35	186	71,080	371	107	900,126.00	857,361.00
1922	40	197	77,956	447	103	976,041.00	945,197.00
1923	42	201	68,379	381	104	905,897.00	939,564.00
1924	43	207	73,353	317	75	894,796.73	906,069.11
1925	43	206	79,764	282	63	833,880.54	873,246.84
1926	44	211	-	319	32	-	-

資料來源：任夫：〈十年來吾國青年會之重大變化〉，《青年進步》第 100 冊（1927 年 2 月），頁 236-237。

說明：虛線為筆者所加。

展情勢無疑是大不如前。<sup>88</sup> 職是之故，檢視非基督教運動爆發以前上海青年會的內部面貌，不僅有助我們了解全盛時期的中國城市青年會面貌，亦為評估非基督教運動對青年會所造成的衝擊，提供更客觀、持平的參照點。

最後倒想一提的是，本書附錄一收錄了一篇與這個研究相關，但卻與全書的中心論述稍有分別的文章。這篇文章旨在釐清

<sup>88</sup> 「講到本會的成績，去年一年雖不能說絕後，實在可算是空前的了。」〈又是一年〉，《上海青年》第 22 卷第 1 號（1923 年 1 月 5 日），頁 3。

一個在中國青年會研究裡近乎是不說自明、無需深究的問題——青年會宗旨中的「Spirit」、「Mind」及「Body」三字，在進入了中國語境以後，何以會被翻譯為「德育」、「智育」及「體育」三詞。筆者借用了「跨語際實踐」的分析框架，從詞源學的角度，追溯三詞在中國漢語土壤上紮根和流傳的梗概；繼而指出青年會以「德育」、「智育」及「體育」（兼及「群育」）三詞作為宗旨的漢譯名稱，並不是語言翻譯的自然結果，而是挪用了當時剛由日本傳入中國不久的三個充滿救亡意味的教育術語。「德育」、「智育」及「體育」三詞的翻譯，說明救國元素早已注入中國青年會運動的血液裡，青年會往後愈益高舉救國的旗幟，只不過是這種取態進一步激化的表現而已。這篇文章也可視為本書第三章的一個註腳。

還得補充的是，本書提及的「基督教」均指基督新教或更正教（Protestant）傳統。其次，除了特別註明外，本書所指的「元」皆為墨幣。墨幣即墨西哥銀元，俗稱「鷹洋」，自十九世紀中葉流入中國，於華東和華南一帶普遍流通，在上海一帶幾以墨銀為主幣，與銀兩並行。<sup>89</sup> 此外，本書引用的多種青年會期刊、雜誌，由於出版年月較長，編輯標準不一，存在卷、期、號、冊等不同用法，但為保持文獻的原來面貌，筆者不擬強求統一，謹在此作出說明。

---

<sup>89</sup> 詳參魏建猷：《中國近代貨幣史》（上海：群聯出版社，1955），頁106-107；潘連貴：《上海貨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頁37-42。

## 第二章 華路藍縷——上海青年會的草創與發展

每一位前赴中國開展青年會工作的西幹事，都會收到北美協會發出具如下內容的一封委任函：

我們〔北美協會〕指派你到南昌（或其他城市），一個有五十萬至一百萬人口的城市。當地人並不知道甚麼是基督教青年會，你必須透過實際的示範向他們顯示。當地少數的領袖人物曾造訪過其他城市的青年會，但大部分人對於青年會一無所知，你要教導他們有關的思想。我們會支付你前赴當地的旅費、房租及其他津貼，並足供你的衣食，以及你家人的健康所需；但有關青年會日常運作的一切開支，我們不能夠向你提供任何東西。在你進行示範的日子裡，你一定要——即所謂——「倚靠這個國家而生活」（live on the country）。我們有時候或許會協助你獲得一個永久的居所作為會址，條件是你的贊助者要貢獻一部分。這是一個非基督教的城市，但在城中有一所教會及數百名基督徒。當然，他們來自貧窮階層，但他們是世上的鹽，你會從他們獲得真摯的款待，他們多年來一直力主派駐一位幹事。我們分派你去建立一個自養、自治及自傳的基督教青年會。<sup>1</sup>

---

<sup>1</sup> W. W. Lockwood, Report for Quarter ending, 30 June 1916, AQRLF.



究竟青年會是怎樣在一個近代中國城市誕生？

## 第一節 自西徂東

### 一、來自中國的召喚

北美協會的海外工作政策早有規定，青年會會否在某個國家或城市開展工作，端在於是否獲得當地教會人士同意，並向北美協會提出設立青年會的呼籲，以免影響青年會與當地教會的關係。<sup>2</sup> 我們在導言已提及，北美協會巡迴幹事魏夏德訪華期間和返美以後，寓居中國的傳教士已先後多次向北美協會提出設立青年會的邀請。1890年10月，由上海不同宗派傳教士組成的上海傳道聯合團（Shanghai Missionary Association）在一次會議上，委任了一個委員會調查寓滬傳教士對於在上海設立青年會的看法。

同年12月，在另一次會議上，與會者經過詳盡的討論以後，在少數異議的情況下，議決「贊成在華人群體組織基督教青年會，呼籲一位總幹事從事有關的工作，規定青年會在目標和方法上必須完全福音性（evangelistic）」。<sup>3</sup> 上海傳道聯合團的主席同時委任了一個由七位傳教士組成的委員會，成員包括美國聖公會的文惠廉（W. H. Boone, American Episcopal Mission）、中國內地會的路易士（W. J. Lewis, China Inland Mission）、英國及國外聖經公會的戴爾（S. Dyer,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獨立傳教士埃文斯（Edward

---

<sup>2</sup> Kenneth S. Latourette, *World Service: A History of the Foreign Work and World Service of 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New York: Association Press, 1957), pp. 51-52.

<sup>3</sup> *Urgent Calls from China: To 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ominion of Canada* (New York: n.p., n.d.), pamphlet, p. 8, COR.

Evans, Independent Missionary)、美國南方監理會的邦乃爾(W. B. Bonnell, Southern Methodist Mission)、美國安息日浸禮會的戴維斯(D. H. Davis, Seventh Day Baptist Mission),及美國長老會的薛思培(John Alfred Silsby,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統籌向北美協會正式提出在滬設立青年會的邀請事宜。

迨至1891年2月,委員會正式致函北美協會,呼籲派遣幹事前赴上海建立青年會,並向北美協會建議在滬推動宗派間的聯合事工,以及開展中國人和外國人的青年會工作。<sup>4</sup>後來《青年會報》回顧上海青年會的創立經過時說:

迨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僑居上海之傳道士,有鑑於後生之可畏,欲養童蒙以聖道,遂邀聚會商,經營一羈勒造就後生之法,公函敦請美國青年合會總委辦,遴派妥人,來滬督辦青年會事宜。<sup>5</sup>

當時委員會的祕書長薛思培在一封給北美協會的信中,特別強調上海作為全國傳教事業中心的戰略地位,以增強游說的力度。他說:「據估計上海約有七十至八十位傳教士,是中國的傳教中心。它作為基督教青年會工作的中心,較中國所有城市更為顯著(起碼我是如此認為)。」<sup>6</sup>當然,如導言所述,在各地傳教士競相邀請下,天津最後在群雄逐鹿的情況下脫穎而出,成為

<sup>4</sup> *Urgent Calls from China: To 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ominion of Canada*, p. 9.

<sup>5</sup> 〈上海青年會紀略〉,《青年會報》第3冊(1902年9月),頁4b。

<sup>6</sup> *Urgent Calls from China: To 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ominion of Canada*, p. 7. 有關上海成為中國傳教事業中心的因由,可參李天綱:〈上海基督教中心地位的形成及其原因〉,卓新平、許志偉主編:《基督宗教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頁249-269。

中國學校青年會的首個試點。有關在上海設立青年會的事宜，一直延宕到 1898 年北美協會正式派遣西幹事路義思（Robert E. Lewis, 1869-1969）赴滬，才正式提上議事日程。

## 二、計畫的調整

路義思生於美國佛蒙特州的波克夏（Berkshire, Vermont），1892 年於佛蒙特大學（University of Vermont）畢業，先後出任聖約翰斯伯瑞（St. Johnsbury）、麻塞諸塞州立學院（State College of Massachusetts）及波士頓青年會幹事。1896 年，轉到當時方興未艾的學生志願運動（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出任國內巡迴幹事，推動海外傳教工作。1898 年 2 月，他在學生志願運動的一個會議上，正式接受北美協會的委派，遠赴上海開展青年會工作。<sup>7</sup> 路義思是十九世紀末美國學生志願運動典型的時代產物。<sup>8</sup>

1898 年 4 月，路義思經日本抵達上海，同行的還有前赴天津學校青年會接替來會理的西幹事格林（Robert R. Gailey）。時來會理轉任中國學塾基督幼徒會總幹事，路義思曾就未來的工作安排與他進行仔細商討，並向在滬的傳教士、教會學校校長、商人以及外交人員等徵詢意見。<sup>9</sup> 他們討論的結果是，路義思應暫

---

7 有關路義思的生平，參景賢：〈路義思先生去思小誌〉，《青年》第 10 卷第 10 冊（1908 年 1 月），頁 1-2；Robert E. Lewis, *Search of Far Horizons* (West Conshohocken, PA: Infinity Pub., 2004).

8 「每年傳教士由美洲出發者約千人中，泰半皆受此等集會〔學生志願運動〕直接或間接影響以行者也。」〈北美大學生傳道會之消息（留美學生金仲藩通信）〉，《上海青年》第 13 卷第 5 號（1914 年 2 月 20 日），頁 2。有關學生志願運動與基督教在華傳教事業的關係，可參 Clifton J. Phillips, "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and Its Role in China Mission, 1886-1920",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91-109.

9 Robert E. Lewis to Mr. Murray, 10 May 1898, COR.

緩在上海建立城市青年會的計畫，改為隸屬中國學塾青年會，專責發展華中地區，包括上海、南京、蘇州、杭州及寧波等地學校青年會的工作；並以上海作為根據地，讓他能夠透過海路方便往返。<sup>10</sup> 路義思在提交的報告中指出，更改原來計畫的原因包括：

（一）學校青年會的工作業已開展，必須加以維持；（二）為鞏固學校青年會的工作，必須有周密的指導；（三）來會理北上以後，將無法承擔緊密的指導工作；（四）學校青年會為目前最重要的工作領域；（五）上海目前約有八處學校青年會，由於它們分散在上海各處，故不能像天津般將工作集中在一座位處市中心的會所進行；（六）要是只留守在上海工作，便會較少機會研究水道的問題；（七）這樣的決定無論與北美協會的信念，或是路義思前赴中國的渴望均為一致。<sup>11</sup>

筆者相信，在上述的眾多原因中，最重要的還是來會理必須北上學習語言。<sup>12</sup> 事實上，在路義思與來會理商討工作安排的過程中，來氏曾向他提出發展文字事業的計畫。查當時流通全國的報刊均以官話作為語言媒介，因此，來會理必須前赴北京學習語言，為青年會日後開展的文字工作做好準備。在這樣的考慮下，路義思便成為代替來會理擔任華中地區巡迴幹事的不二人選。當然，不能忽視的是，這樣的安排相信亦與當時中國青年會整體的人事布局有關。1898年4月，路義思在給稍後來華的西幹事巴樂滿（F. S. Brockman）的信中，初步透露了他與來會理商討以後，對當時中國青年會的人事布局及分工的想法，見附表 2-1：

<sup>10</sup> Robert E. Lewis to Mr. Murray, 10 May 1898, *COR*.

<sup>11</sup> Robert E. Lewis to Mr. Murray, 10 May 1898, *COR*.

<sup>12</sup> 路義思後來在回憶錄指出，這樣的安排是出於兩個考慮，一方面是為了讓校會巡迴幹事來會理得以赴北京專心學習語言；另一方面則希望讓他對中國青年會的整體情況有更寬廣的國家視野。Robert E. Lewis, *Search of Far Horizons*, pp. 43-44.

附表 2-1 青年會早期的人事布局構想 (1898)

幹事	根據地 (headquarters)	地區 (field)
來會理	北京	華北
路義思	上海	華中
巴樂滿	福州	華南
格 林	天津	-

資料來源：Robert E. Lewis to F. S. Brockman, 20 April 1898, *COR*.

總的而言，路義思被改派統籌華中地區的校會工作，乃是由於當時中國各地的學校青年會尚處於萌芽階段，亟須具經驗的幹事加以指導及鞏固；加上中國幅員廣大，當時在華的西幹事人數有限，根本不足以應付各地的需要，在緩急先後的考慮下，在上海建立城市青年會的計畫便只得暫時擱下。

路義思在確定了工作計畫以後，不旋踵便展開考察中國各地校會的巡迴旅程。除了華中地區的校會以外，他亦與稍後抵華的巴樂滿考察華南地區校會的情況。查當時中國各地校會的負責人，均非派遣自北美協會的西幹事，欠缺辦理學校青年會的相關知識及經驗；因此，路、巴二人在中國各地校會的考察工作，一方面主要是透過舉辦演講，闡明青年會的宗旨及各項辦事程序；另一方面，亦如當時傳教士一般，透過舉行布道會、查經班、祈禱會等活動，鞏固信徒的信仰及進行布道工作。<sup>13</sup>

<sup>13</sup> Robert E. Lewis, "The Yangtze River and South China Tours, April 1898", *COR*. 路義思考察各地校會的記述，可參 Robert E. Lewis to My Dear Friends, "Among the Pioneers of Central China: 800 Miles in a House-boat", October 1899, *COR*; Robert E. Lewis to My Dear Friends, "Among the Pioneers of Central China: II. A Province Eager for the Truth", December 1899, *COR*.

1899年1月，中國學塾基督幼徒會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會議中校會考察工作的重要性獲得進一步的肯定，並議決委派路義思擔任巡迴幹事，專責考察全國各地學校青年會的工作。<sup>14</sup> 路義思履新後不久，在2月給北美協會總幹事穆德的一封信中指出，一直以來，擔任巡迴幹事使他無法專注學好語言，四處漂泊不定對他的家庭生活亦不理想；同時表示他最多只能在中國多留五、六年。<sup>15</sup> 穆德大概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在7月給路義思的回信中，向他提出留在上海發展不同階層（all classes）青年會的建議，並指出上海作為中國最重要的商業及教育中心，在非基督教世界中，沒有任何一個未發展青年會事業的工場會較上海更為重要。他向路義思勾勒了一個恢宏的工作願景，堅定他留在中國的心志：

我可以提供柏林、斯德哥爾摩及紐約的例子，這令我想及你將會在上海實現甚麼。要是你未來幾年的大部分時間專注在這裡工作，你將很快擁有遠東最強大的學校青年會組合：一個在其他中國青年中的工作和兩位本地幹事，一個日本人的工作和一位日本人幹事，一個可以自養的歐洲人工作，並有外國幹事及會所，以及總的來說，一個由於它的位置（中國的交通中心）將會感動和刺激整個帝國的青年事業的工作。<sup>16</sup>

<sup>14</sup> Robert E. Lewis to My Dear Friends, "Traveling among the Colleges of China", January 1899, *COR*.

<sup>15</sup> Robert E. Lewis to John R. Mott, 2 February 1899, *COR*.

<sup>16</sup> John R. Mott to Robert E. Lewis, 24 July 1899, *COR*. 穆德後來給路義思的另一封信中，形容上海是一個戰略中心，路氏的經驗將容許他成就紐約青年會總幹事麥克班尼在紐約所作的偉大事業 John R. Mott to Robert E. Lewis, 29 November 1899, *COR*.

穆德的建議回應了路義思的訴求，路氏在 10 月的回信中，表示認同穆德的說法，並願意留在上海發展不同階層的青年會工作。<sup>17</sup>不久，路義思即辭退了中國學塾基督幼徒會巡迴幹事的職務，轉任上海青年會總幹事。<sup>18</sup>事後回看，路義思的請辭似乎間接加快了中國青年會發展市會工作的步伐。

事實上，穆德所提及的不同階層的青年會，其實是包括了上海四個不同的社會階層及服務對象：

該會〔上海青年會〕略分四派，第一派為西國青年會；第二派為中國商賈青年會；第三派為中國學塾青年會；第四派為日本青年會。然派雖分四，而氣則聯一，統歸總委辦主理執掌。<sup>19</sup>

它們分別指：（一）1870 年代在上海成立的西僑青年會；<sup>20</sup>（二）以服務中國商界青年為宗旨的城市青年會；（三）六個已初具規模的學校青年會；（四）路義思抵滬不久所創辦的日僑青年會。<sup>21</sup>礙於篇幅和主題所限，本書只會集中討論上海的城市青年會，其他青年會的情況只得按下不表。

---

<sup>17</sup> Robert E. Lewis to John R. Mott, 23 October 1899, *COR*.

<sup>18</sup> Robert E. Lewis to My Dear Friends, 2 February 1900, *COR*.

<sup>19</sup> 〈上海青年會紀略〉·頁4b-5a。

<sup>20</sup> Robert E. Lewis to Mr. Murray, 10 May 1898, *COR*. 有關該會的歷史可參George A. Fitch, "The Story of Shanghai's Foreign Y.M.C.A.", *The China Week Review*, March 24, 1928, pp. 95-96, 98, 106, 108.

<sup>21</sup> Robert E. Lewis to My Dear Friends, "Work among Chinese Students", July 1898, *COR*.

## 第二節 草創經過

### 一、由小團契肇始

有關上海青年會的歷史緣起，先要由路義思與曹雪賡的認識說起。路義思在上海青年會建立多年以後回憶說：

作者〔路義思〕於一八九八年四月到上海，那時曹〔雪賡〕先生正擔任崑山路中西書院的主任教員，時常邀請我去演講，由曹先生擔任翻譯。因此我們兩人在公私交誼上，日益密切。<sup>22</sup>

曹雪賡（1873-1927）出身於基督教家庭，父親為蘇州監理會牧師曹子實。<sup>23</sup> 早年在教會學校肄業，後負笈日本深造，返國後入讀上海聖約翰書院（即後來的聖約翰大學），畢業後旋於中西書院任教。<sup>24</sup> 路、曹二人在公私交誼上相過從，很可能是始自路義思抵滬初期在中西書院青年會主持布道會（evangelistic meetings）之時。<sup>25</sup>

中國青年會運動開展初期，西幹事所面對的其中一大難題是，無法覓得願意委身青年會事業的中國基督徒出任幹事。巴樂滿在1902年的報告中指出：「中國並不缺乏具能力和領導要素的

22 路義思：〈上海青年會第一任華總幹事——曹雪賡先生生平之回憶〉，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編：《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五十週年紀念冊（1885-1935）》（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1935），頁175。

23 曹子實的生平，可參W. B Nance, *Soochow University* (New York: United Board of 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 1956), pp. 7-9.

24 詳參賈維廉：〈曹公雪賡傳略〉，《上海青年》第33卷第33期（1934年10月24日），頁1-4。

25 D. Willard Lyon to John R. Mott, 16 June 1898, COR.



青年，只是商業主義的精神太強烈，青年人很難抵抗加入商界的誘惑。」<sup>26</sup> 青年會對中國幹事的要求，除了必須為基督徒外，一般需具相當的學識水平，並通曉英語。可以想像的是，具這樣學歷的人才在愈益走向西化的中國社會，不僅廣為人所青睞，更不乏優厚的待遇。中國基督徒不願加入青年會幹事行列，最根本的原因便是幹事與其他世俗職業比較，在薪酬待遇上存在很大的落差。<sup>27</sup> 多年來一直擔任上海青年會和全國協會董事的鄭富灼，早年便曾婉拒香港青年會的禮聘。他在回憶錄裡說：

香港青年會函聘余為該會幹事，時則余仍在大學四年級肄業，去畢業之期不遠，余當時滿擬接納其聘，惟一念自己之國文程度太淺，不足以為人群服務；復以中國政府方面，畀余以方言學堂之教席，待遇更為優厚，遂此余棄其前而採其後者矣。不明余衷者，或輕余為醉心名利之徒，庸知余為家庭境遇計，固不得不如是。再以余之連年顛沛潦倒，今欲稍蘇余困，想亦人之常情，而大雅所能諒者耳！<sup>28</sup>

<sup>26</sup> Annual Report of F. S. Brockman, September 1902, p. 25, AQRBV.

<sup>27</sup> Annual Report of Robert E. Lewis, September 1907, p. 152, AQRBV. 梁小初說：「由於青年會待遇菲薄……」梁小初：《未完成的自傳：七七回憶錄》（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69），頁108。後來更有上海青年會幹事在晚間兼職的例子：「記者（謝強公）……比年就本會文牘，主任筆墨蜩集，晚間又需佐理日報筆政，往往至深夜尚筆不停揮……」強公：〈精益公司名稱其實〉，《上海青年》第10期第33號（1911年11月23日），頁5。

<sup>28</sup> 鄭富灼著，謝洪貴譯：〈六十年之回顧〉，收入鄭均永編：《鄭富灼博士紀念集》（香港：出版資料不詳，1966），頁25-26。有關鄭富灼的生平，除《鄭富灼博士紀念集》所收的文章以外，可參Chi Wai Cheung, "Kuang Fuzhuo: From Coolie to Educator and Humanitarian", in Carol Lee Hamrin ed., *Salt and Light 2: Lives of Faith That Shaped Modern China* (Eugene, OR: Pickwich Publications, 2010), pp. 61-77.

鄭氏的經歷似乎並不是個案，梁小初在決定出任廣州青年會幹事以前，亦經歷了相同的掙扎：

我感覺到獻身青年會，視為終身職業，會使我的人生有意義，有價值，是服務的機會，是上帝的呼召，使我心嚮往之。但在當時的確是一個挑戰，要付出犧牲的代價。我在美華書局，月薪五十元，正想另謀一個比較高薪的職位。若到上海青年會受訓，每月只領生活津貼二十元，僅足維持個人生活之用。……我雖經禱告，受了感動，下了決心，願意獻身，這現實問題也不是不能不謀解決的。<sup>29</sup>

從鄭、梁二人的自述大概可以想見當時的普遍情況。<sup>30</sup> 難怪天津青年會幹事格林在 1902 年說：「我們仍然活在希望裡，同時祈求這個〔天津〕青年會總有一天會有一位能幹的中國幹事。」<sup>31</sup>

青年會除了要與世俗行業競逐人才以外，事實上，在具有良好教育背景、富有宗教熱誠的基督徒僧多粥少的情況下，青年會也要與當時的教會爭奪人才。駱維廉說道：

我們所需要的具有才幹的人，在商業市場裡的價值，是青年會所能支付的三至五倍；此外，那些具有宗教熱誠，或曾受訓作這種工作的人，均被訓練他們的差會（missions）

<sup>29</sup> 梁小初：《未完成的自傳：七七回憶錄》，頁39。

<sup>30</sup> 上海青年會創會會員顏惠慶的父親顏永京可作為一個參照例子，他早年由教會保送到美國留學，返滬後先後在商界及工部局工作，後來在主教的「建議和勸導」下，才出任上海聖公會牧師。顏惠慶回憶說：「作為教會工作人員，父親只領得一份薄酬。如果他繼續從事世俗職業，收入會高得多。」顏惠慶著，吳建雍、李寶臣、葉鳳美譯：《顏惠慶自傳——一位民國元老的歷史記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頁2-3。

<sup>31</sup> Annual Report of Robert R. Gailey, 1902, p. 3, AQRBV.

妒忌地看守著 (guarded jealousy)。<sup>32</sup>

不難想像的是，路義思在「人地兩生，著手頗難」<sup>33</sup>的情況下籌辦上海青年會，曹雪賡優良的家學背景，很自然成為他心目中的理想幹事人選：

這時曹先生尚是一個豐姿英俊的青年，說著一口流利的英語，並且在日本學過日語，他也是聖約翰大學同學會的會員。作者那時的腦海中便醞釀一種思想，就是要成立一個有組織的服務機關，於是先向各同人徵詢意見，並看曹先生便是我理想中最適當的領袖人物。<sup>34</sup>

曹氏亦不負所望，甘願放棄優厚的薪金和永久教席，加入籌組青年會的工作，<sup>35</sup> 成為中國青年會的第一位華人幹事。<sup>36</sup>

---

32 Annual Report of W. W. Lockwood, September 1907, p. 162, AQRBV. 同年，一篇文章也評論說：「我們不應嫉妒這個或那個組織，可以使我們部分最優秀和聰穎的人投身一項較一般傳教工作更具吸引力的事業，使他們為青年會所用遠較完全失去他們要好得多。」"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Monthly Bulletin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 no. 6 (October 1907), p. 10.

33 [曹雪賡]：《上海基督教青年會歷史概論》（上海：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出版年份不詳），油印稿，頁171。

34 路義思：〈上海青年會第一任華總幹事——曹雪賡先生生平之回憶〉，頁175。另參 Robert E. Lewis, *Search of Far Horizons*, p. 44. 路氏在他的報告和書信中常常提及曹雪賡，並讚賞他的表現。Robert E. Lewis to My Dear Friends, 2 February 1900, p. 1, COR.

35 路維廉在1907年的報告中說：「曹先生的薪酬最近調整至每月二百元，要是他像這些〔英文〕教師一樣，有意隨時離開青年會從事其他工作，他的薪酬是可以提升一倍的。」Annual Report of W. W. Lockwood, September 1907, p. 160, AQRBV.

36 「〔曹雪賡〕……且在青年會中當書記〔幹事〕者，在全中國為第一人。」〈臨別贈言〉，《會務紀聞》第2冊第17號（1904年6月17日），頁1。他的妻子後來亦成為中國基督教女青年會（YWCA）的第一位華人幹事。Annual Report of Robert E. Lewis, 1 October 1904, p. 4, AQRLF.

在曹雪賡的協助下，路義思更凝聚了幾位志同道合之士，共同籌組上海青年會：

後來又蒙曹先生介紹一位留學生黃佐庭先生給我，他們轉把他們的令親顏惠慶博士和唐紹儀先生的令姪介臣先生介紹給我，於是我們的小團契漸漸的擴大了。<sup>37</sup>

曹雪賡亦憶述：「……於是聯絡各教會學校畢業之學生，能悉英文者至其〔路義思〕家，互相磋商，始得張君政聲〔張振聲〕、黃君佐庭、謝君洪賚、龔君伯英、顏君惠慶、唐君介臣及著者。」<sup>38</sup> 茲將他們的生平簡介如下：

黃佐廷（?-1919，又作黃佐庭）的父親為上海聖公會救主堂牧師黃光彩，早年隨姐夫聖約翰書院校長卜舫濟（F. L. Hawks Pott）負笈美國，於維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畢業，返國後在聖約翰書院進修神學，先後出任山西大學編譯、滬寧鐵路公司祕書長等職，及後於 1911 年被委任為留美中國學生監督。<sup>39</sup>

顏惠慶（1877-1944）的父親顏永京（1838-1898）亦為上海聖公會救主堂牧師，早年於維吉尼亞大學畢業，返國後於聖約翰書院任教，曾擔任上海《南方報》英文版的主編，及後擔任中國駐

37 路義思：〈上海青年會第一任華總幹事——曹雪賡先生生平之回憶〉，頁175。

38 〔曹雪賡〕：《上海基督教青年會歷史概論》，頁171。

39 黃氏的生平綜合自以下資料：〈黃佐廷靈柩安葬紀〉，《申報》，1920年3月8日，第3張，第10版；〈發起黃佐廷追悼大會〉，《民國日報》，1920年3月13日，第3張，第10版；〈黃佐庭先生（?-1919）〉，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編：《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五十週年紀念冊（1885-1935）》，頁165；徐以騷：《教育與宗教：作為傳教媒介的聖約翰大學》（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頁13、15、213-214。

外大使，並出任外交總長等職。<sup>40</sup>

唐介臣（1858-1913）為1882年首批隨容閱留美的幼童，在美入讀耶魯大學，返國後初在上海擔任教員，後轉入聖約翰書院任教，與顏惠慶共事；繼顏氏以後擔任《南方報》英文版的主編，及後轉入仕途，曾任萬國禁煙會中國代表、游美學務處會辦，1912年出任清華學校首任校長。<sup>41</sup>

謝洪賚（1873-1916）的父親謝元芳為美北長老會信徒，早年曾在浙江姚江一帶任傳道。畢業於蘇州監理會主辦的博習書院，其時與曹雪賚同為中西書院教員。謝氏後曾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監理會傳道等職，至1906年轉任青年會出版部主理筆政。<sup>42</sup>

40 有關顏惠慶的生平，可參他所撰的自傳。W. W. Yen, *East-West Kaleidoscope, 1877-1946: A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St. John's University Press, 1974). 該書有中譯本二種，見姚崧齡譯：《顏惠慶自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3）；吳建雍、李寶臣、葉鳳美譯：《顏惠慶自傳——一位民國元老的歷史記憶》。另參陳雁：《顏惠慶傳》（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41 詳參盧隱：〈唐先生介臣事略〉，《青年》第17卷第9號（1914年10月），頁199-204；孔憲立著，嚴楨譯：〈前北京清華學校校長唐介臣先生傳〉，收入舒新城輯：《近代中國教育史料》（臺北：文海出版社，1979），頁235-238。新近的研究另見Carol Lee Hamrin, "Tang Guo'an: Pioneering China's Rights Recovery Movement", in Carol Lee Hamrin ed., *Salt and Light: Lives of Faith That Shaped Modern China* (Eugene: Patrick Pub., 2009), pp. 30-49. 筆者懷疑，唐介臣很可能是因為顏永京的緣故而認識顏惠慶。顏惠慶回憶說：「1880年代從美國歸來的留學生，處境窘迫，父親曾全力幫助他們謀求職業。」又說：「……父親鼓勵那些曾在容閱的帶領下留學美國的青年人，也組織類似的文學團體。一天晚上，他邀請了二十幾位留學生至家中，商討此事。」吳建雍、李寶臣、葉鳳美譯：《顏惠慶自傳——一位民國元老的歷史記憶》，頁2、15。

42 詳參胡貽穀：《謝廬隱先生傳略》（上海：青年協會書報社，1917）；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編：《謝洪賚先生紀念冊》（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1926?]），收入中國宗教歷史文獻集成編纂委員會編纂：《東傳福音》第23冊（合肥：黃山書社，2005），頁1-115（總頁131-164）；朱昌峻 (Samuel C. Chu)：〈Early 20th Century Chinese Christian Writers and the Church Indigenization Movement〉，《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2期（1983年6月），頁195-217。

張振聲（1866-？）早年由福州教會資助赴美留學，返國後先後於福州及重慶工作，時任職於上海海關。<sup>43</sup>

龔伯英（1862-1915）在加入上海青年會前，曾出任上海中國內地會書記十年。<sup>44</sup>

我們雖然不盡清楚上述各人彼此相識的經過，但對他們的個人背景稍作考察（見附表 2-2），不難發現他們有一些共通的背

附表 2-2 上海青年會創會成員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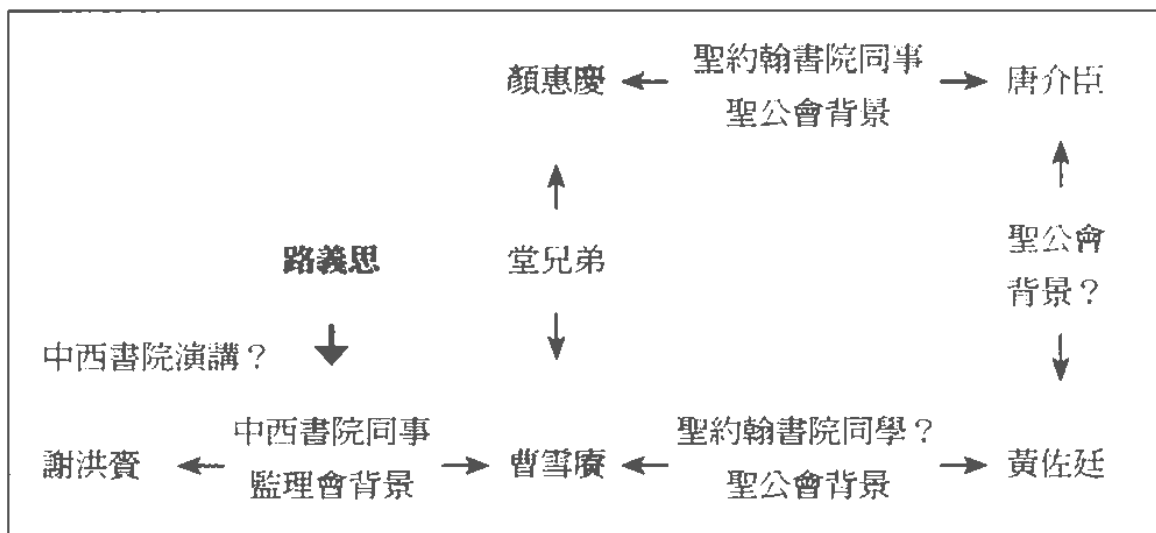
創會成員	畢業學校	父親牧職	親屬關係	任職機關
黃佐廷	維吉尼亞大學、 聖約翰書院	救主堂牧師 (聖公會)		山西大學編譯?
顏惠慶	維吉尼亞大學	救主堂牧師 (聖公會)	曹雪賡的堂弟	聖約翰書院 (聖公會)
唐介臣	耶魯大學			聖約翰書院 (聖公會)
謝洪賚	博習書院 (監理會)	傳道 (美北長老會)		中西書院 (監理會)
曹雪賡	聖約翰書院 (聖公會)	蘇州監理會牧師 (監理會)		中西書院 (監理會)
張振聲	留學美國			上海海關
龔伯英				中國內地會

43 〈本會第一任會長——張振聲先生訪問〉，《上海青年》第38卷第8期（1939年3月），「上海青年徵求特刊」，頁26-27。

44 詳參Annual Report of Robert E. Lewis, September 1906, p. 91, AQRBV；〈痛失良友〉，《上海青年》第14卷第6號（1915年2月5日），頁4；〔曹雪賡〕：《上海基督教青年會歷史概論》，頁174。

景或特徵。例如他們除了都是基督徒外，不少人出身自基督教家庭，與監理會和聖公會尤具淵源；他們主要接受教會學校的教育，部分更曾在外國留學，精通英語，具優良的學歷背景；他們學成歸國以後，主要從事教育工作。此外，他們主要是在曹氏的親朋基礎上派生出來，牽涉親戚、校友、同事、教友等關係（附表 2-3）。<sup>45</sup>

附表 2-3 上海青年會創會成員關係



這一批志同道合之士，早期常在路義思的家中，就籌備成立青年會的事宜進行商討。路義思回憶說：「大家的意思，也覺得我們在上海可以組織一個美國式的服務團體，聯合留學生和國內的畢業生，從事基督教的社會改造工作。」又說：

我們因為有了這個動機，所以時常開會討論研究，……我們研究保羅的工作，及安底亞、哥林多、羅馬等處古代的民情風俗，文化商業，旁徵博采，引古證今的與上海互相

<sup>45</sup> 張振聲憶述早期青年會的热心人士說：「有一位張先生、路義思博士、顏惠慶博士、顏博士之介弟、顏德慶博士、曹雪廉先生、黃佐庭先生、Mr. Robert Wu、顏明慶先生等十數位。」〈本會第一任會長——張振聲先生訪問〉，頁26。

比較，覺得結果很美滿。最後決定把我們預定之計劃付之實現，並主張完全由國人主持辦理，定名為上海基督教青年會。<sup>46</sup>

在這裡我們可能有的疑問是，路義思等人為何將上海與聖經所載使徒保羅時代羅馬帝國的城市作比較？路義思在別處較清晰地指出，使徒保羅所建立的傳教運動，都是在一些重要的學術、商業及宗教中心，如以弗所、安底亞、哥林多、雅典及羅馬等地。他說：「上海、福州、天津及北京或可被視為中國的以弗所、安底亞、哥林多、雅典及羅馬。」<sup>47</sup> 事實上，他的說法正反映出北美協會在中國的發展策略：以大城市為戰略據點，以知識分子為服務對象。<sup>48</sup> 余日章後來解釋說：

蓋當時諸領袖鑒於工區之廣袤，開拓之艱難，以及人才經濟之不易分配，故決從調查工區入手，研究其最急之需要而定設施之方針，庶其能力得以集中，事工不致浪擲。研究之結果，決定方針如下：（甲）先於首都，省會，及教育商業中心城市，設立青年會，以為其他各地之倡率。（乙）向學生及智識階級從事宣傳，使之了解青年會之理想及原理。<sup>49</sup>

可見路氏在討論上海青年會的發展策略時，大抵是向他的中國同

46 路義思：〈上海青年會第一任華總幹事——曹雪廉先生生平之回憶〉，頁175。

47 Robert E. Lewis, *The Students of China for Christ* ([New York?]: n.p., n.d.), pp. 31-32.

48 這種看法基本上體現在穆德的著作中。參John R. Mott, *Strategic Points in the World's Conquest: Th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s Related to the Progress of Christianit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Y.M.C.A., 1897).

49 余日章：《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史略》（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27），頁4。



工闡明北美協會的發展策略，同時訴諸聖經權威作為神學基礎；同時不難想見的是，上海在中國青年會運動中的戰略性地位，亦在這時成為創會會員之間的基本共識。

迨至 1900 年 1 月 6 日，上海青年會假博物院路亞洲文會館（Royal Asiatic Society）成立，以發展青年的德、智、體三育為宗旨，凡品行端正的青年均可入會，會員毋須為基督教徒。<sup>50</sup> 與英、美兩國青年會會員必須個人信仰基督，或為宗派教會成員比較，中國青年會在會員入會要求方面明顯來得寬鬆。正如陳立廷後來所說：

我國青年會採用之辦法，不問其是否為基督教徒皆可入會，凡基督教徒則稱為同宗會員，非基督教徒，則稱為同志會員，利益一體享受，惟同宗會員得選舉或被選舉為會中職員，主持會務，而同志會員則否，此其差別耳。<sup>51</sup>

不像英、美等國具有深厚的基督教傳統作為她們的「給定」（given），<sup>52</sup> 中國青年會打從早期開展的校會工作開始，便無可避免帶有強烈的傳教運動色彩。曹雪廛的回憶進一步揭示了創會會員的背景：

是日由諸君介紹之親友，及教會人士，和教會學校之生

50 駱維廉：〈本會三十五年的歷史沿革〉，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編：《力的創造：上海青年會三十五週年紀念冊》（上海：上海基督教青年會，1935），頁73；路義思：〈上海青年會第一任華總幹事——曹雪廛先生生平之回憶〉，頁176。

51 陳立廷：《基督教青年會釋要》（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27），頁4。

52 據1913年的調查顯示：「當時上海每一千居民中平均信徒不足五人，而美國每一千居民中即有信徒二百四十一人之多。」中華續行委辦會調查特委會編：《中華歸主：中國基督教事業統計（1901-1920）》，上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修訂重印），頁299。

員，並出洋學生，到會者不少，是日而入會簽名者共計四十五人之譜。<sup>53</sup>

值得留意的有兩點：第一、與會人士主要是信徒、教會學校的畢業生及留學生，他們之間的最大公約數不是同宗基督教信仰，而是或多或少曾受西方文化的洗禮。第二、在逾百名與會者中，只有四十多人現場入會，可見不少人對這個新興團體仍持觀望態度。最後，大會舉定黃佐廷為會長、顏惠慶為副會長、唐介臣為會計、曹雪賡為書記及執行幹事，上海青年會於焉成立。

我們從上海青年會早期使用的信箋紙得知，她的對外稱呼仍為「上海基督教幼童會」。<sup>54</sup> 一直要到1902年以後，才正式跟隨全國協會易名為「上海基督教青年會」。<sup>55</sup>

### 第三節 早期發展

#### 一、舉步維艱

上海青年會成立以後，接著需要處理的問題便是設立臨時會所。路義思回憶說：

第二步重要工作是設立臨時會所，由曹〔雪賡〕先生提議在現在北四川路〔北蘇州路〕上海郵務管理局所在的地址，租一幢房屋，經眾通過後，即行遷入辦公。<sup>56</sup>

53 〔曹雪賡〕：《上海基督教青年會歷史概論》，頁1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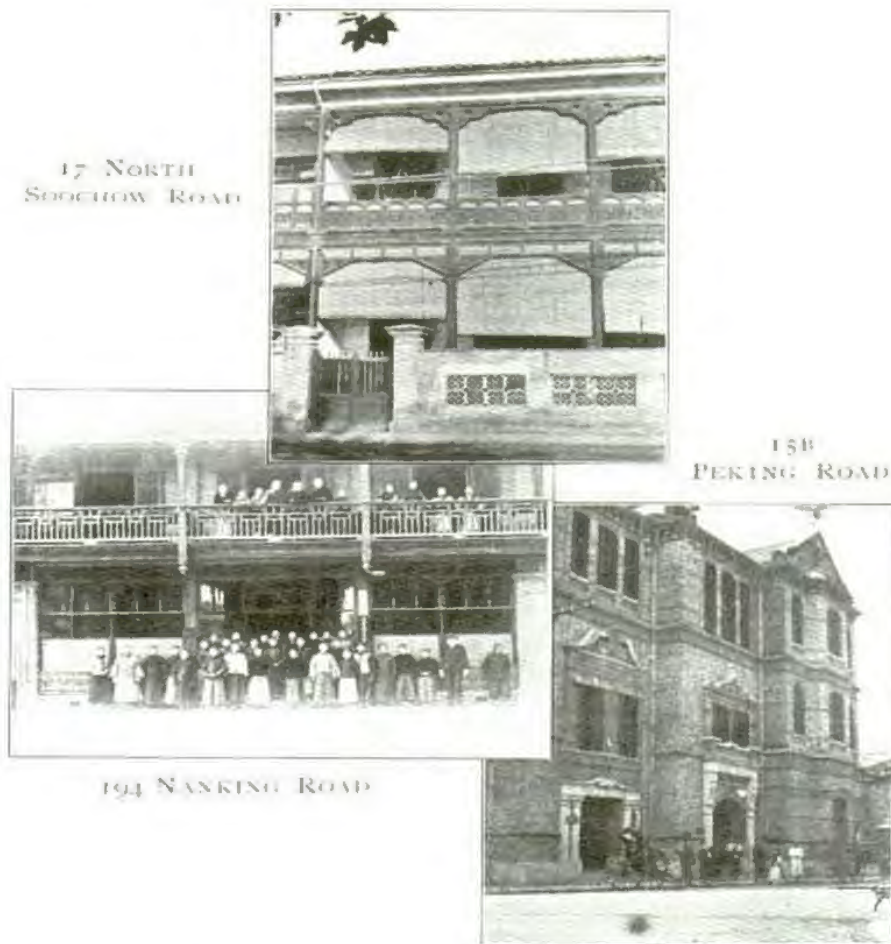
54 Robert E. Lewis, "To Student Volunteers: An Appeal from China", 1 January 1901?, *COR*.

55 Robert E. Lewis to John R. Mott, 22 October 1902, *COR*.

56 路義思：〈上海青年會第一任華總幹事——曹雪賡先生生平之回憶〉，頁176。

1900年3月，上海青年會正式進駐北蘇州路17號辦公，會址是一幢半洋式房子（附圖2-1）。<sup>57</sup> 該處地方狹小（附圖2-2），只有四個房間；加上位處上海公共租界的北區（附圖2-3），與北美青年會向重市中心選址的原則相違，明顯是一個短期、過渡性

附圖 2-1 上海青年會早期租賃的會所



圖片來源：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編：《力的創造：上海青年會三十五週年紀念冊》，缺頁碼。

<sup>57</sup> 參賈維廉：〈本會三十五年的歷史沿革〉，頁73；Robert E. Lewis, *Search of Far Horizons*, p. 44.

附圖 2-2 北蘇州路會所的大堂



圖片來源：PHO

附圖 2-3 遠眺北蘇州路會所



圖片來源：PHO

(筆者估計會所位置為箭頭下方)

的臨時會址，並不是一個可供長久利用的理想會所。<sup>58</sup>

研究中國青年會的學者常有一種看法，就是青年會適值清末的改革氛圍進入中國，為她提供了一個難得的發展良機，但是歷史現實似乎並沒有這麼簡單。上海青年會創立初期，在社會上知名度不高，「時人知者甚少」；<sup>59</sup> 她不像當時上海的會館或公所組織，既沒有地緣或業緣等人脈網絡的聯繫，亦沒有豐厚的財政基礎或官方背景作為後盾。打從創會伊始，便只得在「會友寥寥，財力甚薄」<sup>60</sup> 的情況下開展工作：「……經濟頗覺困難，每月由各會員捐月費一元，以作開辦之用。」<sup>61</sup> 曹雪賡這樣憶述創會早期的情況：

本會初辦之時……所享利益甚少，不過讀報聽講，研究聖經，討論宗教等數事，有時，或於清晨乘自由車，出遊田野一次，會員娛樂之事，僅此一端而已。<sup>62</sup>

會長張振聲亦回憶說：

第一年開始之時，光景不見怎麼好！那時會中辦起夜間的英文班，有幾個報關行來的學生七八人而已，並不收學費。並且多多設法號召吸引青年，來學習，來做會員。有

58 「那時街面冷靜，雨時極為不便。」〈本會第一任會長——張振聲先生訪問〉，頁26。

59 盧隱：〈唐先生介臣事略〉，《青年》第17卷第9號（1914年10月），頁204。

60 〈十周小史〉，《會務雜誌》第8期第5號（1910年3月25日），頁2。顏惠慶亦回憶說：「從北蘇州路簡單的房屋，極有限的會員……」顏惠慶：〈三十五年前的上海青年會〉，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編：《力的創造：上海青年會三十五週年紀念冊》，頁7。

61 [曹雪賡]：《上海基督教青年會歷史概論》，頁171。及後此舉成為定制：「按本會定章，凡會友每人月納例捐一元。」〈會友例捐〉，《上海青年會報》第1卷第15冊（1904年1月1日），頁1。

62 〈追記本會二十週年紀念會總幹事曹雪賡君演說辭〉，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編：《力的創造：上海青年會三十五週年紀念冊》，頁89。

一個交際室，每晚七時有聖經班，向 Kelly & Walsh [別發洋行] 公司買了一架小風琴，每晚唱讚美詩祈禱，尚能吸引聽眾。<sup>63</sup>

可見上海青年會創辦初期，礙於經費和人力所限，規模和程序皆只能因陋就簡，僅能以免費的英文班與極有限的宗教和文娛活動招徠會員。

事實上，青年會進入中國初期發展的道路，並不見得完全一帆風順：「其時民智未開，社會對於本會關係尚淺，進行事業不克十分順利，概可想見。」<sup>64</sup> 胡貽穀亦說：「當時青年會三字，非為社會所稔知，更非為社會所稱道，在會辦事者，因之頗感困難。」<sup>65</sup> 上海青年會作為中國第一個城市青年會，並無任何先例可援。<sup>66</sup> 路義思在人地生疏的情況下開展工作，委實是舉步維艱：「按路君來華於茲十稔，當其創辦之初，苦心孤詣，財薄力微。」<sup>67</sup> 正如他後來回憶說：「一個陌生人 (stranger) 在一個東方城市，不論他的動機多良好，仍終究是一個陌生人……」<sup>68</sup> 早期來華的西幹事在異邦開展工作，一切只能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與日後青年會建立起社會地位後，各大城市的官紳主動捐地

63 〈本會第一任會長——張振聲先生訪問〉，頁26。

64 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編：《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十九年度會務報告》（上海：上海基督教青年會，1931），頁1。

65 胡貽穀：《謝廬隱先生傳略》，頁30。

66 Robert E. Lewis, *Search of Far Horizons*, p. 76.

67 〈繼往開來〉，《會務雜誌》第5期第25號（1907年12月6日），頁2。

68 Robert E. Lewis, *Search of Far Horizons*, p. 44. 陳立廷後來亦評論說：「所以從路〔義思〕先生到上海的頭一天起他就得求當地的人援助。當地人不動手，他是一籌莫展，除非他有感人的力量，決不能收甚麼成效。」陳立廷：〈歡迎路義思先生〉，《上海青年》第29卷第6期（1930年2月13日），頁1。

設會的情況，當然不能同日而語。<sup>69</sup>

除了人力物力的限制外，清末的改革氛圍對青年會的發展，亦不必然提供一片合適的生長土壤，駱維廉回憶說：

那時一般大人物不把我們放在眼中，一則因為我們是一個組織，組織在那時是最犯忌的。二則因為我們的團體是叫青年會，「為甚麼叫青年會？」他們都懷疑地問。三則因為我們是基督教，基督教是被視為洋教的。<sup>70</sup>

路義思憶述：「〔上海青年會〕物色申請者成為會員、填滿財政及迴避任何條例，都可能被政治當局解釋為革命行動。」<sup>71</sup> 這樣對上海青年會取得清廷官員的信任及支持，當然構成一定的障礙。廣州青年會總幹事梁小初在回憶錄中亦說：「青年會在廣州之出現，是前所未有的。尤其以『青年』二字為標榜，更具有爆炸性、危險性。故此廣州青年會在粵東當局的心目中，最值得猜疑的。」<sup>72</sup> 可見青年會作為一個新興團體，在中國開展工作初期，被清廷視為潛在的政治組織，時人為免遭受任何可能的牽連而與之保持距離，亦乃人之常情。

---

69 「近聞金陵青年會蒙南京參議院贈地百二十畝，又承前任總統孫中山君及現任總理唐紹儀君，各捐助洋一千元，並聞兩君於斯會頗樂贊成云。」〈金陵青年會之近聞〉，《上海青年》第11期第8號（1912年4月18日），頁3。「成都來函：該處士紳曾集洋六千元，為青年會開辦一雜誌，且又公送城中地一方，以為該會建屋之用。」〈成都來函〉，《上海青年》第12卷第12號（1913年3月21日），頁3。

70 駱維廉：〈過去三十年的回憶〉，《上海青年》第33卷第6期（1934年2月13日），頁2。

71 Robert E. Lewis, *Search of Far Horizons*, p. 45.

72 梁小初：《未完成的自傳：七七回憶錄》，頁61。福州青年會在創立之初也被視為清末鼓吹改革的團體，而非一個明確的基督教組織。參Ryan Dunch, *Fuzhou Protestants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hina, 1857-192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70-71。當然，進入民國以後，「青年」二字便一躍而成為廣受青睞的詞彙。「……故青年二字乃民國以來的新名詞，而尊重青年亦成為民國以來的新風氣。」錢

此外，基督教自清中葉傳入中國以還，由於與西方列強糾纏不清的關係，一直被中國人視為「洋教」；在種種誤解或利益衝突的情況下，更引發了數以百計的民教衝突（教案），為基督教在華發展構成了嚴重的障礙。<sup>73</sup> 截至 1900 年，中國基督徒人數只有約 10 萬人，佔中國人口不到千分之一。<sup>74</sup> 上海作為中國當時的傳教中心，情況亦不見得樂觀。從附表 2-4 可見，1901 年，上海約有 1,628 名信徒。如以當時上海租界約 100 萬的人口作基數計算，基督徒佔當時的人口百分比亦只有千分之一。當然，上述的統計資料並不全面；<sup>75</sup> 但即或加入資料的完整性作為考慮因素，基督徒所佔百分比大約亦只有千分之三。<sup>76</sup> 可以想見的是，青年會在清末挾基督教之名進入中國，即或沒有引起中國人的猜疑，大抵亦不會為普羅大眾所熱烈歡迎。<sup>77</sup>

---

穆：〈文化之中語言和文字〉，錢穆：《中國文學論叢》（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頁29。陳映芳認為1915年《新青年》的發刊，可視為中國社會中「青年」這一角色類型形成的象徵，完全忽略了青年會在此以前扮演的重要角色。參陳映芳：《「青年」與中國的社會變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頁60-62。

73 詳參邢福增：《文化適應與中國基督徒（1860-1911）》（香港：建道神學院，1995），頁36-39。

74 Paul Cohen, "Christian Missions and Their Impact to 1900",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558.

75 正如報告的編者所說：「關於過去十年的進展情況，我們未能從所有的教會那裡得到所希望得到的完整資料。但是，凡屬已經搜集到的資料，我們均予收錄，並加注說明資料是不全的。」〈海關十年報告之二（1892-1901）〉，徐雪筠等譯，張仲禮校訂：《上海近代社會經濟發展概況（1882-1931）——《海關十年報告》譯編》（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頁112。

76 據1913年所作的另一項調查顯示，當時上海「受餐信徒總數在三千七百人以上」。中華續行委辦會調查特委會編：《中華歸主：中國基督教事業統計（1901-1920）》，上冊，頁298。

77 嚴復與賈維廉交談時透露，曾有一位年輕的中國官員對他說，有一天，我們將會從基督教青年會一名中除去「基督教」，改稱為「青年會」，使所有會員站在相同的基礎之上。W. W. Lockwood to John R. Mott, 30 January 1906, p. 3, COR.



附表 2-4 上海基督教的統計資料（1901）

宗派名稱	傳教士（男、女）		中國信徒	中國牧師	中國教師	教堂	學校
美南浸信會	2	4	100	5	6	5	6
美國聖公會	-	-	-	-	-	-	-
美國長老會	6	10	250	6	23	3	7
英國聖公會	5	7	-	-	-	3	6
倫敦會	3	2	504	13	9	13	12
安息日浸禮會	2	5	58	1	9	2	6
監理會	12	30	466	15	49	15	25
女公會	-	7	120	6	6	1	4
基督會	3	3	130	2	4	2	1
總數	33	68	1,628	48	106	44	67

資料來源：〈海關十年報告之二（1892-1901）〉，頁 112。

正如陳立廷所說：

當青年會來華之初，其性質固無殊於其他基督教之事業，儼然一西人傳教機關耳。我國風氣初開，率多不明真相，故僅居於被動之地位，而一般人士之心理，遂目青年會為外人之機關……<sup>78</sup>

同時要指出的是，路義思雖然是應上海傳教協會的呼籲來滬開展工作；但是上海青年會與本地教會之間的關係，似乎亦非如想像中的理想。我們從前述上海傳道聯合團在成立青年會的問題上出現少數異議已可初見端倪。胡貽穀提及謝洪賚與青年會之間的因緣，曾經有這樣的記述：

<sup>78</sup> 陳立廷：《基督教青年會釋要》，頁 5。

……旋中國南部青年會幹事路義思君，駐滬辦理會務。國人對於青年會之宗旨與組織，多茫然莫解，即教會中人，亦多持反對態度。獨〔謝洪贊〕先生睹而善之，亟予親善，故於二十年前，在滬中西書院設立青年會，竭力商助會務。監理會向有益賽會之組織，以彼代此，頗有阻礙，顧青年會之實有益於學生，先生知之甚審，因力排眾議，獨行其所主張。<sup>79</sup>

或許是出於保持在華傳教組織之間的團結、和諧形象，又或是西幹事不欲公然挑戰北美協會的辦事原則，在上海青年會中、西幹事的早期記述中，與本地教會關係的負面描述並不多。倒是性格剛烈的天津青年會幹事格林說漏了嘴：「我可以說，要是我誤解了，路義思與上海的傳教士豈不是存在大抵相同的問題……」<sup>80</sup> 他在1902年的報告中，提及天津青年會面對的困難之一是缺乏當地傳教士的支援。他指出，個別傳教士並沒有作出任何協調，同時進行不同的青年工作，造成當地教會與青年會競爭的局面；而更嚴重的問題是，青年會董事部的成員均來自當地的不同教會，意味著任何與當地教會存在競爭的政策均不能推行。他甚至激動地說：

這裡的看法認為我們只是一個「輔助」團體("auxiliary" institution)，意思是我們只能取用教會活動以外的時間和人員。試問我們可否在這些限制下生存和發展成一個運動。<sup>81</sup>

我們在第四章將述及，上海青年會後來在開辦日校的問題上態度

<sup>79</sup> 胡貽穀：《謝廬隱先生傳略》，頁30。

<sup>80</sup> Annual Report of Robert R. Gailey, September 1902, pp. 31-32, AQRBV.

<sup>81</sup> Annual Report of Robert R. Gailey, September 1902, p. 32, AQRBV.

遲疑不決，這可能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sup>82</sup>

1903年9月，賀嘉立（Charles W. Harvey）在抵滬後首次提交的報告中，提及他所面對的困難時，有以下一段真情剖白：

我今年的工作所面對的主要困難是由新環境所催生，這樣的情況至今仍然持續。我發現自己被語言不濟，以及對人們的習俗和生活的陌生所大大阻礙，與人們真切熟識已是一個緩慢的過程，要贏得他們的信任則更慢，要明白和欣賞他們的觀點是困難的，要知悉他們的真正生活有時看來是幾近不可能，我們與他們之間的樊籬看來無法逾越。每項計畫實際上都是實驗，在老家令人滿意的的方法，在這裡需要作多次的調整。另一個困難是缺少那些可以真正依靠的助手，〔西〕幹事必須處理幾近是所有的細節以確保成功。青年會的原則和方法仍是嶄新和少為人所明白……<sup>83</sup>

筆者當然不擬否定清末存在有利青年會發展的客觀條件，但是這種宏觀的歷史概論（generalization），既忽視了青年會幹事在具體歷史場景裡所面對的種種困難，同時亦淡化了拓荒者筚路藍縷的功勞。

## 二、否極泰來

在不理想的條件及環境下，憑著中、西幹事的努力，上海青年會的會務發展開始漸見起色，會員人數穩步增加，大部分均具

---

<sup>82</sup> 事實上，教會人士反對青年會的聲音基本上一直存在，特別是來自部分華人教會領袖。他們不接納青年會的辦事手法，亦害怕青年會會把她們比下去（overshadowing the churches）。Annual Report of W. E. Taylor, September 1911, p. 192, AQRBV.

<sup>83</sup> Annual Report of Charles W. Harvey, September 1903, p. 53, AQRBV.

大學畢業生 (college graduates) 的資歷。<sup>84</sup> 1900 年 3 月，路義思在給北美協會的報告中指出，上海青年會的會員已增至 160 人。在一星期內，他需要負責講道會、聖經班、講課、演講、詩班及委員會會議共 43 次，同時向北美協會提出增派西幹事赴滬協助的要求。<sup>85</sup>

但在上海青年會的發展初現曙光之際，同年 6 月，義和團亂事席捲京津，反教氛圍向全國蔓延。翌年出版的上海《海關十年報告》回顧當時的情況說：

1900 年的動亂對各教會的工作到底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可以說，在危急的三個月期間，到學校和教堂來的人數大減。就某些學校的情況來說，近半數的學生缺席。但到教堂做禮拜的人數，通常下降不那麼大，而且，減少的人幾乎全部都是非教徒。<sup>86</sup>

義和團亂事對於剛起步的中國青年會事業難免構成巨大的打擊，中國各地的學校青年會均告停止活動，<sup>87</sup> 天津剛建成的學校青年會會所亦遭夷為平地。位處公共租界之內的海關青年會，雖免受拳匪的襲擊，但會務亦同樣陷於停頓。

路義思眼見目下無事可為，原擬遷入的新會址（下詳）要待 10 月才竣工，在徵得全國協會總幹事來會理及上海青年會董事部的同意下，遂向美國駐滬總領事古納（John Goodnow）

<sup>84</sup> Robert E. Lewis to My Dear Friends, 2 February 1900, COR.

<sup>85</sup> Robert E. Lewis to Ober and Mott, 27 March 1900, COR.

<sup>86</sup> 〈海關十年報告之二 (1892-1901)〉，頁113。

<sup>87</sup> Robert E. Lewis to My Dear Friends, "The Boxer Uprising and the Work of the Association", 1 October 1900, p. 1, COR.

自薦，隨同英、美聯軍北上，在海、陸軍隊中開展青年會的工作。<sup>88</sup> 7月10日，路義思離滬北上。<sup>89</sup> 尚在襁褓階段的上海青年會遂交由曹雪賡主理，曹氏憶述當時情狀說：

是時本會情形，幾有消滅景象，又因財政支絀，辦事掣肘，於德育惟有查經班，於智育惟演說並影燈片，於體育惟有自由車隊運動而已，會員統計五十人；惟會所狹小，難敷其用，以二層樓房之陽臺作寫字間，房金每月三十五，預算全年經費，約在一千元以上，無處籌措。時有德人克沅慈君睹此困難情形，願擔任本會幹事，月薪以資補助，著者亦得勉勉從事，以盡其責，此為本會草創時期之情形也。<sup>90</sup>

事後證明，路義思不但沒有所託非人，甚至是獨具慧眼。曹雪賡在臨危受命的嚴峻環境下，仍能維持上海青年會的日常工作，備受路義思的讚賞。路氏在9月初返滬後，給北美協會的報告中說：

此外，我們極能幹的中國幹事曹先生，在兩個月內維持了青年會的每日開放，並沒有遺漏任何一個主日崇拜或星期三舉行的社交演講，且在我回來以後，向我顯示已繳付所有帳單的戶口。<sup>91</sup>

梁小初憶述曹雪賡時亦說：「他善於理財，若投身商界，當可致

---

<sup>88</sup> Robert E. Lewis to Ober and Mott, 14 September 1900, *COR*; Robert E. Lewis, *Search of Far Horizons*, pp. 46-56.

<sup>89</sup> Robert E. Lewis to Dear Friends, "Extracts from My Diary during the Peking Campaign", July-August-September, 1900, p. 1, *COR*.

<sup>90</sup> [曹雪賡]:《上海基督教青年會歷史概論》，頁172。

<sup>91</sup> Robert E. Lewis to Ober and Mott, 14 September 1900, *COR*.

富。但他寧願獻身於青年會，可謂難能可貴。」<sup>92</sup> 在這裡我們已初步可見，維持財政收支平衡既是青年會的主要工作，亦是衡量青年會幹事能力的重要指標之一。<sup>93</sup>

尚在萌芽階段的上海青年會，雖然在義和團亂事期間受到一定程度的打擊，但隨著亂事的結束，維新改革的氛圍得到進一步強化，卻為上海青年會的發展揭開新的一頁。亂事平息以後，上海青年會遷入新會所，並為會務發展提供新契機。路義思解釋搬遷新會址時說：

…… 但是總感覺〔北蘇州路〕會所太狹窄，不敷應用，所以又遷到了大馬路〔南京路〕先施公司左近，舊日市政廳的對面……<sup>94</sup>

1900年10月，上海青年會遷至南京路194號。清末以還，南京路逐漸發展成為上海最繁華的商業街道。早在1860年代，上海工部局已著意透過市政廳以及其他公共設施的建設，從而提升其中心地位（centrality）。<sup>95</sup> 上海青年會在地價較前昂貴的南京路租賃會址，已初步體現出青年會對於市中心會所選址的要求。

南京路會所為一所新建的房子（附圖2-1）。<sup>96</sup> 該處前身為滬海道尹公署，剛為上海猶太籍富商哈同（Silas A. Hardoon）購

<sup>92</sup> 梁小初：《未完成的自傳：七七回憶錄》，頁43。

<sup>93</sup> 一篇文章提及對青年會幹事的要求說：「無論會中有無積儲，能設法應付各項帳目。」〈青年會幹事所當知者何事乎〉，《青年》第16卷第8冊（1913年9月），頁162。

<sup>94</sup> 路義思：〈上海青年會第一任華總幹事——曹雪廉先生生平之回憶〉，頁176。

<sup>95</sup> Sherman Cochran, "Commercial Culture in Shanghai, 1900-1945: Imported or Invented? Cut Short or Sustained?", in Sherman Cochran ed., *Inventing Nanjing Road: Commercial Culture in Shanghai, 1900-1945* (Ithaca, NY: 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1999), pp. 4-5.

<sup>96</sup> Robert E. Lewis, *Search of Far Horizons*, p. 55.

入。<sup>97</sup> 哈同慨允捐銀一千兩予上海青年會作搬遷經費，同時給予免租三個月的優待。主理整個洽商過程的曹雪賡在二十年後憶述此事時，仍深深銘感哈同為上海青年會奠下發展根基的恩惠：「吾人所不能忘者，即當日哈同君慨然捐助鉅款，為吾青年會立一後來基本。」<sup>98</sup> 南京路會所的規模較前為完備：

該樓房〔南京路會所〕共計二層，下層分閱報所、西人會客所、公事所，三處；上層分會聚所、啜茗所、華人會客所，三處；另有晚學課讀所一處，以備青年夜讀之地。<sup>99</sup>

曹雪賡亦回憶說：「屋宇宏敞，地點適宜，頗堪設施……房舍共計十大間，講堂、夜館、報所、浴堂，逐漸設備。」<sup>100</sup> 會址雖仍屬租賃性質，然而從會所的布局、運用，以至設施的配置，皆可略見青年會「三育」理念的雛型（詳參第三章）。

同年冬天，美以美會（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s）傳教士畢啟（Joseph Beech）<sup>101</sup> 和軒尼斯（C. E. Hunnex）<sup>102</sup> 二人因義和團

---

97 〔曹雪賡〕：《上海基督教青年會歷史概論》，頁172。

98 〈追記本會二十週年紀念會總幹事曹雪賡君演說辭〉，頁90。

99 〈上海青年會紀略〉，頁5a。全國協會早期一直以上海青年會作為辦公會址，後來隨著該會日校的發展一日千里，至1905年9月才正式遷出。〈廣集師資〉，《會務紀聞》第3冊第21號（1905年9月15日），頁2。

100 〔曹雪賡〕：《上海基督教青年會歷史概論》，頁172。

101 畢啟離開上海青年會以後，繼續前赴華西開展傳教工作，為華西協合大學（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的創辦人之一。有關畢啟的生平，可參 "Joseph Beech", typescript, pp. 1-2; "Founder of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Passes", 2 March 1954, typescript, pp. 1-2, 皆收 Joseph F. Beech and Mrs. (Nellie M.), Mission Biographical Reference files, 1880s-1969, Reel #20 ID: 381, the General Commission on Archives and History, th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Madison, New Jersey.

102 「時有德人沅慈君睹此困難情形，願擔任本會幹事，月薪以資補助。」〔曹雪賡〕：《上海基督教青年會歷史概論》，頁172。

亂事寓滬，曾短暫擔任上海青年會幹事，義務協助上海青年會的復原工作。<sup>103</sup> 上海青年會的會務亦逐漸回復舊觀，會員人數亦回到亂事以前 160 人的水平：

自一千九百零一年正月一號起年底止，共得會友一百二十五位；除已出會或徙居他處之會友四十二位，總核實數得會友一百六十一位。道學：有查經班二班，每禮拜一聚；學問：該年內禮拜六之晚集，共十三次大會演說，並立有照像會；閱課之習俄文、法文、華文、減筆及水面機器等，學者四十名；文接：款客八次、筵宴二次，備有客房七間，去秋又設大餐間，以備會友訪客之用；操體：備有拋球場二處、踏車會友有三十位，踢球會友七位。<sup>104</sup>

### 三、曙光乍現

1903 年 1 月，路義思赴美休假，順道為上海青年會籌措經費興建永久會所（詳參第六章），上海青年會總幹事一職由全國協會總幹事來會理兼任。<sup>105</sup> 來會理主事期間，鑑於「會務更覺發達，大馬路〔南京路〕舊有之會所已覺狹小而不適用」；加上當時大部分會員居於虹口，往返非常不便。來會理遂建議將上海青年會遷至北京路 15 號 B 的新會址。<sup>106</sup> 同年 3 月出版的《青年》雜誌，扼要交代了上海青年會當時的會務發展概況：

一、會友：本年正月綜計寓居上海之青年會友三百有一名，年內共增會友一十四名；二、教育：年內講學共二百晚，學生數目

<sup>103</sup> Annual Report of CYMCA of Shanghai, 1901, p. 1, AQRBV.

<sup>104</sup> 〈上海青年會情形節略〉，《青年會報》第3冊（1902年3月），頁6a-b。

<sup>105</sup> Annual Report of D. Willard Lyon, September 1903, p. 44, AQRBV.

<sup>106</sup> [曹雪廉]：《上海基督教青年會歷史概論》，頁174、177。



按籍所載共有三十名，而長到班者均計之只九名；又新設童子教育班，而講學於日間，班分為五，延名師五位以司其教。童子數目，按籍所載，現有八十名，長到班者均計之只五十名；三、教務：該班一年之間，於禮拜日午後聚合共三十五次，赴會者以中數核之，每次四十八名；更於臘月間聚會五次，誦讀聖經，每次至會者均計百有一名；四、益智：是班通計年內共講說十有八次，赴會者每次均計四十二名；五、體操：童子教育班，按時體操，功無間斷，於本年特選光廠大地會演體操一次；六、司事：本會任書記者一位，另延先生三位，寫字人一位，執事一人，又僱工人三名。<sup>107</sup>

從上面的記述可見，上海青年會的發展形勢良好，會員人數突破三百大關，各種會務亦方興未艾，南京路會址已不敷會務的進一步發展。此外，當上海青年會在南京路會址運作一段時間以後，該會址的一些不足之處亦逐步浮現。據《上海青年會報》一則報導說：

本會原居大馬路三百四十號房內，不第阻於局面格式，且嫌其囂塵繁華，於讀書辦事殊多不便，故於七月十六日〔1903年9月7日〕遷至北京路15b號房內。<sup>108</sup>

南京路位處上海公共租界中心，理應符合青年會對理想選址的要求；不過，南京路會址為一所店面房子，參見附圖2-1，道上商販吆三喝四，相信對上海青年會日常的演講、課堂及辦公亦構成一定的影響。

107 〈上海華人青年會報告六條摘要〉，《青年》第2冊（1903年3月），頁12b。

108 〈卜宅喬遷〉，《上海青年會報》第1卷第1冊（1903年9月25日），頁1。

與此同時，原來南京路會址存在根本的缺陷，就是隔間並不理想，會所內三分之一的空間，一直以來並不能夠充分利用。來會理在寫給路義思的私人報告中指出，上海青年會需繳付一筆不成比例的租金：要是租用一個空間較小但隔間更好的地方，既可以節省支出，地方亦可作更有效運用；即或選用一個空間更大的地方，亦可以分租部分地方，以提供額外收入。<sup>109</sup> 隔間布局不佳固然是上海青年會另覓新址的重要原因，但是支出（租金）遠超過回報（空間）相信才是背後的關鍵所在。事實上，路義思早在 1902 年的報告即指出，南京路會址租金昂貴，浪費金錢，且設施亦不完備。<sup>110</sup> 西幹事賀嘉立在 1903 年的報告亦指出，南京路會址的位置尚算適中，但安排工作非常不便，條件不佳，租金高昂，因此他們在較早前便已著手另覓一個更理想的會址。<sup>11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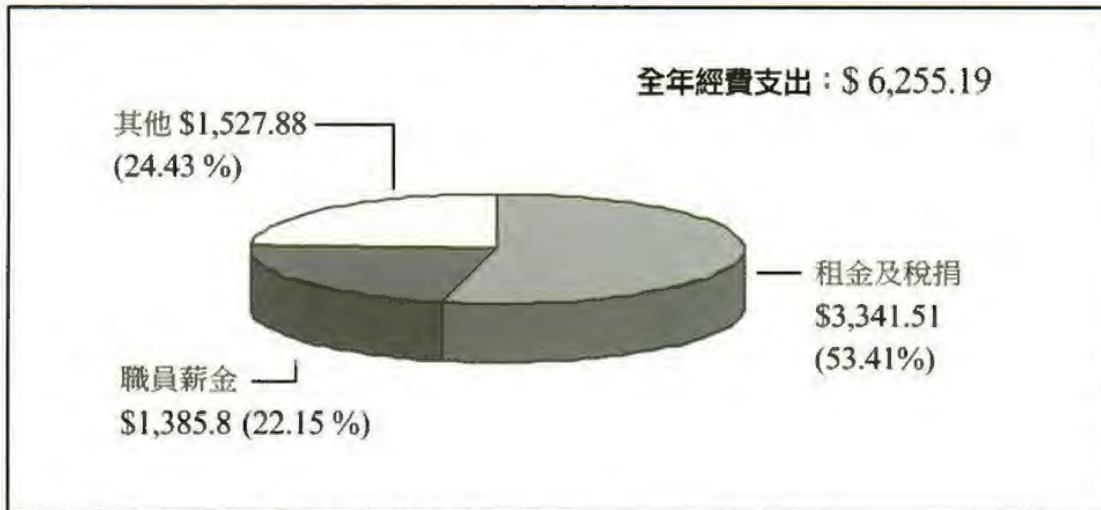
只要我們考察上海青年會早期的財政狀況，便可印證上述說法。從附表 2-5 可見，1901 年上海青年會的全年經費支出為 6,255.19 元，租金及稅捐方面的支出為 3,341.51 元，高達 53.41 %。另據附表 2-6 可見，1903 年上海青年會的全年經費支出為 10,835.2 元，租金及稅捐方面的支出為 3,735.82 元，仍高佔全年支出的 34.5 %。可見租金及稅捐的確構成上海青年會沉重的經濟負擔。若進一步將該兩年上海青年會職員的薪金總支出，與全年租金及稅捐的支出作比較，當可發現後者幾近足以支付職員兩年薪金，或多聘一倍職員。對於身兼多職、忙得不可開交的路義思來說，租用南京路會址當然是「浪費金錢」之舉。

<sup>109</sup> D. Willard Lyon to Robert E. Lewis, 3 May, 1903, p. 3, COR.

<sup>110</sup> Annual Report of Robert E. Lewis, September 1902, p. 40, AQRB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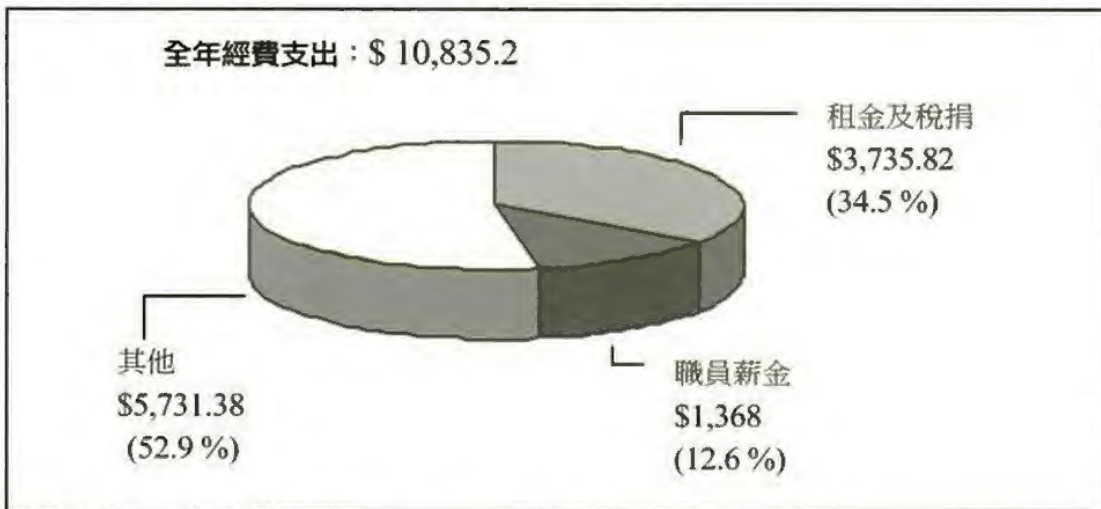
<sup>111</sup> Annual Report of Charles W. Harvey, September 1903, p. 52, AQRBV. 西僑青年會稍後亦因租金昂貴而遷移會址。〈遷地為良〉，《會務紀聞》第2冊第23號（1904年10月23日），頁2。

附表 2-5 上海青年會經費支出（1901）



資料來源：Annual Report of the CYMCA of Shanghai, 1901, AQRBV.

附表 2-6 上海青年會經費支出（1903）



資料來源：Annual Report of the CYMCA of Shanghai, 1903, AQRBV.

1903年9月，上海青年會正式遷入北京路會所，該處亦是一座新近落成的房子，面積較南京路會所為大，位處城市更中心的位置，且是一座更現代（modern）的建築物（附圖 2-1）。新會址似乎亦為上海青年會稍稍紓緩財務上的困難，該處每月租金較南

京路會址便宜最少 20 元。<sup>112</sup> 此外，新會址的設施亦似乎更符合青年會會所的理念：

該房近始落成，光潔可鑑，諸室廠亮，晚設電燈，不啻白晝；閱報所、會客廳、公事房、游藝所、課讀館、沐浴室、廚房、餐室無不周便備具，故人多樂之。<sup>113</sup>

究竟上海青年會遷入北京路會所以後，會務發展的情況若何？黃佐廷在一個慶祝北京路會所啟用的場合說：

……〔上海青年會〕本無體操也，今則體操興焉；本有學館也，今則學生眾焉；況添晚課、增新報，諸友之聯袂來至者，不絕如縷。拜日之講道會，前只有官話一會，今則又益以英文一會。種種之起色，處處之組營，會之興旺，旁觀者諒可概見矣。<sup>114</sup>

可見上海青年會在遷入北京路會所以後，會務發展已初現曙光；與此同時，亦創辦《上海青年會報》以推廣會務：「其宗旨為報告會中事務，蓋為一般會友中所不能到會者，可知其詳也。」<sup>115</sup> 據統計，上海青年會遷入北京路會所後，會員每日使用人次由 5 月、6 月間的 122 人（南京路會所）遽增至 200 人，升幅超逾六成；<sup>116</sup> 會員的積極推介相信發揮了一定的作用：「自

112 Annual Report of CYMCA of Shanghai, September 1903, p. 1, AQRBV.

113 〈卜宅喬遷〉，《上海青年會報》第1卷第1冊（1903年9月25日），頁1。「這所房屋比較前兩處寬綽得多了，裡面也有了一個小規模的大禮堂，不大完備的寄宿舍，這不過以今日的眼光追溯當日的事，是如此看法，然在當日，也算是應有盡有了。」楊益惠：〈本會三十五年事工概況〉，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編：《力的創造：上海青年會三十五週年紀念冊》，頁58。

114 〈開堂盛會〉，《上海青年會報》第1卷第3冊（1903年10月9日），頁1。

115 〔曹雪廉〕：《上海基督教青年會歷史概論》，頁177。

116 Annual Report of CYMCA of Shanghai, September 1903, p. 2, AQRBV.

喬遷而後，入會之友遂源源而來，攷其所以，實舊友有以導之也。」<sup>117</sup>

1903年11月抵滬的駱維廉在翌年的報告中指出，教他印象最深的是，上海青年會在有限的空間中竟能同時舉辦多種活動。他形容北京路會所的位置優越（well located），建築物的外貌亦備受讚譽（creditable）；但是在駱維廉眼中，它仍不是一個有足夠空間發展城市工作的好地方——因為它的面積只有一般美國城市青年會的十分之一。因此，他們必須非常小心安排時間表，以維持不同活動在六間房間中輪流舉行。<sup>118</sup>就當時的情況而言，他認為青年會的事工必須繼續發展，並且在有限的空間中仍要不斷擴張。<sup>119</sup>

#### 四、潛在隱憂

南京路時期標誌著上海青年會漸獲社會人士的接納及歡迎，初步建立起事業的基礎；然而，在漸見明朗的發展形勢下，上海青年會的發展前景並不是毫無隱憂。1903年5月，署任總幹事來會理遞交了一份私人報告給身在美國的路義思，其中特別提及上海青年會的會員人數問題。據1902年終的統計顯示，上海青年會有會員315人，但他卻發現其中有145人已六個月或以上未繳交會費，且不少已離開上海或下落不明，在一次董事部會議上，議決將他們從會員冊上除名；加上1903年首季有12名會員退會，

117 〈會友日增〉，《上海青年會報》第1卷第3冊（1903年10月9日），頁2。

118 「每禮拜三日晚間，除英文初班外，夜館停課，因是時為文學辯論會談講之期，或演說要事，或款接會友，不惟無暇亦無地也。」〈夜館先聲〉，《上海青年會報》第1卷第21冊（1904年2月12日），頁2。

119 W. W. Lockwood, "Report Letter No. 1", 15 February 1904, AQRBV.

另有 11 名新會員入會，截至 4 月份會員的總人數應為 169 人。但這 169 名會員中，又有 20 人兩個月或以上未繳會費，不過董事部卻認為未足以刪除他們的會籍。<sup>120</sup>

來會理接著指出，上海青年會實際的會員人數可以從年度的財政報告中確定，因為會費是每月一元。他並提供了 1901 年至 1903 年 4 月間，每月會費收入的數據（見附表 2-7），指出 1902 年的每月平均會員人數，較 1901 年下降 25%，1903 年首四個月的每月平均會員人數，亦較 1902 年下降 18%。來會理無意討論這驚人跌幅（*alarming decrease*）背後的因由，但他認為有兩點幾乎可以不證自明（*self-evident*）：第一、上海青年會向會員提供的利益（*privileges*）極為有限，會員人數正如上海青年會所提供的利益那樣少；第二、同宗會員（*active member*，即基督徒會員）佔極少的比例，就他所知只有 20 人是同宗會員，也就是說只有一個很小的團隊認同青年會的基本目標。<sup>121</sup>

來會理以「局外人」的身分提供上海青年會會員的數據資料和評論，有助我們更持平的總結南京路時期上海青年會的發展實況。他的報告至少說明了兩方面的事實：第一、上海青年會會員的流失率十分高。賀嘉立解釋說：「在一定程度上歸因於在這些口岸裡的青年持續轉變的性格（*constant changing character*）。」<sup>122</sup>也就是說，新舊會員的交替情況，雖未出現根本性的轉移，但似乎亦存在頗嚴重的更迭情況。正如一則報導說：「自設會以

<sup>120</sup> D. Willard Lyon to Robert E. Lewis, 7 May 1903, *COR*. 上海青年會為了解決會員欠交會費的問題，於翌年1月改以上期形式繳交。〈會友例捐〉，《上海青年會報》第1卷第15冊（1904年1月1日），頁1。

<sup>121</sup> D. Willard Lyon to Robert E. Lewis, May 7, 1903, *COR*.

<sup>122</sup> Annual Report of Charles W. Harvey, September 1904, p. 50, *AQRBV*.

附表 2-7 上海青年會會費收入 (1901-1903)

月份	1901	1902	1903
1月	261	174	128
2月	173	147	126
3月	274	163	144
4月	212	179	142
5月	270	155	-
6月	180	173	-
7月	231	156	-
8月	287	158	-
9月	161	178	-
10月	231	150	-
11月	172	157	-
12月	172	162	-
總數	2624	1952	(1917)
平均	219	163	(160)

資料來源：D. Willard Lyon to Robert E. Lewis, 7 May 1903, *COR*.

說明：括號內數字為筆者另據 1903 年年報加入。Annual Report of CYMCA of Shanghai, September 1903, p. 6, *AQRBV*.

來，吾會會友有遷居異地者，有因事造退者，紛去杳來，實不乏人。」<sup>123</sup> 筆者相信，上海青年會的會員流動性高並非個案或特例，它只是上海作為一個移民社會的一個縮影。可見，上海青年會早期的組織基本上仍是十分鬆散，會務主要由一批骨幹會員維

123 〈會友實數〉，《上海青年會報》第1卷第4冊（1903年10月16日），頁2。「凡會友住址如有遷移，務請關照本會事務所，以便通訊投遞函件……」〈通訊須知〉，《會務紀聞》第3冊第11號（1905年5月19日），頁2。

持。這樣的情狀，在上海青年會規模尚小的情況下，或許仍未構成即時性的危機；但隨著上海青年會的規模增大，對其本身的長期發展肯定是極為不利。

第二、來會理的報告指陳了一個事實，就是上海青年會會員的臨時性（temporariness）。在逾 300 名會員中，竟有泰半逾半年未繳會費，可以推斷的是，促使社會人士加入上海青年會主要是一些短暫或偶然的因素，例如來氏特別指出上海青年會所提供的利益，而非青年會造就青年的高尚宗旨。據 1903 年的統計，同宗教員只佔會員總人數 15%。<sup>124</sup> 當會員滿足了短暫的需要，又或是上海青年會無法再創新猷，延續會員維持會籍的誘因，自然便會出現會員流失的情況。

從本章的論述可見，上海青年會在新世紀之初落戶上海，在中、西幹事的努力下，克服種種外在或內在困難，方能於上海初步站穩陣腳。然而，在上海青年會的發展初見曙光之際，卻同時出現會員鬆散、同宗會員比例偏低等問題。究竟，上海青年會的發展自此是否一片光明？會內潛在的種種隱憂有沒有得到正視或處理？我們在後面的篇章會有進一步的討論。

---

<sup>124</sup> Annual Report of the CYMCA of Shanghai, 1903, p. 1, AQRBV.



## 第三章 宗旨的嬗變—— 從人格模造到「人格救國」

過去的中國青年會研究在社會福音的分析框架下，往往將焦點集中於青年會在近代中國推展的種種社會改良運動上。本章探討過去的研究較少注意的一個基本問題，即青年會宗旨本身所承載的整個模造人格的理念——「人格出產所」——與社會福音之間存在的既矛盾又模糊的關係，以及追溯此理念在近代中國的獨特歷史處境下如何逐步政治化，發展至後來有關「人格救國」的論述，對青年會向來秉持的不干涉政治立場作重新的詮釋。筆者不擬否定社會福音對中國青年會運動構成的潛在影響，在本章想要強調的是，本土政治的因素可能發揮了更為基本和重要的影響。

### 第一節 「人格出產所」

十九世紀中葉於英國肇始，繼而擴展至北美，以至世界各地的青年會運動，可說是因應城市化（urbanization）對（男）青年構成的道德衝擊，所作的一項信仰回應行動。來會理早在 1895 年便指出：「美國青年所遭遇的諸種試誘，在中國方面也是同樣存在的。……他們需要基督教青年會所能給予的環境，使他們可據以發展青年人格中最高尚的特性。」<sup>1</sup> 事實上，在太平洋彼岸有

---

<sup>1</sup> 來會理：〈中國青年會早期史實之回憶〉，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編：《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五十週年紀念冊（1885-1935）》（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1935），頁179。

東方巴黎之稱的上海的確存在同樣的社會道德危機。

## 一、城市化衍生的道德危機

### (一) 上海——罪惡的淵藪

鴉片戰爭以後，上海被開闢為條約口岸，英、美、法三國先後在此建立租界。從 1850 年代開始，無論是為逃避戰亂，或是謀求生計，來自中國各省的移民大量遷入上海（附表 3-1），為上海蓬勃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及資金。<sup>2</sup> 然而，移民脫離原來相對固定和封閉的農村社會，進入上海這個人口流動性極大的商業社會生活以後，傳統的倫理規範失去了監控作用，原有的官方教化功能亦隨之失效；在趨商、重商的社會風氣影響下，個人以至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念和道德標準均日趨腐化。<sup>3</sup>

附表 3-1 上海人口統計（1852-1927）

年份	華界（上海縣城）	公共（英美）租界	法租界	總數
1852	544,413	-	-	544,413
1865	543,110	92,884	55,925	691,919
1910	671,866	501,541	115,946	1,289,353
1915	1,173,653	683,920	149,000	2,006,573
1927	1,503,922	840,226	297,072	2,641,220

資料來源：鄒依仁：《舊上海人口變遷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頁 90。

2 忻平：《從上海發現歷史：現代化進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會生活（1927-193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頁 58-65。

3 詳參李長莉：〈十九世紀中葉上海租界社會風尚與民間生活倫理〉，《學術月刊》第 3 期（1995），頁 63-70。另參李長莉：《晚清上海社會的變遷：生活與倫理的近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樂正：《近代上海人社會心態（1860-191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1900年4月，寓滬不久的路義思在給贊助人的信件裡，便形容上海為中國最富裕，但同時又是最邪惡的城市：

上海在邪惡方面的名聲，甚至較在貿易方面更廣為人知。許多美國和日本婦女在市場上；數以百計的中國婦女常於福州路出沒，致使一個正派的婦女不可能在該區居住；大量的煙館（opium palace）；酒館（rum-dives）；穿上絲綢旗袍的不幸人乘坐人力車在街上招搖過市。這些活生生的證據顯示，魔鬼並未曾失去使生活成為地獄的詭計。這並非誇大其辭，我所書寫的並不需要任何證據，因為它每天均自我顯明於公眾眼中。<sup>4</sup>

他另一份報告描述上海時亦說：「這是一個富裕和無法無天的城市，兼具歐洲和東方的惡習。」<sup>5</sup>事實上，路氏的說法並不是他的一偏之見。早年肄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的林語堂，在一篇題為〈上海頌〉的文章開首，以不無諷刺的意味說道：「上海是可怕的，非常可怕。上海的可怕，在它那東西方的下流的奇怪混合……」<sup>6</sup>巴金甚至相當坦率的說：「……但是在我過去的作品中，我寫到上海的時候不曾用過一次美麗的形容詞。」<sup>7</sup>陳獨秀在〈上海社會〉一文亦說：

上海社會，分析起來，一大部分是困苦賣力毫無知識的勞

<sup>4</sup> Robert E. Lewis, "Shanghai, the Wealthiest and Wickedest City of China", 28 April 1900, p. 2, *COR*.

<sup>5</sup> Annual Report of Robert E. Lewis, September 1902, p. 1, *AQRBV*.

<sup>6</sup> 林語堂：〈上海頌〉，林語堂：《林語堂評說中國文化》（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1），頁113。

<sup>7</sup> 巴金：〈上海，美麗的土地，我們的！〉，巴金：《巴金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頁162。

動者；一部分是直接或間接在外國資本勢力底下討生活的奸商，一部分是賣偽造的西洋藥品賣發財票的詐欺取財者；一部分是淫業婦人；一部分是無惡不作的流氓，包打聽，拆白黨；一部分是做紅男綠女小說，做種種寶鑒秘訣，做冒牌新雜誌騙錢的黑幕文人和書賈；一部分是流氓政客；青年有志的學生只居一小部分，——處在這種環境裏，僅僅有自保的力量，還沒有征服環境的力量。<sup>8</sup>

可以說，上海的社會風氣敗壞，不啻是時代的共識。<sup>9</sup>

## （二）青年之陷溺場

尤其教人擔憂的是，上海的腐敗社會氛圍對廁身期間的青年構成嚴重的道德威脅：「滬上繁華甲於全國，雖號為文明之中心點，實為青年之陷溺場，有心人莫不心焉憂之。」<sup>10</sup> 上海青年會幹事謝強公說：

上海一青年最易墮落之地也。凡在青年立志未定初入社會，環境四周，皆係惡魔，幾何不為其所誘惑。即有束身自好之士，不肯隨俗浮沉，與時俯仰；然處此惡濁潮流之際，涼涼踽踽，難尋同調，亦不免索然寡懽。雖亦有種種之組織，如某社、某俱樂部，無非麻雀撲克，沉溺於賭

<sup>8</sup> 陳獨秀：〈上海社會〉，陳獨秀：《獨秀文存》，下冊（香港：遠東圖書公司，1965），頁94。

<sup>9</sup> 在舊版的英文詞典中，「上海」一詞更是一個貶義動詞。參李歐梵著，毛尖譯：《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第2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4。民國時期上海城市形象的討論，可參熊月之：〈民國時期有關上海城市形象的議論〉，收入張仲禮、熊月之、沈祖偉合編：《中國近代城市發展與社會經濟》（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頁146-169。

<sup>10</sup> 〈民國八年即一九一九年會務報告〉，《上海青年》第19卷第15號（1920年5月14日），頁3。

博之中，甚而群居終日，言不及義，故自愛者，亦望而卻步；再有某世界某世界，入其中凡耳所聞、目所見，實多不堪言狀之處，舉足皆齷齪之地，廁身悉陷溺之地。<sup>11</sup>

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隨著上海經濟高速起飛，休閒娛樂的需求隨之產生，影響更及於非菁英階層；娛樂場所亦由傳統的廟會、會館，擴展至戲院、茶館、煙館、公園等地方。<sup>12</sup> 自從1915年新世界遊樂場創辦以後，遊樂場如雨後春筍般陸續開業。<sup>13</sup> 易地遷徙、隻身在外的單身漢缺乏親友照顧，娛樂場所遂成為他們排遣寂寞的好地方。<sup>14</sup> 青年要是偶一不慎便會墮入各種誘惑，無力抽身而去。朱舒堂說：

譬諸賭博，初則因一二知己，公餘多暇，引為消遣，似無傷雁道也，不知與賭者，己為引誘所乘也；至若歌臺舞榭、楚館秦樓，在朝夕過往，沉溺其中者無論矣；或間有逢場作戲，一擴見識者，於德性庸無傷，不知偶一涉足，久即沉溺不返，不能得勝引誘，反為引誘得勝，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可不懼哉？<sup>15</sup>

黃警頑亦說：

11 〈青年之明星〉，《上海青年》第19卷第8號（1920年3月8日），頁2。

12 Alexander Des Forges, "Opium/Leisure/Shanghai: Urban Economies of Consumption", in Timothy Brook and Bob Tadashi Wakabayashi eds., *Opium Regimes: China, Britain and Japan, 1839-195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 169.

13 沈立行：〈舊上海的「世界熱」〉，施福康編：《上海社會大觀》（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頁277-281。

14 胡平生：《抗戰前十年間的上海娛樂社會（1927-1937）——以影劇為中心的探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2），頁13。

15 舒堂（朱舒堂）：〈得勝引誘之捷訣〉，《上海青年》第13卷第32號（1914年10月30日），頁5。

吾輩青春力壯，脫離家庭師表之約束，而入惡濁之社會，欲不傳染而守真，非有意志力強者不能，因上海商埠中心，最繁盛之區，心志薄弱，血氣未定之青年，單身獨立，實不易處，偶一不慎，即受外邪引誘，而變化其常質。<sup>16</sup>

難怪謝強公說：「上海為繁華鉅埠，夙號稱黑暗而汙濁之社會也，為上海青年者，其能免為黑暗而汙濁之青年乎？」<sup>17</sup>

同樣教人憂心忡忡的是，上海作為近代中國最重要的教育中心，<sup>18</sup> 上海的道德歪風對於來滬求學的學子所構成的衝擊，無疑更為尖銳：

學校之有價值者，大半皆在省城，及通都大埠，多數之學生，則出自村都鄉鎮，惜交通猶未便利，教學規模稍完備之學堂，多與學生之家族遙隔。彼為學生者，既脫離家人之羈絆，往往墮落人格，染繁華之惡習，前此家居時未經受之誘惑，至是有八面受敵之慮，其傷風敗俗之行為，殆亦世運所趨也。<sup>19</sup>

全國協會對此情況甚表關注：「……無數青年為求西學，遠去鄉井，齊集於省會大都，遍國皆是，當安息日例為假期，學生最易

16 黃警頌：〈紹介青年人入上海青年會說明書〉，《上海青年》第15卷第40號（1916年12月22日），頁2。

17 強公：〈二十二週紀念徵求大會開幕宣言〉，《上海青年》第21卷第3號（1922年1月23日），頁5。

18 「寰海大通以來，學風丕變，上海最得風氣之先，學校之多，人才之盛，甲於全國。」〈半夜學堂代表團會正鍾文川君演說詞〉，《上海青年》第23卷第33號（1914年11月6日），頁2。

19 〈智德二育之反動〉，《青年》第13卷第3號（1910年4月），頁73。

接觸險惡之試誘……」<sup>20</sup> 抑有進者，隨著清末儒學的價值愈益受到懷疑，各種新思想學說紛至沓來，在舊倫理觀念步向崩解、新道德價值尚未建立之際，傳統的知識分子容易陷入道德虛無主義的危機：

……今日銳行之新學，事事以革舊建新為方針，故新學說、新學理、新計畫，則趨之惟恐不及，前所聞者，視為陳腐，不問良窳，概遭屏斥，此新學界稍有遠識之士，莫不怵目驚心，亟思有以救正之也。<sup>21</sup>

可以說，上海青年會如同英、美的先行者一般，既面對相近的社會道德危機，亦肩負起相同的社會使命：

嗚呼！聲色貨利，上海一埠，可謂至矣。人苟焦灼見洞識，偶蹈陷阱，甯有跳出日耶！況少年子弟，經歷未多，學養未至，隨風逐浪，流連忘返，將見出聖入狂，遠善匿惡，日趨邪途，何堪設想。茲青年合會，聯士商為一體，合中外為一家，逐邪培正，興教勸學，免魑魅之害，而獲耶穌之恩，其不善哉！<sup>22</sup>

1915年2月，上海青年會為了讓在徵求會期間倉促入會的會員，能對該會的宗旨有更深入的了解，於是在一個交誼會上演了如下的一齣話劇：

20 〈提議委辦之報告〉，《青年》第10卷第3-4號（1907年5月），頁59。

21 〈智德二育之反動〉，頁73。早在1906年，嚴復與駱維廉交談時，已提出這方面的擔憂。W. W. Lockwood to John R. Mott, 30 January 1906, p. 3, COR.

22 〈上海青年會紀略〉，《青年會報》第3冊（1902年9月），頁5b。唐介臣在1907年的青年會全國大會上亦說：「城市風氣敗壞，由於尚利輕義，誘惑紛乘，青年會適欲於敗壞中設補救之法。」〈中韓基督教青年會大會記略〉，《青年》第10卷第3-4號（1907年5月），頁44。

其大旨有一少年自鄉間來，途遇本會徵求會隊員，為述會中利益，欲介紹其入會。該少年以初次來申，舉止行動處處留神，因在鄉間常聞人言，上海為五方雜處，少年人涉足其間，稍一不慎，即易受愚故也。旁有一守舊老，聽隊員之言，竭力與之反對，隊員則不與之計較，仍平心靜氣為之解說，並邀彼二人至會所參觀會內各部所辦之事。……末後參觀至德育部，彼此辯論多時，二客均被感動，遂立志簽名入會，並願共同研究聖經云云。<sup>23</sup>

這齣話劇的內容與真實情況存在多大落差，我們在第五章會作詳細討論；在這裡要指出的是，幫助來滬謀生、就學的青年，逃避社會上的種種引誘，引領他們歸信基督教，養成完全的人格，一直是上海青年會的宗旨和使命。

### （三）預防而非改造

學者常有的看法是，二十世紀初年，中國青年會由於受到美國社會福音的影響，故積極介入中國各種社會改良運動（附圖 3-1）。<sup>24</sup> 這種看法當然不無道理：

今之宗教較之向者，已由迷信之疆域而入於實際的界限，向者重守教規，今茲重在實行。吾人對於上帝之進步，為三育之發展；而對於人類之進步，則為箇人對於社會所盡之義務。無論何地，凡有基督教徒在，則社會即有改造之氣象，社會改良事業本為倫理上的設施，而今則變為基督

23 〈本會模範劇〉，《上海青年》第14卷第6號（1915年2月5日），頁2。

24 1907年青年會全國大會上的一項提案說：「煙癮、邪淫，以及種種妨害少年之惡習，俱為青年之巨敵，本會與之搦戰，萬無遷就之理，願各處領袖志士，俱能卓立不移，以保基督徒最高之人格。」〈提議委辦之報告〉，《青年》第10卷第3-4號（1907年5月），頁60。



附圖 3-1 青年會參與社會改良運動的宣傳漫畫



圖片來源：泊塵（沈泊塵）：〈屏棄惡習·責在青年〉，《上海青年》第18卷第10號（1919年3月21日），頁3。

教會之事業，以與基督教之宗旨相合故也。<sup>25</sup>

青年會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固然樂意參與社會改良事業，但是社會改良事業大抵並不是她的核心業務：

<sup>25</sup> 〈基督教之社會改良事業〉，《上海青年》第11期第34號（1912年12月13日），頁6。

基督教青年會對於酒肆不倡反對之議，而惟吸引少年使來會中，蓋既來會中即不能入酒肆矣。青年會對於慈善事業雖不籌款濟貧，而實則已暗藏於日夜學塾中，何則日夜學堂以道德及知識教人，使人能自重、自立、自助，即不致有貧乏困苦，故青年會對於社會之功用，係積極的，非消極的。其所注意者在使青年有地可往，不致身入醉鄉或他處黑暗之區耳。<sup>26</sup>

在參與社會改良的問題上，青年會基本上持兩個主要原則：第一、青年會無意扮演壓力團體的角色，對社會上存在的種種惡習單純進行消極性的抗議行動，而是嘗試另闢蹊徑，希望將那些業已沾染惡習的人吸引到青年會來，為他們提供另一個可能的選項（alternative）——為青年遷善遠罪、改惡從善創造可能的空間和條件。第二、青年會亦不以慈惠組織作為定位，主動介入各種消極性的社會慈善或賑濟活動，而是透過以教代賑、助人自助的手法，根本解決種種社會問題：

救今日之社會，不外乎改造與防止二法，譬如慈善事業，本指周濟貧困而言，而今則以防止貧困為入手辦法。不論何種團體，如能使人自重，而知為人之道，即能減少罪惡、貧乏、愚昧、困苦種種之惡現象。<sup>27</sup>

駱維廉在 1907 年的報告中說：

去年提及的賭博抗爭運動，青年會是在無法容忍的情況下被迫參與的；但是青年會的政策是，將影響力集中在會所

26 〈基督教之社會改良事業〉，《上海青年》第11期第34號（1912年12月13日），頁6-7。

27 〈基督教之社會改良事業〉，頁6。

裡——使青年會會所（association home）成為一個為青年提供最好的〔培育〕中心，包括教育、社交和宗教——同時尋求轉化那些前來、可接觸的生命。<sup>28</sup>

這種以會所為中心的事工模式，乃是繼承自美國青年會有關「人格出產所」（manhood factory）的理念。<sup>29</sup> 如聶其煒所說：「……而會員能時常到會，則自然絕迹於煙酒賭博之場，與彼匪友淫朋，無由親近……」<sup>30</sup> 丁福保亦說：「在會內讌客，不得飲酒挾妓，皆助吾人之德育者也。」<sup>31</sup> 可以說，在上海的不良道德氛圍下，對於尋常青年來說，潔身自愛再不是天方夜譚的神話，或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企望。如會員戈朋雲所說：「……上海之青年會，洵足為學子之課餘、商家之業餘、紳士之公餘之蒞臨所。……乃此會為浮華洋場中特見之一片乾淨土，為俗塵所飛不到者。」<sup>32</sup> 上海青年會取而代之的是，提供具反吸引作

28 Annual Report of W. W. Lockwood, September 1907, p. 158, AQRBV.

29 「美前大總統羅斯福曰，『青年會者，鑄造人格之大工廠也。』」楊鶴慶：〈余所知之青年會（在西安青年會講演稿）〉，《青年進步》第39冊（1921年1月），頁90。詳參 Paula Lupkin, "Manhood Factories: Architecture, Business, and the Evolving Urban Role of the YMCA, 1865-1925", in Nina Mjagkij and Margaret Spratt eds., *Men and Women Adrift: The YMCA and the YWCA in the City* (New York;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40-64; Paula Lupkin, *Manhood Factories: YMCA Architecture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Urban Culture*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0).

30 聶其煒（管臣氏稿）：〈說基督教青年會〉，《上海青年》第16卷第12號（1917年3月30日），頁3。

31 丁福保：〈青年會會員之利益〉，《上海青年》第16卷第40號（1917年12月3日），頁5。

32 戈朋雲：〈青年會有助於改良社會〉，《上海青年》第16卷第42號（1917年12月17日），頁8。李平亦說：「諸君果能常到會所，獲益良非淺，較之日往遊戲場者，何啻天壤之別哉！夫諸君能於七、八百人集合之會場中，無吸煙之惡德，喧嘩之聲浪，豈他處熱鬧場中所能幾及！」李平：〈第十屆新會員歡迎會紀事〉，《上海青年》第17卷第5號（1918年2月4日），頁5。

用 (counter-attraction) 的健康有益活動：「本會宗旨原為扶掖青年，提倡後進，俾初出處世之人，專心於學問，不致為外物所引誘。」<sup>33</sup> 黃警頑亦說：「入青年會後，可不至茶坊酒肆，改酒食徵逐為閱報、聽講演，改碰和為游泳、臺球及各種遊戲運動。」<sup>34</sup> 這種改良社會風氣的方法，既可以防止種種社會惡習進一步蔓延，亦有助提升青年的道德人格，發揮「此消彼長」的功效：

本會組織日夜學堂，延請名人演說，並設藏書室等，區區之意，惟思有以嘉惠青年，藉資造就；至於設立研究聖經班，按期演講真道，以防青年或有歧途之誤。蓋滬江一隅，最易受外物之引誘，防微杜漸之方法，惟多讀有益之書，日與善人交聽，信良言庶，品行端方，雖處客感紛乘之地位，自百折而不磨矣。<sup>35</sup>

青年會與一般教會不同的是，採取間接的布道策略，期望在世俗社會中搭建一片自留地，俾讓青年在潛移默化的情況下，接受基督信仰的薰陶，由量變達到質變，最後皈依成為基督的門徒。<sup>36</sup> 如陳維新所說：

33 〈深望於諸君〉，《會務雜誌》第5期第7號（1907年6月21日），頁1。

34 引自王立才：〈勸青年快入青年會〉，《上海青年》第16卷第43號（1917年12月24日），頁6。

35 〈此消則彼長〉，《會務雜誌》第6期第13號（1908年5月15日），頁2。俞國楨說：「夫青年之會何為而設也？一欲有範圍也。青年之血氣未定，青年之心性易動，習於善則歸於善，習於惡則歸於惡，苟無青年之會，或為歹人所引，或為物慾所搖，往往入於污穢之場而不知返，故曰：與善人交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惡人交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云。」〈講義照登〉，《會務紀聞》第2冊第33號（1905年1月6日），頁2。

36 有學者將青年會在這方面的努力稱為「環境布道」(environmental evangelism)。詳參Paula Lupkin, "Manhood Factories: Architecture, Business, and the Evolving Urban Role of the YMCA, 1865-1925", pp. 40-64; Paula Lupkin, *Manhood Factories: YMCA Architecture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Urban Culture*, pp. 5-7.

蓋人性喜飲鴆毒之晏安，而畏苦口之良藥，若驟然勸人悔過遷善，其事已不易，猶望其信心堅定，更屬難能；惟青年會所辦之事業，純係基督真理，因勢利導，引人入勝，勸其入青年會，使浸潤濡漬於宗教道德之中，不知不覺，遂成為強有力之基督徒。是青年會者，又各界人士入教之一間接機關也。<sup>37</sup>

可以說，積極預防而非消極改造，一直是青年會的基本宗旨和辦事方針：

它〔宗教工作〕的影響力在於預防性（preventive）和建設性（positive）——在預防方面，就是為青年提供一個舒適和有益的聚會場所，至於建設方面，則透過運作中的不同宗教部門。<sup>38</sup>

事實上，青年會作為「人格出產所」的定位，理論上制約了社會福音的影響力；青年會要是過分介入種種政治、社會運動，不誇張地說，更有自挖牆腳之虞。截至1920年，青年會在介入社會問題上的取態仍然相當含糊：「青年會整體對於社會的態度和應

37 陳維新：〈中國青年會與教會之關係〉，《上海青年》第15卷第20號（1916年6月2日），頁1。張篤雲亦說：「會中三育並重，無一偏廢，且用種種引人入勝之法，於吾中國少年最為合宜。會中雖以基督教為宗旨，而毫無強迫，其栽培少年之道德，妙在循循善誘，使逐漸遠離惡勢力，而受基督教之感化。少年既入會，於不知不覺之中其人格漸高。」〈余信青年會何也〉，《上海青年》第12卷第8號（1913年2月21日），頁6。

38 Annual Report of CYMCA of Shanghai, 1908, p. 2, AQRBV.「我們知道療治和衛生的不同。既病之後，謂之治療；未病之前，謂之衛生。去年史量才先生說得好：『青年會不是一個醫院。牠的工作是預防。』」（《上海青年會徵求會隊員袖珍錄》（上海：上海基督教青年會，[1932?]），頁3。上海市檔案館檔案·U120-0-85-[4]。

該提供的服務或者可以說仍是一個未解決的問題。」<sup>39</sup>

因此之故，單純以社會福音來理解中國青年會運動，不僅有以偏概全之弊，更有捨本逐末的危機。邢軍指出：「青年會前 25 年的工作中心是社會服務，1919 年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對青年會形成了挑戰，使其工作改變集中到社會改革和政治重建方面來。」<sup>40</sup> 這種表面上看來是理所當然的說法，除了將複雜的歷史圖像簡單化外，亦完全忽略了青年會一直以來奉為圭臬的發展議程。事實上，中國青年會在二十年代以後無法有力回應政治、社會的挑戰，正是與「人格出產所」這種事工理念存在結構性的關係。有關這一點我們在結論部分會再作討論。

#### （四）標準化的模造人格程式

與「人格出產所」理念孳生的是一套標準化的人格模造程式（附圖 3-2），也就是青年會素常強調的「三育」話語：「蓋以人之為人，既合身心靈三者而成，而欲造成完全之人格，自當於斯三者各施以相當之教育，使得平均發達，無稍偏重。」<sup>41</sup> 可見，「三育並重」這套標準化的人格模造程式，乃是建基於青

<sup>39</sup> W. W. Lockwood, *Principles of 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Shanghai: Secretarial Training Department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s of China, 1920), p. 29. 這本幹事訓練手冊在談及社會服務時，引述一個委員會報告表示：「青年會可以因應需要提供出色的服務，以及在沒有過分承擔責任的情況下，為更大型的社會活動指陳方向。最理想的是，在某些情況下，青年會可以組織小規模的工作作為範例，讓其他外圍機構模仿和擴展。此外，在開展非常規性福利事業時，要清楚的是，青年會不先佔有或不需要盤據有關工場，而是要引起人們注意到有關服務的需要及可行性，透過展示幾個原則，使其他最終承擔主要責任的人得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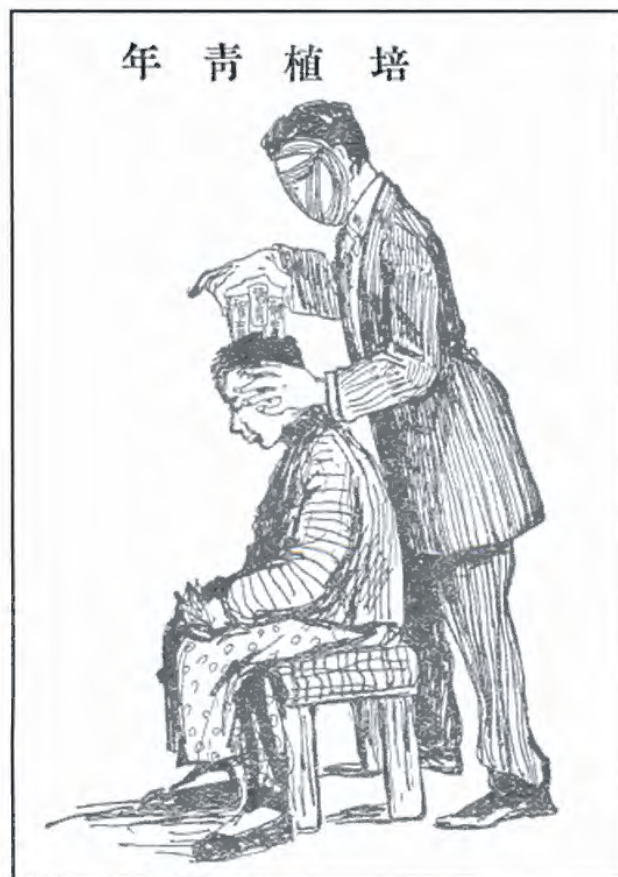
<sup>40</sup> 引自邢軍著，趙曉陽譯：《革命之火的洗禮：美國社會福音和中國基督教青年會（1919-193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44-45。

<sup>41</sup> 天翼：〈青年會在世界各國之造就〉，《進步》第6卷第4號（1913年10月），頁5。

年會對人格構成的理解。於此可知，不同設施或活動內容，理論上並非任意或隨機的湊合，而是建基於青年會宗旨所揭示的「三育」原則：

本會素以栽培青年人格養成有道德之國民，蓋基督教不第以道德教人，更有能力運行於人身，俾能依道而行，是實踐的，非理想的。然欲培養完全人格，非注重三育不可，三育者何？心、靈、體是也。而其相當之社交工夫亦宜顧及之，職是之故，於是有體操班、澡身室、日夜學校，查

附圖 3-2 青年會以德育、智育、體育培養青年的人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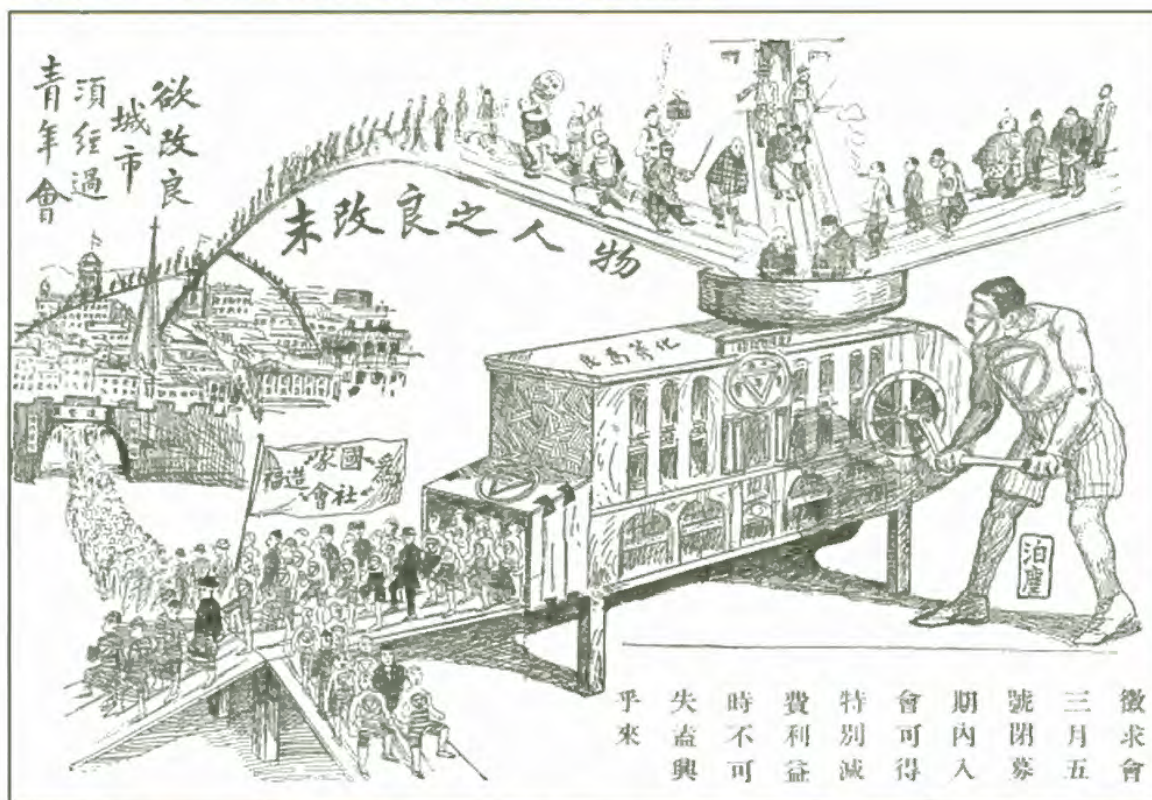


圖片來源：〈培植青年〉，《上海青年》第 18 卷第 9 號（1919 年 3 月 1 日），頁 3。

經班、論道會、交誼會、會食堂，以及關於體育、物理種種之演說會，以期啟發青年各方面之知識，三育兼全，不偏於一，而此實基督教青年會之引導青年歸於正道之不二法門也。<sup>42</sup>

青年會的「三育」理念，對於塑造青年理想人格的可能性持高度樂觀態度，只要將青年帶到青年會接受塑造，青年會便能發揮「化莠為良」的功能（附圖 3-3）。徐翰臣嘗以工廠中的生產原料鐵、木、漆比附青年會所提供的德、智、體三育訓練：

附圖 3-3 青年會改造青年人格進而貢獻國家



圖片來源：泊塵（沈泊塵）：〈欲改良城市須經過青年會〉，《上海青年》第 18 卷第 7 號（1919 年 2 月 28 日），頁 14。

42 〈甲寅全年報告〉，《上海青年》第 14 卷第 11 號（1915 年 3 月 19 日），頁 1。另參〈青年會之宗旨〉，《會務雜誌》第 7 期第 35 號（1909 年 12 月 10 日），頁 2。



金屬非經陶冶，不克為良善器具；人民非由造就，不能成完全人格，此青年會之所由建設也。……顧三育並進，如爐斯熔，如錘斯擊，靡與不純，靡品不精，鑄造多數嶄新國民，完全有用人格，大為國家棟樑，小為社會服務，是青年會之範圍。若合鐵木漆三工場，而為造成各良好器具之大工廠也。……昔人有言，天地為爐，萬物為冶，而生育遂。吾則謂青年會為爐，青年為冶，而國民成。吾之以青年會喻工廠，豈虛語哉！<sup>43</sup>

也就是說，上海青年會有如一間生產完全人格青年的大工廠，德育、智育、體育三部便是青年會工廠下的三個小工場，青年在工廠內經陶冶以後，便能成為國家社會服務合用的國民。

從上面的宣傳漫畫可見，晚至二十年代，青年會有關「人格出產所」的理念已產生微妙的變化，在招徠會員的時候，除了向來提倡的改良城市道德風氣外，還添上「造福國家」的政治意義。如蘇理平亦說：「故青年會者不啻製造新青年之製造廠，一經此廠之製造，即能奮發有為，興家強國。」<sup>44</sup> 究竟這種微妙的變化是何時及如何產生？

## 第二節 青年會的政治化

### 一、時代意識與歷史使命

青年會的政治化與清末獨特的政治環境息息相關。青年會入

<sup>43</sup> 徐翰臣：〈青年會為鑄造國民之工廠〉，《上海青年》第18卷第4號（1919年1月24日），頁3。

<sup>44</sup> 蘇理平：〈青年會與中國前途之關係〉，《上海青年》第18卷第14號（1919年4月18日），頁3。

華之際，適值中國步入新舊更迭的過渡時代。路義思在 1898 年抵滬不久，即意識到一群饒富創新、改革活力的新知識分子，正在這個東方古國迅速冒升：「最早幾星期在上海的學習和會議，令我們從一個新角度看舊中國。傳統的方法和靜態的教學無法引起新一代的興趣。」<sup>45</sup> 義和團亂事以後的局勢發展，更進一步確認了改弦易轍的時代軌跡。路義思說：「義和團亂事是一段可怕的插曲，然而它標誌著舊秩序的結束，以及中國人民新時代的開始。」<sup>46</sup> 在新時代的十字路口上，青年會對於中國政局的走向密切關注：

在這樣的情勢下，青年會必須在上海、天津、廣州、漢口、北京、香港，以及後來的其他城市觀察她〔中國〕的步伐。沒有人能明白那是甚麼意思，除非他打消腦海中有關美國的情況。<sup>47</sup>

早期的西幹事積極思考青年會可資發揮影響力的地方，並期望把握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成為塑造新中國的歷史動力。路義思說：「我們沒有時間可以浪費，中國必定會現代化，同時發展她的國家生活和資源。」<sup>48</sup> 來會理亦說道：

她會成為世界繁榮的威脅，抑或世界和平的保證人，將很視乎她的青年在多大程度上被授與耶穌的原則，以及被引導在他們的生活中，將這些原則化為具成果的應用。<sup>49</sup>

---

<sup>45</sup> Robert E. Lewis, *Search of Far Horizons* (West Conshohocken, PA: Infinity Pub., 2003), p. 41.

<sup>46</sup> Robert E. Lewis, *Search of Far Horizons*, p. 56.

<sup>47</sup> Robert E. Lewis, *Search of Far Horizons*, p. 63.

<sup>48</sup> Robert E. Lewis, *Search of Far Horizons*, p. 65.

<sup>49</sup> Annual Report of D. Willard Lyon, September 1905, p. 1, AQRBV.

駱維廉提及青年會發展體育工作的迫切性時說：「要是我們在這個項目猶豫或失敗，其他的組織將會對這個國家的生活作出貢獻並得到回報，一名在上海的體育教練將可教授整個國家。」<sup>50</sup>

二十世紀初年，青年會在中國社會所展現的驚人活力，與早期西幹事普遍具有強烈的時代意識，以及隨之而來的歷史使命感分不開。駱維廉的太太這樣評價駱氏早年在中國開展的工作：

他並不單活在當下，且放眼將來，當看見轉變和發展必然來到這個國家時，他設法將青年會引入生活，使她對中國的偉大作出貢獻。由一開始，他努力使青年會適應中國的需要，並不需要複製在西方曾作過的事情。這樣的政策，為中國各地的青年會所跟隨，這亦是中國青年會擁有巨大影響力，她的事工在中國扮演重要角色的原因。<sup>51</sup>

此外，香港青年會的奠基者麥花臣（John I. McPherson）在回顧他參與青年會三十年的經歷時亦指出，青年會的「前瞻眼光」（forward view）與她的成功息息相關。<sup>52</sup> 後來有華人幹事將這種具有高度前瞻性的工作思維稱為「與時俱進」，並自詡為青年會賴以成功的重要因素。王正廷說：「『與時俱進』的意思，就是通變達權的意思，凡事牢守就笨滯，變通就靈活。」<sup>53</sup> 張伯苓解釋青年會的成功要素時亦說：「因其〔青年會〕能供給人之需

<sup>50</sup> Annual Report of W. W. Lockwood, September 1907, p. 7, AQRBV.

<sup>51</sup> Mary Lockwood, "Manuscript on Life of William W. Lockwood", unpublished typescript, 1950-1955, p. 7.

<sup>52</sup> Sue (Fulham) McPherson, "J. I. McPherson, Hong Kong YMCA: General Secretary 1905-1935",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vol. 46 (2006), p. 569.

<sup>53</sup> 楊恕：〈會長王正廷博士對全體幹事會議的演說詞〉，《上海青年》第19卷第26號（1920年9月24日），頁5。

要，且青年會有活動能力，有變化性，能審機度勢，以應付社會之要求云云。」<sup>54</sup> 這種靈活創新、緊貼時代的思考邏輯，後來更內化為青年會的組織文化，對整個中國青年會運動影響深遠。<sup>55</sup>

如前文所述，救亡圖存為中國近代不少知識分子的時代關懷，對於心繫時局發展的青年會西幹事來說，又豈有不知之理。來會理憶述：「……是以中國青年，咸然以向有者為不足，而放眼於將來，本極高之熱忱，探索西方所以富強之術，時求學狂熱，瀰漫於全國人心。」<sup>56</sup> 西幹事海慕華（Egbert M. Hayes）亦說：「好思考的人，均熱切幫助他們的同胞解決僅僅是維持存在（*maintaining a mere existence*）的問題，而任何知識能補救這方面均會備受歡迎。」<sup>57</sup> 青年會要在這批新知識分子中間產生影響力，便必須向他們提供各種有助中國走向富強的啟蒙知識。從這個角度看，上海青年會的活動程序從一開始便根本不能不政治化。<sup>58</sup>

## 二、對時代訴求的回應

影響所及，上海青年會在詮釋模造人格的「三育」程序時，亦不得不在重點上作出相應的調整。在德育方面，早期講道會

<sup>54</sup> 引自〈青年會協會新屋落成開幕紀〉，《申報》，1921年4月12日，第3張，第11版。

<sup>55</sup> 陳立廷後來說：「青年會的事業如與會員生活相去太遠，那便失了牠理想的目標。我們希望今後多在這點努力，使本會確實可以成為一個同志的聯絡會。」陳立廷：〈致本會同人〉，《上海青年》第28卷第20期（1929年9月26日），頁1。

<sup>56</sup> 來會理：《中華基督教二十五年小史》（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20），頁18。

<sup>57</sup> *Annual Report of Egbert M. Hayes, September 1914, p. 2, AQRBV.*

<sup>58</sup> 「特以新報疊出，閱如為憾，故近而添《新民叢報》、《江蘇雜誌》、《浙江潮》、《湖北學生界》各報，庶有以擴諸友之眼界，慰眾人之快矣。」〈增報〉，《上海青年會報》第1卷第2冊（1903年10月2日），頁2。另參Ryan Dunch, *Fuzhou Protestants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hina, 1857-192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77.

的題目已帶有濃厚的政治味道，如「愛國之教友有何本份」、<sup>59</sup>「基督教於國政學術有何相關」、<sup>60</sup>「中國如何可以興盛」<sup>61</sup>等。這些講題的擬定明顯是為了招徠愛國之士：「……按基甸〔Gideon，舊約聖經士師〕時其本國情形大有似中國目下之情形，來君〔來會理〕言之當與吾人家國不無少裨，凡知愛國者尚其來聽。」<sup>62</sup>而講員似乎亦深明聽眾的需要，致力提供極具時代適切性的應用訊息，如倫敦會傳教士包克思說道：「中國正在危亡之境，凡為吾儕，其奮勉以進焉可也！」<sup>63</sup>上海青年會幹事盧愛德（Arthur Rugh，後譯如雅德）亦說：「……現在吾人扶助中國，當效彌希米〔Nehemiah，舊約聖經士師〕之恆心，堅持到底……」<sup>64</sup>此外，上海青年會為招徠會員參加查經會，在宣傳查經會時亦同樣訴諸救國的關懷：「今人皆欲振興中國，而不知振興中國，惟在以聖經為寶云云。」<sup>65</sup>聖經更被詮釋為西方國家富強的祕訣所在，窺探聖經內所載的富強良方有助振興中國：「吾人何故欲習聖經？固聖經實為顯明天道之聖書，西國之文明發達實繫乎此。」<sup>66</sup>

智育方面，青年會最為人所稱道的演講會便是最特出的例子。如駱維廉所說：

與大多數西方國家的青年會比較，演講在上海青年會的活

59 〈拜日宣道〉，《上海青年會報》第1卷第14冊（1903年12月25日），頁2。

60 〈黃君講義〉，《上海青年會報》第1卷第15冊（1904年1月1日），頁2。

61 〈講義照登〉，《會務紀聞》第2冊第33號（1905年1月6日），頁2。

62 〈聖日宣道〉，《上海青年會報》第1卷第15冊（1904年1月1日），頁2。

63 〈包君講義〉，《上海青年會報》第1卷第10冊（1903年11月27日），頁1。

64 〈盧君講義〉，《上海青年會報》第1卷第14冊（1903年12月25日），頁1。

65 〈查經會〉，《上海青年會報》，第1卷第3冊（1903年10月9日），頁2。

66 〈讀聖經之緣由〉，《會務雜誌》第6期第30號（1908年12月4日），頁1。

動中，構成一個更重要的特色。我們的目的是透過每年舉辦一系列的演講，將可啟發和導引中國領袖需要思考的問題。<sup>67</sup>

1905年10月，上海青年會邀請嚴復主持一個政治學的系列演講。據嚴復憶述：「不佞近徇青年會駱〔維廉〕君之請，謂國家近日將有立憲盛舉，而海上少年，人懷國家思想，於西國政治，所與中國不同者，甚欲聞其真際。」<sup>68</sup>可見駱維廉因鑑於清廷行將推行立憲，遂邀嚴復為上海青年會登壇演講。是次演講雖然額外收費，但仍無損聽眾的入場意願：「一時來聽講者，人至六十名之多，洵是一時知名之士，可為中國人知政治學之先導。」<sup>69</sup>聽眾反應的熾熱程度，也從上海青年會計畫再請嚴復主持演說可見：「計每期聽者足有七十餘人，且漸次有增無減，殊堪欣喜……惟本會尚望其在年內仍時來惠我，更出萬幸茲！」<sup>70</sup>

在演講會以外，上海青年會所舉辦的文學辯論會，更提供了討論時局的平臺，我們從其中的辯論題目同樣可見一斑，如「解釋日俄之戰中國是否須注意嚴守中立」、<sup>71</sup>「解釋究竟吃鴉片煙習俗之惡抑勝於飲酒習俗之惡乎」、<sup>72</sup>「日俄爭戰日勝將有益於中國」、<sup>73</sup>「現今中國收回各處鐵路洋權股利其有關係中國損益與否」、<sup>74</sup>「今戰事結局後中國國家應商請日本政府派員助行新

67 Annual Report of W. W. Lockwood, September 1913, p. 11, AQRBV.

68 嚴復：《政治講義》，收入王棧主編：《嚴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第5冊，頁1242。

69 〈政學儲才〉，《會務紀聞》第3冊第26號（1905年10月20日），頁2。

70 〈演說完竣〉，《會務雜誌》第3冊第32號（1905年12月1日），頁2。

71 〈辯論開會〉，《上海青年會報》第2冊第7號（1904年4月8日），頁2。

72 〈以文會友〉，《上海青年會報》第2冊第11號（1904年5月6日），頁2。

73 〈行華語辯論會〉，《會務紀聞》第2冊第26號（1904年11月18日），頁2。

74 〈辦〔辯〕論先聲〉，《會務雜誌》第3冊第32號（1905年12月1日），頁2。

政乎？」<sup>75</sup>「吾國擬仿效日本設立上下議院之口益」<sup>76</sup>等。這些辯論題目均與青年的道德修養及傳揚福音無直接關係，倒是清一色與中國時局有關，對於關心政局的人士無疑頗有吸引力。<sup>77</sup>

在推廣體育活動方面，上海青年會亦將體育與國家的富強連繫起來，如1905年宣傳戶外運動場說：「本會操場網球界址現已竣工……尚望諸君推己及人廣引同志，庶可人人強健，養成國民精神。」<sup>78</sup>後來宣傳體育學堂時，亦將參與體育活動詮釋作強國強種的手段：「體育一科我國素不講求，近年以來各處學堂莫不有此一科，實可謂中國現今之新學，強國強種全繫乎體育之發達，故本會特設體育學堂……」<sup>79</sup>1910年，上海青年會在宣傳全國運動會時，更將運動場上的成績演繹成為中國強弱、榮辱的反映：

此次為中國第一次全國運動會，關係匪淺，且此次運動會為日後萬國運動會之基礎，按泰西各國皆派有代表，惟中國獨無，可恥孰甚。尚望吾輩青年勉力為之，為吾中國奮尚武精神，不致為外人所輕視，則幸甚矣。<sup>80</sup>

可以說，上海青年會早期已致力將「三育」的活動程序政治化，以達到招徠愛國之士的效果。誠如駱維廉所說：「上海青年會每年均會就程序（program）作出調整，以緊貼人們腦海最關

75 〈辯論先聲〉，《會務紀聞》第2冊第30號（1904年12月16日），頁2。

76 〈聊索解人〉，《會務紀聞》第3冊第28號（1905年11月3日），頁1。

77 1904年的年報形容文學辯論會內容有趣，既具教育意義，又能啟發社會意識。參 Annual Report of the CYMCA of Shanghai, 1904, p. 3, AQRBV.

78 〈體育雜誌〉，《會務紀聞》第3冊第14號（1905年5月26日），頁2。

79 〈需才甚殷〉，《會務雜誌》第8期第23號（1910年9月12日），頁2。

80 〈全國運動會簡章〉，《會務雜誌》第8期第18號（1910年6月24日），頁2。

注的課題。」<sup>81</sup> 在這樣的情勢下，青年會的「三育」活動程序勢必進一步添上救國色彩：「當今道德日衰，吾輩青年更宜勵志，自修德、智、體三育，皆為當務之急。將來為國圖治，以增我青年歷史上之隆譽，則我青年會陶鎔完全人格之功，可光明較著矣。」<sup>82</sup> 我們在這裡已隱然可見人格模造與國家富強的因果關係論述。

### 三、政治運動的搖籃

上海青年會饒富時局色彩的活動程序，在招徠會員方面大概有不俗的成績。早在1902年6月，傳教士任保羅在上海青年會的一次演講上說：「今日在會諸君，大概皆有維新之志者。」<sup>83</sup> 另據顏惠慶後來憶述：

當時外國基督教青年會舉行了一場有關「廢除外人在華治外法權」的辯論會，引起了社會的關注。我與唐國安〔唐介臣〕為正方，主張廢除。另外兩名外國人為反方，主張保留。英國的一位著名律師擔任裁判。最後他判定我們取勝。<sup>84</sup>

〔上海青年會〕會所在南京路時代，有名人演講，最哄動

<sup>81</sup> Annual Report of W. W. Lockwood, September 1912, p. 4, AQRBV.

<sup>82</sup> 〈歷史增光〉，《會務雜誌》第7期第24號（1909年9月24日），頁1。「……故凡抱有愛國心者，當以整頓國勢推廣前途為思想，青年會以德、智、體三育培植遠進青年為宗旨，實具振興國勢前途之能力在焉。」〈立身之言〉，《會務雜誌》第7期第35號（1909年12月10日），頁2。

<sup>83</sup> 任保羅：〈上海青年會演說〉，《萬國公報》第161期（1902年6月），頁12（總頁21026）。

<sup>84</sup> 顏惠慶著，吳建雍、李寶臣、葉鳳美譯：《顏惠慶自傳——一位民國元老的歷史記憶》，頁50。另〈中西合辦〉，《上海青年會報》第1卷第10冊（1903年11月27日），頁2。



一時的，就是嚴幾道先生的名學及法學演講，所有在上海不懂洋文而研究新學的人物，因此就認識了青年會，表示同情。<sup>85</sup>

可見上海青年會透過舉辦政治色彩濃烈的活動而聲名大噪，不僅得到接受西學訓練的知識分子的支持，亦教傳統文人學士另眼相看。在清末維新改革的時代氛圍籠罩下，上海青年會積極引介西方文化，對於渴慕透過吸取西方文化養分，以尋求中國富強之道的愛國之士而言，當然對她青睞有加。如顏惠慶所說：

…… 庚子年是一大轉機，人民經過內憂外患，發生覺悟，  
…… 尤其是在上海，而青年會到滬，剛巧是一千九百年，  
那時候全國智識階層，正渴望維新，有青年會出來提倡四  
育，除尋常學校以外，有演講會，辯論會，體育會，夏令  
會，種種研究及尋求新智識與新生活的方法；當然是受社  
會的歡迎……<sup>86</sup>

事實上，顏氏在這裡的記述正是中國青年會運動早期發展的一面縮影。

要進一步指出的是，上海青年會不僅募集了一群熱中時政的會員，更吸引了一些另有用心的不速之客。路義思回憶說：

<sup>85</sup> 顏惠慶：〈三十五年前的上海青年會〉，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編：《力的創造：上海青年會三十五週年紀念冊》（上海：上海基督教青年會，1935），頁7。他在別處說：「在該會〔上海青年會〕的主持下，曾邀請嚴復先生舉辦系列講座，介紹基于杰文斯（Jevons's system）的邏輯學。嚴復的演講，在前來聽課的文人學士中引起極大的反響。」顏惠慶著，吳建雍、李寶臣、葉鳳美譯：《顏惠慶自傳——一位民國元老的歷史記憶》，頁47。按：顏惠慶大概記憶有誤，與1900年嚴復在上海主持的名學演說混淆。參徐立亭：《嚴復》（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1996），頁351-352。

<sup>86</sup> 顏惠慶：〈三十五年前的上海青年會〉，頁7。

我們當中並不缺少一些流動訪客或自由作家，這需要若干的耐心預防他們利用青年會作為推廣各種救國嗜好的平臺（a forum for the promotion of various hobbies for saving China）。要是在這一點上失敗，將青年會經營在繁瑣的爭論上，這將會令那些我們極為需要的人失去信心。<sup>87</sup>

路義思後來於 1907 年底離滬返美，可見上海青年會很早已知悉，會所裡存在一些潛在的政治活動。1911 年，美國建築師赫錫（Harry Hussey）應穆德的邀請來華考察，他在回憶錄裡對中國各地青年會存在的政治運動亦有所記述，例如提及廣州和香港青年會時說：

我享受與眾多熱心的中國青年和女士接觸，他們在〔廣州〕青年會臨時總部或幾處校舍聚會，那裡沒有政府的干涉。他們大部分的對話都是集中在革命，他們對於三月起義（孫中山的第十次革命）所造成的犧牲仍然感到憤慨。……當時我們沒有任何一個想到，我們正在偉大的革命門檻前。否則我們可能會更留意這群青年和女士。他們的名字很快便出現，成為中國革命和未來新政府的領袖。<sup>88</sup>

在香港，透過巴樂滿和他的青年會同事所認識的大部分中國人，均是香港幾個正計畫推翻中國政府的其中一兩個組織的成員。這裡在英國人的保護下，他們可以計畫和領導中國的起義，並沒有中國政府干涉的危險。……當我聆聽中國青年的討論和計畫時，看見他們何等熱心，要是國家

<sup>87</sup> Robert E. Lewis, *Search of Far Horizons*, p. 70.

<sup>88</sup> Harry Hussey, *My Pleasures and Palaces: An Informal Memoir of Forty Years in Modern China*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8), pp. 122-123.

需要，他們何等願意捨棄性命。我認識到愛國主義和烈士仍然存在這個世界。<sup>89</sup>

赫錫提及上海時亦說：

在上海期間，巴樂滿堅持我與他同住，……他的房子與其說是住家，其實更像一個會所，因為它成為很多中國青年的聚會地方，其中很多後來成為中國革命及新政府的領袖。<sup>90</sup>

赫錫的記述說明中國各地的青年會成為不少革命人士的出沒場所。<sup>91</sup> 他解釋說：「在東京，像在中國一樣，青年會是中國青年的聖地（mecca），因為他們可以在毋須害怕被本地警察干涉的情況下召開會議。」<sup>92</sup> 可以想像的是，座落在公共租界內的上海青年會會所，無論是在治外法權的保護傘或基督教的外衣下，均成為革命人士策劃起義的絕佳掩護。

全國協會很早便向外重申不干涉政治的立場，更是側面證明了不少青年會會所內的確存在潛在顛覆政權的人士，甚或已引起外界的猜疑和關注：

若夫政治界上種種重要之事業，青年會概不負責，亦不與聞，蓋非其界限所當及也，惟懼偶有闇昧之士，尚未洞見

<sup>89</sup> Harry Hussey, *My Pleasures and Palaces*, p. 116.

<sup>90</sup> Harry Hussey, *My Pleasures and Palaces*, p. 103.

<sup>91</sup> 在日本的中華留日青年會亦不例外：「黃花崗失敗後，居正由粵返東京……湖北同盟會支部長為馬伯援，書記長為朱幹青，在武漢運動者，為劉公、劉鐵，四人均為教友，且時常出入於青年會，而居君於不知不覺中，則以早稻田青年會分會，為其大本營。」〈青年會與國民革命〉，《同工》第159期（1937年2月），頁31。

<sup>92</sup> Harry Hussey, *My Pleasures and Palaces*, p. 63.

立會本意，因多捕風捉影之談，又恐或有陰險之途，假公濟私，欲藉青年會，以圖一己之目的，敗公眾之利益，故述數語，布告大眾，庶幾猜忌盡泯，信用益篤，是則青年會之大幸，抑亦公眾之利益也。<sup>93</sup>

事實上，上海青年會幹事不僅知悉革命人士（或活動）的存在，甚至與他們過從甚密，曾就革命運動的看法交換意見。駱維廉在 1912 年提交的報告中說：

〔青年會〕常面對犯上錯誤的〔政治〕判斷的誘惑，帶來的結果足以令青年會花上以年計的時間來復原。這種說法對於上海來說最為正確，這裡的青年會因為眾多和具代表性的會員，以及其現代的設備而著名。對於一場政治革命的領袖而言，很自然會尋求青年會的積極合作。青年會多年來以現代進步作為定位，很自然吸引了最進步的青年成為會員，他們大部分亦參與革命。<sup>94</sup>

據駱維廉記述，1911 年 11 月 2 日晚上傳來消息，上海縣城遭革命黨人佔領，為了查證有關的消息，他與西幹事費吳生（George A. Fitch）前赴縣城一趟。當他們抵達道台衙門時，向革命黨人的守兵詢問能否進入，初被守兵拒絕，但在旁的另一守兵打量後，詢問他們是否來自青年會，他們回覆後便獲准進入。<sup>95</sup> 這段記述大概可以反映出上海青年會予人支持革命運動的社會形象。

---

93 〈申明基督教青年會不干涉政務〉，《青年》第10卷第2冊（1907年3月），頁1。

94 Annual Report of W. W. Lockwood, September 1912, p. 1, AQRBV.

95 W. W. Lockwood to Dear Friend, 7 November 1911, p. 2, COR.

#### 四、華人領導層的政治取態

中國青年會雖然奉行不干涉政治的政策，但在中國獨特的歷史時空下，青年會的活動程序根本不可能與政治無涉；要在介入與迴避之間拿捏得穩，委實絕非易事。如前所述，上海青年會並不打算成為政治組織，直接推動或參與任何形式的政治運動；只會為中國青年提供救國所需的軟體資源，間接推動中國走向富強：

當清季時代，我國政治不甚良好，各部職員深悉有人藉名招搖，有害會中名譽，於是得將本會宗旨宣布，使海內人士知青年會之宗旨，為培養青年人士之靈界，而為基督聖徒，使成優秀國民，亦不假會所與他團體開反對政府之會議，若研究政治法律學會假借則可。<sup>96</sup>

但自武昌起義以後，上海青年會每星期均收到不同政治集會租用場地的申請，例如上海各大報章的編輯舉行討論革命立場的會議、華人牧師舉辦支持革命的祈禱會、劇團擬作籌款演出支持革命軍、主張共和的人士（republicans）欲借用禮堂舉行軍團北上的誓師大會等。<sup>97</sup> 西幹事戴偉良（W. E. Taylor）指出，這些申請並非單純為借用場地而來，而是帶有明顯的政治動機：

你會估計他們為何會選擇在青年會舉行聚會？是否因為上海再沒有較我們更舒適的其他房子可以成為報紙街（newspaper row）〔二十世紀初美國波士頓下城區華盛頓

<sup>96</sup> 〔曹雪廉〕：《上海基督教青年會歷史概論》（上海：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出版年份不詳），油印稿，頁183，另參Annual Report of CYMCA of Shanghai, 1905, p. 5, AQRBV.

<sup>97</sup> Annual Report of W. W. Lockwood, September 1912, p. 249, AQRBV.

街一個匯集了八份日報的出版中心]？當然我們並不知道，但在我們看來，在這些人的心目中，這種聚會宣布在青年會舉行對該運動會有所幫助。<sup>98</sup>

上海青年會當然沒有接納這些申請的理由，但要斷然拒絕亦並不容易：第一、提出申請的團體不乏青年會的重要支持者；第二、上海新政府的領導人部分是青年會的會員；<sup>99</sup> 第三、不少青年會會員本身就是革命人士。<sup>100</sup> 可見，拒絕這些要求不僅可能對上海青年會日後的發展帶來負面影響，亦難免會惹來不愛國的批評。

不過，更大的困難還在後頭。原來上海青年會的華人領導層亦傾向支持革命，要游說他們堅持青年會的立場，拒絕任何政治集會的申請，等於變相否定他們個人的愛國熱忱：

這些要求均提到董事的面前，他們個人均熱烈支持革命，但卻覺察到危險，站穩〔青年會〕立場，昧著他們的同情心，拒絕這些他們個人非常支持的要求。無怪乎青年會在這個國家向被懷疑為一個政治組織，這裡的人視政治為非常自然的事，青年會一直以來多次遭受懷疑。<sup>101</sup>

其中上海青年會最資深的華人幹事曹雪賡便是徹頭徹尾的革命支

---

<sup>98</sup> W. E. Taylor to W. W. Lockwood, January 1912, p. 2, *COR*.

<sup>99</sup> 辛亥革命後出任滬軍都督的陳其美便是一例。Annual Report of W. W. Lockwood, September 1912, p. 2, *AQRBV*.

<sup>100</sup> 詳參〈教員之勇敢堪欽〉，《上海青年》第10期第31號（1911年11月9日），頁5；〈維持公安之熱心可敬〉，《上海青年》第10期第31號（1911年11月9日），頁4-5。

<sup>101</sup> Annual Report of W. W. Lockwood, September 1912, p. 1, *AQRBV*. 事實上，西幹事亦傾向支持革命。參Peter M. Yeo, "The Metamorphosis of A Missionary: William Wirt Lockwood and the Shanghai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Bachelor Thesis, Wesleyan University, 1985), p. 73.

持者，他早在辛亥革命以前，便曾參與寰球中國學生會的革命話劇演出：

……該會〔寰球中國學生會〕再接再厲，終於在所謂英租界南京路「市政廳」公演了新劇《十年後之中國》。其劇情為推翻帝制，改建民國。由該會董事曹雪賡飾大總統，上海名醫唐乃安飾內閣總理。觀眾大為轟動。<sup>102</sup>

曹氏的政治立場大概已是公開的祕密，以至上海光復以後，伍廷芳和陳其美更邀請他加入新政府。戴偉良指這個邀請對曹氏而言，實在非常誘惑（tempting），其誘人之處在於這是一項對國家的重要服務。曹雪賡大概意識到他所處的地位極具象徵意義，一旦受邀，將使青年會無法向外宣稱政治中立，最終他婉拒了這個邀請。<sup>103</sup>

在這裡要強調的是，對於滿懷愛國熱血的華人幹事來說，青年會不干涉政治的立場與愛國主義所催生的行動主義訴求，一直令他們處在極大的張力之中。<sup>104</sup> 事實上，往後爆發的政治風潮

102 朱仲華、陳于德：〈復旦校長李登輝〉，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華文史資料文庫》，第17卷（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頁495。「日前曹君雪賡自檀香山來函云：彼聞美國已承認中華民國，不禁喜躍。」〈曹君來函〉，《上海青年》第12卷第23號（1913年6月6日），頁2。

103 W. E. Taylor to W. W. Lockwood, January 1912, p. 3, COR. 曹雪賡最後亦出任新政府的顧問，相信是權衡個人與青年會利益後的權宜之計。參熊月之主編：《上海通史》，第7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頁15。

104 中華留日青年會幹事馬伯援嘗說：「辛亥革命，記者以幹事資格，實地參加，頗來物議：民二以東會為根據，從事反袁，反對者更多。以故憤社會事業之難作，寧可歸家種田，不再事洋和尚的生活——青年會幹事有稱為洋和尚。」又說：「民國六年與余日章君相晤於廬山，彼問記者：何不服務青年會。記者曰：非不樂為也；並告以青年會幹事不問政治之非是。」馬伯援：〈青年會與中國革命〉，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編：《力的創造：上海青年會三十五週年紀念冊》，頁36。

一直為上海青年會領導層帶來持續的考驗。費吳生在 1919 年的報告中，談及「五四運動」在上海掀起的罷課、罷市風潮時說：

在最近的學生抗議運動期間，我們用高度警惕的態度，防止任何有可能被視為政治性的會議在會所內舉行，雖然為此我們要冒上嚴重的風險，被視為不愛國的組織而被杯葛。不用說，我們大多數會員和董事在運動中均有重要的參與。<sup>105</sup>

據此可以推斷，無論是受到時代的薰陶，抑或在青年會內耳濡目染，上海青年會基本上一直存在一批熱血愛國的董事、幹事和會員。誠如論者指出：

清朝末年，青年會中很多人走進了革命黨人的隊伍，尤其是留學日本和美國的青年會成員參加革命黨的更多。這大概是外國傳教士所始料未及的。當初他們來滬來華創辦青年會，目的並不是為了促進中國的革命，但客觀上卻因此而培養了一批覺悟的知識分子，以至到後來外國傳教士已無法駕馭青年會的活動了。<sup>106</sup>

可以說，青年會「三育」理念和活動程序在詮釋和應用上愈趨政治化，應不是純粹削足適履的舉措，而是領導層、幹事與會員間良性互動的結果。

---

<sup>105</sup> Annual Report of George A. Fitch, September 1919, p. 1, AQRBV. 「本會殉道堂宜於開大會……然而會議或演說之性質不能涉及政治。」〈殉道堂可以借用〉，《上海青年》第18卷第30號（1919年9月26日），頁9。

<sup>106</sup> 唐繼無、于醒民：《飛地》（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3），頁284。另參余子俠：〈陶行知與基督教青年會——兼論基督教青年會與近代中國新型知識階層〉，《南京曉莊學院學報》第1期（2008年1月），頁15。



### 第三節 救國論的揭櫫

#### 一、艾迪、穆德的布道熱潮

要了解青年會步入救國廟堂的經過，便不能不提民國初年由布道家艾迪（Sherwood Eddy）和穆德在中國各地所掀起的布道熱潮。自 1911 年開始，北美協會東亞幹事艾迪應全國協會的邀請，多次來華舉辦巡迴布道會（見附表 3-2），無論在教會內、外均引來廣泛的迴響。1913 年，艾、穆二人在中國十二個城市主持的布道會，總出席人數便有 78,230 人，扣除重複出席的人數估

附表 3-2 民國初年艾迪、穆德主持的布道大會

布道家	來華日期	所經城市
艾迪	1911 年 4 月	上海、廣東、香港、福州、蘇州、漢口、太原、保定、北京、天津
穆德	1913 年 2 月	廣州、上海、太原、北京、漢口
艾迪	1913 年 2 月	香港、天津、北京、保定、武昌、安慶、南京、福州、上海
艾迪	1914 年 9 月至 12 月	天津、北京、保定、長沙、福州、上海
艾迪	1918 年 2 月至 5 月	廣東、香港、汕頭、福州、上海、杭州、漢口、長沙、北京、保定、天津、南京

資料來源：〈名人蒞滬之先聲〉，《會務雜誌》第 9 第 9 號（1911 年 4 月 14 日），頁 3；〈安遜先生遊記〉，《上海青年》第 9 期第 19 號（1911 年 6 月 22 日），頁 1；〈安遜先生之行旌再誌〉，《上海青年》第 9 期第 20 號（1911 年 6 月 29 日），頁 4；〈穆德博士之遊踪〉，《上海青年》第 12 卷第 5 號（1913 年 1 月 31 日），頁 1；〈艾迪先生不日來滬〉，《上海青年》第 12 卷第 5 號（1913 年 1 月 31 日），頁 2；〈艾迪先生之大布道會〉，《上海青年》第 13 卷第 29 號（1914 年 10 月 9 日），頁 3；〈艾迪博士來華有期〉，《上海青年》第 17 卷第 5 號（1918 年 2 月 4 日），頁 6。

計亦有 35,000 人。<sup>107</sup> 翌年，由艾迪個人主持的巡迴布道會，出席者更逾 121,730 人，扣除多次出席者估計亦超逾 50,000 人。<sup>108</sup>

艾迪描述 1913 年在華的布道盛況說：

總計在中國各地，到會聽講的人，共計在五萬人以上，大多數是官立學校的學生。每次開會時間，約自二小時至三小時，會場往往是城中最大的廳堂或戲館，但仍時常擁滿了人，以致後來者往往連插足之地也沒有。<sup>109</sup>

翌年參加艾迪布道會的賈豐臻亦回憶說：

民國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始，美國博士艾迪開布道大會於春申江上，一時聯袂而往聽者，幾乎車履為滿，而戶限為穿。聞在北京、漢口、香港、南京等處，其景象亦復如是，可以見吾國人心之丕變矣。<sup>110</sup>

中國各大城市的地方官員積極配合，不僅提供舉行布道會的場地，更安排當地的學校停課，俾使學生能抽空參加。同時，中國各地的報章亦對布道大會作出詳細報導，堪為民國初年中國基督教的一大盛事。

---

107 戴偉良：〈穆艾二君在中國大布道後成績報告書摘要〉，中華續行委辦會編：《中華基督教會年鑑（1914）》，第1冊（上海：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臺北：中國教會研究中心、橄欖文化基金會，1983年重印），頁57b。

108 戴偉良：〈艾迪播道始末記〉，中華續行委辦會編：《中華基督教會年鑑（1915）》，第2冊，頁127。

109 艾迪 (Sherwood Eddy) 著，沈秋賓譯：《思想的探險——艾迪博士自述》（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36），頁82。

110 賈豐臻：〈赴美博士艾迪布道大會感言〉，《教育雜誌》第7卷第1號（1915年1月），頁33（總頁8041）。

在布道熱潮影響下，不少中國知識分子對基督教產生前所未有的興趣，有人更受洗成為信徒。戴偉良總結 1913 年的布道大會時說：「按此會未開會之先，中國國立學校之學生，從未有與聞斯道者，今則信道者竟大有人焉。」<sup>111</sup> 以上海為例，在 1911 年艾迪首次來華布道以後，即有上海青年會會員受洗加入教會的報導：「本會自經美國安遜先生講道之後，即有多數青年立志為基督信徒，上禮拜日有本會會員江霖發、林步瀛、林桂慶、葛觀采四君，就虹口聖公會救主堂奉教受洗。」<sup>112</sup> 迨至 1914 年艾迪第三次赴滬布道亦有報導說：「今查前在本會決志簽名慕道之三百九十二人中，已有領受洗禮者三十七人，行將受洗者五十五人，餘外更有多人尚在研究聖道。」<sup>113</sup>

艾迪布道大會的另一項重要成果是，為教會吸納了不少過往甚少機會步入教堂的中國知識分子，戴偉良評論 1914 年的情況說：「其中百之九十為非信道者，皆平日不易接近之人。」<sup>114</sup> 甚至令當時的教會人士另眼相看。梁小初說：

經過這次布道會〔1913 年〕以後，各教會對青年會刮目相看，認為是基督教會的前鋒。從前教會的布道方法，多在

111 戴偉良：〈穆艾二君在中國大布道後成績報告書摘要〉，頁 58b。

112 〈共明真道〉，《上海青年》第 10 期第 32 號（1911 年 11 月 16 日），頁 1。

113 〈艾迪布道會之成績〉，《上海青年》第 13 卷第 8 號（1914 年 3 月 13 日），頁 2。

114 戴偉良：〈艾迪播道始末記〉，頁 127。教會內知識分子之少，從以下的事例可見一二：「我要在這裡一提龐富灼、熊崇志二人回粵，大受歡迎的經過。他們是廣東人，在美國留學領有碩士學位，大約在一九〇五年被聘回粵，擔任方言學堂教席，後來入京中了洋進士。在今日視之……不足為奇。但在當時的廣東教會中，領有外國碩士學位，等於鳳毛麟角，是以廣州各教會領袖覺得『與有榮焉』，發起一個『羅漢請觀音』方式的公譙會。參加者極為踴躍，有二百之眾，是一時空前的盛會。這個譙會，我雖不及參加。但聽人敘述，使我神為之往，深覺高等教育的受人重視，自己望塵不及了。」梁小初：《未完成的自傳：七七回憶錄》，頁 30。

晚上，大開福音堂門，宣講街書，任由路人進聽，隨意出入，進來坐下的寥寥無幾，聽到講完的更少之又少；有些聽了幾句，表示不滿高罵一聲而退，他們全是店員藝徒苦力之輩，讀書人來聽的，非常稀罕。青年會竟能把學界中人，帶入教會之門，牧師傳道們都認為難得的機會。<sup>115</sup>

這樣的情況亦在上海出現，王治心在 1919 年評述上海監理會的發展時說：

近年我道推行，漸及於上等社會，本會中如聶雲台、鈕鐵生、殷鑄夫、李次九、季仲寅、沈螯安、羅梯雲、周錫三、周越然、楊仲馨諸公，皆為政學界有數人物，業已次第皈依我主，為熱忱信徒，其餘進教人數，亦較增於歷年……<sup>116</sup>

毋庸置疑，二十世紀初年艾迪、穆德在華舉行的布道大會，無論從增加中國信徒的「量」和「質」來說，均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 二、艾迪穆德的布道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艾迪的布道大會之能夠產生如此巨大的迴響，與他充分把握當時國人的救國訴求密不可分。艾迪在自傳說：

在這許多年中，中國各地聽眾所最關心的一個問題是：「甚麼能夠救中國呢？」二十年前，我用以引起中國聽眾之思想的，便是新的五色國旗，以及新的愛國精神了。我以國旗中的五色，來象徵新共和國的五種需要。那時我

<sup>115</sup> 梁小初：《未完成的自傳：七七回憶錄》，頁83-84。

<sup>116</sup> 王治心：〈監理會〉，中華續行委辦會編：《中華基督教會年鑑（1916）》，第3冊，頁續89。

所大聲疾呼的，是國家的統一，人民的愛國心，社會的服務，道德上的熱忱，和宗教的實在等。在民國成立的初年間，中國人中間確曾有過熱忱，和新的愛國精神。<sup>117</sup>

以 1911 年 4 月為例，艾迪在上海主持題為「立國之要素」的系列演講，分題為：一、「中國現勢之需乏」；二、「中國立國之精神」；三、「中國將來之希望」。當時《上海青年》宣傳說：「此次〔艾迪〕來華專欲與我國學界及愛國青年有救國思想者研究立國之要素，屆期務望早臨一聆宏論。」<sup>118</sup>《上海青年》在演講後報導說：

上星期六起，每晚延請安遜先生在本會演講立國要素，及中國之缺點，語語道著中國病根，頗極動聽，每次開會座為之滿，幾無立足之地，遲到者均抱向隅，是以函囑本會再三商懇安遜先生，於下星期即四月初二日晚間八時，仍在本會演講（中國過渡時代），亦為中國現今極要之問題……<sup>119</sup>

聽眾對於艾迪布道的反應，從這則報導可見一斑：「演畢謂聽者曰：在座諸君，如以余言為然，欲使中國立於完全強大地步，必須救主之扶助，應起立同聲禱告，一時在座者莫不起立。」<sup>120</sup>可見艾迪的布道大會如斯成功，乃是由於他頗能夠針對當時國人最為關注的救國問題。如梁小初所說：

艾迪在華布道之收效，因其口才卓越，言論動人所致。尤

117 艾迪著，沈秋賓譯：《思想的探險——艾迪博士自述》，頁86。

118 〈立國之要素〉，《上海青年》第9期第10號（1911年4月21日），頁1。

119 〈機緣不可錯過〉，《上海青年》第9期第11號（1911年4月28日），頁3。

120 〈演說紀事〉，《上海青年》第12卷第11號（1913年3月14日），頁2。

其對於中國時局，認識頗為清楚，故能對症發藥，語多中肯。他發揮真理，富有情感，使聽者感動。但脫離一般布道家慣用的武斷，及違反理智之辭。故知識分子也能接受，因而皈信。<sup>121</sup>

吳耀宗曾將穆德的布道策略概括如下：

穆德在那時候的「理論」根據，便是：中國最大的毛病是政治腐敗，政治腐敗的原因，就是因為中國人沒有人格；有了人格就能救國，要有人格，必須要信基督教。<sup>122</sup>

他的描述對艾迪同樣適用。艾迪在自傳說：

我述說了中國目前的危機以後，往往提到中國青年的罪惡，危險，和試誘。吸食雅〔鴉〕片，對於中國人是一種極大的危害。榨取或非法取財，更是中國的致命傷。中國青年的試誘，不外乎不誠實，污穢，賭博，放蕩，自私，和漠視，既有了這些缺點，沒有人能把他自己救起來。教訓或格言，我們已經有了幾世紀，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別的，乃是能力。試問我們能從何處去找能力呢？——這是我對於聽眾所提出的一個主要問題。<sup>123</sup>

121 梁小初：《未完成的自傳：七七回憶錄》，頁123。當然我們毋須存有過分浪漫化的想法。林語堂回憶說：「在聖約翰的時候，我們同笑艾迪的激烈的佈道戰術。他的詭計之一，是突然從他的大衣袋拉出一面中國旗（那時候是五色）宣告他愛中國，這種通俗劇的手法不適用於我們，因為孟君〔林的同學〕是一個知識分子，雖然有幾個學生在演講完畢時站起來且簽名信耶穌。」林語堂著，謝綺霞譯：《從異教徒到基督徒》，收入梅中泉編：《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0卷（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頁232。

122 吳耀宗：〈控訴美帝國主義在青年會內利用改良主義侵略中國〉，《天風》第276期（1951年8月），頁8。

123 艾迪著，沈秋賓譯：《思想的探險——艾迪博士自述》，頁87。

艾迪以為，中國衰弱不振的根本原因在於道德敗壞，以及沒有自我改善的「能力」？那麼，中國人如何才能獲得這種「能力」？

艾迪先生在大舞臺演說，特將世界各國貧富強弱比較表揭示於眾，謂西方文化，啟發極遲，東方各國，開化甚早，今則西方各國，異常富庶，工商等業之進步，大有一日千里之勢，東方各國，反多貧弱，此何固哉？蓋西方各國之所以興盛，乃有基督教之能力存焉，嘗考信仰基督教諸國，其進步之神速，非人所能測度，而東方各國之信仰基督教者尚居少數，此國家衰弱之大原因也。<sup>124</sup>

艾迪透過東西方國家的強弱比較，指出西方的國家強大，乃是由於信仰基督教的緣故，可見中國的唯一出路就是信仰基督教：

自安遜先生遊歷中國各省以來，到處宣講耶教為興國唯一之要素，一時憂國之志士聞其言者，如夢之初覺，始知救世救國獨一無二之方針，惟在道德，而道德之源頭，即在耶穌基督而已。<sup>125</sup>

艾迪的布道策略基本上是将基督信仰演繹為一套道德救國論：

中國人沒有人格 → 中國衰弱腐敗

西方人信奉基督教 → 西方人有人格 → 西方富強

中國人信奉基督教 → 中國人有人格 → 中國富強

艾迪的說法當然是將複雜的歷史大幅簡單化，但是他的說法既與

<sup>124</sup> 鄭雲輝：〈基督教之能力〉，《上海青年》第13卷第40號（1914年12月25日），頁4-5。

<sup>125</sup> 〈睡獅猛醒〉，《上海青年》第9期第12號（1911年5月4日），頁2。一名香港的觀察者說：「他們〔聽眾〕視基督教為可以拯救國家的一些東西。」J. C. Geldart to Dear Friends, 30 June 1911, COR.

傳統儒家思想裡「政治是人格的擴大」<sup>126</sup> 的思考模式暗合，亦與時人對中國現況的診斷接近。<sup>127</sup> 可以想像的是，在當時敵強我弱的處境下，對於亟欲為國家尋求出路的愛國之士而言，道德救國論無疑是有一定的吸引力。

### 三、救國方略的範式轉移

艾迪久居印度，他之能投當時國人所好，當然是來自在華西幹事的經驗總結。巴樂滿在 1910 年前赴日本主持布道聚會後記述：

現在中國的情況使〔在日本留學的〕學生們處於一個無希望的狀態，當有人告訴他們基督教能為現在的困難提供出路，他們接受基督教的意願將會是驚人的。<sup>128</sup>

駱維廉在 1912 年的報告中亦說：「要是青年中國 (young China) 今日可以被說服基督教將會拯救中國，這個國家的青年將願意付出代價。」<sup>129</sup> 事實上，這種道德救國論的布道策略，並不

---

126 有關「政治是人格的擴大」的觀念，在宋明以來如何形成一種人格本位政治觀，可參張灝：〈宋明以來儒家經世思想試釋〉，張灝：《張灝自選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頁63-70。

127 「照國內的狀態而論，道德教育比隨便甚麼教育都要緊。現在政治上的黑暗，就因為這班在政治上活動的人當初沒有受道德教育的緣故。所以他們的正當職業，不能合力去做；而他們的亡國運動，是大家一致的。這種黑暗的政治，果然可使國亡，但是還不能使我們十分寒心。因為倘使國民好，即使國家亡了，仍舊有再興的機會。使我們最寒心的，是社會上一般的道德墮落。若到現在社會上各界中去調查，就可發見每界裡邊都有種種黑幕和卑鄙齷齪的事。總而言之，『廉潔正直』四字，可算是現在大多數國民所沒有的。這種一般的道德墮落，真能使國民以後，永遠沒有再興的機會。」吳致覺：《教育心理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頁72-73。

128 F. S. Brockman, *I Discover the Orient* (New York, London: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35), p. 138.

129 W. W. Lockwood to Dear Friends, 5 March 1912, COR.



算石破天驚，清末的華人基督徒早已提出相同論調。<sup>130</sup> 那麼，為何有關論述在民國以後才產生如斯鉅大的效果？

梁家麟曾指出，國人對基督教的改觀，以及知識分子在救國方略取態上，普遍從政治革命返回文化革命，均是民國初年基督教備受歡迎的重要原因。<sup>131</sup> 對於青年會的發展而言，後者的重要性值得我們在這裡加以討論。周錫三憶述：「……然滿清末年，道德淪亡，政治窳敗，有以改革之，固知非從政治上下手不可，因決然以改革自任……」<sup>132</sup> 青年會幹事范子美亦說：「自甲午戊戌以還，全國之人競以改良政治為目的，而未嘗以改良社會為前提也。」<sup>133</sup> 可以推想，清末不少知識分子均認定，政治制度的改革乃是當時振興國家的唯一出路：

政治腐敗 → 政治改革 → 政治清明  
 （中國衰弱） （救國方略） （中國富強）

在政治改革被視為救國唯一出路的年代，漸進式的道德改良主義當然是沒有市場：

嘗聞愛國志士，驚精神，糜軀體，相與狂奔絕馳，奮勇闖

130 「……三、基督教足令人有自立自強之效……復申論富國強兵之基，不在新學而在真道，欲探本者舍是道可乎。」〈王君講義〉，《上海青年會報》第1卷第15冊（1904年1月1日），頁2。「……二論求富強當先培植根基，其根基即在聖道。」〈曹君講義〉，《上海青年會報》第1卷第18冊（1904年1月22日），頁1。筆者曾就此問題撰文討論，可參張志偉：〈王煜初牧師傳略（1843-1903）〉，《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第4期（2003），頁115-127；張志偉：〈晚清基督徒調適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嘗試——王謙如（1847-1907）的「超儒論」研究〉，《建道學刊》第23期（2005年1月），頁1-37。

131 梁家麟：〈五四前後新文化思潮與基督教〉，梁家麟：《徘徊於耶儒之間》（臺北：宇宙光出版社，1997），頁212-228。

132 周錫三：〈余之信教過渡〉，《上海青年》第13卷第40號（1914年12月25日），頁7。

133 范子美：〈基督教改良社會之能力〉，《上海青年》第16卷第21號（1917年6月1日），頁2。

決，僅僅在於政治方面。曰：吾以救國為之耳；而對於社會及個人者，初乃淡漠視之，更有從而蹂躪之，如擾亂社會秩序，蔑棄個人道德。<sup>134</sup>

然而，歷史的發展不為人的意志所轉移。清末以還，政治改革紛至沓來，政局發展不但未見起色，反倒有愈益敗壞之勢，不啻是將愛國之士的救國憧憬，一次又一次地推向反高潮。前內務部次長謝敬虛說：

……辛亥以前，合國人因政治不良而倡大改革之議。自辛亥至今六年，革命四次，其變動亦可謂劇矣；然而國本愈以漂搖，民生愈以窮困，政治愈以腐敗，且世界之競爭外力之壓迫急轉直下，日甚一日。一般人士遂以為中國必亡，無法救治；甚至大名流、大學問家均以此呼號……<sup>135</sup>

這促使部分知識分子對政治改革作為救國方略的有效性漸生懷疑，並為他們接受道德救國論預備了心靈的土壤。周錫三的經歷很能說明這種時代心態的轉變：

民國兆興，躍然而起，自以為中國可大有希望矣，因是北上觀光，見乎前日之所稱志士者，其污濁之情形較滿清之亡國士夫為尤甚，不知道德為何物，盜賊充途橫行無忌，言之痛心疾首，嘗致函某報指斥皆不見登，蓋勢力使然而。……余固辭決南歸，因是自省以改革道德為己任。

134 〈青年會救中國之能力〉，《上海青年》第18卷第12號（1919年4月4日），頁3。

135 謝敬虛：〈第十次徵求大會開幕演說〉，《上海青年》第17卷第2號（1918年1月14日），頁4。「吾中國最近二十年來，自命為新人物者，亦曾痛詈舊官僚之腐敗矣，不意一登政局，攫取金錢之手段，遠不如〔遜？〕舊官僚……」劍衡：〈對於青年人格之感言〉，《青年進步》第4冊（1917年6月），頁13。

……適美國艾狄君遍歷中國，演講救時之要素，翩然醒悟，因就江牧師行洗禮皈歸上帝。<sup>136</sup>

溫佩珊亦有相近的經歷：

其〔溫佩珊〕所以受感立志為基督徒者，因見會中各種事業皆具有基督教救人之宗旨。此次艾迪先生演說，救人救國惟恃基督教之力，更為之大感動。……其之所以為基督徒者，羨慕基督徒之為人清潔愛國熱誠也。聖經所言有力，能挽救吾國之弱點。<sup>137</sup>

艾迪此時所提出的道德救國論恰好應合了人心的轉變。如賈豐臻所說：

……而其〔艾迪〕兢兢於吾國之道德，不啻舌敝唇焦，最後歸其原於信仰宗教，亦與僕平日所感想而表見者，不謀而合。是可以見道在人而未墜於地，僅識大識小之分而已。<sup>138</sup>

此外，知識分子對時局的無可奈何所催生的無力感，亦促使他們進一步向道德倫理層面的宗教尋求答案。據前農商總長金邦平自述：

今日有心之人，孰不願盡其智力以救我國家？各方面亦有勉為之者矣，而悲觀者比比皆是，蓋社會墮落已深，非專恃人類言行之力所能振拔，吾始亦欲有所貢獻，而自省中心實無能力，不知從何著手有何果效，廢然作罷而此心未

136 周錫三：〈余之信教過渡〉，頁7。

137 〈溫交涉使之信仰〉，《上海青年》第13卷第38號（1914年12月11日），頁3。

138 賈豐臻：〈赴美博士艾迪布道大會感言〉，頁33（總頁80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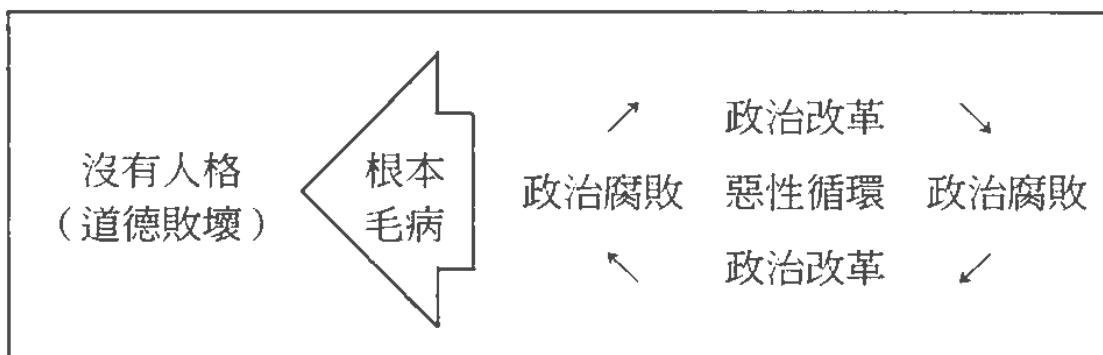
混，不能不別有所求，此反省之傲覺我也。

昔聞張君伯齡〔張伯苓〕稱基督教有感化人心之大力，因敬重其人雅重其言，遂開研究之端；然羈於事務作輟無常，未能貫注也。去春閒居海上，目怵時危，自量無力，遂猛憶及張君之言，立意日讀聖經，又從青年會駱維廉先生聽講質疑，閱年餘而恍若有得。蓋其旨在以靈獻主，有脩身事天之意，其途在復性救靈，有理得心安之意，其極在神人感通，有樂天知命之意，此誠求之啟發我也。<sup>139</sup>

可以說，知識分子在救國方略的取態上出現的範式轉移（附圖 3-4），造就了艾迪、穆德的布道大會產生基督教入華以來前所未有的影響力。如湯紀湖所說：

中國之所以成為不堪回首之中國者，無道德為之樞也！上自官吏，下至齊民，大概以道德置之腦後，而惟利己損人是務。是以每舉一事，外國行之成效卓著，一入中國百弊叢生，豈淮南為橘，淮北為枳土地使然者歟？無道德使之

附圖 3-4 救國方略的範式轉移



<sup>139</sup> 金邦平：〈吾信基督教之由來〉，《上海青年》第13卷第16號（1914年5月8日），頁4-5。

然也！艾迪先生之言曰：「金錢不能救中國，海陸軍不能救中國，路礦不能救中國，其能救中國者，其道德乎！」此中國之症斷書也！<sup>140</sup>

#### 四、救國布道的迴響

基督教救國論的狂飆，對於上海青年會產生了幾方面的重要影響：

##### （一）「傳道」？

此時期沿著道德救國論思考基督信仰的知識分子，與當時教會的一般信徒不同的是，其信仰觀念很少帶有來世或彼岸的色彩，倒是充滿濃厚的現世和救國關懷。鄭雲輝說：

今吾中國處千鈞一髮之秋，一般國民，乃置道德於弗顧，以誠實為愚蠢之別名，以奸詐為無上之知識，利己損人，競為欺騙，不知公益二字為何物。言念及此，不禁淚下，亟謀挽救之法，舍基督教何從乎？鄙人學識謏陋，所以不量膚淺，敢進芻蕘者，以余切心仰望基督教能救吾中國於危險之中。<sup>141</sup>

張更生亦說：

為今之時事，非基督之道則難以補救。試觀基督教廣行之

140 湯紀湖：〈來函照登〉，《上海青年》第14卷第26號（1915年7月2日），頁5。「鍾榮光師〔廣州嶺南大學校長〕常言，開通民智，端賴教育，改革民心，要靠基督。余初不以為然，及查見官場之怪狀，與學風民治之腐敗後，乃信除基督教之靈力之外，實無他法可以廓清之。」李紹昌：《半生雜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79），頁25。

141 鄭雲輝：〈基督教之能力〉，頁5。

國，如英、美等國無不民富國強，今吾國既在墮亡之時代，應以基督之道負責於。吾為基督徒者，勇敢講道，且作人之榜樣，使國民能人人知以基督之道，可以救國救民。<sup>142</sup>

要是撇除其中的宗教元素不談，這些言論與傳統士大夫的政治改革方案，可謂並無二致。馬伯援不諱言：「近數年來，高唱宗教救國者，耶佛儒皆有人焉。無知若鄙人，所以深表同情於耶穌者，非故阿好也，實以耶穌教之精神，真足以救中國之亡。」<sup>143</sup>可見基督教被他們理解為一種救國福音，並企圖向國人加以傳講。鄭雲輝說：

余甚望諸君，各抱救國熱誠，與余等共同研究，並轉告友人，偕彼同來，從個人而推廣及全國，使人人能明白天國真理，排除私見，熱心公益，庶幾吾中國日進高明，與泰西諸文明國永立於地球之上，區區愚忱，希鑒察之。<sup>144</sup>

朱錫田亦說：「吾敢敬告吾親愛之同胞曰：諸君不欲救國則已，苟欲救國，其速信從基督教，而邀上帝之憐憫，庶得享共和之幸福也。」<sup>145</sup>

---

142 張更生：〈基督教理如何補救時事論〉，《上海青年》第16卷第2號（1917年1月12日），頁2。

143 馬伯援：〈救國罪言〉，《上海青年》第13卷第36號（1914年11月27日），頁1。

144 鄭雲輝：〈基督教之能力〉，頁5。

145 朱錫田：〈基督教救國論〉，《上海青年》第18卷第43號（1919年12月26日），頁5。周錫三亦說：「今日社會之污濁，非耶教無由澄清之……歐美既以奉耶教成美俗，政治清明，吾國人今日尚能作姑息之談，任時日之曷喪而欲偕亡哉！」周錫三：〈余之信教過渡〉，頁8。

## (二) 研經

他們不僅熱心向國人「傳道」，且對查考聖經亦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費吳生在1912年曾指出，查經班的參與情況較以往大為改善：

一年前，徵募青年參加查經班或多或少存在困難，……在這些班中大部分為非基督徒，大部分前來的存有的思想是，他們仍堅持信奉儒家學說，但或許可能從研讀耶穌的教導中得到好處。<sup>146</sup>

可見不少參加者本著不妨一試的心態，試看聖經能否成為他們尋求救國出路時的啟迪；而最為西幹事所稱道的事例發生在1913年，幾位來自政商界的非基督徒會員，自發在上海青年會內成立一個「星期三俱樂部」，旨在研究聖經及討論有關基督教的問題：

今有聶君雲台、金君伯屏〔金邦平〕等組織星期三晚餐俱樂部，其宗旨在研究聖經，今部友已有孟昭常等五、六人。聶君為工藝界巨子，金君係前參議院秘書總長，餘孟君等亦一時名士會友。諸君倘有研究聖經之意，曷勿效聶金諸君之所為，以收切磋琢磨之益乎！<sup>147</sup>

駱維廉解釋這個聚會的成立因由時說道：

……這〔二次革命的爆發〕引起部分人〔國家的領袖〕更深入思考中國的問題，成立一個細小但由富有思想和具影

<sup>146</sup> George A. Fitch to Dear Friends, 22 May 1912, COR.

<sup>147</sup> 〈研究聖經〉，《上海青年》第12卷第32號（1913年10月3日），頁3；另參〈星期三俱樂部〉，《上海青年》第12卷第35號（1913年10月24日），頁4。

響力的中國領袖組成的小組，思考究竟宗教（或者是基督教）是否未來中華民國賴以建立的基礎。在國家的危機面前，人們顯明了他們的無能為力。<sup>148</sup>

他們研究聖經的熱切和認真態度也令人留下深刻印象。費吳生回憶說：

我被邀請擔任下一次聚會的嘉賓，雖然只有數人出席，但我發現他們一直認真地研究新約聖經，他們所提出有才智和具同情心的問題，顯明他們對真理產生了很深的興趣。

與他們共度的第一晚，的確是我在中國以來其中最愉快的〔一晚〕。在我看來，我看見潮流的轉變，它預示基督的治權進入百萬計這樣的人心裡。<sup>149</sup>

可見出於經世救國的關懷，不少知識分子仿如儒家公羊學派的學者一般，熱切發掘聖經中所蘊含的微言大義。這樣，青年會幹事在詮釋聖經的時候，亦同樣難免傾向於政治方面的應用。<sup>150</sup> 如克樂愷（J. C. Clark）所說：

中國的少年和青年正為國家思想，甚麼有助中國成為一個國家。……在我們的查經班和宗教聚會裡，我們教導孩子們，基督教是唯一的宗教具能力改造一個國家，要改造和發展一個國家，只能透過個人的改造和發展，國家的改造幅度與業經改造的個人數目恰成正比例。因此，我們反對

<sup>148</sup> Annual Report of W. W. Lockwood, September 1913, p. 2, AQRBV.

<sup>149</sup> Annual Report of George A. Fitch, September 1913, p. 4, AQRBV.

<sup>150</sup> 「耶穌自信為數百年來國人所盼望之領袖，故領洗之後即獨往曠野，默想如何而可救國，如何而可救民，……」〈聖經·耶穌受試探〉，《上海青年》第12卷第29號（1913年9月12日），頁3。



很多中國青年存在的想法：他們可以獲得基督教給予他們國家的祝福，而毋須成為基督徒。<sup>151</sup>

### （三）青年會等同救國機關

艾迪掀起的布道熱潮固然有助教會吸納一批生力軍，但是教會並不能完全滿足這些慕道者的需要：

教會意識到需要，然而看來無力應付，情況的確相當微妙。要是容讓裂痕持續擴大，青年會將愈來愈不能夠傳送她的製成品到教會去。……牧師們均是忠誠的好人，但他們屬於之前的年代，並不熟悉教會工作的現代方法。<sup>152</sup>

駱維廉早在 1908 年已指出：「很難將受過教育及富裕的人聯繫上教會，因為教會內的成員大多很貧窮，很多牧師均未受過良好的教育。」<sup>153</sup> 知識和社會地位的隔閡，固然是攔阻知識分子投入教會的客觀原因，第四章會再作討論。一般教會無法如青年會般向他們提供政治化的活動程序或應用訊息，可能才是問題的根本所在。如克樂愷所說：

我們面對的其中一個困難是，青年會在現今的中國備受歡迎。人們欣賞她對於基督教的實用性詮釋（practical interpretation）。每一個城市均想有一個青年會，我們無法回應所有的呼喚。<sup>154</sup>

<sup>151</sup> Annual Report of J. C. Clark, September 1916, p. 6, AQRBV.

<sup>152</sup> Annual Report of W. W. Lockwood, September 1916, p. 12, AQRBV.

<sup>153</sup> Annual Report of W. W. Lockwood, September 1908, p. 138, AQRBV. 另參 Annual Report of W. W. Lockwood, September 1913, p. 336, AQRBV.

<sup>154</sup> Annual Report Letter of J. C. Clark, September 1919, p. 9, AQRBV. 「竊以為本色青年會，似乎比教會尤為急需，其故由於青年會和社會，非常接近。」范頤誨：〈對於第十一次青年會全國大會的感想〉，《青年進步》第125冊（1929年9月），頁110-111。

可見傳統教會所傳講的有關靈魂得救的訊息，對於心繫家國的知識分子來說，不啻是隔靴搔癢：「當此社會服務時代，使基督教無青年會事業為之輔助，則基督教萬難普及人群。」<sup>155</sup>

教會既無法承擔此使命，青年會便負有不可推卸的「救國」責任。駱維廉說：「這股基督教受人歡迎的潮流，賦予青年會額外的巨大責任，因每個城市的青年會代表基督教會的一種獨特方式。」<sup>156</sup> 1911年11月，全國協會於上海舉行第六次全國大會，其中一個演講題目便是「基督教為強國維一之根本」。<sup>157</sup> 可見全國協會亦因應時代風潮，將青年會嫁接上基督教救國論：「我儕愛國乎？請先役於人，我儕願使中國成為強有力之國家乎？請先使我國人皆知上帝之權能，中國實需一宗教，此識者所見皆同者……」<sup>158</sup> 上海青年會亦不得不將「三育」話語演繹為救國之道，以招徠愛國之士的支持：

第十一次徵求會員大會已告終矣，先後共得會員可二千餘人，都滬上有志青年，濟濟一堂，皆以本會為救國之機關，蓋本會注重德、智、體三育也。<sup>159</sup>

吾國國民性之墮落，夫豈偶然者，推原其故，則吾國青年實缺乏德智體三育，與良好之社交，有以致之也。憂國之士，日思救國，吾以為救國之道，則推廣青年會於國中，

155 陳維新：〈中國青年會與教會之關係〉，《上海青年》第15卷第20號（1916年6月2日），頁1。

156 W. W. Lockwood, Annual Administration Report, October 1920, p. 2, AQRLF.

157 〈中韓基督教青年合會第六次大會通告啟〉，《上海青年》第10期第25號（1911年9月28日），頁1。

158 〈非以役人乃役於人〉，《上海青年》第12卷第34號（1913年10月17日），頁4-5。

159 〈會員之讀書得益〉，《上海青年》第18卷第9號（1917年3月14日），頁8。

亦一當務之急者。<sup>160</sup>

邇來東西洋文明若是之發達者，罔不先有改良社會然後改良政治，萬國必由之軌也，我國豈能外是。故欲改良政治，須改良社會始，欲改造政府，須改造人心始。青年會者其製造德智體三育之模型乎，吾會員共勉之。未為會員者，尚祈源源加入而共勉之。愛國之道在是，救國之道亦在是矣。<sup>161</sup>

於此可見，以改良人格作為救國之道，早在 1910 年代業已成為上海（中國）青年會對外宣傳時的定位。

#### （四）支持和投身青年會

社會人士加入上海青年會的不同原因，我們在下一章會深入探討；這裡欲先指出的是，視青年會為救國機關，參與青年會的工作等同服務國家，肯定是其中一個不能忽視的原因。上述「星期三俱樂部」的核心成員聶雲台，便是最為西幹事所稱道的例子。<sup>162</sup> 聶其杰（1880-1953），字雲台，湖南衡山人。其父聶緝梨曾為上海道台，母曾紀芬為曾國藩季女。聶氏家學淵源，早年便擔任上海恒豐紗廠經理，及至 1922 年更獲選為上海總商會會長。<sup>163</sup> 他在上海青年會的查經

160 聶其杰（管臣氏稿）：〈說基督教青年會〉，《上海青年》第16卷第12號（1917年3月30日），頁3。

161 滄海（崔通約）：〈廿週紀念之上海青年會〉，《上海青年》第17卷第16號（1918年5月6日），頁4。

162 史文（Alfred H. Swan）說：「我想在我所有的報告裡並沒有不提及我的朋友聶其杰。」Annual Report Letter of Alfred H. Swan, September 1917, p. 1, AQRBV.

163 劉紹唐：〈民國人物小傳·聶其杰〉，《傳記文學》第251號（1983年4月）。有關聶氏家族的歷史，可參宋路霞：〈恒豐紗廠的後世傳奇〉，《中國企業家》第10期（2001），頁100-104。

班中認識基督教，及後於 1915 年 3 月與家人一同受洗：

本會會員聶雲台君研究聖道有年，頗多心得，常在本會所設之聖經班內熱心查攷，研究其中之真義。茲已深信基督教道能改化人心，救人脫離迷道，得來日永生之福，特於上星期日，即十四號，與其太夫人及其夫人，在崑山路中西學堂內同領聖洗。自茲以後，本會友多一熱心基督教之宗主會員矣！共計是日到場者有該堂學生教友及本會全體幹事，誠盛事也！<sup>164</sup>

聶氏從 1910 年代開始積極支持上海青年會的工作，多次擔任徵求會的隊長（詳見第六章），後來更出任上海青年會以及全國協會的董事等職。<sup>165</sup> 他的胞弟聶其煒和聶其焜亦是青年會的重要支持者。1919 年，長沙青年會為興建新會所募捐購地，聶雲台與聶其焜便以聶崇德堂名義捐洋 10,000 元。<sup>166</sup> 聶其煒嘗言：「鄙人自為上海青年會會友以來，每屆徵求會，鄙人必踴躍將事，且數獲前茅，誠以鄙人深知該會之益，欲公諸同好而已。」<sup>167</sup> 聶氏昆仲便是從救國的關懷出發思考、歸信基督教，並認定青年會可以成為救國助力的典型例子。如聶雲台說：「吾嘗冥思深慮，而以為青年會者為救中國社會之唯一機會。」<sup>168</sup> 聶其焜亦嘗

164 〈會員領受聖洗〉，《上海青年》第14卷第11號（1915年3月19日），頁4-5；另聶其杰輯：《崇德老人自訂年譜》（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重印），頁337。

165 W. W. Lockwood, Report for Quarter Ending December 31, 1913, p. 1, COR.

166 馮崇毅：〈基督教青年會在長沙〉，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華文史資料文庫》，第18卷（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頁910。

167 聶其煒（管臣氏稿）：〈說基督教青年會〉，《上海青年》第16卷第12號（1917年3月30日），頁4。「按聶氏〔管臣〕不獨竭力介紹新友，且於上星期五晚特開特別會歡迎所介紹之新友四十餘人，其對於本會之熱心於此可見一斑矣。」〈錦標獨得〉，《上海青年》第9期第42號（1912年1月25日），頁3。

168 聶雲台：〈青年會為唯一之社交機關〉，《上海青年》第13卷第40號（1913年12月25

言：「請以一言敬告同胞曰：基督教者，吾國惟一之救時良藥，凡屬國民，皆當信徒者也。」<sup>169</sup>

像聶雲台這樣的事例當不僅限於上海一隅，各地的青年會當有相近的例子，張學良（1901-2001）的經歷可作為佐證：

我對於青年會的體、德、智、群，任何的聚會，我皆竭力去參加。這對於我的思想行動，影響不小。我當時對於青年會的徵求會友和募捐，無不熱心幫助，每次我都是得到最好的成績。

為奉天青年會建築會所的募捐，我個人募捐得七萬餘元，創青年會在中國募捐的最高數字。因為這一宗事，加上諸位中外人士過去給我的鼓勵、教誨，啟發了我一個信念——我是可以做些事的，確比一般人容易，這不是我的能力過人，而是我的機遇好，人家走兩步或數步的路，我一步就可以達到，這是我依藉著我父親的富貴權勢。

張學良最後說道：「我為甚麼不憑藉著這個來獻身於社會國家哪？！這使我決心拋棄那安享的公子生活，投身走上了為人群服務的途徑。」<sup>170</sup>

日），頁2。

169 聶其焜：〈余何以為基督徒〉，中華續行委辦會編：《中華基督教會年鑑（1916）》，第3冊，頁委34。

170 張學良自述，王書君撰編：《張學良口述自傳》（Elmhurst, NY: 香江時代出版社，2004），頁70。前文述及前浙江特派交涉使溫珮珊後來便出任杭州青年會總幹事。參聶其杰：〈溫珮珊君之決志服務社會與其影響〉，《上海青年》第18卷第4號（1919年1月24日），頁5-6；真我述：〈溫君珮珊事略〉，《青年》第17卷第12號（1915年1月），頁312-316。

可以說，參與青年會的工作等於服務國家的思考邏輯，成為二十世紀初年不少愛國之士支持青年會的重要因由：

中國的少年均很愛國，渴望為他們的國家做點事。他們認為幫助貧窮、體弱和無知的人，是最佳的途徑顯示他們的愛國情懷，以及在有需要的時候願意服務國家。<sup>171</sup>

如戴偉良所說：「…… 問題是為他們提供一個位置，值得他們認同青年會為中國所作的服務。」<sup>172</sup>

在基督教救國論的浪潮下，上海青年會中部分未歸信基督教的職員亦同受時代的感召。<sup>173</sup> 此外，華人幹事團隊中亦不乏基督教救國論的信仰者。陳維新說：

吾今敬告我國同胞，倘能大多數皆誠心信仰基督教，而以平等為精神，自由為行義，博愛為存心，則我中華民國富強之大希望，而不速達目的者，未有之也。<sup>174</sup>

潘毅華亦說：

歐戰既息…… 毅華之所以信基督教者…… 基督教之所以

---

171 Annual Report of J. C. Clark, September 1916, pp. 4-5, AQRBV. 「僕近年灰心世事，凡社會有興革事，輒置不問，惟近來上海新紀錄，如義賑會、禁吸紙煙會，頗足動余之腦筋，為之慶羨不置。」啞（周律溪）：〈紙煙與清道〉，《上海青年》第9期第23號（1911年9月），頁4。

172 Annual Report of W. E. Taylor, September 1911, p. 192, AQRBV.

173 〈同胞信道〉，《上海青年》第11期第26號（1912年10月17日），頁1。

174 〈陳維新先生演說基督教於國家之希望〉，《上海青年》第16卷第31號（1917年9月28日），頁7。「我參加青年會的工作，正是穆德在一九二一年到中國來推進『基督徒學生運動』的前夕，起初，我的思想受了穆德和艾迪很深的影響，我被他們的改良主義所麻醉。」吳耀宗：〈控訴美帝國主義在青年會內利用改良主義侵略中國〉，《天風》第276期（1951年8月），頁9。

開動世界者，大而言之，博愛而矣。耶穌嘗謂仇吾者，吾亦愛之，由博愛而生道德，由道德而生合群性，以合群性而論國體之問題，則國家之攪擾，亦自當瓦解矣。故今之言救國者，不以道德，則雖糜百萬之生命財產，於事亦無濟也。<sup>175</sup>

部分華人幹事亦將青年會等同救國機關，視加入青年會為救國實踐的具體場景：

徐君可陞有道士也，充本會附屬中學英文兼算學教員，數年於茲熱心任事，為學者所心折，因鑒列強之興盛，痛祖國之衰頹，欲圖自強，非精研各國政治學術不為功，爰立志出洋赴美洲克利佛倫青年會留學數年，學成返國，仍駐本會襄理會務，以期造就青年。<sup>176</sup>

張天培亦說：

余之擇此業而服務者，乃在是〔青年會宗旨〕矣；且當今同胞疾苦，年多一年，吾國衰弱，日甚一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捨此最大最要之事業外，吾復何求哉？<sup>177</sup>

這亦解釋了不少華人幹事甘願捨棄高薪厚職，加入青年會幹事行

175 毅華（潘毅華）：〈浸禮後之感想（待續）〉，《上海青年》第18卷第15號（1919年4月25日），頁4。

176 〈一路福星〉，《會務雜誌》第8期第42號（1911年1月20日），頁2。「今英國勢力之能澎漲於異國者，因國民皆有德智體三育之故，由此觀之，欲救吾國危亡，須先注重國民個人之道德，然後改良家庭、社會、政府，庶不枉費苦心矣；設國民無個人道德，而強欲改良腐敗之政府、社會及家庭，則徒勞焉。」〈徐可陞君之演說〉，《上海青年》第17卷第31號（1918年10月11日），頁3。

177 張天培：〈余何為擔任青年會體育幹事乎〉，《青年進步》第6冊（1917年10月），頁35。

列的因由。如費吳生在 1913 年的報告中所說：

……令人高興的是，愈來愈多青年為參與基督教的工作，寧願捨棄高薪厚職。我相信從前已舉出例子，但最近有其他事例引起我的關注。一個例子是，一名每月有 130 元薪金的青年，捨棄了他的工作，為的是到這裡擔任月薪只有三十元的實習幹事。我們的另一名新幹事亦作出相近的犧牲，雖然並不像上述的那麼大。一位格拉斯哥大學（Glasgow University）的畢業生，一位土木工程師，告訴我他願意接受他現時一半的薪金，從事基督教的教育工作。……我可以枚舉更多例子。他們全部見證愈來愈多的人，渴望以最佳的方法來服務他們的國家和同胞，並意識到唯一的方法便是透過基督教的服務。<sup>178</sup>

於此可見，上海青年會基本上一直存在一批滿懷愛國熱情，視投身青年會為參與救國事業的華人幹事。

從上述的分析可見，早在二十年代以前，人格／青年會與救國的有機關係論述，業已在上海青年會裡形成；而後來由全國協會提出，並為各地青年會跟進的「人格救國」主張，我們得從這樣的思想背景來理解。

#### 第四節 「人格救國」芻議

##### 一、「人格救國」的緣起

不少學者指出，青年會有關「人格救國」的說法於 1923 年 10 月

<sup>178</sup> Annual Report of George A. Fitch, September 1913, p. 5, AQRBV.



在廣州舉行的全國大會上，由全國協會總幹事余日章正式提出；而這個詞彙／觀念的出現，可以追溯至兩年前全國協會會所舉行落成典禮之時：

回憶民國十年四月十二日，全國協會新會所行落成禮時，章〔余日章〕曾編一紀念冊，冊之封面署「人格救國」四字。彼時此四字之聯成一句，似頗新奇。然章以個人觀察所及，兼受種種之刺激，不能不確認人格為救國唯一根本，因此決用人格救國四字以喚醒我四萬萬同胞；而社會各界對此旨趣，近亦有普遍之覺悟，共為直接間接之宣傳。<sup>179</sup>

事實上，余氏這番話與歷史實況並不相符，致後來的學者平白遭逢了一場美麗的誤會。

「人格救國」的提出，至少可以再推前一年多。1920年2月，全國協會校會組於蘇州東吳大學舉行江南學生春令會。據屠哲隱記述：「有余日章先生演說此次春令會的目的在救國，而救國惟一的方法，就是『人格救國』。」<sup>180</sup>是次春令會原於1919年夏舉行，但由於「五四運動」掀起學潮的關係，夏令會被迫順延舉行：「後來因為那時正是學生愛國運動劇烈的時候，學校大都停課，不便顧及此會，又恐時間局促，設備難周，於是將此會暫停。」<sup>181</sup>可以想像的是，余氏在學潮過後所舉辦的春令會上，

179 〈余日章致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第九次全國大會諸同志書〉，《青年進步》第67冊（1923年11月），頁83。「余總幹事答謝來賓，復由諸幹事分送『人格救國』書冊，內容係述協會事業近況。」聶民：〈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新會所落成開幕誌盛〉，《青年進步》第43冊（1921年5月），頁83。

180 屠哲隱：〈江南學生春令會紀事〉，《青年進步》第34冊（1920年6月），頁89。

181 屠哲隱：〈江南學生春令會紀事〉，頁88。

向愛國情緒高漲的學生提出「人格救國」的說法，當是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政治、社會形勢所作的回應，不可能與他後來受華盛頓會議的刺激存在任何因果關係。<sup>182</sup> 余日章與時人大概不會忘記他在該次春令會上曾提出「人格救國」的說法，他後來將此說的揭櫫連繫上全國協會會所的落成，大抵只是為了突顯「人格救國」在中國青年會的歷史座標上的不平凡意義。

「人格救國」的說法雖然晚至 1920 年初才被正式提出，但正如前文所述，有關的想法早已為人所提及，只不過沒用上這個詞彙而已：

竊有一言為諸君告者，在請諸君認明本會建設之旨耳。夫德、智、體三育為吾人立身行事所必需，而尤以德育為當務之急。我國今日不乏多材之士，而國勢尚如此者，則以缺乏道德所致，故本會首重德育，兼及智育，欲使我青年胥具完全人格，可以為國士，可以為公民，中國前途庶有豸〔解決〕乎！今荷諸君熱心贊助，還希始終匡扶，共圖進步，實所深望焉。<sup>183</sup>

青年會注重德育、智育、體育，何也？曰：人之所以為人者，道德而已，智識而已，身體之健康而已。無是三者則人格墮，人格墮而國本隨之矣……則人格由之而完，國

182 王成勉說：「余日章亦思考提振國家富強之道，而『人格救國』的觀念實係來自他出席華盛頓會議之感想。」王成勉：〈余日章與青年會——一位基督教領袖的愛國之道〉，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歷史人物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頁802。另參李志剛：〈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提倡「人格救國」及其反響〉，《維真學刊》第2卷第1期（1994），頁27。

183 〈敬告會友〉，《上海青年》第11期第44號（1912年2月8日），頁1-2。

本因之而固矣。<sup>184</sup>

吾國今日四顧茫茫，所希望者端在有用之青年；而青年所以致用者，在能力自勉黽，養成實力耳。今觀青年會所揭示之宗旨，曰：「培植青年」，注重三育，並實行社交及社會服務，以養成完全人格。諸君但勘明此旨，而實行之，則三育進，基業立；社交廣，服務熱，人格成，國家將大有賴矣！<sup>185</sup>

誠如邢福增指出，「人格救國」的主張並非晚至 1923 年才提出，有關理念其實早已貫穿於青年會的事業之中。<sup>186</sup> 也就是說，余日章若非拾人牙慧，也不過是有關論述的集大成者。前人的論述為後來「人格救國」論提供了豐富的理論資源。如吳耀宗所說：

一九二一年，當中國反帝、反封建革命運動開始發展的時候，受了穆德深刻影響的中國青年協會總幹事余日章，便提出了「人格救國」的口號，這個口號，就是青年會一貫提倡的「德、智、體、群」四大教育的變相，也就是改良主義在那個時代所披上的一件新的外衣。<sup>187</sup>

可以說，「人格救國」的說法只不過是舊酒新瓶，將青年會過去有關人格與國家建設的論述理論化，並提煉成一個綱領性的立場宣言，作為青年會在「五四運動」以後的危亡氛圍下，在救國問

184 顏誨（范顏誨）：〈青年會旨趣〉，《上海青年》第12卷第42號（1913年12月19日），頁1。

185 曹仲淵：〈敬告上海青年〉，《上海青年》第16卷第44號（1917年12月31日），頁6。

186 邢福增：《基督信仰與救國實踐：二十世紀前期的個案研究》（香港：建道神學院，1997），頁47，註45。

187 吳耀宗：〈控訴美帝國主義在青年會內利用改良主義侵略中國〉，頁8。

題上所宣示的立場而已。<sup>188</sup>

## 二、「人格救國」運動？

李志剛將「人格救國」視為青年會致力推動的一場「運動」，認為與青年會所推行的平民教育和公民教育運動存在有機的聯繫：

平民教育運動的發起故〔固〕較「人格救國」提倡為早，但當「人格救國」運動確立後，則將平民運動轉作「人格救國」運動的一項事工。……由是推知，「人格救國」是在於公民教育的實現。期間青年會雖有拒毒運動、節儉運動、齊家運動等舉行，但都是推行「人格救國」的一種行動。<sup>189</sup>

事實上，這種「泛人格救國」論述，與時人的看法不啻是南轅北轍。惲代英曾批評說：

這一次他們在廣州開全國青年會大會第一個講演，便以「人格救國」做題目。黎元洪給他們的祝辭，亦說「青年會注重道德」。孫中山給他們講演，亦說「青年會於養成人格方面，已有好成績」。黎元洪、孫中山說的話，或者

---

188 「現在我國給一般武人政客，鬧得無一片乾淨土，既為有目者所共見了！而一般熱心愛國者，近也洞微病源所在，揭櫫『人格救國』，以為國民若個個有人格，國家就能和平，人類就有福樂，那也說得確是一種對症的方子。」黃紹衡：〈為言人格救國者進一解〉，《真光》第23卷第2號（1924年2月），頁4。「就青年會的歷史說，成立已經有了二十多年，至今始提倡救國……但是諸君如果自今天發起來救國，還不為遲，且正合其時。」黃昌毅記：〈孫中山先生歡迎第九屆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大會代表演詞（十二年十月二十日）〉，收入余日章：《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史略》（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27），頁31。

189 李志剛：〈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提倡「人格救國」及其反響〉，頁27。

只是應酬他們的一個面子，亦未可知；然而他們必定要更覺得他們這鬧的「人格救國」，真有一個錢的價值了。<sup>190</sup>

他的評論雖然略帶意識形態的偏見，但並非完全沒有道理。事實上，1923年孫中山在是次大會上發言時亦委婉地說道：

兄弟對於青年會，是有很大希望的。此時在廣州開會討論的問題自然很多，萬不可徒託空言，散會之後便不理他。必須各回各的地方，實行用青年會所提倡的人格去救國！<sup>191</sup>

可見，對於當時熟悉青年會運作的人來說，這種以偉大口號作為號召的會議，要不是不抱任何幻想，也只是持觀望態度。

全國協會於同年舉辦以「人格救國」為題的徵文比賽，得獎者楊實雖然是典型的「人格救國」論者，<sup>192</sup>但是他對青年會的實踐誠意亦不無懷疑：

青年會既然大書特唱「人格救國」，當然，他們是首倡的。所可怕的，他們是首倡的，不是實行，是一種空吹。一種空吹，怎能感化人呢？……但有一件事，我們要注意，就是人格在實行的，不是虛空的。用人格去救人，是在行為上去，是在做事上去，不是像中國儒家消極的修

190 惲代英：〈基督教與人格救國〉，惲代英：《惲代英文集》，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371。

191 黃昌毅記：〈孫中山先生歡迎第九屆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大會代表演詞（十二年十月二十日）〉，頁31。

192 「由此看來，無論怎樣救國，總先要有人格。況且有了人格，國不待救而自救了。所以說，要救中國，只有人格可以做得到。……至此我敢說，『人格救國』是頂好的，頂重要的，是今日救國的惟一方法。」楊實：〈人格救國（青年協會智育部徵文第一名）〉，《青年進步》第72冊（1924年4月），頁54。

身，乃是在積極的活動進行上去做功夫。<sup>193</sup>〔底線均為筆者所加，下同〕

他在別處又說：

但我有一事極不願說，也不可說，就是全國青年會自從廣州閉會後，至今寂無所聞，仍然與先前一樣，無特別動作，可以表現「人格救國」的大目的。前日所大唱的，好像浮雲過太虛，今已無影兒了。……我更希望青年會極端進行，再接再厲，勿僅知道而不能實行，讓他人笑青年會是一個空議會。<sup>194</sup>

楊實的文章既獲得徵文比賽冠軍，大概反映出全國協會也認可其觀點。要是連他也認為青年會所提倡的「人格救國」，只不過是一個亮麗的口號，而不具實質內容。<sup>195</sup> 我們便有理由懷疑「人格救國」究竟有沒有發展成為一場具規模的運動。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楊氏對「人格救國」論雖持肯定態度，但是在他的言論裡亦不無自相矛盾的地方：

請用人格救國的人注意，不但要在人格救國上做工夫，還要從環境改良上著力，……所以我提出經濟與職業兩個問題，並不是推翻人格不能救國，乃是成全人格去救國。總之救國，不要空談，要去實行，不僅講理論，還要注意實際，那樣方有結果。<sup>196</sup>

193 楊實：〈人格救國（青年協會智育部徵文第一名）〉，頁52。

194 楊實：〈人格救國（青年協會智育部徵文第一名）〉，頁53。

195 任夫早前有關「人格救國」的討論亦是非常空泛。參任夫：〈人格救國是怎樣的〉，《青年進步》第45冊（1921年7月），頁1-4。

196 楊實：〈人格救國（青年協會智育部徵文第一名）〉，頁53。

從他上述的言論可見，內容充斥著「實行」、「行為」、「做事」、「進行」等饒富行動主義色彩的用語，如它們不是單純的修辭或寫作手法，或許側面說明他已自覺或不自覺受到「五四運動」所揭櫫的行動主義所影響。<sup>197</sup>

可以說，余日章提出「人格救國」主張之時，雖非道德救國論完全式微的時代，也是漸進式改良主義開始受人質疑，同時轉向於對具體行動方案有所要求的年代。我們有理由懷疑，「人格救國」論在中國社會最具影響力的時候，是在「人格救國」這句口號提出以前，而非在此以後。<sup>198</sup>

### 三、不干涉政治的再詮釋

踏入二十年代，青年會不得不隨著外在環境的轉變，對不干涉政治的原則作出更寬鬆的詮釋。民國肇建，寓公在〈新世紀基督教青年會宣言〉一文中說：

青年會標明之一主義，即不涉政治問題是也。今值掃除更新之時代，自始徹終，莫或離乎政治問題之範圍，青年會又奚從而見功乎？曰：不然！青年會注重道德科學，陶鑄

197 楊實在寫成此文以後，曾將它交給一位同學閱讀：「一位同學看了我的這篇文章問道：『像你說，人格救國，雖然很當，但除此以外，就沒有別的方法麼？更沒有別的方法較此還好些嗎？』」楊實：〈人格救國（青年協會智育部徵文第一名）〉，頁54。另參任夫：〈組織救國力〉，《青年進步》第34冊（1920年6月），頁7。

198 唐日安在他的福州基督教研究中，追溯了幾位1910年代很有代表性的皈依基督教的愛國之士後來的事跡，指出他們熱心參與福州青年會工作為時很短，部分人後來甚至與基督教沒有任何關係，詳參Ryan Dunch, *Fuzhou Protestants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hina, 1857-1927*, pp. 170-176。事實上，上海青年會的模範人物聶雲台在二十年代以後也戲劇性地改宗佛教。詳參孫尚揚：〈聶雲台的出耶入佛：一種獨特的宗教比較〉，首屆華人學者宗教研究論壇宣讀論文（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主辦，2010年1月21日至23日）。

新中國之人才，間接以立富強之基礎，以視他種設施，於政治上直接見效者，猶表與裡之不相離也。<sup>199</sup>

可見青年會期望在民國肇建的過程中，向青年傳播西方文化、進行道德教育，發揮「曲線救國」的功能。1920年，王正廷在全國協會主持的幹事會議上說：

青年會不涉及政治，這是應當的，但是造就一班具有宏大眼光的政治家，和糾正政治的誤點，與喊醒國民有純粹政治的覺悟，這是必可以的。因為青年會所以不牽涉政治，所怕的是怕一齊被拖到穢濁的旋渦裡去，若是能夠幫助政治的實處，而不受政治所渲染，並不貪圖政治上的勢利和名譽，那麼同不牽涉政治是無甚麼分別的。<sup>200</sup>

從王氏言論可見，不干涉政治的原則不僅變得愈來愈含糊，甚至可以說幾近完全被打破，參與政治不僅是理直氣壯，更是青年會的義之所在。當然，王正廷的說法不一定完全反映全國協會的立場，但從他公然向全體幹事宜揚有關訊息便可得見，不干涉政治的原則基本上已告動搖。

從本章的討論可見，在救亡圖存的時代氛圍下，上海青年會為招徠愛國之士的垂青，在活動程序的具體實踐上，相應作出政治化的調整。值得我們進一步追問的是，上海青年會除了政治化的面向外，它在其他層面的發展情況又是如何？這是下一章會處理的問題。

199 寓公：〈新世紀基督教青年會宣言〉，《青年》第15卷第1號（1912年2月），頁1。

200 楊恕：〈會長王正廷博士對全體幹事會議的演說詞〉，《上海青年》第19卷第26號（1920年9月24日），頁7。



## 第四章 繁華背後 —— 青年會眾生相

在第三章，我們特別著重從政治方面闡述了上海青年會作為一個政治啟蒙的平臺、潛在政治活動的掩護場所，以及更廣泛意義的救國機關，如何成功招徠愛國之士的垂青。本章進一步探討的是，上海青年會在這種政治化的論述背後多元、複雜的眾生相。1906年，由青年會主辦的英文雜誌《中國青年》（*China's Young Man*）刊載了一篇題為〈甚麼是青年會？〉的文章，其中有一段這樣的文字：

一名青年造訪青年會會所，參與一個宗教聚會，離開後告訴他的朋友，青年會是一所教會 —— 一個傳揚教義的地方。另一名青年來訪，聆聽一個科學講座後離開，認為青年會是一個傳播西方知識，以及預備中國青年將來成為有用之才的組織。另一名青年的遭遇發生在運動場上，他看見青年們在運動場上鍛鍊身體，以成為男子漢。他看見青年會的旗幟，推斷她代表一個以發展強健體格為宗旨的組織。還有一名青年來參與一個交誼會，發現會員一同玩遊戲、說故事、猜謎語等，實在是一段美好的時光。他回家後，腦中或許並沒有別的想法，只是發現一群性格相合的青年，晚上在一個社交俱樂部歡聚，並接受最高尚的道德薰陶。一名在職青年看見〔青年會〕夜校的通告，在指定的時間找出那座建築物〔上課地點〕，發現全是英語、簿記、政治、經濟等課堂。他說：「我知道青年會是甚

麼——她是一所書院。」現在中國也存在很多互相矛盾的思想，事實上，它們或許如同城市青年會生活裡的眾多特色（features），每種想法均有某程度的正確與錯誤。但是，甚麼是青年會？<sup>1</sup>

自上海青年會創辦伊始，會員間的最大約數一直不是基督信仰：

入青年會之資格分為兩等：一曰會員，皆基督教人，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於會中；一曰會友，皆未奉基督教，而品行端正之人，無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於會中，其入會也，非以熱心宗教之故，大都因會中諸利益而來。<sup>2</sup>

究竟，上海青年會以甚麼「利益」招徠會員？當大量會員因各種「利益」而加入青年會，對上海青年會的會員面貌、內部生態，乃至於整體發展，又帶來怎樣的影響？

## 第一節 留學生與文化適應

### 一、生活在文化夾縫中

留美學生唐悅良嘗言：

…… 蓋當青年會在中國創設之初，國人未明其宗旨及其事業，贊助者寥寥，苟無留學畢業回國諸君，熱心毅力贊成之，提倡之，鼓吹之，維持之，則青年會恐不易有今日也。<sup>3</sup>

---

<sup>1</sup> "What is 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China's Young Men*, vol. 1, no. 1 (April 1906), pp. 6-7.

<sup>2</sup> 季理斐譯，范祿述：〈論中國青年會〉，《萬國公報》第212期（1906年9月），頁12（總頁24630）。

<sup>3</sup> 唐悅良：〈青年會與留學生之關係〉，《青年進步》第4冊（1917年6月），頁2。

近代上海是一個五方雜處的通商口岸，中國各地不同省籍的人士往來頻繁，留學生自當不例外。不難想像的是，不少初到貴境或流落異鄉的歸國留學生，在融入上海生活的過程中，難免會面對不少適應上的困難。清華留美學生監督孟治嘗將 1872 年至 1916 年稱為留美學生的試驗時期（experimental period）。他形容此時期的留美學生說：

他們大部分是青少年，很多入讀小學和預科學校，很少考入研究院。他們的最大障礙是，對於自己的文化和社會認識很少。由於他們在最易受影響的年紀到來〔美國〕，他們很容易和頗完全地變得「美國化」(Americanized)。因此，當他們返回中國，便隨即面對調整的困難，在某些方面更是不可能〔克服〕。<sup>4</sup>

孟治雖沒有仔細談及留美學生所面對的種種困難，但從他對留學生起居飲食習慣的描述可見，文化適應（cultural accommodation）肯定是他們回國後需要面對的其中一大難題：

個人方面而言，這些留學生大部分選擇咖啡而非中國茶，雪糕而非任何的中國甜點，跳舞和電影而非傳統中國的戲院和茶館，網球、棒球、口香糖、騎馬等，而非較文靜的一類的娛樂和他們父親的惡習。<sup>5</sup>

二十世紀初年，上海作為全國最西化的城市，加上有數以萬

---

<sup>4</sup> Chih Meng (孟治), "The American Returned Students of China", *Pacific Affairs*, vol. 4, no. 1 (January 1931), pp. 5-6.

<sup>5</sup> Chih Meng, "The American Returned Students of China", p. 13. 有關這方面較詳盡的討論，可參 Stacey Bieler, "Patriots" or "Traitors"?: *A History of American-educated Chinese Students* (Armonk, NY: M.E. Sharpe, 2004), pp. 322-338.

計的外僑居住，留學生在這裡重新融入中國社會的生活，如不是最為容易，理論上也不應存在不可克服的困難。不過，如所周知的是，寓滬的外僑與華人涇渭分明，他們在所屬國家的總會（見附表 4-1）過著自給自足的社交生活，即便是華人的政商名流，亦無法打入他們的社交圈子。<sup>6</sup> 費吳生在回憶錄裡記述了兩件很有代表性的事例：某次一名不知就裡的英國公使從北京赴滬，邀約早年留學美國的唐紹儀於上海總會（Shanghai Club）午膳。唐氏在約定的時間抵達該會，惟遭守門的印度人粗魯地呼喝。另一件事例發生在上海銀行家朱成章身上，他應一位剛抵滬不久的美國人邀請到美國總會（The American Club）午膳。他乘車抵達後，同樣被拒絕進入，當時正值下雨，結果他在找到其他交通工具離開前，全身被淋濕透。<sup>7</sup>

附表 4-1 上海外僑總會一覽

建成年份	外僑總會	重建年份
1865	英國總會	1910
1866	德國總會	1907
1879	鄉村俱樂部	-
1904	法國總會	1926
1912	日本人俱樂部	-
1917	美國總會	1925

資料來源：婁承浩、薛順生編著：《老上海經典建築》（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02），頁 164-167；婁承浩、薛順生編著：《消逝的上海老建築》（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02），頁 72-73、76-80。

<sup>6</sup> Nicholas R. Clifford, *Spoilt Children of Empire: Westerners in Shanghai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the 1920s* (Middlebury, VT: Middlebury College Press; Hanover: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91), pp. 71-73.

<sup>7</sup> George A. Fitch, *My Eighty Years in China* (Taipei: Mei Ya Publications, 1974), p. 31.

但更不幸的是，他們的教育背景、生活習慣與中國傳統的社會菁英亦扞格不入，加上語言的隔閡，具地緣或業緣性質的會館、公所等中國傳統社會組織，亦不是他們尋求身分認同的合適地方。<sup>8</sup> 西幹事吉爾達（J. H. Geldart）在 1915 年的報告中提出了一項觀察：

每星期一群青年（數個留學生，可是全是說英語的青年）均聚首一堂，有一段社交和文藝的時間，社交特色漸漸獲得重視，而我只是在最近才認識到它的自然原因。這顯示上海青年其中一項迫切需要是社交生活，例如以小團體的形式出現——只限於具有相似精神的會所或學會。一直以來，中國並沒有太多這些團體，雖然有無數的會館和公所。<sup>9</sup>

不難想像，早期歸國的留學生基本上處在中國人與外國人之間的文化夾縫中，陷入兩面不是人的尷尬處境。

## 二、青年會的會員生態

上海青年會早期的骨幹會員，主要為教會學校的畢業生和留學生。他們的出身背景與生活習慣，與傳統中國的社會菁英迥然不同，反倒是與留學生有不少雷同之處。首先，他們無論是在教會學校肄業，或曾在外國留學，大部分均接受西式的現代教育，對英語尤其熟諳。路義思回憶說：

<sup>8</sup> 有關上海會館、公所的深入研究，可參郭緒印：《老上海的同鄉團體》（上海：文匯出版社，2003）；Bryna Goodman, *Native Place, City, and Nation: 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 1853-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sup>9</sup> Annual Report of J. H. Geldart, 1915, p. 5, AQRBV. 留學生在美國的學會生活，可參Weili Ye, *Seeking Modernity in China's Name: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0-192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16.

上海是一個存在多種方言的地方，滬語、寧波語……但是其中以英語為最令人夢寐以求的溝通媒介（coveted vehicle）。〔上海青年會〕每一名職員和董事均說英語，〔英語〕在董事部會議和大部分聚會裡為認可語言。他們看來認為有些東西將他們區分為一個說英語的團體，像是一個校友會。<sup>10</sup>

其次，他們的西學訓練背景，或曾在外國留學和生活的經歷，亦令他們的生活習慣變得更為西化。顏惠慶憶述父親顏永京時說：

父親終身保持著他在美國養成的習慣。我們家的家具、陳設和裝飾，都多少有些外國化了，飲食也中西合璧。從孩提時代，我們就習慣於歐洲的備餐、用餐方式。由於父母篤信西醫，我們從來不服中藥。<sup>11</sup>

梁小初憶述上海青年會董事宋耀如時亦說：「〔宋耀如〕每日午間到青年會餐室用膳，飯後稍玩卓球，然後回去辦公。」<sup>12</sup>

再者，隨著中國社會進一步走向西化，加上科舉制度的崩解，社會上對於精通西學的人才需求甚殷，他們憑藉對英語的掌握、不同學科或技能的認識，漸次成為社會上當時得令的人物。<sup>13</sup>

---

<sup>10</sup> Robert E. Lewis, *Search of Far Horizons* (West Conshohocken, PA: Infinity Pub., 2004), p. 74. 另參 George A. Fitch, *My Eighty Years in Chin*, p. 20.

<sup>11</sup> 顏惠慶著，吳建雅、李寶臣、葉鳳美譯：《顏惠慶自傳——一位民國元老的歷史記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頁3。

<sup>12</sup> 梁小初：《未完成的自傳：七七回憶錄》（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69），頁44。

<sup>13</sup> 謝洪貴為上海青年會董事唐介臣撰寫傳略時，亦不無時而世易之嘆：「當日幼童別家庭而遠游異國，旁觀者無不悲之。孰知數十年後，此輩多因新學之先進，得社會中重要之位置。企慕之者每嘖嘖稱羨，恨己身未與其列。社會之好尚遷移如是，誠可規世變矣。」盧隱：〈唐先生介臣事略〉，《青年》第17卷第9號（1914年10月），頁200。

據顏惠慶憶述：「回國後不久，大哥帶我到梵王渡，拜訪聖約翰大學校長。……他當場決定聘任我做教師，月薪為 100 銀洋。對於初任教職者，這樣的待遇在當時是很豐厚了。」<sup>14</sup> 他在別處亦說：

由於我是大學教師，精通英語，經常被邀請出席各種會議，盛宴和社交活動，為知名人士和美國貴賓擔任譯員。在公開場合的頻繁出面講話，使我漸漸地為上海眾人所知曉。無論政府大員還是社會賢達，都願意向我諮詢，以得到幫助。他們都感到，我如果能成為其團體的一員，或出席他們的社交活動，會帶來諸多方便，使人更愜意。<sup>15</sup>

在上海青年會董事中，具相似社會、經濟地位可謂大不乏人（詳見附錄七），如鄺富灼所說：「余所接觸青年會中人，有顏駿人〔惠慶〕博士，及已故之唐介臣，及黃佐庭君，此三者均為一時之領袖。」<sup>16</sup> 他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以至社會經濟特徵，與留學生顯然非常相近。

部分留學生返國後加入上海青年會，當然可能是由於他們在外國留學期間，已在大學校園與青年會結下因緣。<sup>17</sup> 他們對於尚

14 顏惠慶著，吳建雍、李寶臣、葉鳳美譯：《顏惠慶自傳——一位民國元老的歷史記憶》，頁44。

15 顏惠慶著，吳建雍、李寶臣、葉鳳美譯，頁49-50。

16 鄺富灼著，謝洪貴譯：〈六十年之回顧〉，收入鄺均永編：《鄺富灼博士紀念集》（香港：出版資料不詳，1966），頁26。賀嘉立甚至形容他們為「代表高等級的華人」（a high grade of Chinese men）。Annual Report of Charles W. Harvey, September 1903, p. 1, AQRBV.

17 鄺富灼著，謝洪貴譯：〈六十年之回顧〉，頁25；顏惠慶著，吳建雍、李寶臣、葉鳳美譯：《顏惠慶自傳——一位民國元老的歷史記憶》，頁36。但顏惠慶在維吉尼亞大學青年會的生活，並不教他感到愜意。

在襁褓階段的中國青年會，不會有太大的猜疑或戒心，屬於青年會可以團結的理想對象；加上上海青年會的骨幹會員，無論是教育背景、生活習慣，乃至於職業出路，均與留學生頗為相近；而且其中也有少數歸國的留學生，或多或少亦曾遭遇相近的適應困難。<sup>18</sup> 這些因素自然為兩者的結盟，提供了理想的客觀條件。

### 三、文化隙縫：青年會

上海青年會很早已有留學生的蹤跡。早期舉辦的講道會主要以滬語主講；偶有以官話、英語講說者，則輔以翻譯。然自 1903 年 10 月開始，為方便講說不同方言的會眾，講道會增設英文一節，舉行時間為下午五時。<sup>19</sup> 賀嘉立在該年的報告中指出，由於有部分會員不諳滬語，英語講道會遂成為他們的唯一選擇。<sup>20</sup> 按理會員不懂滬語，並不代表他們必定熟諳英語；可見英語講道會的設立，大概是為當時一些曾在外國留學，或具一定英語水平的人士而設。<sup>21</sup> 從附表 4-2 可見，上海青年會當存在少數

18 青年會不少中、西幹事均在美國接受教育。參 C. E. Patton, "The Missionary and Philanthropic Sphere", in Richard P. Butrick ed., *American University Men in China* (Shanghai: Comacrib Press, 1936), pp. 58-61.

19 〈宣道蟬聯〉，《會務紀聞》第2冊第3號（1904年3月11日），頁1。

20 Annual Report of Charles W. Harvey, 1903, p. 52, AQRBV. 事實上，就是幹事之間亦存在語言不通的問題。梁小初憶述在上海青年會實習的經歷說：「我被招待於這宿舍內。有一位從福建興化做練習幹事的黃展美，比我先到。我們二人同住一室，每日三餐也共同進食，故不寂寞。……我當時國語未通，我說廣州話，黃說興化語，因為方言各異，只得用英語交談。」梁小初：《未完成的自傳：七七回憶錄》，頁43。

21 1909年，廣州青年會再派出幹事謝恩祿到滬受訓，梁小初回憶說：「我們兩人在上海感覺有一點不太方便，就是當地教會主日崇拜，幾乎全用滬語。我們參加得益不多，無貢獻可言。我還可以參加英語崇拜，謝因不懂英語，更覺為難。」梁小初：《未完成的自傳：七七回憶錄》，頁48。「本會近已組織一禮拜日論道團，團員皆係善操英語者……，專為便利留學生以及熟諳英語諸君而設，俾能於靈性道德上得獲實益。」〈星期日之英語論道會〉，《上海青年》第13卷第30號（1914年10月16日），頁3。



附表 4-2 講道會出席人數統計表 (1901-1907)

年份	漢語(次數)	平均出席率	英語(次數)	平均出席率
1901	49	30	-	-
1902	-	-	-	-
1903	45	25	12	39
1904	48	21	43	35
1905	41	27.5	48	31.6
1906	46	36	35	30
1907	46	45	28	54

資料來源：*Annual Report of CYMCA of Shanghai, 1901, 1903-1907.*

的留學生會員。

我們可能會問，這些留學生既通曉英語，何不參加西人教堂的崇拜？鄭富灼的經歷應可成為答案：

余返滬上伊始（一九〇八年），即覺教會關係之不可更離，惟以不諳本土方言，對於本土禮拜堂之宣道，鑿柄不能入，而外國教堂又欠融洽，殊覺有設立粵人禮拜堂之要。<sup>22</sup>

鄭氏在這裡所述及的「外國教堂又欠融洽」，大概是指當時西人教堂普遍存在歧視華人的傾向，致使華人信徒多不喜歡參與西人教堂的聚會。<sup>23</sup> 我們從費吳生避重就輕的說法可以得到印證：

<sup>22</sup> 鄭富灼著，謝洪貴譯：〈六十年之回顧〉，頁29。

<sup>23</sup> 晏陽初在香港有這樣的經歷：「我至今記得，一星期日，我步入一座堂皇的教堂，等待引座員領我入座。他看了我一眼，卻去招呼站在我後面的一個衣著體面的白膚男士。我轉身走出教堂，從此不再去。」晏陽初：〈九十自述〉，宋恩榮編：《晏陽初全集》，第2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頁517。

他們〔留學生〕在大多數本地教會能聽到的講道，很少(要是有任何東西)迎合他們的喜好。西人教會歡迎他們參加崇拜，但不承認他們的會友身分，因為這是恰當的認為，他們可以對自己的同胞作更大的服務。自然的結果是，他們至今只有少數參加教會崇拜。他們部分人已為基督徒，部分在外國留學時已對基督教產生興趣。因此，這裡是一個有很大需要的工場，同時有很大的機會。<sup>24</sup>

不諳滬語的留學生既不能(或不願)參加西人教堂的崇拜，當時亦沒有太多鄉黨地域教會(compatriot-territorial churches)可供選擇；<sup>25</sup> 加上如第三章所述，這些菁英分子在學識和社會地位上，均與當時教會的一般信徒存在重大落差。上海青年會所設立的英語講道會自然成為他們的一個較佳的選擇。

英語講道會固然可以成為基督徒留學生的文化適應場所，非基督徒的留學生又如何？

……然滬上商人雖眾，而欲求一公餘集會之所，以研究健身方法者，厥惟本會而已。此外西人健身之處，准中國商人享同等權利者，間亦有之，惟以楚人處莊獄之間，精神上終有不能融洽之苦；甚或有須受西人之管理者，其不便又如何。若中國青年會，則完全為中國人的青年會。<sup>26</sup>

<sup>24</sup> Annual Report of George A. Fitch, 1914, p. 6, AQRBV.

<sup>25</sup> 原籍廣東的華僑革命報人崔通約說：「鄙人……旅居北美九年，秋間歸國，因事暫旅滬上將三箇月，以屬基督徒一分子之故，未通上海方言，故於主日向在公園靶子路懷恩堂廣東教會聽道……」通約：〈非以役人乃役於人〉，《上海青年》第14卷第42號(1915年12月10日)，頁2。崔通約後來與鄭富灼等人創立旅滬廣東中華基督教會。參崔通約：《滄海生平》(臺北：龍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4)，頁52-53。

<sup>26</sup> 〈本會體育事業〉，《上海青年》第21卷第30號(1922年9月29日)，頁13。

我們有理由相信，活在兩種文化夾縫之間的歸國留學生，在無處可以作為他們的文化適應場所的情況下，上海青年會西化的生態環境，遂成為他們重投中國社會的理想過渡場所。<sup>27</sup>

留學生會員人數雖然不算太多，但他們卻是上海青年會的核心成員和重要支持者，當他們日後成為社會上不同領域的領袖人物以後，遂為上海青年會日後的發展提供重要的助力：「顏駿人君自本會草創時即為本會董事，熱心任事，餘力不遺，本會得有今日現象，半為顏君贊助之功。」<sup>28</sup> 長期任職於上海商務印書館的鄭富灼亦嘗言：「余一生事業之重要者，捨著述外，要以青年會事業為其次。」<sup>29</sup>

## 第二節 政商界名利場

上海青年會早期的骨幹成員，雖然是社會上正在冒升的一群新菁英分子，但是與傳統的菁英集團比較，他們在財力方面仍然相當有限。巴樂滿在 1903 年提及煙台青年會時說：「幸運的是，煙台有兩位知名商人為基督徒，他們均在董事會裡任職，1,000 元墨幣的預算已經取得。」<sup>30</sup> 那麼，不幸的情況又是怎樣？

27 錢益民在《李登輝傳》裡說：「初到上海，人生地不熟，又不曾說國語，怎麼施展他滿腔的報國之志呢？這對剛回國的他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加入上海青年會，李登輝找到了精神上的皈依，也得以結交志同道合的朋友，開始逐漸融入以外國傳教士、歸國留學生和本國基督教徒為主的上流社會。青年會既給李登輝以安身立命的場所……」錢益民：《李登輝傳》（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頁32-33。另參 James L. Huskey, "Americans in Shanghai: Community Formation and Response to Revolution, 1919-1928"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1985), p. 51.

28 〈參贊皇華〉，《會務雜誌》第6期第1號（1908年2月21日），頁2。

29 鄭富灼著，謝洪贊譯：〈六十年之回顧〉，頁25。

30 Annual Report of F. S. Brockman, September 1903, pp. 3-4, AQRBV.

缺乏年長和富裕的中國商人出任董事，令我們的青年會工作吃了不少苦頭。大部分基督徒均為青年，他們給與忠誠和傑出的服務予委員會；但你是否可以想像，本國裡有一個沒有董事會的青年會，只有一個會員委員會，而其中並沒有一個城中富有商人呢？你會大致掌握中國青年會的處境。<sup>31</sup>

在當時客觀環境的制約下，誠如巴樂滿所說：「我們的財政支持大部分必須從非基督徒商人處獲得。」<sup>32</sup> 加勒特 (Shirley S. Garrett) 的研究指出，在二十世紀初年，青年會深得中國政商名流的經濟支持；<sup>33</sup> 但是她的討論偏重於描述性，對於背後的所以然並未觸及。究竟，青年會與中國政商名流背後鮮為人知的關係是怎樣？

### 一、中國官員的支持

二十世紀初年，美國政府官員在對華傳教的問題上，基本上一直持同情態度，美國駐華領事對於在華的傳教士更不時予以援手。美國總統塔虎脫 (William H. Taft) 在任期間對於穆德所推動的青年會工作尤其大力支持，當時不少遠東問題專家更是北美協

<sup>31</sup> Annual Report of F. S. Brockman, September 1903, p. 7, AQRBV.

<sup>32</sup> Annual Report of F. S. Brockman, September 1903, p. 7, AQRBV. 北京青年會幹事陶德滿經過包裝的說法是：「一個基督教機構，幾乎完全從非基督教的來源獲得財政支持，是中國青年會的奇怪現實，是它廣泛工作的價值和中國人寬廣胸襟的明顯見證。」Dwight W. Edwards, "The Chines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39 (January 1912), p. 112.

<sup>33</sup> Shirley S. Garrett, "The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the YMCA", in Mark Elvin and G. William Skinner eds.,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213-238.

會的成員。<sup>34</sup> 上海青年會與美國駐滬領事的密切關係，遂成為招徠中國政商名流的最大本錢：「本會留學生部會友上星期特為美總領事維爾德〔Amos P. Wilder〕君開歡送會……維爾德君與本會會友感情最洽……」<sup>35</sup> 相反，要是上海青年會與駐滬領事鬧翻，通往中國政商界的大門便隨之關上。

早在1901年，上海青年會總幹事路義思應邀出任美國亞洲協會（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上海分部榮譽祕書一職。該會於1898年10月在紐約正式成立，以促進美國商人在華利益為宗旨。同年12月，該會在上海建立分部。<sup>36</sup> 路氏幾經考慮後，接受了巴樂滿等人的意見，答應出任榮譽祕書一職。對於路義思而言，要處理上海多個青年會的事務，已教他分身乏術；促使他勉力首肯的原因，相信正如他所說，出任榮譽祕書一職，使他能夠接觸到最具名望的人士，包括執行委員會中五大商行的負責人，有助青年會建立籌款網絡。豈料，在他上任不久，該會即開始調查美國駐滬總領事古納的違法行為，並將調查報告呈交美國國務

34 「即如此次由美起程時，曾由美總統暨美政府繕成信函，予以介紹於各處。」〈穆約翰〔穆德〕先生事略〉，《會務紀聞》第5期第4號（1907年3月7日），頁2。另參Paul A. Varg, *Missionaries, Chinese, and Diplomats: The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ina, 1890-1952*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 132-135; Jerry Israel, *Progressivism and the Open Door: America and China, 1905-1921*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71), pp. 119-124.

35 〈歡送美總領事回國〉，《上海青年》第13卷第4號（1914年2月13日），頁2。「上星期六即五月十三日，滬上諸美國人士假匯中旅館開月會，共計到者約有一百五十人，美總領事亦預焉。餐畢後，美領事起立演說，特為本會總幹事路維廉君送行。」〈匯中旅館之一席談〉，《上海青年》第16卷第19號（1917年5月18日），頁2。

36 有關該會成立的背景及經過，可參James J. Lorence, *Organized Business and the Myth of the China Market: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1898-1937*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81), pp. 5-23; John R. Eperjesi, *The Imperialist Imaginary: Visions of Asia and the Pacific in American Culture* (Hanover, NH: Dartmouth College Press, 2005), pp. 87-89.

院。這個事件帶來的影響是，路義思無法如常透過古納接觸中國官員，令早前向中國官員募捐土地興建青年會會所的計畫戛然而止（詳參第六章）。<sup>37</sup>

迨至 1904 年 3 月，古納在得知有關他的調查後，大概是希望尋求轉機，遂致函邀請路義思至領事館面談，惟遭他斷然拒絕。<sup>38</sup> 古納對此深表震驚，並再度致函向路氏提出質詢：

過去並不是這樣〔拒絕前往古納的辦公室，下同〕，當你希望在這領事館裡為青年會舉行首次聚會，期望同時得到我的積極幫忙，促成有利於你的計劃的聚會（to induce the meeting to favor your plan）；當你要求同時得到我的積極幫忙，獲得英國總領事幫忙你的計劃時，亦不是這樣；當你要求我與你同行，勸誘那些你沒有其他途徑可以接觸到的人，提供財政援助予你的事業時，亦不是這樣。事實上，你從前每一次前來我的辦公室，你和你的事業得到的只會是我的好意和幫忙。<sup>39</sup>

可見路義思過去透過古納的穿針引線，得以接觸到一些他個人無法接觸的重要人物，從而達到籌募經費的目的。世上當然沒有免費午餐，古納的長期協助不可能是完全沒有代價。路義思回覆古納的指責說：

…… 請允許我說明，作為美國的總領事，你當提供服務予青年會。我事前曾向你查詢，你的職位可否提供幫助予這

---

<sup>37</sup> Robert E. Lewis to John R. Mott, 22 October 1902, *COR*.

<sup>38</sup> John Goodnow to Robert E. Lewis, 13 March 1904, *COR*; Robert E. Lewis to John Goodnow, 14 March 1904, *COR*.

<sup>39</sup> John Goodnow to Robert E. Lewis, 19 March 1904, *COR*.

個組織，你的回答是幫助美國人所有的合法利益，是總領事館工作的一部分。你同時認為，這個組織對於年輕的美國人和其他的本地居民，將會是一個明顯的幫助。你毋須訓斥我是忘恩負義，除了在那時我向你所表達的衷心感謝外，我也曾幫你不少忙，教你公開的感謝……你可能亦會記起，數年前，我特地寫信給美國的知名信徒，讚賞你為傳教士所作的某些行動。這些信件均是為你服務，讓你在數年前回國述職時，能獲得公眾的稱許。<sup>40</sup>

古、路二人互揭瘡疤，揭示了青年會西幹事與美國駐華領事糾纏不清的利益關係。

迨至同年12月，整個事件最後以古納被召回美國劃上句號。路義思事後在給穆德的信中說：

隨著古納在十二月尾離開上海返回華盛頓，這裡的領事館交由禮密臣（Mr. Davidson）〔James W. Davidson（1872-1933），前美國駐臺領事〕重組。我在中國這裡等待接觸那些大官員已經一年了，禮密臣立即給我聯繫這些官員，茲附上一封給署理〔兩江〕總督端方的介紹信（附件三）。禮密臣安排我在宴請巡撫的晚宴上報告，席上我認識了星使李伯行（Lord Li）〔李鴻章所收繼子〕，以及三位具大使官階的官員。後來，禮密臣與我親自面見巡撫，巡撫指示道台協助我們獲得土地。<sup>41</sup>

<sup>40</sup> Robert E. Lewis to John Goodnow, 24 March 1904, *COR*.

<sup>41</sup> Robert E. Lewis to John R. Mott, 26 January 1905, *COR*. 其他例子另見H. A. Moran to John R. Mott, 12 April 1911, p. 3, *COR*.

路義思在禮密臣上任後所得到的優待，與古納最終離職的下場有否關係，並不是這裡討論的焦點；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從路義思與古納、禮密臣的往還可見，青年會西幹事透過美國駐華領事的協助，得以直接面見中國官員，推展青年會的工作並進行募捐；又或是透過領事的影響力，邀請中國官員出席青年會所舉辦的活動，既可增加青年會的聲望，亦可伺機募捐經費。中國官員對於青年會的支持，當然可以是出於對該會在社會啟蒙、改良運動方面的肯定，<sup>42</sup> 但是脅於領事的壓力，或作為一種政治酬庸或交際手段，相信是更真實的原因；<sup>43</sup> 而西幹事為了答謝駐滬總領事的幫忙，遂在力之所及的情況下，特別是利用青年會／教會的人脈網絡禮尚往來。

## 二、中國商人的贊助

中國商人之所以支持上海青年會的工作，大概亦離不開同樣的原因。據巴樂滿意述，中國人向來沒有出席公開演說的習慣，1903年10月，美國巴爾的摩（Baltimore）富商、慈善家樂伯林（Joshua Levering）訪滬，其背景被認為適合於「指導」（"coach"）中國商人，在形塑道德環境予中國青年方面的責任。

42 「知該會〔上海青年會〕所有捐款多由政府中非基督徒處得來者，可見青年會實受各界所贊成云云。」〈塔富脫君不忘本會乎〉，《上海青年》第13卷第23號（1914年6月26日），頁3。「中國官場及當道均為該會之輔助者。」徐潤：〈上海雜記〉，徐潤著，陶希聖主編：《徐愚齋自敘年譜（上海開埠後1842-1911之經濟概況）》（臺北：食貨出版社，1977），頁300-301。

43 誠如浙江交涉使溫珮珊所說：「迨光復後，受杭州交涉員職，雖與青年會諸君周旋，不過略盡交誼之道，非有真誠慕道之心也。」真我述：〈溫君珮珊事略〉，《青年》第17卷第12號（1915年1月），頁316。1914年底，全國協會接獲通知，袁世凱主動增加每年的捐款，由3,000元增至5,000元。Annual Report of J. C. Clark, September 1915, p. 4, AQRBV.



上海青年會遂向少數經篩選的銀行家和商人發出邀請，聲稱演講嘉賓為銀行家、商人、慈善家，以及曾是禁酒黨總統候選人（prohibition candidate）。<sup>44</sup> 據報導，演說會舉行當天，絕大部分嘉賓均應約赴會，而且反應熱烈，會後更隨即慷慨捐助經費。<sup>45</sup> 於此可見，上海青年會在創會不久，已大致掌握到招徠中國商人的絕佳手段——潛在的商業利益。

自此以後，上海青年會充分把握地理上的優勢，每有美國政商人物訪滬，均會邀請他們來訪青年會，就中美貿易有關問題發表演講，並邀請上海的政商界名人出席：

禮拜三即三月廿四日晚，由本會敦請美欽使精大臣琪〔J. W. Jenks, United States Commissioner of Coinage〕，貴臨本會演講東方財政及中國改製圓法情形，主席者為粵漢鐵路局陳君靄亭，陪坐者為嚴小舫觀察、張叔和觀察，足為本埠商務之代表，其餘紳商光降者共六十餘人，講畢後各紳商又向精大臣相互問答，偉人偉論，足為一時之盛會矣。<sup>46</sup>

前上海商務總會曾函請美國太平洋一帶商務總會派人來華參觀商情，茲該會已派有代表四十餘人……本會爰定於十三日即禮拜五午後五時開會歡迎，已先期遍邀本埠紳商

44 「另有著名美商新入中華，名樂伯林者，原為本籍青年會會正，又為美國及干阿達青年會總委辦之一，前數年美國戒酒會曾舉為元首，則其人之品誼名望概可想見矣。」〈查經會〉，《上海青年會報》第1卷第3冊（1903年10月9日），頁1-2。另參Jessica I. Elfenbein,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ity: Philanthropy, Civic Culture, and the Baltimore YMCA*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1), p. 35.

45 F. S. Brockman, *I Discover the Orient* (New York, London: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35) pp. 85-88.

46 〈偉人偉論〉，《會務紀聞》第2冊第12號（1904年5月13日），頁2。

各界屆時蒞會共襄盛舉，並備本國各種幻術遊戲以佐雅興。<sup>47</sup>

可以推斷，這些帶有明顯中美貿易色彩的活動，同樣得力於美國駐滬領事的居間協助；而美國商人之所以支持宗教團體的工作，除了出於認同其道德理想以外，在中美商民或僑民之間建立友善的關係，對於美商在華從事投資亦不無間接的幫助。<sup>48</sup>

這些聚會之所以受到政商名流的支持，大概有以下的幾個原因：第一、有助中國商人了解世界商貿發展的趨勢，作為日後投資時的參考資料：「吾國之國外貿易，以絲茶為大宗，華茶在美國銷路最廣，本會……敦請俞希稷君演講吾國茶業在美國之近狀，想為關心國外商業者所歡迎也。」<sup>49</sup> 第二、為他們提供了一個與外國商務機關或人物建立網絡和關係的平臺。查當時中外商人的接觸，只限於業務上的往來。<sup>50</sup> 這些名人畢集的聚會為中外商人的接觸創造了空間：

會員數千人中，有大學問家、大政治家、大文學家，各種科學專家，以及豪商鉅富，與各項商業中之職員，無不咸在，設遇要事須訪問律師或銀行員或洋行買辦之類，苦於乏人介紹，可至本會交際部，託主任者檢閱本埠會員姓名

47 〈歡迎美國實業團〉，《會務雜誌》第8期第24號（1910年9月15日），頁2。

48 羅志平：《清末民初美國在華的企業投資（1818-1937）》（臺北：國史館，1996），頁243-254。

49 〈美國之中華茶業〉，《上海青年》第16卷第31號（1917年9月28日），頁14。另參〈中美商業之利弊〉，《上海青年》第16卷第31號（1917年9月28日），頁5；〈推廣營業者注意〉，《上海青年》第18卷第20號（1919年5月30日），頁17；〈中美通商之便利〉，《上海青年》第21卷第22號（1922年6月16日），頁3。

50 F. S. Brockman, *I Discover the Orient*, pp. 85-88.

錄而介紹之，如欲訪問各項職員，無論軍警工商學界皆可。<sup>51</sup>

而更重要的是，在沒有地緣或業緣壟斷的情況下，從前無法找著門徑的人可以在一個相對中立和公平的平臺上分得一杯羹。<sup>52</sup> 難怪猶太籍記者愛潑斯坦（Israel Epstein）在自傳中指出，很多加入青年會的中國人，主要是為了建立有利的商業關係（advantageous business relationship）。<sup>53</sup> 此種潛在的商業利益更成為招徠會員的宣傳手法（附圖 4-1）：

舉凡著述界之出類人物，實業界之中堅人物，政治界之穩健人物，以迄凡百職業界裡有守有為之人物，大都產出於是會。……有志殖產者，欲在職業場裡嶄然顯頭角，當及早入青年會用若干時間之修養工夫。<sup>54</sup>

對於上海青年會而言，得到的回報當然是紳商名流的樂善好施：

本會上禮拜六晚假座一品香，舉行第五次年會大宴祝典，

51 丁福保：〈青年會會員之利益〉，《上海青年》第16卷第40號（1917年12月3日），頁9。

52 Shirley S. Garrett, *Social Reformers in Urban China: The Chinese Y.M.C.A., 1895-1926*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128; James L. Huskey, "Americans in Shanghai: Community Formation and Response to Revolution, 1919-1928", p. 63.

53 Israel Epstein, *My China Eye: Memoirs of a Jew and a Journalist* (San Francisco: Long River Press, 2005), p. 231.

54 尤惜陰：〈青年會與奮鬥生活之關係〉，《上海青年》第17卷第3號（1918年1月21日），頁4。梁啟超在1925年接受《同工》月刊訪問時亦說：「……青年會之多數會員，倘以青年會為飛黃騰達之捷徑，而青年會自身亦即以此相應，則青年會之價值必因以貶損，甚至一落千丈，亦意計中事也。」〈梁任公先生對於青年會的期望〉，《青年進步》第84期（1925年6月），頁93-94。任夫在後面欲蓋彌彰地加入按語說：「按青年會為飛黃騰達捷徑一說，當是任公一偏之見，大約任公在京津青年會特別大會之時所遇者多此類人故云。」（頁94）

附圖 4-1 青年會饒富功利色彩的宣傳漫畫



圖片來源：〈已入青年會與未入青年會之區別〉，《上海青年》  
第 18 卷第 15 號（1919 年 4 月 25 日），頁 2。

一時冠裳畢集，衣香與人影相迷，肴饌雜陳，海錯共山珍……愈見一時之盛會，是晚並順將本年經費預算表佈告大眾，募勸捐項，於是並蒙多人助成巨款。<sup>55</sup>

### 三、青年會的社會資本

在二十世紀初年的上海，除了青年會以外，只有尚賢堂（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1897 年建立）、上海美國大學同學會（The American University Club of Shanghai，1905 年建立，1908 年招收華人會員）、國際禮拜堂（Community Church，1917 年建立）等少數組織或場所，可以作為華人與西人接觸或交流的平臺，聯華

<sup>55</sup> 〈祝典佳談〉，《會務紀聞》第 3 冊第 15 號（1905 年 6 月 2 日），頁 2。

總會（The Union Club of China）和上海扶輪社（Shanghai Rotary Club）要晚至 1919 年才成立。<sup>56</sup> 上海青年會之能夠得到中外政商名流的支持，主要是由於在當時獨特的社會結構下，她提供了一個少有且具影響力的接觸平臺；透過舉辦不同形式的社交活動，有效將不同界別的中外官商名流等領袖人物聯繫起來：

二十晚本會舉行年宴，特備西筵，邀請在滬官紳及全體會友於健身房，來賓計有百人，實為本年最特色之大會也。時計報七下，聯袂而來者，官紳與會友也；洋洋盈耳者，西樂也；美味適口者，法國大餐也；侃侃而言者，為諸名人志士之演說者也。座中尊客為出使美國伍星使、滬道梁觀察、美國富商雷德君也。<sup>57</sup>

1905 年，傳教士明恩溥（Arthur H. Smith）在出席上海青年會的一次年宴後指出：

這個宴會與我迄今所見的同類聚會迥然不同，出席的人士代表一個階層，就我所知，一直以來，平常的傳教工作很少能觸及。他們部分曾在外國留學，部分是商界中的翹楚，他們幾乎（或可能）全部在中外事務中位處令人感到具影響力的位置。

<sup>56</sup> James L. Huskey, "Americans in Shanghai: Community Formation and Response to Revolution, 1919-1928", pp. 13, 61-67; Nicholas R. Clifford, *Spoilt Children of Empire: Westerners in Shanghai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the 1920s*, p. 71.

<sup>57</sup> 〈濟濟一堂〉，《會務雜誌》第5期第33號（1908年1月31日），頁2。李長莉討論晚清上海休閒娛樂時說：「人們的一些社會交往活動，如商人之間的談賣買、士紳之間的拉關係、同行同業之間的相互結交等等，也已經習慣於以這些消閒娛樂之地為活動場所……這種社交性的休閒娛樂方式，與傳統方式相比，感情色彩淡化，主要是溝通信息，結交同行，甚至直接從事商業活動，與人們的職業活動有更多聯繫，因而帶有更多的功利性，顯示了更多的商業化色彩。」李長莉：《晚清上海社會的變遷：生活與倫理的近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頁254-255。

對我來說，得到這個階層的消極友好 (passive goodwill) 是極為重要，而獲得他們的主動親善 (active goodwill)，像青年會明顯所得的則是顯著的成就。在新會員的眼中，會員間的「友好」("camaraderie") 是其中的一大優點，並毋疑是最佳的推薦信 (prime recommendation)。<sup>58</sup>

1908年1月，上海青年會增設職業介紹的服務：

旅滬西商往往有欲延書記、繙譯等席，苦於無處招尋，而會友中欲謀一席者，又以紹介無人。此情此景，本會時有見聞，不勝代為搯腕，茲特創議添設紹介所，專以紹介為宗旨，以便謀事之人，想我會友當必全體贊成也。<sup>59</sup>

從一個更寬廣的角度說，上海青年會本身便是一個引介中外政商名流接觸或交換各種潛在利益的紹介所，這亦是政商名流積極支持她的根本因由。明恩溥生動地描述在上述宴會中慷慨解囊的政商名流說：「很可能在我們的家鄉不會有太多這類人士；在不多的呼籲下，只有一次平常的財政需要報告，逾 1,300 元隨即在不到四十分鐘內便籌得。」<sup>60</sup>

隨著上海青年會在華人社群中的影響力日高，她與外國社群的關係亦產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1909年5月，上海工部局捐出 5,000 兩予上海青年會發展運動場計畫：

基督教青年會提出在靶子路偏東南建造一個體育場的建議，這項建議連同已獲得一定成功的華人認捐名單一起於

<sup>58</sup> 引自 W. W. Lockwood, Report Letter No. VII, July 1905, p. 3, *OLWWL*.

<sup>59</sup> 〈殷勤紹介〉，《會務紀聞》第5期第30號(1907年1月10日)，頁2。

<sup>60</sup> 引自 W. W. Lockwood, "Report Letter No. VII", July 1905, p. 3, *OLWWL*.

前幾個星期刊於在報上。會議考慮了青年會希望得到工部局幫助的要求，並強調青年會接納所有品德良好的華人，該體育場將盡可能向一切華人的教育或體育團體開放。董事們一致認為，根據這些情況，從公眾基金中給以補助是正當的，並且將有助於改善和本社會中華人的關係。因此，會議決定答覆到，1910年預算中將列入5,000兩銀子的補助金，並將提出此數目以便得到立稅人會議的通過。<sup>61</sup>

會議紀錄中所指的「華人」，當然不是指一般的草根階層，而是指與上海青年會關係密切的一些政商名流。這些中國政商名流對於工部局的不滿，成為上海青年會爭取捐助的政治本錢。駱維廉說：

上海其中一件最不幸的事情是，繳交大部分稅款的中國人被拒進入外國娛樂場所和公園。這是種族間充滿仇恨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要是我們的青年會有助於除去這種反感因由（instrumental in removing this cause of ill feeling），我們迄今所做的〔意義〕將會多於〔工部局〕單純的繳付。<sup>62</sup>

當然，工部局亦有用得著上海青年會的時候。1910年10月，上海閘北爆發鼠疫，上海租界行政當局所採取的強制性檢疫、

61 〈華人體育場〉，上海市檔案館編：《工部局董事會會議錄》，第1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909年5月25日，頁613。此外，工部局的捐款亦由非正式的渠道打開：「且本會未嘗呈正式之請求，即獲該部之資助，此皆怡和公司蘭德爾君之力也。」〈地方之飲助〉，《會務雜誌》第7期第19號（1909年6月11日），頁2。

62 W. W. Lockwood to John R. Mott, 28 May 1909, p. 3, COR. 晏斯納（M. J. Exner）亦指此舉旨在疏導華人一直存在的的天不滿。Annual Report of M. J. Exner, September 1909, p. 4, AQRBV.

防疫措施，引起租界華人社會的強烈反彈。<sup>63</sup> 西幹事毛蘭（H A. Moran）指出工部局要求上海青年會透過舉行大型的衛生講座，向華人解釋當局所實行的衛生措施。<sup>64</sup> 《上海青年》報導說：

去冬租界因查疫一事幾釀風潮，幸後來中國董事出而調停，由華人自立醫院風潮始息；然上海雖無此疫傳染，亦不宜不先事預防，至於個人衛生尤極宜講究。本會向有衛生演說會，今定於本月二十四日，……敦請名醫某君蒞會演講各種時疫問題及預防法，是為目前最要之問題。<sup>65</sup>

戴威廉在 1911 年的報告中亦說：「在最危急的關頭，青年會表示願意擔起調停人（mediator）和指導者（instructor）的服務，欣然獲得接受。」<sup>66</sup> 上海青年會成為了中國人與外國人之間的和事佬。

類似的情況似乎亦發生在美國駐滬領事身上。1913 年 4 月，駐滬總領事維爾德邀請費吳生出任「週末聚餐會」（Saturday Club）的祕書，以聯絡中外各界人士為宗旨，<sup>67</sup> 費氏被看中的原因，相信是他豐富的人脈關係。1919 年 1 月，艾迪在給穆德的祕密信函中，談及費吳生要求增加額外津貼時說：

費吳生雖然天生有點放肆，但是很有社交天賦（social gifts），以及在上海有罕有其匹的良好社會關係……透過

---

63 詳參傅懷鋒：〈清末上海公共租界的鼠疫風潮〉，《二十一世紀》總第77期（2003年6月），頁118-124；彭善民：《公共衛生與上海都市文明（1898-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頁90-92。

64 H. A. Moran to John R. Mott, 12 April 1911, p. 2, COR.

65 〈第一次演說會〉，《會務雜誌》第9期第1號（1911年2月17日），頁2。

66 Annual Report of W. E. Taylor, September 1911, p. 3, AQRBV.

67 Annual Report of George A. Fitch, September 1913, p. 6, AQRBV.



他與中外群體有寬廣的社交接觸的強處，曾募捐得一筆龐大的金錢，亦同時增加了他的開支。我認為應該保留他在我們的工作中。<sup>68</sup>

設立這個聚餐會的政治動機是昭然若揭的，據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Paul S. Reinsch）憶述，他於1913年在滬出席「周末聚餐會」時，尚賢堂的創辦人李佳白（Gilbert Reid）便曾當面向他投訴，指美國駐華公使有越俎代庖之嫌，將本應由民間推動的民族友好工作一手包攬。<sup>69</sup> 據鮑引登（C. L. Boynton）指出，「週末聚餐會」便是後來在1919年由美國領銜成立的太平洋國際學會（Pan-Pacific Association）的前身。<sup>70</sup> 如所周知的是，太平洋國際學會的成立與青年會的關係密切。<sup>71</sup> 青年會在各國擁有的人脈關係，相信是她受到美國政府青睞的重要原因。

明恩溥在《北華捷報》（*The North China Herald*）撰文指出，青年會為外國人與具影響力的華人之間的中間人。<sup>72</sup> 筆者以為，

<sup>68</sup> Confidential Letter from Eddy to Mott, 8 January 1919, *BIO*. 1917年駱維廉返美休假，由華人資深幹事曹雪廉出任署理總幹事。費吳生在該年的報告中說：「然而，這樣的改變在未來一段時間並不能顯著地減輕西幹事的責任，包括眾多外國的關係、英文的書信往來、某些他們一直承擔的部門的特別顧問關係。」Annual Report of George A. Fitch, September 1917, p. 3, *AQRBV*.

<sup>69</sup> Paul S. Reinsch, *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 (Garden City, NY: Toronto: Doubleday, 1967), pp. 9-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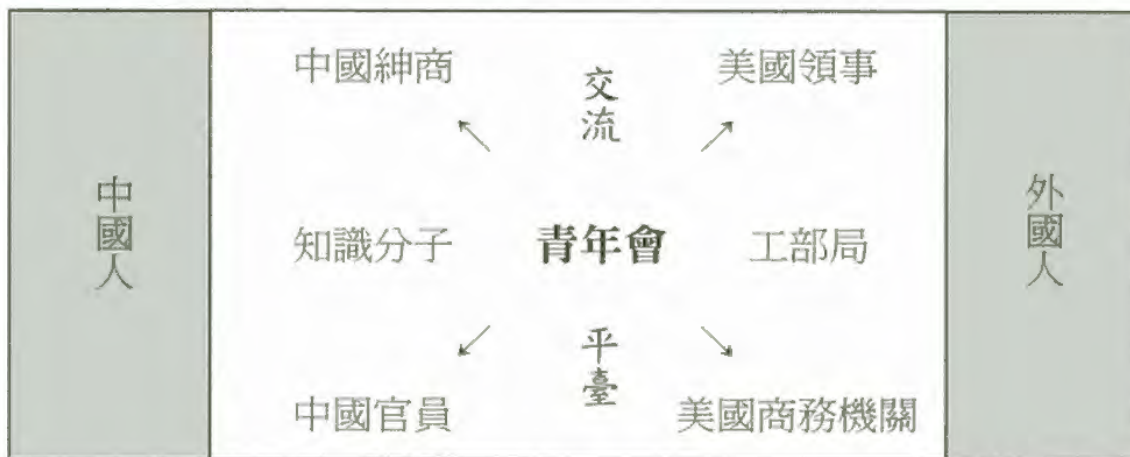
<sup>70</sup> C. L. Boynton, "The Club's History in Outline", in Richard P. Butrick ed., *American University Men in China* (Shanghai: Comacrib Press, 1936), p. 22.

<sup>71</sup> 「有一部分人的心理上，覺得太平洋國際學會和基督教男女青年會是很有關係的……」〈余日章博士歡迎第四屆太平洋國際學會代表演說詞（譯文）〉，《同工》第107期（1931年12月），頁1。另參Tokomo Akami, *Internationalizing the Pacific: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in War and Peace, 1919-45*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 47.

<sup>72</sup> 引自Annual Report of Robert E. Lewis, September 1906, p. 11, *AQRBV*.

正如附圖 4-2 所示，上海青年會憑藉擁有當時最具影響力的中外交流平臺的客觀優勢，加上中、西幹事的中外人脈關係所轉化成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使她得以在二十世紀初年左右逢源，游走於中國與外國政商學菁英之間，無往而不利。<sup>73</sup> 翟明磊評論二十世紀初年的中國青年會時說：「當時青年會是一個社會網絡，青年會幹事們可謂個個都是社會活動家，……余〔余日章〕長袖善舞，善與名流勢力打交道，青年會往往給名流們各種銜頭的會員名稱，把他們拉進自己的網絡……」<sup>74</sup> 他的說法雖然沒有提供相關的確鑿證據，但從上面的分析可見仍是有一定的說服力的。

附圖 4-2 上海青年會的社會網絡



73 「無論學界商界政界中人，能與之一一周旋，於交接上中下三等人，皆能從容中禮。」〈青年會幹事所當知者何事乎〉，《青年》第16卷第8冊（1913年9月），頁162。近年學者已注意到，中間人、社會網絡在黏合民國時期的上海社會所產生的重要作用。詳參 Nara Dillon and Jean C. Oi., eds., *At the Crossroads of Empires: Middlemen, Social Networks, and State-building in Republican Shanghai*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21。

74 翟明磊：〈基督教青年會：城市改革者的命運〉，張立憲主編：《讀庫0607》（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頁155。

### 第三節 進身之階

#### 一、夜校的緣起和發展

二十世紀初年，新式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各式學堂於中國各大城市如雨後春筍般萌生：

數年以來，中華風氣大改，教育之舉驟盛，各處學校，蓬起叢立，如竹林經春雨而筍抽，不僅有大中小三等，普通專脩兩項，而見義勇為者，更有半日學校，半夜學校之設，夫半夜學校設，則吾國人求學心之亟，灼然可見矣！<sup>75</sup>

中國青年會所推動的教育事業，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

當時通商大埠之青年，莫不學習英法語言文字，究心歐美禮俗，及經商善法，以求適應當前之需要。故商埠中之青年，恒分二種，一為專門求學者，一則日間治商業而於夜間求學者，青年會鑒於此兩種人需要之不同，因是特開日校與夜校以分別供應之。<sup>76</sup>

自上海開埠以還，中外貿易日趨頻繁，涉外事務亦隨之增加，對於精通外語及商貿知識的人才需求孔急。<sup>77</sup> 這些炙手可熱的人才，與只懂傳統學問的人士比較起來，自然享有更優厚的薪酬待遇：

…… 有見夫當世之鮮衣華服、乘輿策馬者，無不從洋務

75 簡修：〈論半夜學堂之益（上海華人青年會第七屆夜館開校演說）〉，《青年》第9卷第8號（1906年11月），頁18。

76 來會理：《中華基督教二十五年小史》（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20），頁18-19。

77 詳參熊月之主編：《上海通史》，第6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頁287-298。

中來，其在官場，則翻譯焉、隨員焉；即同一教習授西學者，每月至少數十金，而授中學者每月至多一二十金。<sup>78</sup>

這亦是時人對西學趨之若鶩的原因：「〔習西學者〕始能為洋行買辦，始能赴洋行寫貨，與西人交易，每歲所入或數萬、或數千數百，以視中國為商則奚啻天壤，此人之所以欲習西國之語言文字也。」<sup>79</sup> 上海青年會開辦的夜校，固然是看準了當時在職青年的需要：

嘗見幼年子弟，教育未完，亟欲謀生，遂入商界執業，及至與人貿易交往，言語未通，文字未諳，情形未悉，種種窒礙；雖有舉荐提拔之人，猶恨己無能力以應之；他如照顧無人者，無論矣。況當此學術競爭時代，苟無一藝之長，終不免處於淘汰之列，至此再欲棄商讀書，吾恐韶華不再，老大徒悲，可痛孰甚。本會有鑒於斯，特設此半夜學堂……<sup>80</sup>

另一方面，亦充分掌握他們尋求進身之階的期望：「……本會所設夜館，誠為少年人一生成敗升降之關鍵，望吾會友勿輕忽而漫視之也。」<sup>81</sup>

如第二章所指出，上海青年會在創會初期，以免費的夜校課程招徠會員，與早期的教會學校以免費入讀招徠生員，可謂同出一轍；<sup>82</sup> 只是不旋踵便由非謀利（應是虧本）轉為謀利事業。

78 〈論習西學當以工藝為急務〉，《申報》，1896年12月29日。

79 〈論習西學當以工藝為急務〉，《申報》，1896年12月29日。

80 《中國青年會半夜學堂辛亥簡章》（上海：上海基督教青年會，1911），缺頁碼。

81 〈燈晚課館〉，《上海青年會報》第1卷第1冊（1903年9月25日），頁2。

82 「西人先開華人之風氣，各處教堂設立書塾，有不收修膳者，如中國之義塾……」〈論習西學當以工藝為急務〉，《申報》，1896年12月29日。

1901年，夜校課程開設英文、法文及德文三科，為期八月之久，共有49名會員報讀。會員的學費為1元，非會員為2元。<sup>83</sup>可見，夜校課程明顯受到在職人士歡迎，即或是收取學費，亦無損他們入學的動機。1903年，夜校在原來的語言科目以外，復增設了簿記、速記及算學三項技能科目。是年入讀夜校的總人數更高達198人；撇除部分修讀一科以上的學生，總人數亦達123人。<sup>84</sup>

從附表4-3可見，上海青年會的夜校課程，由早期單純的語言課程，逐漸擴展至算學、打字（見附圖4-3）、賬目等商貿技能科

附表 4-3 上海青年會夜校課程時間表

功 課 單														
東文班	公文繙譯班	官話班	法文班	德文班	機器打字班	英文快字班	掌管賬目班	算學二班	算學初班	貿易英文班	英文四班	英文三班A	英文三班B	英文初班
拜一四	拜一	拜四六	拜一四	拜一四	拜二五	拜二五	拜二五	拜二五	拜二五	拜一二四	拜二六	拜一三四	拜一四五	拜一三五
八至九點鐘	八至九點鐘	八至九點鐘	七至八點鐘	七至八點鐘	八至九點鐘	七至八點鐘	七至八點鐘	八至九點鐘	七至八點鐘	八至九點鐘	八至九點鐘	七至八點鐘	八至九點鐘	七至八點鐘
清水安治教習	顏教習	馬教習	阿教習	加教習	愛教習	愛教習	愛教習	德教習	德教習	阿特教習	固教習	愛教習	固教習	魏教習

資料來源：〈功課單〉，《上海青年會報》第1卷第5冊（1903年10月23日），頁2。

<sup>83</sup> Annual Report of CYMCA of Shanghai, 1901, p. 1, AQR.

<sup>84</sup> Annual Report of CYMCA of Shanghai, 1903, p. 2, AQR.

目，不啻為一個商業城市訓練所需的經貿人才：「當茲商戰劇烈之時，華洋雜沓，商市如林。凡人習業非得有相當之學識，斷難佔優勝之地位，此一定不易之理也，故本會夜學於商學一科尤為注意……」<sup>85</sup> 其中又以英文科目最多，且按程度分為不同班別，可見英語最受在職人士歡迎：「查其中習英文者居多數，實業打字各班次之。」<sup>86</sup> 據 1904 年的年報指出：「這些課程不僅是青年會生

附圖 4-3 青年會夜校學生上打字班的情形



圖片出處：Annual Report Chines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Shanghai 1908(Shanghai: Chines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Shanghai, 1909), p. iv.

85 〈精益求精〉，《會務紀聞》第5期第8號（1907年4月12日），頁1。「……凡諳打字、速記、簿記等學者，不難求得相當之位置，否則宜速入本會夜學或他處學校學習，俾得高就。」〈介紹科〉，《上海青年》第13卷第13號（1914年4月17日），頁3。

86 〈夜學發達之現象〉，《會務雜誌》第6期第21號（1908年10月2日），頁2。獨尊英語的情況往後一直持續：「查夜學堂學生欲補習英文者居多數，故本會另添學齋一所，於星期五晚開課教授英文，俾好學者無向隅之憾。」〈發達之現象〉，《會務雜誌》第8期第5號（1910年3月25日），頁2。

活中具吸引力的特徵 (attractive feature)，對於從事商業的中國青年亦有益處，他們沒有其他機會在外國老師指導下學習有關的科目。」<sup>87</sup>

清末學子前赴日本留學蔚為風潮（詳見附錄一），上海青年會的夜校課程以當時日本的公立學校為藍本，並輔以日籍教習任教，可謂適切時代的需要：

技能之學最有益於職業之士，日本各種公學無不重視此等教育，以便造就商務人才，拾級而登。是以本會特師日本，俾益青年，設立算學、貿易、英文、減筆字、賬目各科，以為有志文藝者助，所聘各師不僅能知皮毛，徒托空談，必請辦公多年，具有實學。似此商務中心有如上海者，設立此等教育，將來負笈者眾，可無疑義矣。<sup>88</sup>

如第三章所述，華人幹事曹雪賡早年曾留學日本，路義思在前赴中國以前，亦曾到日本考察及研究教育制度，<sup>89</sup> 上海青年會夜校的設立，乃至於課程內容的設計，相信是他們二人共同打造的成果。

## 二、白領階層的搖籃

上海青年會所開辦的夜校，除了得到在職青年的青睞外，更獲得上海不少工商企業的認可。據西幹事的報告指出，早在 1903 年便有上海報章免費隨報附送該會的夜校章程，亦有中國

<sup>87</sup> *Annual Report of CYMCA of Shanghai*, 1904, p. 3.

<sup>88</sup> 〈文藝儲才〉，《上海青年會報》第3冊第4號（1905年3月17日），頁2。

<sup>89</sup> 路氏的研究成果，可參 Robert E. Lewis, *The Educational Conquest of The Far East*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 1903), pp. 17-91。

銀行買辦和商人提供財務支持，保送職員入讀。<sup>90</sup> 上海工商企業對上海青年會夜校予以財務支持，最重要的原因莫過於在當時專門人才供不應求的情況下，它們無需花費大額資金，自辦培訓機構，聘請教員，卻可以得到合用的人才：

再者凡工廠或商號，如欲自設學科，以教育僱員，不若送之入青年會夜校中肄習更為經濟，而得益或更多。是以本會夜間所辦之各種教育班來學者，不下數百人，大抵皆供職於外國公司或中國之實業機關。<sup>91</sup>

曾在上海青年會夜校進修的學生，不少人後來更進身各大企業的重要位置，無怪乎入讀夜校的學生人數持續攀升：

本學堂創辦至今，已十稔矣。凡今日在各團體各機關占優勝地位者，強半自本堂肄業得來，成績之優美，效果之卓著，早為各界所推許，毋須贅述。職是之故，雖各處夜校日多，而本堂來學之人，仍摩肩接踵而至，幾有人滿之患。<sup>92</sup>

晚至 1926 年，上海青年會日校校友、後來出任新生活運動總幹事的黃仁霖在美國肄業後，返滬出任上海青年會幹事。他獲得董事

---

<sup>90</sup> Annual Report of Charles W. Harvey, 1903, pp. 50-51, AQRBV.

<sup>91</sup> 〈上海青年會財政問答〉，《同工》第51號（1926年4月），頁20。「至就學諸生，大概為商界有志之士，晚間公畢乘暇考習，是以大得商界所贊許，遣派學徒到堂肄業者，實繁其數。」〈民國四年即西歷一九一四年本會全年報告〉，《上海青年》第14卷第10號（1915年3月12日），頁3。

<sup>92</sup> 〈弁言〉，《商業半夜學堂章程》（上海：上海青年會商業半夜學堂，1915），頁1。文學家巴金早年亦因為希望獲得高薪厚職而入讀成都青年會英文補習學校：「這年〔1918年〕秋天，我進了青年會的英文補習學校，這是得了祖父的許可的。因為祖父聽見人說學了英文可以考進郵局做事，而郵局裏的位置在軍閥割據的局勢下的成都市面上算是比較優越的，薪水是現金，而且逐年增加，位置又穩固，不會因改變而動搖。」巴金：《巴金自傳》（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頁64-65。



會的支持，計畫將上海青年會夜校改組為職業學校，惟遭到很多人的反對。他回憶說：

我記得當時有許多人反對這樣的一個學校，這是對於時代潮流的嚴重反抗。人們批評我說，我是把那些學生降級了。要他們去做工人，而不是使他們將來去做白領階級。<sup>93</sup>

可見上海青年會夜校一直被視為通往白領階層的成功之門，入讀夜校的在職人士均抱持在商界更上一層樓的冀望。<sup>94</sup>

上海青年會對於入讀夜校學生的功利性動機，當然是再清楚不過，甚至充分把握會員學習英語的動機，設立英語查經會，進一步創造傳播福音的機會：「擬於本會為晚課生徒設立淺易英文釋經會，既有益於性靈，復加助於英語，凡有晚課生徒尚其來焉。」<sup>95</sup> 同時亦以一倍之差的學費，作為招徠他們加入青年會的手段：

本會學費非會友與會友相較幾及一倍，會友既得減費之利益，又獲閱報、交誼、洗澡、體育等種種權利，故凡有志求學者，能入為本會會友，則其獲益尤多，幸各鑒之。<sup>96</sup>

93 黃仁霖著，張玉孫譯：《黃仁霖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頁30。

94 參張志偉：〈圖像藝術與中國基督教史研究——《上海青年》（1914-1927）中的漫畫應用〉，吳梓明、吳小新合編：《基督與中國社會：第二屆國際年青學者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2006），頁345-348。

95 〈大益生徒〉，《上海青年會報》第1卷第11冊（1903年12月4日），頁2。「本會夜學添設英文聖經班，每逢星期三晚七時至八時共集於小講堂內，先用英語解釋，然後傳譯華語，並用華英文聖經為課本，以便學者易於詳解。」〈夜學聖經班〉，《上海青年》第9期第27號（1911年10月12日），頁3。

96 《中國青年會半夜學堂辛亥簡章》，缺頁碼。「凡會友學生須於啟館時預付脩金三元，會外學生須於啟館時預付脩金六元。」〈夜館先聲〉，《上海青年會報》第2冊第1號（1904年2月26日），頁2。

會員不僅獲得學費減半的優惠，更可享受上海青年會內各種利益，可以想像的是，不少學生均為減省學費而入會：「……且會友人數亦因之〔入讀日夜校〕增加不少（蓋為會友者可得減學費之利益）。」<sup>97</sup> 1903年的年報便指出，該年最後一季會員大幅增加，主要得力於夜校的影響。<sup>98</sup> 1904年的一則報導亦說：「來會之友除進夜班外，多願為會友。」<sup>99</sup> 據學生席煥承自言：

生〔席煥承〕於十年前乃紗業商號中之學生耳，且名為學生，每日所謂者，每日所為者，不外號中諸般瑣屑事，務無所學也。如是者三年，雖明知耗費寶貴光陰，但在此期中無進款，求學之心雖切，無能為力也，三載後能得三數微俸矣，私心自我曰：此其餘之束修乎？因思申江乃一中外通商大埠，洋行林立，欲與之交易，非先習其語言文字不可，而英文為萬國所公用，由是擬研究英文。但滬上夜校甚多，求一完善者實鮮，知貴會夜校為基督徒主持，定屬完善，即挽友人前來報名，並為會友。<sup>100</sup>

事實上，這樣的情況可說是上海青年會會員生態的一個縮影：

近查會友冊，會友之數陡然增加，其故自暑假後，來夜學肄業者咸願為會友，享同等利益，且有並非夜學生報名入會者，亦日見其多，以是可見本會發達之一班矣。<sup>101</sup>

#### 附表 4-4 根據上海青年會歷年年報的入讀夜校學生人次統計

97 〔曹雪賡〕：《上海基督教青年會歷史概論》，頁175。

98 *Annual Report of CYMCA of Shanghai, 1903, p. 2.*

99 〈開校紀盛〉，《會務紀聞》第2冊第19號（1904年9月30日），頁1。

100 席煥承：〈青年會商業學堂（來函）〉，《上海青年》第15卷第5號（1916年1月16日），頁3-4。另*Annual Report of W. W. Lockwood, September 1914, 3-4, AQRBV.*

101 〈會友陡增〉，《會務雜誌》第8期第23號（1910年9月12日），頁1。

資料整理而成，部分數字雖然付諸闕如，不同學期的學生人數亦必有所重疊，致使我們無法充分掌握實際入讀的學生人數。然而，即或據最保守的估計，在 1910 年代以後的一段時期，每年最少也有近 500 名學生入讀上海青年會夜校，影響力不可謂不大。可以推斷，以在職青年為主的夜校學生，一直是上海青年會會員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附表 4-4 上海青年會夜校學生人數（1901-1921）

年份	春季(人次)	秋季(人次)	夏季(人次)	總人次
1901	94		94	
1902				
1903	198		198	
1904	159	90		249
1905	165	168		333
1906	92	144		236
1907	116	127		243
1908				
1909	203	190		393
1910				
1911				
1912				
1913	545	501		1,046
1914	644	605		1,249
1915	672	560		1,232
1916	610	514		
1917	510	421	331	1,262
1918				
1919			1,008	
1920			997	
1921			1,276	

資料來源：Annual Report of CYMCA of Shanghai, 1901, 1903-1909, 1913-1921.

## 第四節 望子成龍

### 一、日校的緣起和發展

除了夜校學生外，上海青年會會員的另一個重要來源是日校學生。據路義思指出，曹雪賡以中西書院教師的過來人身分，最先建議為會員的兒子設立一所高級中學（high school），因為當時上海只有一所供外國人入讀的高級中學，而供華人子女入讀的卻付諸闕如。<sup>102</sup> 但是當這項建議被提到董事會上討論時，卻遇到阻力：「是時會中諸人請求開辦日館，而董事部甚不贊成，因任重力薄，恐難達到美滿目的。」<sup>103</sup> 上海青年會創辦初期，人力物力有限，採取較務實、審慎的發展步伐，當然是不無道理。不過，如第二章所述，與本地教會學校存在競爭，可能亦是重要的考慮之一。<sup>104</sup> 此外，據路義思後來憶述，紐約青年會總幹事麥克班尼曾在相當困難的情況下，堅持為街童開辦日校；但令他感到驚訝的是，上海青年會所辦日校竟然受到上海具影響力的社會人士的信任和支持。<sup>105</sup> 可以推想，北美青年會的負面辦學經驗亦可能是令上海青年會裹足不前的原因之一。然而，會員持續呼籲要求開辦日校，上海青年會在巨大的壓力下，最終亦不得不戰戰兢兢地開辦日校：「……然義不容辭，特云：『若報名有三十五人者，即設法開辦。』至截止之日共計五十人，本會之日館自此而始。」<sup>106</sup>

<sup>102</sup> Robert E. Lewis, *Search of Far Horizons*, pp. 19, 58.

<sup>103</sup> [曹雪賡]：《上海基督教青年會歷史概論》，頁175。

<sup>104</sup> 「各青年會興辦各會，慎勿與教會所辦雷同一致。」《青年會第一次幹事會報告》（上海：基督教青年會，1912），頁28。

<sup>105</sup> Robert E. Lewis, *Search of Far Horizons*, p. 77.

<sup>106</sup> [曹雪賡]：《上海基督教青年會歷史概論》，頁175。

1903年2月，上海青年會正式開辦日校，最初僅為半日制，教員由幹事兼任：「創辦伊始，教職員多由幹事兼任，既可減少支出，且可利用學校以鼓吹本會之事工，以引起社會之同情；當斯時也，因陋就簡，諸凡撙節，是為草創時期。」<sup>107</sup>可見日校的開辦同樣有招徠會員的用意。日校的課程規劃參照了當時名聞遐邇的聖約翰書院的高中課程，以預備學生日後升讀該校的大學部：「其課程均仿〔仿〕聖約翰大學校備館之程度，蓋以畢業後可逕往該校肄業也。」<sup>108</sup>可以推斷，創辦日校的建議很可能是來自會員中的聖約翰畢業生，<sup>109</sup>他們大概是懷著望子成龍的心態，期望兒子亦能入讀他們的母校，踏上未來的成功之路。<sup>110</sup>曹雪賡作為聖約翰書院同學會的會員，很可能便成為一眾校友反映意見的渠道。當然，上海青年會董事部中畢業於聖約翰書院的成員（見附錄七）在其中也可能扮演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據賀嘉立指出，日校在開辦的首學期已頗受歡迎，最終超額收生達81人，並已達到當時會所可容納的人數上限；所得學費收入更挹注了上海青年會全年的三分之一支出，且令上海青年會的工作開始受到不少具影響力的社會人士注意。<sup>111</sup>事實上，上海青

107 〈三十五年來本會日夜校概況〉，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編：《力的創造：上海青年會三十五週年紀念冊》（上海：上海基督教青年會，1935），頁69。

108 〔曹雪賡〕：《上海基督教青年會歷史概論》，頁175。

109 「而本會大半該〔聖約翰〕書院之同門會〔同學會〕中人。」〈監院贈言〉，《上海青年會報》第2冊第15號（1904年6月3日），頁1。

110 林語堂父親的舉措很能說明當時家長的心態。據林語堂憶述：「我聽到父親自己告訴一個朋友，當他賣去我們在漳州唯一的房子來讓二哥可以在入〔聖約翰〕大學的契約上簽字的時候，眼淚止不住滴在紙上。這就是一個牧師能力的極限。」林語堂著，謝綺霞譯：《從異教徒到基督徒》，收入梅中泉編：《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0卷（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頁50。

111 Annual Report of Charles W. Harvey, 1903, p. 50, AQRBV. 「本會向設中英日館，近來大有進步，是以聲名四播，近日來報名者甚眾，行見春風滿座，桃李盈門，後來者恐無位置矣。」〈報名者眾〉，《上海青年會報》第2卷第1號（1904年2月26日），頁2。

年會日校所收取的學費，相當高昂。以 1905 年為例，學生每學期的學費為 30 元，連午餐 40 元，再加上住宿 74 元。<sup>112</sup> 入讀學生既要推薦人，又要預付學費，但仍非常受歡迎：「去歲額滿見遺約有五十名之多。」<sup>113</sup> 1908 年赴滬實習的梁小初在回憶錄裡亦說：「該校當時頗有聲譽。」<sup>114</sup>

## 二、備受歡迎的原因

究竟，上海青年會日校何以如此受歡迎？首先，上海青年會備受學子及其家長青睞，師資優良、課程完善，以及培訓出優異的學生，相信是首要的原因：

本月三日為梵王渡聖約翰書院招考學生之期，本會與考之學生計八人，中選者五人。按聖約翰書院此次招考，與考者共一百八十一人，中選者僅五十一人，而本會之學生約居十份之一，於此可見，本會所設之中英學館，其章程之妥善，其功課之嚴密，不言而諭矣！此非本會故誇其詞，因有實事足證也。<sup>115</sup>

可見上海青年會日校不僅訓練出成績優異的學生，亦達到使畢業生入讀聖約翰書院預備學校的預設目標：「本會日館開辦以來，極為發達，歷經改良，進步尤速。時至今日，足可確認為一預備書院。」<sup>116</sup> 作為入讀聖約翰書院的踏腳石，上海青年會日校自然

112 *Annual Report of CYMCA of Shanghai, 1905, p.6.* 有關上海學校的學費研究，可參施扣柱：〈民國初期教育收費研究——以上海為例〉，《史林》第6期（2003），頁76-79。

113 〈報名須知〉，《會務紀聞》第3冊第19號（1905年6月30日），頁2。

114 梁小初：《未完成的自傳：七七回憶錄》，頁42。

115 〈學生中選〉，《上海青年會報》第1卷第19冊（1904年1月29日），頁2。

116 〈日館聘師〉，《會務紀聞》第2冊第19號（1904年9月30日），頁2。

受到家長的歡迎。

史家蕭公權在 1914 年入讀上海青年會日校，翌年投考插班五年級。他憶述：「徼幸得很，我居然被取錄了。更幸運的是，教我們五年級和後來六年級的有幾位飽學而兼善教的先生。」<sup>117</sup> 1918 年，蕭公權考入北京清華學校的高等科三年級，他在回憶錄裡提及多位老師的功勞：

其實我能被錄取應當感謝我中學的幾位先生，尤其是葉楚傖、程萬里、何挺然和馬瑞琪四位。他們所教課程的內容好像是為我所投考清華的預備。……事後我曾這樣想，假如那年青年會中學畢業生有兩個人去報考清華，我大約就不在被錄取的八名之內了。<sup>118</sup>

蕭氏的話當然有自謙之意，但亦側面說明了青年會日校在師資及課程方面，的確有不俗的表現。

師資和課程素質當然是重要的考慮，上海青年會日校／青年會與美國人的密切關係，相信亦是令家長心儀的重要原因。黃仁霖於 1914 年由上海育才公學轉入上海青年會日校，他在回憶錄裡比較兩校說：

……我對這一個學校〔上海青年會日校〕，確是更為喜歡。以所有學業課程的程度而言，二者可說不相上下，但是日校還有課外活動來鼓勵學生，使得學生更為活潑，而且思想開放，課餘之時，有童子軍、遊樂活動、體育、運動，並且有時還有演講會和放映電影等可以享受。<sup>119</sup>

117 蕭公權：《問學諫往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2），頁24。

118 蕭公權：《問學諫往錄》，頁31-32。

119 黃仁霖著，張玉蓀譯：《黃仁霖回憶錄》，頁9。

日校作為上海青年會的附屬部門，上海青年會多采多姿的文娛活動（下詳）自然引入該校，為上海其他學校所無法比擬；不過，在二十世紀初年，真箇認識和接受青年會「三育」理念的人仍在少數（詳見附錄一），新穎而多元化的學校生活，不但未必成為該校的吸引力，更有可能是阻力。<sup>120</sup>

黃仁霖談及入讀青年會日校更確實的因由時說：

在育才念了二年書之後，我的第三位譚家的舅父，他正在上海聖約翰大學念書，他對我母親說，如果能把我的送到一個有美國人關係的學校去讀書，那會對我更好。<sup>121</sup>

可見上海青年會日校與美國人之間的密切關係才是這位譚家舅父的關懷所在。黃仁霖對於有關的詳情雖然沒有仔細明言，但我們大概可以推想，入讀該校對他未來的前程，總會或多或少帶來一定的潛在好處，例如有助入讀聖約翰大學、赴美留學、任職美國商行……等。說不定，譚家舅父的意見更可能是他的夫子自道呢！事實上，在芸芸上海青年會會員中，亦有不少是聖約翰大學的畢業生，可以猜想的是，譚家舅父的意見大概並不見得怎樣獨出機杼，只不過是時人眾所周知，但卻不便明言的「潛規則」吧。可以說，青年會與美國人的密切關係，以及隨之衍生的種種潛在利益，既是政商名流加入青年會的重要原因，亦是不少家長為兒子選讀該校時的一個重要考慮。

如同當時上海其他教授英語的學校一般，上海青年會日校的學費高昂，一般平民百姓當然無緣入讀。影響所及，上海青年會

<sup>120</sup> Annual Report of M. J. Exner, September 1909, p. 1, AQRBV.

<sup>121</sup> 黃仁霖著·張玉孫譯：《黃仁霖回憶錄》，頁9。



日校逐漸發展成為一所名牌的貴族學校。早在 1904 年一則談及學生背景的報導說：「多半屬會友及商賈子弟」。<sup>122</sup> 如雅德在同年亦指出：「他們〔學生〕大部分是上海青年會富裕會員及朋友的兒子」。<sup>123</sup> 據 1914 年的調查顯示，在日校 1,134 名學生中，475 名來自士紳、商人及官員的家庭。<sup>124</sup> 上海青年會日校這種貴族化的傾向一直維持下去，1910 年代的年報中仍不乏「來學者半係紳商界子弟」、<sup>125</sup> 「學生大多數為本埠富戶」<sup>126</sup> 的報導。據克樂愷憶述，當時的學生來自富裕之家，乘坐私人的人力車、馬車和汽車上學。<sup>127</sup> 我們有理由懷疑，上海青年會另一個備受家長／學子歡迎的原因是，她業已成為上海一所知名的貴族菁英中學，憑藉其優良師資、課程，以及人脈關係，幾近成為畢業後獲得理想出路的必然保證。

此外，對於一般的莘莘學子來說，入讀教會開辦的學校，當然主要是為了學好英語，希望日後謀得高薪厚職。如《申報》早期的一篇文章說：「況華人之欲學西學，大半為謀食計為身家計矣，且僅為目前之謀食計身家計矣，未必皆有大志也。人若皆為謀食計身家計，而欲從事於西學，則其所學亦淺陋可知。」<sup>128</sup> 作為過來人的蕭公權亦說道：「進教會學堂的學生多半意在學好

122 〈回報好音〉，《上海青年會報》第1卷第17冊（1904年1月15日），頁1。

123 Arthur Rugh, "Bible Study Possibilities", 4 May 1904, *COR*.

124 Annual Report of W. W. Lockwood, September 1914, pp. 7-8, *AQRBV*.

125 〈民國四年即西歷一九一四年本會全年報告〉，《上海青年》第14卷第10號（1915年3月12日），頁2。

126 《上海基督教中國青年會乙卯年（1915）報告》（上海：上海基督教青年會，1916），頁3。

127 J. C. Clark, Transcription of an Interview by Lillian Schroeder Van Loan, recorded in May 1956, p. 8, *BIO*.

128 〈論習西學當以工藝為急務〉，《申報》，1896年12月29日。

了英文以後，在『十里洋場』裡面謀生活。」<sup>129</sup> 晚至二十年代，該校學生汪震華仍說：

…… 然今之學子，對於英文，則無不悉心攻讀，盡力研究；而於中文似有不屑學而不加以研究，致英文之程度日高，而中文之進步日遲……此輩人才，在社會中屢見而不鮮矣，至其偏重之故，不外乎欲於社會上得美滿之生活耳。<sup>130</sup>

上海青年會會員入讀日校可享學費減半的優惠，但對於來自富裕家庭的學生來說，這並不一定構成他們必須入會的理由。然自 1915 年 3 月起，上海青年會規定，日、夜校的學生必須成為會員。<sup>131</sup> 從附表 4-5 可見，在 1910 年代開始，因為入讀日校而加入上海青年會的會員也有逾 500 人，成為上海青年會會員的另一個重要來源。

特別值得一提的，據路義思憶述：「位處高位的年長人士認為，加入青年會將會對他們的兒子帶來好處。」<sup>132</sup> 也就是說，學子為求入讀上海青年會夜校，固然要成為會員，然而他們的父親（部分很可能便是上述提及的紳商名流）為了兒子的潛在好處著想，也得一體均霑，一同加入青年會。我們可以進一步看見，一張潛在利益的關係網若隱若現地浮現在上海青年會的不同角落。

129 蕭公權：《問學諫往錄》，頁26。

130 汪震華：〈予對於習英文之意見〉，孫祖勤編：《學屑》（上海：上海青年會中學，1926），頁5。《學屑》為該年度上海青年會中學中三畢業生出版的一部紀念冊。

131 Annual Report of J. C. Clark, September 1915, p. 12, AQRBV.

132 Robert E. Lewis, *Search of Far Horizons*, p. 107.

附表 4-5 上海青年會中學學生人數 (1903-1921)

年份	春季學生	秋季學生 (修訂)
1903	81	64 (65)
1904	84	85
1905	91	108
1906	92	144
1907		170
1908		
1909	219	
1910		
1911		
1912		
1913	382	402
1914	487	461
1915	507	503
1916	523	518
1917	480	480
1918		
1919	414	
1920	460	
1921	682	

資料來源：*Annual Report of CYMCA of Shanghai*, 1901, 1903-1907, 1909, 1913-1921；〈民國六年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報〉，《上海青年》第17卷第11號（1918年4月1日），頁6。

說明：1919年至1921年年報只提供全年學生人數，沒有細分為春季、秋季。

## 第五節 休閒娛樂

### 一、華人／基督教俱樂部

時人描述上海西僑總會（俱樂部）的生活說：

西人於朋友聚集之處，謂之總會。滬上法總會在法大馬路，英則在四馬路東首。每值安息之期，怒馬高車，如雲而至，簪裾冠蓋，座上常盈。或打彈子以休閒，或拉風琴而奏曲。或杯邀紅友，別尋酒國之春；或几倚青奴，共索花間之句，以至圍棋蹴鞠，跳躍高歌，任意嬉娛，毫不拘檢。惟華人之寓滬上者，雖意興飛揚，終不能問津而至云。<sup>133</sup>

有趣的是，我們從有關上海青年會的報導中亦發現不少雷同之處：

本會現得極佳之菰菰茶爐〔cocoa urn〕，擬由下禮拜一起，每日下午及晚間，特烹菰菰熱茶，佐以西點，以便諸君消遣之助，取價極廉，可至賬房購票，倘試得法，將來尚當添備各式精點，此蓋為其先聲也。<sup>134</sup>

本會近又購得上等烏木大彈子檯一座、全套彈子及一切器具，是檯頗極華麗，現已安置於會所二層樓之東北隅休閒室內，供我會友公餘消遣，藉舒筋骨。<sup>135</sup>

本會飯廳南首臨街樓備有全副絲絃器具、中西棋子及東西

133 黃協瑛編：《淞南夢影錄》，卷四（上海：進步書局，1883），頁1a。

134 〈風氏七碗〉，《上海青年會報》第2冊第10號（1904年4月29日），頁2。

135 〈添設彈子檯〉，《會務紀聞》第5期第19號（1907年10月27日），頁1。

一切文明遊戲玩具，備我會友公餘把玩消遣閒情。<sup>136</sup>

青年會雖然是自西徂東的舶來品，但單就會員的休閒娛樂生活而言，她在進入中國以後，似乎並沒有刻意脫去她的西方外衣（所謂的「本土化」），基本上還保持著相當濃厚的西方文化色彩，甚至頗有外僑俱樂部的影子。究其原因，相信與時人對西方的休閒娛樂趨之若鶩有關。

自十九世紀中葉以還，不同形式的西方休閒娛樂（如電影院、彈子房、健身房、西餐廳等）已傳入上海，除了對中國人的休閒娛樂方式產生了重要影響外，亦催生了求享樂、重消遣的風氣。<sup>137</sup>如《上海青年》的一則報導說：「本會休閒處自設立彈子枱以來，每逢禮拜六午後二時起，來會擊彈者頗極擁擠，大有三〔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勢，比之昔日氣象迥殊矣。」<sup>138</sup>西化的會員休閒娛樂生活，可說是上海青年會與傳統娛樂事業比拼的有利條件。上海青年會基本上一直以一個基督教俱樂部作為定位：

本會之設俱樂部，乃欲使我會友共樂其樂也。自入新屋以來，漸覺佈置妥貼，爰增設一切利益，以供我青年會友。吾恐滬上各種俱樂部，決不能如本會之完全也，假如交通友誼、研究學問、娛情遣興、衛生養性、攷求道德，凡此種種，吾敢必他俱樂部之必無也！<sup>139</sup>

上海青年會的理念是否為會員所知，當然值得我們再作討

136 〈消遣閒情〉，《會務雜誌》第5期第22號（1907年11月15日），頁1。

137 李長莉：《晚清上海社會的變遷：生活與倫理的近代化》，頁244-248。另參樓嘉軍：《上海城市娛樂研究（1930-1939）》（上海：文匯出版社，2008），頁1-51。

138 〈氣象迥殊〉，《上海青年會報》第5期第22號（1907年11月15日），頁1。

139 〈青年俱樂部〉，《會務紀聞》第5期第19號（1907年10月25日），頁1。

論；但是俱樂部式的休閒生活卻頗為會員所歡迎。上海青年會在1907年遷入四川路會所不久，已有會員提議定期舉行晚宴作為聯誼活動：「現有多數會友公同議定，每逢禮拜三晚集宴一次，以聯交誼。」<sup>140</sup> 此舉乃仿效自當時上海的外僑俱樂部：

月前本會組成一教友俱樂部，計有四十餘人，定於每月上絃〔上弦，陰曆初八前後〕聚集一次。上星期六又集廣東會友二十餘人，合成一會，於是晚共酌於大餐室，藉聯鄉誼。按本會組織俱樂部之本意，專以聯絡交情為目的。<sup>141</sup>

此外，上海青年會亦在軟體配套方面不斷作出改善：「本會自力求進步以來，設各種方法希冀會友得以陶情消遣，故現下於彈子房中安置天然發聲琴一架……」<sup>142</sup> 致力打造一個堪與外僑總會媲美的俱樂部：

本會自入夏以來，於閱報室招待所均安置電氣風扇，並自製各種熱水、啣嚙水、水結玲等，食之涼沁心脾，神氣為之一清，莫不視為避暑樂地，故每日來會休憩者，踵趾相接，大有三〔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勢，以往年較之相去奚啻霄壤。<sup>143</sup>

140 〈易牙復見〉，《會務雜誌》第6期第4號（1908年3月13日），頁1。

141 〈廣東俱樂部合成〉，《會務雜誌》第6期第27號（1908年11月13日），頁1。「本會會友已達一千之數，恐彼此未能聯絡一氣，爰組織俱樂部聚餐之法，月聚一次使全體會友彼此可以相識而敦交誼。」〈彼此成相識〉，《會務雜誌》第7期第5號（1909年2月26日），頁1。

142 〈俱樂部之新現象〉，《會務雜誌》第7期第27號（1909年9月2日），頁2。「本會彈子房置有天然發聲琴為會友消閒之助……自然發聲，音韻悠揚，隨心所欲，誠為消閒之無上上品。」〈絕妙消遣法〉，《會務雜誌》第7期第28號（1909年9月7日），頁2。

143 〈日增月盛〉，《會務雜誌》第6期第18號（1908年9月11日），頁1。

附圖 4-4 四川路會所大堂



圖片來源：PHO

附圖 4-5 四川路會所閱覽室



圖片來源：PHO

附圖 4-6 會員打撞球的情形



圖片來源：《上海中國基督教青年會報告（1908）》（上海：上海基督教青年會，1909），缺頁碼。

如前文所述，這種西化的生活方式不僅照顧到留學生的需要，對於上海的華人菁英來說，組織一個屬於華人的俱樂部，亦似乎與當時的民族主義情緒相配合：「嘗思西人寓滬者，不過一萬五千人，倘需亟亟覓一體操場以強其體質，矧吾華人之居滬者五十萬有奇，豈可無一體操場乎？本會有鑑於斯，不得不獨樹一幟，為後來者之先鋒。」<sup>144</sup> 路義思早在 1902 年便指出：「西僑青年會是上海工作的寒暑表，外國人辦得好的，中國人亦會很希望能做到。」<sup>145</sup> 朱仲華等指復旦大學校長李登輝嘗言：

現在基督教青年會規模雖大，但非中國人自辦。我們應立即

144 〈運動外場〉，《會務雜誌》第7期第13號（1909年4月23日），頁2。

145 Annual Robert E. Lewis, September 1902, p. 1, AQRBV.



迎頭趕上世界新潮流，自己站起來創辦一個既像個學會，又像個福利團體的組織，研究科學技術，與國際互通聲氣，吸收國際間先進文化，力求走改革自新之道。並須提倡高尚有益的娛樂，鍛鍊身體，以圖改造社會，貢獻祖國。

外國人辦得好的事業，我們中國人也可以辦，不一定要由外國人來辦。但我們要吸收外國人的長處，發揮中國人的智慧。<sup>146</sup>

華人菁英積極支持青年會的工作，相信民族主義在其中亦發揮了一定的黏合作用。

## 二、菁英式的娛樂生活

從上述的報導可見，俱樂部式的聚餐會參與人數不多，明顯是屬於小眾玩意，以致引來部分未能躬逢其盛的人不滿：「或問：何不組織一大俱樂部，俾大眾會友得以一律入會，豈不更妙？本會亦有此意，奈因大餐室窄狹之故。」<sup>147</sup> 地方不足或許是原因之一，參加者須繳費入場，以及維持參與者的素質（社會經濟地位）可能來得更為重要：「龔伯瑛君創議組織會友俱樂部，亦為聯絡交情起見，每月聚餐一次，每次付會費半元，所備西餐無不精益求精。」<sup>148</sup>

事實上，上海青年會這種西式的休閒娛樂生活，具有頗濃厚的菁英主義色彩：

146 朱仲華、陳于德：〈復旦校長李登輝〉，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華文史資料文庫》，第17卷（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頁494。

147 〈廣東俱樂部合成〉，《會務雜誌》第6期第27號（1908年11月13日），頁1。另參〈彼此成相識〉，《會務雜誌》第7期第5號（1909年2月26日），頁1。

148 〈再開會友俱樂部〉，《會務雜誌》第6期第27號（1908年11月13日），頁2。

本會所假北四川路運動場，日來僱工修理拍球之地成二方形，拍球費經董事議定決每季三元，已載上期雜誌。此費不過略資津貼，除各人所用之拍球具外，其餘應需各項，概歸本會置備。蓋皮球每打需洋八元，再加以修整工程，與夫球網等物，所費不下百餘金。由斯思之，每人取費三元，可謂廉之至矣。<sup>149</sup>

上海青年會的普通會員每年會費6元，特別會員則每年12元，並須以預繳形式支付，如參加其他的額外活動（如拍球、聚餐），還需另外收費。據學者的調查顯示，從1880年至1924年間，上海一般工人每日工資大致為0.2至0.3元，直到1926年才升至0.4元。1920年前後，工廠工人的每月工資約為9元。<sup>150</sup> 陳存仁回憶說：

我六歲〔1914年〕前，絕少有機會可看到一塊銀元，新年中到九姑母處拜年……給我一塊錢作為「拜年錢」，我拿著銀元回來，覺得飄飄然已成為有錢人了。……我明知這一塊錢可以兌換到一百多枚銅元使用……有時還拿出來炫耀於人，自鳴得意。<sup>151</sup>

清末以迄二十年代初，上海一般低下階層的每月工資當在10元

---

149 〈取不傷廉〉，《會務雜誌》第6期第15號（1908年5月29日），頁1。「西人每於公餘後輒從事拍球運動筋骨，洵為健身妙法。」〈體育家注意〉，《會務雜誌》第6期第17號（1908年6月12日），摺頁。

150 《上海工運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工運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頁147。

151 陳存仁：《銀元時代生活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頁5。他又說：「他〔綢緞鋪中的學徒〕見了我的一塊錢，也拿去放在手中把玩不已，他講出綢緞鋪中薪金最高的掌柜先生，每月的薪金不過八元；普通的職員，不過六元、四元，剛滿師的學徒每月只有一元。你拜一個年，就拿到一塊錢，真令人艷羨，你要好好保存起來。」（頁6）

以下，扣除起居飲食等燈火之資，1元對於他們來說肯定不是九牛一毛，要是省吃儉用，甚至足供一家一月的伙食之用。<sup>152</sup> 隨著上海的物價持續上升，在低下階層工資大體不變的情況下，1元的購買力實際愈益減少。<sup>153</sup> 可見，上海青年會從創辦伊始，基本上一直與社會低下階層絕緣。在二十年代，對於「青年會是貴族的，不是平民的」的批評，幹事吳樂雲說：

從表面看起來像是很有理由，因為入會的須要會費，所以在上海城內，只有四千人納得起會費的資格，那些勞動界和貧窮的，便不能得著青年會的利益……<sup>154</sup>

上海青年會亦不得不承認說：「本會雖非貴族的，而與平民謀利益之機會少，為商學界求幸福之時多，此誠引為缺點。」<sup>155</sup>

上海青年會的菁英色彩除了體現在高昂的娛樂消費外，透過上海青年會的關係，<sup>156</sup> 會員甚至可以參與很多與當時華人社會絕緣的西人活動：

禮拜六即八月二十日〔1903年10月10日〕，外國青年會

152 陳存仁說：「這三年中，我家的伙食，老是粗米淡飯，米價每擔三元六角，每天佐膳食品限定四個銅元，以一個銅元煮青菜一大盤，一個銅元購豆腐豆芽之類，二個銅元購『東洋魚』……這般的膳食，常年不變，五天吃一次蛋，每月難得吃到一次『炒肉絲』，即使有肉，肉絲也不過是寥寥可數的十幾條。」陳存仁：《銀元時代生活史》，頁13。

153 有關二十世紀初年上海的物價指數和購買力情況，可參楊蔚：《物價論》（長沙：商務印書館，1940），頁130。

154 吳樂雲：〈今後青年會的趨向〉，《上海青年》第20卷第9號（1921年4月1日），頁8-9。

155 〈為勞働者謀幸福〉，《上海青年》第20卷第11號（1921年4月15日），頁4。

156 1911年6月21日，上海工部局董事會會議紀錄云：「中國基督教青年會請發給50份參觀公共體育場特別通行證的要求，由泰勒牧師作了口頭轉達，此一要求已得到公共體育場委員會的同意，現由董事會作為特殊情況予以批准……」〈公共體育場〉，上海市檔案館編：《工部局董事會會議錄》，第1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550。

在跑馬廳舉行體操大賽會，已蒙工部局允准本會會友入內觀看，有願前往者請即至本會帳房領取執照，每張取洋二角。<sup>157</sup>

一則有關當天體育比賽的報導說：「本會會友赴是會者亦七、八十人，西人青年會體操委辦將為華人青年會友備有布棚一架、茶點數席，吾等會眾感篆莫名。」<sup>158</sup> 可以想像的是，會員獲接待參與西人主辦的盛會，在當時是既光榮亦是令人羨慕的身分象徵。<sup>159</sup> 崇尚奢靡、追新慕異既是晚清以來上海人的娛樂生活特點，上海青年會菁英式的娛樂生活與時代風潮恰好配合。周錫三嘗言：「長立時，急於謀生，恒視耶教為富人之一種消遣品。」又說：「……後得鍾萼云君介紹入青年會作會員，初視之為消遣之所，繼漸與有道者相近，始稍知耶教真理。」<sup>160</sup> 部分具經濟能力的會員大概便是因此加入上海青年會：「近來外間來入體操諸君，多願兼為會友。」<sup>161</sup>

### 三、大眾化的娛樂消遣

在菁英式的娛樂生活以外，1910年代前後，上海青年會也進一步開拓大眾化、綜合性的娛樂生活：

157 〈請閱體操大會〉，《上海青年會報》第1卷第3冊（1903年10月9日），頁2。另參〈賽操先聲〉，《會務紀聞》第2冊第22號（1904年10月21日），頁1；〈參觀西比利亞商船記〉、〈定期參觀兵艦〉，《上海青年》第9期第16號（1911年6月1日），頁2；〈加冕日出遊〉，《上海青年》第9期第18號（1911年6月15日），頁4；〈參觀美兵艦〉，《上海青年》第18卷第38號（1919年11月21日），頁4。

158 〈體操〉，《上海青年會報》第1卷第4冊（1903年10月16日），頁1。

159 Bryna Goodman, "Improvisations on a Semicolonial Theme, or, How to Read a Celebration of Transnational Urban Communit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9, no. 4 (November 2000), p. 906.

160 周錫三：〈余之信教過渡〉，《上海青年》第13卷第40號（1914年12月25日），頁6-7。

161 〈體育雜誌〉，《會務紀聞》第3冊第14號（1905年5月26日），頁2。

本會向例於一星期中，必舉行文學交誼會一次，現須加意整頓，經諸董事員疊次會議，磋商已久，始得就序。准自本月起自孟夏止，每逢星期三晚間舉行一次，或請名人演說各種要理，以增人學問，或開辯論會，以交換知識，或演活動影片，使人悅目賞心，或備文明遊戲，俱以供人清玩。以上種種，無非為聯絡會友，藉廣交通要素，故自下星期三起，決無間斷，尚望全體會員特別注意焉。<sup>162</sup>

同樂會（又稱交誼會）早期只供會員參加，或許是不希望越俎代庖，與女青年會構成競爭，只偶爾對會員家屬作有限度的開放：

再本會嗣後每禮拜三之舉動，係專為本會會友聯絡起見，故一切利益應為會友享受，且本會為男界之青年會，婦孺幸勿帶進間。間常或有音樂大會及其他之演劇，婦孺可以入座者，臨時有特別之廣告，想諸君必共同情也。<sup>163</sup>

但似乎是由於同樂會備受歡迎，不久便全面向會員家屬開放：

本會自發起同樂會以來，頗受會員歡迎，……另雇由外洋回申之京都大幻術家田永奎，試演文武幻術，佐以中西音樂，以便會員子弟、親屬同臨賞鑒，入座券只取津貼費一角，欲新耳目者，及早來購，恐無座位也。<sup>164</sup>

在舉行時間方面甚至設法滿足他們的需要：「按每次同樂會均在晚間，刻因天氣漸寒，恐婦女及小孩等不便，故特改早在下午四時舉行。」<sup>165</sup>

162 〈籍聯交誼〉，《會務雜誌》第7期第3號（1909年2月12日），頁2。

163 〈活動影戲〉，《會務雜誌》第7期第4號（1909年2月19日），頁1。

164 〈與眾同樂〉，《會務雜誌》第8期第7號（1910年4月8日），頁2。

165 〈同樂會〉，《上海青年》第10期第30號（1912年11月15日），頁6。

這種大眾化的家庭式娛樂活動相當受人歡迎，如 1910 年 5 月的一則報導說：「上星期六第四次同樂會來賓頗眾，售票處幾如山陰道上，大有應接不暇之勢。本會大堂設座只七百餘，而來賓竟有千餘，開幕後尚踵趾相接，以致招待員亦無從招待，洵為難得之盛事。」<sup>166</sup> 此種現象更為各國青年會罕見：

本會會務進行之速，實難以道里計，查上年一年中，交誼會預會人數統計一萬零八百九十三人，較之前數年已為最多數，不料本年之數誠有出人意料之外者，核計自正月至今年五個月中，交誼會演說會到會人數，已達一萬五千四百零三人。遍查各國青年會竟無有出其右者，此一端已可概見。<sup>167</sup>

事實上，出席同樂會的人數持續上升，由 1914 年的 13,550 人次，增至 1921 年的 43,170 人次（附表 4-6）。

究竟同樂會何以如此受人歡迎？據費吳生的解釋：

……實際上，在這些場合裡，要擠滿我們的大禮堂，並不存在困難……事實上，整個上海並沒有華人基督徒可去的有益身心的娛樂場所，所以我們認為，我們提供這些娛樂回應了一項真實的需要。<sup>168</sup>

費吳生在這裡的說法表面看來有一定的道理，但肯定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事實上，在上海青年會的會員中，基督徒所佔的比例一直不算太高（下詳），他們及其家人的娛樂需求，充其量只能夠

166 〈洵足樂也〉，《會務雜誌》第8期第14號（1910年5月27日），頁1。

167 〈會務記錄〉，《會務雜誌》第8期第17號（1910年6月17日），頁2。

168 Annual Report of George A. Fitch, September 1910, p. 1, AQRBV.

附表 4-6 交際部活動出席人次

年份	人次
1914	13,550
1915	15,966
1916	17,620
1917	15,566
1918	-
1919	16,663
1920	-
1921	43,170

資料來源：*Annual Report of CYMCA of Shanghai, 1914-1917, 1919, 1921.*

解釋同樂會高朋滿座的部分原因。筆者更相信的是，同樂會之所以備受歡迎，實與 1910 年代在上海社會興起的娛樂需求，以及缺乏相應的娛樂場所密切相關。事實上，這股強烈的娛樂需求，具體地體現在 1910 年代以還樓外樓、新世界、大世界等綜合型、家庭式遊樂場大行其道的情況之上。<sup>169</sup> 據楊今豪憶述：

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就在我家附近。當我尚在初三、高一讀書時，就經常去青年會圖書館閱覽各種報刊雜誌，有時還購票去青年會禮拜堂觀看話劇和音樂演出；也曾領票去青年會體育館觀看各種球類比賽。<sup>170</sup>

<sup>169</sup> 樓嘉軍：《上海城市娛樂研究（1930-1939）》（上海：文匯出版社，2008），頁31-38。

在1912年和1915年先後創辦樓外樓和新世界的上海商人黃楚九，曾是上海青年會的榮譽會員。他所開創的遊樂場王國，有否從上海青年會舉辦的同樂會中獲得靈感，便不得而知了。

<sup>170</sup> 楊今豪：〈我與青年會的情緣〉，羅世龍主編：《天津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與近代天津文明》（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頁398。

另據天津青年會會員王仁鳳的憶述，大抵也可以反映民國時期中產家庭的娛樂需求：

1926-1932年，我在位於東馬路上的民立第四女子小學校（簡稱民四）讀書，民四的正門恰在青年會對過。當時，家父——王祖光，工作於北寧鐵路局……業餘經常在青年會的球房內鍛鍊……我常隨父親入青年會參加聯歡會，多是在大禮堂內（舞臺很大，觀眾席分樓下樓上，樓上即二樓，座位處是由大廳二樓的門出入）看電影、聽講座……<sup>171</sup>

筆者相信，與坊間大眾化的遊樂場相比，上海青年會的不同之處，可能在於會員制度發揮了某種篩選作用。也就是說，並不是普通的市井小民可以隨意光顧，只有繳付會費的一般中產會員及其家屬才能參與，是一種中產階層的社會經濟地位或文化生活品味的反映。<sup>172</sup>此外，與其說上海青年會提供了一個為基督徒而設的娛樂場所，毋寧說同樂會沒有坊間各式品流複雜的遊樂場中潛存的不良活動，成為二十世紀初年上海少有的、具吸引力的正派娛樂場所。據三十年代在上海青年會出任幹事的司徒桐回憶：

對我來講，感受頗深的是青年會的一套設備，比如健身房、游泳池、寄宿舍、簡易餐廳、崇拜室、圖書館、演講廳、文娛廳及音樂廳等等。這套設備雖然大同小異，但與當時社會上那些封建桎梏以及資產階級腐化墜落的誘惑相

171 王仁鳳：〈天津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獨具風采〉，羅世龍主編：《天津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與近代天津文明》，頁371。

172 民國初年上海中產階層的生活情趣，可參Xiaoqun Xu, *Chinese Professionals and the Republican State: The Rise of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in Shanghai, 1912-1937*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65-88.



比，青年會的活動場所確為一種新生活的典範。<sup>173</sup>

這種正派的娛樂環境相信亦是上海青年會受人歡迎的原因之一。

同樣能反映會員入會誘因的，相信是同樣經歷了高速增長的體育活動：

本會健身房自開操以來，頗洽人意。近來報名上班操練者，共計有一百二十人，雖日後吾會友中欲研究體育者，尚不乏人。然觀現今開幕之初，而有如許之人報名，亦可云盛矣。<sup>174</sup>

淋浴室自從安裝蓮蓬頭以後，光顧的會員亦持續增加：「查西十一月間，會友到會澡身者，平均計算每日約五十人，往常多喜盆浴，今則用急雨浴者較多矣。」<sup>175</sup> 使用淋浴室的人士愈益增加，可以在以下兩件事例反映出來：

本會浴室爐小人多，浴水往往一時不能即熱，特定新章如左：每逢星期一二四五，下午自五時至六時止，星期二四兩晚，八時至八時半，只可用急雨浴來浴，諸君幸注意之。<sup>176</sup>

本會定章，凡特別會員可享受健身房、浴室等權利，惟近來會員日益加多，未能一一識認。爰定新章，凡欲入健身房及浴室者，須隨帶會員證給儲物所門者閱過，並於簽字

173 司徒桐：〈我與基督教青年會〉，《金陵神學誌》第2期（2006），頁10。原上海青年會總幹事黃祖貽亦在三十年代出任上海青年會幹事，他接受筆者訪問時指出，一般人即或在街上吸煙，但一進入上海青年會便自律地停止吸煙。黃祖貽先生訪問紀錄（上海基督教青年會，2004年4月）。

174 〈從之者眾〉，《會務雜誌》第6期第34號（1909年1月1日），頁2。

175 〈澡浴之忙〉，《上海青年》第11期第37號（1913年1月3日），頁3。

176 〈浴室廣告〉，《上海青年》第11期第4號（1912年3月21日），頁5。



附表 4-7 體育設施使用人次

年份	健身房	運動場	游泳池	淋浴室
1913	5,325		-	11,190
1914	5,317	1,573	-	12,854
1915	16,514	2,120	7,705	31,815
1916	31,023	2,574	27,544	61,291
1917	30,265	3,851	24,888	77,481
1918	31,808	4,873	30,273	98,626
1919	33,074 (30,427)	5,474	25,968	117,583 (117,582)
1920	34,024 (38,024)	5,294 (5,474)	27,010	129,537
1921	42,827	11,064	19,257	145,260

資料來源：*Annual Report of CYMCA of Shanghai, 1913-1921*.

說明：括號內數字為翌年年報比較往年數字時一併刊出。

## 第六節 世俗化的危機

從上述各種統計數字大概可見，上海青年會各種事業所呈現的強勁增長趨勢。簡言之，二十世紀初，在上海青年會的高速發展歷程裡，有兩個重要的地理座標，它們分別是 1907 年落成的四川路會所，以及 1915 年擴建的童子部會所（詳見第六章）。不過，會務的高速發展卻令上海青年會走上與創會宗旨愈益背離的世俗化道路。

### 一、幹事疲於奔命

#### （一）高速發展

自 1907 年搬入四川路會所以後（附圖 4-8），上海青年會從

附圖 4-8 四川路會所的開幕盛況



圖片來源：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編：《力的創造：上海青年會三十五週年紀念冊》，頁45。

前未能實現的各種社交、娛樂活動均變成可能。<sup>180</sup> 各種新式事工陸續登場，為會務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大好情勢：「本會自去秋遷入新屋以來，諸務莫不竭力整頓，昭然垂著，是年實可謂本會之最大紀念。」<sup>181</sup> 上海青年會愈益受到社會人士歡迎：

上禮拜中，本會會務異常忙碌，茲特記於後……近來本會會務之秩序頗繁，得獲諸君時時惠臨者，深為欣幸也。查上禮拜中，除日夜館上課之學生外，合交際會與講道會所到之人數，計之約有九百四十三人。由是觀之，本會頗有蒸蒸日上之形勢。<sup>182</sup>

180 *Annual Report of CYMCA of Shanghai, 1907, p. 4.*

181 〈大紀念〉，《會務雜誌》第6期第1號（1908年2月21日），頁1。

182 〈瑣事彙誌〉，《會務雜誌》第6期第31號（1908年12月11日），頁1-2。

1915年，上海青年會在原會址後面擴建童子部會所，同樣將會務發展推向另一個高峰。克樂愷在1916年說道：

一年前，我們訂定了一個五年計劃，並估計所有工作每年均持續增長。在今年，我們每一個項目均已超出了計劃的估計，在會員人數方面，我們已經達到第五年的標準。<sup>183</sup>

是年上海青年會童子部的會員人數，在世界各國青年會中的排名由第11位躍升至第3位。<sup>184</sup> 1918年《上海青年》的一則報導說：

一千九百十八年，本會所辦各種事業，較歷年益形繁忙。蓋近年滬上人士對於青年會之宗旨漸漸顯曉，且會員甘願犧牲一切為社會服務，而熱心輔助本會各種事業上之進行者，為數亦不計，故往年會務之發達，大有一日千里之勢。<sup>185</sup>

除了會員人數高速增長以外，上海青年會為迎合會員的喜好，各種會務頻頻推陳出新，給人目不暇給，甚至眼花撩亂的感覺：

本會會友眾多，每禮拜所辦之事亦逐漸加多，蓋一事必不能合眾意，必用種種方法方能使眾會員同享會中利益。有時來賓來會參觀者，見本會一禮拜內開會次數之多，及到會人數之眾，莫不嘖嘖稱奇不止云。<sup>186</sup>

183 Annual Report of J. C. Clark, September 1916, p. 7, AQRBV.

184 Annual Report of J. C. Clark, September 1916, p. 7, AQRBV.

185 〈民國七年即西歷一千九百十八年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報告〉，《上海青年》第18卷第16號（1919年5月2日），頁5。

186 〈會務忙〉，《上海青年》第11期第28號（1912年10月31日），頁2。「武昌青年會還辦理多項文娛活動，計有……等。以迎合青年的心理與愛好為主，吸引他們參加到青年會裡來。」王同：〈武昌基督教青年會的活動〉，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華文史資料文庫》，第18卷（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頁914。

## （二）工作壓力大增

隨著上海青年會各方面的工作迅速發展，一眾中、西幹事的工作負擔自難免大為增加：「本會會友逐漸增多，公事殷繁，日不暇及，即簿書一端，已佔大份。」<sup>187</sup> 費吳生在 1909 年的報告中說：「…… 各部門的工作均在迅速增長，要求愈來愈多的注意力……」<sup>188</sup> 西幹事鄢盾生 (A. Q. Adamson) 在 1913 年的報告中指出：「〔上海青年會〕交際部未來四個月的行事曆，填滿了一張十八吋長的節目表。」<sup>189</sup> 加上西幹事偶爾因病請假、人手調整，以及定期休假，人手不足的問題變得更形尖銳。例如 1909 年晏克斯因病請假，華理士 (J. H. Wallace) 調派至日本青年會，便導致上海青年會出現人手緊絀的情形。<sup>190</sup> 翌年，駱維廉返美休假，更進一步加重了費吳生的工作擔子。他說：「由於駱維廉不在，無論如何，我已經與戴威廉努力承擔這個部門的好些責任……」<sup>191</sup>

上海青年會出現人力資源追不上會務發展的時滯 (time-lag) 情況。費吳生在 1912 年的報告中，以略帶投訴的語氣說了以下的一番話：

在我上任以前，共有三位外國幹事在這裡幫忙了一段時間，但自從駱維廉在 1910 年春往休假去後，只剩下我們兩

187 〈體操〉，《會務紀聞》第3冊第7號(1905年4月7日)，頁2。

188 Annual Report of George A. Fitch, September 1909, p. 181, AQRBV. 「本會各部事務，以上星期最形忙碌……」〈會務聯誌〉，《會務雜誌》第8期第27號(1910年9月7日)，頁1。

189 Annual Report of A. Q. Adamson, September 1913, 4, AQRBV.

190 Robert E. Lewis to John R. Mott, 12 October 1909, COR.

191 Annual Report of George A. Fitch, September 1910, p. 3, AQRBV.

人。當然，這意味著我幾乎要放棄所有學習中文的時間。雖然在離開紐約以前，基於我以前的語言基礎，我曾表達專門學習語言的渴望，並獲得保證我將可如此。我很強烈感覺是，在這裡作成傑出的工作，任何人均必須具備嫻熟的語言知識。<sup>192</sup>

費氏的潛臺詞是，北美協會有違背承諾之嫌。事實上，性格率直的費吳生，幾乎在每年的報告中，均投訴沒有時間學習語言的問題，並三番四次向北美協會提出增派西幹事來滬的呼籲：

…… 但是即使我將所有時間全放在青年會的工作上，我並不認為這是可能完全公平對待我轄下的各部門，同時保持任何程度的良好健康狀況。我已經多次催促多派一人前來的必要性，他至少可用一半時間協助我們，我們希望北美協會將會很快想得方法及實行……<sup>193</sup>

1913年，費吳生在報告中仍說：「有關我們的事工所遇到的困難和障礙，仍然是與過去的一段時間非常相近。個人而言，我很強烈的感覺是，我們在上海被迫在極大的壓力下工作，以取得最佳的成果。……」<sup>194</sup> 可以說，上海青年會的一眾中、西幹事，基本上一直在頗大的壓力下工作：「上星期六本會會務甚形繁冗……

<sup>192</sup> Annual Report of George A. Fitch, September 1912, p. 7, AQRBV.

<sup>193</sup> Annual Report of George A. Fitch, September 1912, p. 7, AQRBV.

<sup>194</sup> Annual Report of George A. Fitch, September 1912, p. 7, AQRBV. 吉爾達來華履新不久，對於當時忙得不可開交的總幹事賈維廉印象尤深。Annual Report of John H. Geldart, September 1912, p. 197, AQRBV. 「青年會的專職人員只有二十一人，遠遠不足承擔廣泛複雜的事工活動，因而專職人員是緊張忙碌的。以幹事部的人員來講，都沒有多少假期和休息，沒有星期日（這天活動更多）。」蔡智傳：〈南昌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26輯（1987年11月），頁37。

是日之會務可謂忙碌極矣，本會幹事苦無分身術，事事可預分也。」<sup>195</sup>

### （三）後繼乏人

事實上，為應付愈益沉重的工作量，上海青年會的幹事、教師，以及其他人員，基本上一直持續增加：「本會會務逐漸發達，而辦事人員自應陸續加添，俾可分門別類，各司其事。」<sup>196</sup> 1908年，受薪的幹事和教師一共有45人，至1921年受薪的職員人數已高達157人，儼如一所小型企業。<sup>197</sup> 但教費吳生滿腹牢騷的另一個原因可能是，人手增加並沒有減輕他的工作壓力。如駱維廉所說：

我們最困難的問題很可能是那些與幹事有關……迅速的推廣和擴張是容易，但要滿足於緩慢實在的增長卻是非常困難。我認為快速增長的運動所面對最大的障礙是，缺乏可倚靠的人出任幹事和董事，他們不容易覓得，即使覓得亦須經過訓練。

有很多事情（然而，特別是有關商科班），必須一名外籍幹事恒常地關注。常常面對的困難是，物色能幹的老師教授如簿記、打字、商務、法文、德文等科。在剛過去的一個學期，由於無法覓得適合人選的緣故，我需要親自教授有三十二名學生的打字班。我們非常需要一名可以主理學

<sup>195</sup> 〈一日之會務〉，《上海青年》第14卷第13號（1915年4月2日），頁2。另Annual Report of George A. Fitch, September 1919, p. 11, AQRBV.

<sup>196</sup> 〈甲寅全年報告〉，《上海青年》第14卷第11號（1915年3月19日），頁2。

<sup>197</sup> Annual Report of CYMCA of Shanghai, 1908; Annual Report of CYMCA of Shanghai, 1921.



校這個部門的人，一名在這些方面〔不同學科〕曾受過專門訓練的外國人。<sup>198</sup>

為了應付日益增加的工作量，上海青年會董事部很早便採取權力下放的政策，透過成立不同的會務委員會，邀請會員義務擔任成員，共同協助推廣會務。<sup>199</sup> 及至 1911 年，董事會下設的各種委員會多達 14 個，成員大幅擴充至 206 人（見附表 4-8）。可見，隨著上海青年會各種活動愈益增加，規模亦日漸擴大，業已存在進一步分工化的傾向：「……此三種〔「三育」〕之業務頭緒紛繁，非可併為一談，故辦事之際，亦各分門別類，而以幹事一員為之率。」<sup>200</sup>

附表 4-8 董事會下設的委員會及委員人數（1911）

德育部	體育部	會友部	藏書樓閱報室	智育部	招待部	交際部	演說部	俱樂部	經濟部	攝影部	款賓部	音樂部	游藝部
23	25	28	11	5	12	16	11	12	20	7	16	8	12

資料來源：〈推舉本年各部董事台銜〉，《會務雜誌》第 9 期第 3 號（1911 年 3 月 3 日），頁 1-2。

究竟，上海青年會以個別不同的委員會推動會務，帶來怎樣的成效？西幹事史文在 1913 年談及體育部時說：

<sup>198</sup> Annual Report of W. W. Lockwood, September 1913, p. 15, AQRBV.

<sup>199</sup> 〈值年委辦〉，《上海青年會報》第 1 卷第 21 號（1904 年 2 月 12 日），頁 2。

<sup>200</sup> 〈民國六年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報告〉，《上海青年》第 17 卷第 11 號（1918 年 4 月 1 日），頁 5。

在過去一年，其中一項重要工作是，發展一個有效的委員會，管理體育部門的工作。……柯樂克（J. H. Crocker）為這個委員會籌組了核心人員，然而部分已證實是無用的材料，同樣，亦有數名成員沒有出席會議，靜悄悄的離開了。<sup>201</sup>

事實上，早已有報導說：「本會體育總董向有多人，今以數人已離滬他往，只有韓玉麟、聶雲台、張籥雲三君為體育總董矣。」<sup>202</sup>可見，委員會成員既為義務性質，成員的責任感並沒有必然的保證。最後，史文只得自己全然負責體育部的工作。<sup>203</sup>委員會成員委身感（commitment）不足的另一原因，應與他們並非同宗會員有關。由於同宗會員人數持續偏低，在上海青年會裡非基督徒亦可擔任主事職員（謝強夫）、委員會成員（周錫三、聶管臣），<sup>204</sup>這亦成為上海青年會後來日趨世俗化的重要肇因。

## 二、世俗化的危機

### （一）流於表面化

上海青年會會務發展一日千里，在上面引述的對外報導中流露出教人振奮無比的樂觀情緒，但是諷刺的是，在西幹事的報告裡卻表現出與此大相逕庭的擔憂。費吳生早在1912年的報告中已指出，上海青年會的工作存在「表面化」的危機：

---

201 Annual Report of Alfred H. Swan, September 1913, p. 5, AQRBV.

202 〈體育總董〉，《上海青年》第12卷第13號（1913年3月28日），頁6。

203 Annual Report of Alfred H. Swan, September 1913, p. 10, AQRBV.

204 〈各司其事〉，《會務雜誌》第6期第18號（1908年9月11日），頁1；〈更正董事台銜〉，《會務雜誌》第7期第31號（1909年11月12日），頁2；Annual Report of A. H. Swan, September 1915, p. 9, AQRBV.

現時我們的工作所面對的其中一個最大及嚴重的危機是表面化。我們細小的職員團隊，加上各部門的工作迅速增長，令我們很難訴諸其他方法。我們正竭盡所能應付這種趨勢，然而，這是我們正面對的一個實在問題。我在這裡的兩年零九個月期間，會員和教育工作已經增長一倍，其他部門的增長甚至更厲害，一些新的職責亦隨之而來。<sup>205</sup>

上海青年會的各式會務愈趨多元化，幹事的工作量隨之持續增加，很多工作便不能仔細兼顧。在事務紛繁的情況下，很自然產生的結果是犧牲了工作的品質。費吳生在 1912 年談及夜校的營辦情況說：「〔夜校〕事工的增長如此迅速，組成了很多新班別，要維持高效率存在一定困難。」<sup>206</sup>

費吳生在 1913 年的報告指出，儘管政局動盪不安，教育事業仍有顯著的增長，日夜校招生人數突破一千大關，衍生了與教育增長未能同步的管理問題。<sup>207</sup> 有關的管理問題指涉為何，費氏在報告中沒有仔細明言。但《上海青年》的一則報導卻為我們提供了一些線索：「本會夜學往年因堂地狹小，每每併班授讀，甚至每一課堂叢集六七十人之多，以致於教法上不能達完全之目的……」<sup>208</sup> 原來上海青年會所辦的附屬學校，雖然備受莘莘學子青睞，但是在硬體設施（校舍空間）和軟體配套（班級混合）兩方面，其實均未完全盡如人意。

對於在美國接受優良教育制度訓練的西幹事而言，這種不理

205 Annual Report of George A. Fitch, September 1912, pp. 6-7, AQRBV.

206 Annual Report of George A. Fitch, September 1912, p. 8, AQRBV.

207 Annual Report of George A. Fitch, September 1913, p. 2, AQRBV.

208 〈夜學改良〉，《上海青年》第10期第26號（1911年10月5日），頁3。

想的情況，他們其實心知肚明。華理士以不滿的語氣說道：「我們的夜學不應該僅僅成為查經班和青年會其他活動的側門（side door）。」<sup>209</sup> 他認為就長遠發展而言，上海青年會的教育事業必須有專門的教育家主理其事，好讓他能夠騰出時間從事其他更有效的工作。這個問題雖然自新會所落成以後早已被提出，但是情況似乎一直未有明顯的改善。作為上海青年會的掌舵人駱維廉，在 1914 年的報告中不諱言說：「我們面對的第一個危機是大量事工的增加，我們可能忘記最廣泛和永久的成果是來自細緻的栽培（intensive cultivation）。」<sup>210</sup>

## （二）失衡的危機

另一個更令人擔憂的危機是，上海青年會的宗教事業有愈趨邊緣化的傾向。戴威廉在 1909 年的報告中指出：

……與上述密不可分的真正危機是，將重要性置於最受歡迎的工作上，例如教育，這樣便會遮蓋了其他特色，致使青年會各部門不成比例。我並不認為現在已是如此，但是我們會慎防這種趨勢。<sup>211</sup>

戴威廉的說法予人欲蓋彌彰的感覺。上海青年會的會務發展明顯出現了向教育、社交等最受歡迎的項目傾斜的現象；而他所謂被遮蓋的「其他特色」，當然是指上海青年會的宗教事業。華理士在 1908 年的報告中說：

直到目前為止，夜學最主要的弱點是，從它們作為傳揚福

<sup>209</sup> Annual Report of J. H. Wallace, September 1909, pp. 2-3, AQRBV.

<sup>210</sup> Annual Report of W. W. Lockwood, September 1914, p. 12, AQRBV.

<sup>211</sup> Annual Report of W. E. Taylor, September 1909, p. 174, AQRBV.

音的媒介的有效性的角度來看。就個人而言，我並不滿足於經營一所夜校，單從教育的角度來看，將會是很有成效，甚至會取得優秀的成果。我們在這裡只有一個明確的目標，就是傳揚福音，它實際上包括了所有其他的事情。鑒於部分（part）不能取代整體（whole），所以教育、社會或政治改良的福音，不可取代耶穌基督的福音。目前為止，只有少數的志願查經班是例外，它們只接觸到很小比例的學生。夜校作為一個傳揚福音的媒介的影響力，一直只是很間接。<sup>212</sup>

可見，上海青年會的各種事業雖然蒸蒸日上，但是卻愈來愈無法達到傳揚福音的本來目標。華理士接續說：

……我將會談及的一個危機是，我們在非基督徒的中國人中愈益受歡迎的危機、不成比例的同宗會員、我們在教育和社交特色的增長，我們將會愈益投身於一個龐大機構的運作，致使我們在屬靈方面的工作將會被淹沒。這將無可避免成為事實，除非我們的幹事（中國人和外國人）均為傳道精神所充滿。<sup>213</sup>

駱維廉在1912年亦指出：

工作的成功為外籍職員帶來工作壓力，一方面容易導致表面化，另一方面是遺漏了某些不可缺少的工作。去年已是最

<sup>212</sup> Annual Report of J. H. Wallace, September 1908, pp. 150-151, AQRBV. 日校的情況亦似乎相差不遠：據蕭公權憶述：「青年會中學，和其他教會學校一樣，想利用教育青年的機會去傳播『福音』，招收信徒。學生雖然多不熱心研讀『聖經』，但也不反對有關宗教的必修課程。」蕭公權：《問學諫往錄》，頁110。

<sup>213</sup> Annual Report of J. H. Wallace, September 1908, p. 152, AQRBV.

理想的情況，然而，這個青年會在宗教工作方面的有效性，卻令人不得不相信，除非我們在未來數年致力強調宗教工作、試驗方法、創作文學及訓練領袖，我們將無法達至上帝交付我們的偉大計劃的標準。我們的青年會理應成為一個實驗場，為引領中國具影響力的階層到基督教事業，並為建立起必不可少的接觸提供解決方法。然而，這需要一名外籍幹事在幾年裡花相當多的時間，以目前的情況而言，我們並不能提供這樣的人。<sup>214</sup>

青年會研究者常有的誤解是，中國青年會由於深受美國社會福音的影響，故積極參與各種社會改良運動，對傳福音等布道事工並不重視。邢軍指出：

…… 部分由於儒教社會的定位和中國的急切需要，部分由於青年會本身的傳統，從一開始，中國青年會奠基人來會理實踐著「我不是來傳教，而是來服務的」的原則。作為一個服務性的團體，青年會開展了許多世俗性事工。<sup>215</sup>

無論從上述華理士的話，抑或上海青年會早期的歷史來看，均反映實際的情況並非如此。事實上，上海青年會甚至開創了街頭布道的先河：

本會創立市場播道會，可謂上海宗教界一新紀元，洵足發

<sup>214</sup> Annual Report of W. W. Lockwood, September 1912, pp. 11-12, AQRBV. 費吳生在1912年指出夜校佔用了他最多的工作時間。George A. Fitch to Dear Friends, 22 May 1912, COR.

<sup>215</sup> 譯文引自邢軍著，趙曉陽譯：《革命之火的洗禮：美國社會福音和中國基督教青年會（1919-193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43。事實上，如筆者在第二章所言，來會理在署任上海青年會總幹事時，曾致函路義思，表達對上海青年會存在不多同宗會員的關注。詳參本書第二章。

聾振聵，令人耳目一新，故自西四月內，連在市場聚會數次以來，一時來聽道者，從一百七十餘人，漸增至四百人左右，功效可謂巨大。<sup>216</sup>

只是後來在會務紛繁、人手不足的情況下，青年會才逐漸減少對傳道工作的關注，以致予人愈益世俗化的形象。不過，我們仍得指出，青年會即或顧此失彼，但說傳道工作不曾存在於青年會的發展議程上，也肯定與歷史事實不符。費吳生不諱言：

青年會最成功的地方是致力滿足青年的社會需要，但所作的卻很少滿足他們的宗教需要。我們在社會方面的成功，當然，是很容易顯示給漫不經心的旁觀者看；努力爭取青年進入國度〔天國〕的成果則較不容易為人察覺。<sup>217</sup>

### （三）世俗化的形象

當大量會員因為教育或娛樂等活動而加入上海青年會，同宗會員的比例便隨之大幅降低。戴威廉早在 1908 年已指出：

過於受歡迎是可能的危機，特別是新任體育教練的履新，導致過度的增長，廣泛勝過了集中（the extensive outstripping the intensive）。在逾 500 名會員中，我們只有少於 100 名基督徒；是一個很大的機遇，亦是一個可能的弱點。我們最大的疑難可能是〔建立〕關懷的文化（careful culture），以及在重點的事工上，發展一個純淨、

216 〈播道有功〉，《會務紀聞》第3冊第16號（1905年6月9日），頁2。「上禮拜日午後五點一刻，本會集議同赴本埠鄰近市鎮各處傳揚聖道。」〈教會進步〉，《會務紀聞》第3冊第38號（1906年1月12日），頁2。

217 Annual Report of George A. Fitch, September 1913, p. 5, AQRBV.

誠摯及業經訓練的基督教工人群體。<sup>218</sup>

事實上，上海青年會對於宗教事業存在的危機，並非視若無睹：「過去幾年顯示危機正在迫近。……〔去年〕董事部、職員及各委員會統一政策，大家共同的渴望是，使青年會首要成為社區中最大的傳福音力量。」<sup>219</sup> 不過，不得不承認的是，上海青年會的同宗會員比例，基本上一直維持在百分之二十以下的水平，特別在 1907 年遷入四川路會所以後，有關的比例更進一步減少（附表 4-9）。

不難想像的是，當大部分非基督徒為各種利益而加入上海青年會，上海青年會便很自然予人愈趨世俗化的印象。早在 1909 年 5 月，《上海青年》刊載的一則回應說：「嘗聞有不識青年會之宗旨者，誤指斯會為荒嬉之場，或謂為求利之所，此乃荒謬無稽之語也。」<sup>220</sup> 事實上，近似的批評可謂不絕如縷：「我儕常耳聞人言，青年會者亦一總會耳。」<sup>221</sup> 可見，上海青年會常予人有不務正業之感：「青年會既屬完全基督教，何以所行之事，每多及於教外人，不限定本教之範圍？」<sup>222</sup> 柴連復有以下的一段經歷：

後來殉道堂成了功，開甚麼百年大會〔1907 年〕，適逢我又到上海，暗暗地去看過兩次，並且看見僑居河南地方

218 Annual Report of W. E. Taylor, September 1908, p. 148, AQRBV.

219 Annual Report of W. E. Taylor, September 1911, p. 4, AQRBV. 另參〈聖經班學友入教〉，《上海青年》第14卷第1號（1915年1月1日），頁3。

220 〈幸勿誤會〉，《會務雜誌》第7期第18號（1909年5月28日），頁2。

221 〈青年會與總會〉，《上海青年》第12卷第21號（1913年5月23日），頁2。「世或有不明青年會之內容及歷史者，徒目之為娛樂機關，則大誤矣。」陳立廷：《基督教青年會釋要》（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27），頁31。

222 〈譯丁文彪君原文大意〉，《上海青年》第18卷第4號（1919年1月24日），頁4。



附表 4-9 同宗 / 同志會員人數統計表 (1901-1922)

年份	同宗人數	百分比	同志人數	百分比	總數
1901					301
1902					315
1903		15 %		85 %	214
1904	58	20 %	232	80 % *	256
1905	56	17.8 %	258	82.2 %	314
1906	59	16.6 %	296	83.4 %	355 #
1907	85	18.2 %	381	11.8 %	466
1908	94	9.7 %	871	90.3 %	965
1909	108	10.9 %	879	89.1 %	987
1910					962
1911					1,662
1912					
1913					1,583
1914					1,778
1915					2,755
1916	242或15 %				2,774
1917	272或15 %				2,874
1918	346	11.4 %	2,797	89.6 %	3,043
1919					3,391
1920	461	13.6 %	2,930	16.4 %	3,391
1921					4,485
1922					4,471

資料來源：Annual Report of CYMCA of Shanghai, 1901, 1903-1909, 1911, 1913-1917, 1919, 1921; Annual Report of George A. Fitch, September 1918, p. 22, AQRBV; 〈民國十年本會全年會務報告〉，《上海青年》第21卷第24號（1922年6月30日），頁11。

說明：\* 資料來自該年5月所作的一項調查，亦見該年年報。  
# 1907年年報提供的數字為346，疑為修訂數。

幾位傳教士，也有人明明對我講，青年會不是傳教機關  
…… 223

可惜有些老古板牧師，總說青年會偏於智、體兩育，對於  
德育相差太遠，我聽了這些話似乎也中了先入為主那種  
惡毒。雖然如此，我還是喜歡看《青年會報》。到光緒  
三十三年〔1907〕我辭了牧職，來到上海充任聖教書會編  
輯職務，有人介紹我作青年會會員，也有人攔阻我說，不  
必將金錢送到無用之地…… 224

如將本章的討論，與第三章的論述並列審視，便可看見上海  
青年會會員的入會動機，可謂紛紜雜沓、各懷異心，他們之間  
的最大公約數大抵只是具有極明顯的功利色彩：「本會會友眾  
多，共計一千五、六百人，考其入會宗旨不一，有因夜學而入會  
者，有因體育部之利益而入會者，有因童子部而入會者。」<sup>225</sup>  
在這裡要強調的是：第一、上述的動機分析只限於比較突出的  
幾個方面，既無意排除會員可以純粹因為欽羨青年會的高尚宗  
旨入會（詳參第七章），亦無法囊括不同會員的個別情況；第  
二、上述幾種入會動機並不存在彼此對立的零和關係（zero-sum  
relationship），它們之間不僅可以同時並存；甚至隨著時間的推  
移，不同因素的重要性可以發生轉移。當然，原來的歷史萬花筒  
必然較這裡所能呈現的更為錯綜複雜。

---

223 柴連復：〈我對於青年會念年來的聞見（未完）〉，《上海青年》第22卷第13號（1923年4月13日），頁5。

224 柴連復：〈我對於青年會念年來的聞見（未完）〉，頁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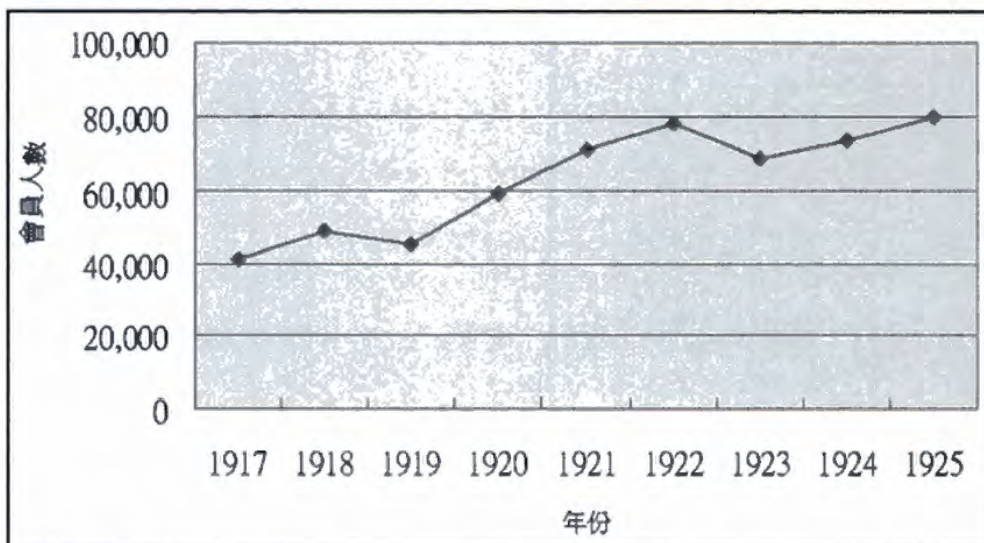
225 〈入會之利益〉，《上海青年》第13卷第33號（1914年11月6日），頁5。

總的來說，二十世紀初年，上海青年會事業的高速增長，基本上是在一個饒富功利色彩的氛圍下催生，並且在歌舞昇平的背後逐漸走上與創會宗旨愈益背離的世俗化道路。

## 第五章 求才（財？）若渴 ——徵求「會員」運動

二十世紀上半葉，在眾多在華傳教團體中，中國青年會的高速發展尤其令人注目：「青年會當一二十年之前尚在萌芽時代，今日發達之驟有非意料所及者。」<sup>1</sup> 從附表 5-1 可見，青年會的會員人數（包括市會和校會）在 1910 年代以後持續攀升，雖然在 1923 年受到前一年爆發的非基督教運動的後續影響，會員人數一度下滑；但自 1924 年開始便回升，1925 年甚至邁向另一個高峰，增長至接近 80,000 人的水平。

附表 5-1 中國青年會會員人數（1917-1925）



資料來源：任夫：〈十年來吾國青年會之重大變化〉，《青年進步》第 100 冊（1927 年 2 月），頁 236-237。

<sup>1</sup> 〈記夜校學生同樂會盛況〉，《上海青年》第 16 卷第 27 號（1917 年 8 月 31 日），頁 5。

事實上，如將上述的數字與同期的國民黨和共產黨黨員人數比較，更有過之而無不及。1926年1月，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當時的共產黨黨員只有5,000人，而正式登記的國民黨黨員亦不過50,000人。<sup>2</sup>無怪乎孫中山於1923年出席在廣州舉行的青年會全國大會時說道：「中國青年會是美國人介紹過來的，現在各省很發達，中國會員有七八萬人，團結起來，已經成了一個很堅強的團體。」<sup>3</sup>

過去研究中國青年會的學者，往往樂此不疲地引用亮麗的會員數字，以證明青年會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社會的影響力（抑或是研究課題的重要性？）。如劉遠城所說：

在它〔中國基督教青年會〕創立十七年後〔1912〕，它設立了一百三十處的分會，比創立時增加了四十五倍，總數也達一萬人。而比其早發展的中國內地會在經過六十八年後，才達七千信徒，這些成效足以顯示青年會成功地使它能為當時的中國社會所接受，並獲得廣大的迴響。<sup>4</sup>

但是學者對於這些數據背後的所以然，卻從未加以深究。究竟青年會會員的增長動力來自哪裡？青年會會員人數與其影響力是否成正比例？這些數據究竟能說明甚麼現象？

本章會討論的是，中國城市青年會每年一度舉行的徵求會員

<sup>2</sup>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冊（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頁100。

<sup>3</sup> 孫中山演講，黃昌毅記：〈孫中山先生歡迎第九屆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大會代表演詞（十二年十月二十日）〉，收入余日章：《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史略》（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27），頁21。

<sup>4</sup> 劉遠城：〈中美文化交流的激盪：基督教青年會對晚清社會的適應與交融，一八九五～一九一一〉（臺灣：淡江大學哲學博士論文，1999），未刊稿，頁2。

運動（membership campaign，簡稱「徵求會」）——它由上海青年會自北美青年會引入，再加以本土創造性的轉化，影響及於整個中國城市青年會運動的生態。本章會仔細討論上海青年會舉辦徵求會的背景、引入經過、具體的運作情況，並進而評檢其成效和影響。對於青年會徵求會員運動的研究，不僅有助我們更深入地了解上海青年會的內部生態，對於審視中國城市青年會系統會員高速增長的現象，<sup>5</sup> 以及更客觀評價其在中國社會的影響力，均有重要的啟示。

## 第一節 徵求會的緣起

### 一、財政緊絀

大多數在十九世紀入華的基督教傳教團體，從一開始便須仰賴母國總會的經費供給；中國青年會不同的地方是，北美協會除了支持西幹事的薪金，以及青年會會所的部分建築經費外，青年會的日常開支必須完全自行承擔：

……故凡在一城市中，欲開辦青年會，必先自量有無確實之常年經費，方能著手組織，且某處青年會，既為某處全城青年及幼童服務，則該會經費，自應由該城本地完全籌出。<sup>6</sup>

誠如劉廷芳提及青年會的財政方針時說：「一、必得由中國人自

<sup>5</sup> 據1920年的統計，城市青年會有41,699名會員，校會則有18,867名會員。中華續行委辦會調查特委會編：《中華歸主：中國基督教事業統計（1901-1920）》，中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年重印），頁782。

<sup>6</sup> 謝扶雅編著：《基督教青年會原理（草版）》（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22），頁39-40。

己擔負。二、經濟的開支必須量入為出。」<sup>7</sup> 可以說，對於中國青年會而言，恪守量入為出的理財方針牽涉生死攸關的存活問題，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從附表 5-2 可見，自上海青年會創立伊始，常年經費收入持續增加。在 1901 年至 1907 年的短短七年間，常年經費收入已增長近三倍，呈現良好的發展趨勢；但是與此同時，隨著會務的進一步發展，常年經費支出亦同步增加。就整體的財政狀況而言，每年均能達到收支平衡，並有小額財政盈餘，由十多元至二百餘元不等，一般只佔該年經費收入不足百分之一（甚至更低）。可見，上海青年會早期的財政狀況基本上並不十分充裕。<sup>8</sup>

附表 5-2 上海青年會經常賬目收支情況（1900-1907）

年份	經費收入	經費支出	盈虧
1900	-	-	-
1901	6,295.49	6,255.19	40.30
1902	6,659.20	6,629.42	29.78
1903	11,061.49	10,835.20	226.29
1904	11,205.07	11,109.47	95.60
1905	13,306.58	13,179.76	126.82
1906	16,230.28	16,212.00	18.28
1907	18,685.50	18,471.20	214.30

資料來源：Annual Report of CYMCA of Shanghai, 1901, 1903-1907, AQR；  
D. Willard Lyon to Robert E. Lewis, 7 May 1903, p. 2, COR.

7 劉廷芳：〈青年會對於中國教會的貢獻〉，《真理與生命》第9卷第5-6期合刊（1935年11月），頁246。

8 「刻將一年出入帳目核計已清，所餘雖不甚多，而亦有盈無絀云。」〈報銷帳目〉，《上海青年會報》第1卷第17冊（1904年1月15日），頁1。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青年會早期所得的些許財政盈餘，並不是輕易獲得的。早在 1903 年，上海青年會曾動用建築會所的基金，以填補當年龐大的財政赤字，年終才能達到收支平衡。<sup>9</sup> 隨後上海青年會的財政狀況雖然稍為好轉，但是基本上仍是左支右絀。1903 年 9 月，上海青年會遷至北京路會所時，並沒有鋪張揚厲，購置大量家具陳設，反倒是因陋就簡，由會員慷慨餽贈：

鍾萼雲者，本會之會友也，素以物與為懷，解囊傾篋習為常事。茲屆本會喬遷，器具多不及備，君將家用篋什輦致而至，假本會便諸友；更有會友多位慨贈綵帳一架、刻聯一雙。吾等會眾莫名感蒙。<sup>10</sup>

賀嘉立在 1903 年的財政年度結束前仍說：「我們期望透過額外的努力，使年終不致負債。」<sup>11</sup>

上海青年會緊張的財政狀況亦可從以下的事例得到體現。1904 年 1 月，上海青年會的會費改以上期形式繳付：

按本會定章，凡會友每人月納例捐一元，而向日係月底交納，司事委辦此期聚議，擬尹作月初交納，故屆本月底，各會友宜將本月及下月之例捐一併交納。<sup>12</sup>

翌年 4 月，更以節省行政工作為由，建議會員預繳全年會費，可

<sup>9</sup> D. Willard Lyon to Robert E. Lewis, 7 May 1903, pp. 2-3, *COR*.

<sup>10</sup> 〈鳴謝〉，《上海青年會報》第1卷第2冊（1903年10月2日），頁2。

<sup>11</sup> Report of Charles W. Harvey, September 1903, p. 53, *AQRBV*.

<sup>12</sup> 〈會友例捐〉，《上海青年會報》第1卷第15冊（1904年1月1日），頁1。梁小初憶述廣州青年會的情形說：「當時會友的會費，每年十二元，是預開收條，由收款員按月去收的。這個制度很多缺點，甚至惹起惡感。幾年後，採取一年一度的會友徵求運動，便改作全年上期交收了。」梁小初：《未完成的自傳：七七回憶錄》（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69），頁55。



獲減少 2 元的優惠：「本會會友逐漸增多，公事殷繁不暇給，即簿書一端已占大份。今擬請各會友將應付會費均預付全年，藉省登記之勞。」<sup>13</sup> 如雅德在 1907 年的報告中指出，宗教部的華人幹事願意將個人月薪 70 元，奉獻予上海青年會，教他為之動容。<sup>14</sup> 1908 年在滬實習的梁小初憶述：

當時我接受了一件指定的任務，就是擔任青年會全盤數目，抄寫入賬。從前有一個日學教員，以部分時間兼任這項工作。每月加領酬金五十元。我因在美華書局已獲得簿記知識，故接任抄賬，駕輕就熟，為上海青年會，每月省去數十元的開銷，我也覺得高興。<sup>15</sup>

可以推斷，上述小額的財政盈餘大概也是在錙銖必較的情況下方能獲得。

此外，上海青年會捉襟見肘的財政狀況也可以反映在審慎理財的態度上。1907 年 10 月，上海青年會董事部經過反覆考慮後，向北美協會提出派遣一位未婚的專業體育教練來滬開展體育事業，並願意承擔該名體育教練的薪金。<sup>16</sup> 體育事業作為青年會不可或缺的一環，理論上不應存在猶豫的理由，教一眾董事猶豫的想必是未來長遠的財務負擔，聘請未婚體育教練的決定，看來是兩害取其輕的權宜之計。

同年，駱維廉在年度報告中提及常年經費持續增加時，並未

<sup>13</sup> 〈會友賜覽〉，《會務紀聞》第3冊第7號（1905年4月7日），頁2。

<sup>14</sup> Annual Report of Arthur Rugh, September 1907, p. 164, AQRBV. 另有華人幹事拒絕加薪的例子，參Annual Report of J. H. Wallace, September 1909, pp. 1-2, AQRBV; Annual Report of G. A. Fitch, September 1911, pp. 1-2, AQRBV.

<sup>15</sup> 梁小初：《未完成的自傳：七七回憶錄》，頁44。

<sup>16</sup> Robert E. Lewis to John R. Mott, 24 October 1907, COR.

流露出絲毫的興奮，反倒是以略帶有苦難言的口吻說：

這些事實或許令人以為，在這裡很容易找到經費，但事實是徵募所得的數額，代表了長期的計畫、多時的祈禱，以及那些主事者的恒常警覺。<sup>17</sup>

可以說，上海青年會早期的財政情況一直並不理想，必須在極大的努力下，才能夠勉強達至收支平衡：「常年收入各款，所入僅敷所出，從無幾微虛擲，已早在諸君洞鑒之中，查一九〇九年進款約共四萬元，而支出之數適與相等。」<sup>18</sup> 1912年的一則報導亦說：

本會每至年終，於經濟上未嘗有缺乏，而反有贏餘，所餘者為數雖不甚大，然亦至不易矣。本會自成立以來，寒暑已易十四，而一切經費向無外款，即如今歲之經常費，竟達洋六千元，此款悉由會費與學費二項內挹注，出入猶僅能相抵實是大幸。<sup>19</sup>

對於上海青年會的一眾董事來說，要維持每年財政收支平衡的重責，殊屬不易：

上崇拜三晚為本會公董本年末次月會之期，會議之下尤以清理賬目、推廣會務為最要，是以敬懇各位會友，有欠繳款項者，即於月內付清，有外來之客不妨引領進會，各公董之易於著手，實會友之隨在盡心也。<sup>20</sup>

17 Annual Report of W. W. Lockwood, September 1907, p. 161, AQRBV.

18 〈發達可期〉，《會務雜誌》第7期第43號（1910年1月28日），頁2。

19 〈本會之經濟〉，《上海青年》第12卷第42號（1913年12月19日），頁2-3。

20 〈公董會議〉，《會務紀聞》第2冊第30號（1904年12月16日），頁2。「……並希冀有積存餘款，早備明年辦公之用，庶不致有臨渴掘井之虞，是為萬幸。」〈通告會友〉，《會務紀聞》第3冊第33號（1905年12月8日），頁1。

## 二、另闢「財」徑

事實上，上海青年會的財政困難，不僅為局內人所知，在會員間亦已成為公開的祕密。上海青年會擬於1907年底遷入四川路會所，不少會員擔心，嗣後經費支出勢將大增，會費難免隨之增加，遂紛向上海青年會查詢。為回應會員的關注，上海青年會特地在1907年5月出版的《會務紀聞》上，作出不加會費的聲明，以安撫人心：

本會宗旨實為提倡青年獨立之精神，非漁利者可比。近每有會友來會詢問，遷屋後應否加增會費，然同人決不願爭及區區；惟是房屋既大用度必多，若得同志之幫助，兼能介紹新友入會，則敝會同人已受惠多多矣。<sup>21</sup>

值得注意的是，該期《會務紀聞》同時刊登增設名譽會員制度以開拓財源的報導：

上星期本會經濟部董事集議，預算今歲上半年之經費，約尚需洋二千元之譜，爰擬徵求名譽會友五十人，計每年每人納會費洋五十元，庶無拮据之虞，兼可多得會友，想諸同志熱心公益，必能始終玉成其事，同人曷勝翹盼。<sup>22</sup>

駱維廉在該年的報告中說得更清楚：

今年經濟部決定落實的其中一項計畫，是徵求五十名名譽會員（sustaining member），他們每人每年須繳交五十元或以上。……一百名這樣的會員，對於解決我們的財政困

21 〈不加會費〉，《會務紀聞》第5期第13號（1907年5月24日），頁2。

22 〈徵求名譽會友〉，《會務紀聞》第5期第13號（1907年5月24日），頁1-2。

難，將有很大的貢獻。<sup>23</sup>

可見增設名譽會員的舉措是由經濟部提出，旨在紓緩上海青年會所面對的財政困難。要是這個如意算盤能打響，如設想般徵得50位名譽會員，那麼將會為上海青年會帶來2,500元的經費收入，平衡（甚至超過）了上半年的財政支出。

筆者推斷，不加會費聲明與增設名譽會員制度既在同一期《會務雜誌》上宣告，兩項決議亦應曾在上述經濟部會議上一併作出討論。這兩項議決對於上海青年會日後的政策方針，很可能帶來兩方面的重要影響：第一、要是上海青年會期望服務社會上最大多數的人，便必須將會費設定於較低的水平，儘可能減少青年因無法繳付會費，而失去入會接受薰陶的機會。1910年4月，《會務雜誌》裡一篇提及會費問題的報導說：

本年支費共需洋四萬一千元，而所收入之會費不過七千元而已，合之支費得六分之一，即此可見本會所定會費之輕矣。然本會創立之宗旨，原不過欲得多數人材，並不在會費之多寡。<sup>24</sup>

晚至二十年代後期，上海青年會論證其低廉的會費時亦說：

……然則青年會奚為勿增加其會費，曰：青年會為多數力量較薄之青年及童子所最需要。倘將會費加足，則必有人抱向隅之虞，非本會服務社會之本意。青年會自二十五年

<sup>23</sup> Annual Report of W. W. Lockwood, September 1907, p. 161, AQRBV. 「本會因經費支絀，爰議有常年樂助洋五十元以上者，即推為名譽贊成員。」〈表彰盛德〉，《會務雜誌》第6期第21號（1908年10月2日），頁2。

<sup>24</sup> 〈預算度支〉，《會務雜誌》第8期第9號（1910年4月22日），頁2。「或曰：既如此何不增加會費？曰：青年會非富有者之專利品，其利益須中級社會以下盡能享受。」〈募捐之理由〉，《上海青年》第19卷第8號（1920年3月8日），頁3-5。

以來，會員費僅由十二元加至十六元，就經濟演進之比例言之，實為絕無僅有，此誠極堪注意之事宜也。<sup>25</sup>

不過，如第四章所述，要是從一般低下階層的收入來衡量，上海青年會的會費基本上一直並不廉宜。

第二、上海青年會既認識到增加會費的阻力巨大，長遠而言，必須另闢「財」徑，始能維持會務的永續發展。從往後的歷史觀之，上海青年會在會費的問題上，基本上是採取兩種方針：首先，上海青年會既不能在「區區」的會費上下手，那麼便只好以能者多付為原則，向較富裕的一群會員打主意，名譽會員制度的出現便是這種思路的反映。其次，上海青年會既然不能增加會費，另一個增加經費收入的可行辦法，便是將整個「會員的蛋糕」（membership cake）擴大：

……今復有懇者，惟望諸君各自介紹貴友一二人入會，藉以資助本會，而亦益我青年。蓋會友多而經濟裕如，經濟裕如而會務發達，會務發達斯能自立，而無竭蹶之虞矣。<sup>26</sup>

如第四章所述，1907年10月，上海青年會遷入四川路會所辦公以後，發展形勢一如預期樂觀，各式會務推陳出新，《會務雜誌》更需增加篇幅予以報導；<sup>27</sup> 會員人數亦隨之大幅增加：「查去年〔1907年〕歲首，計有會友三百四十六人，至年底則增至四百六十六人，可云盛矣。」<sup>28</sup> 翌年3月，會員人數更進一步增至519人。<sup>29</sup> 大約在此期間，上海青年會亦對會員制度

25 〈上海青年會財政問答〉，《同工》第51號（1926年4月），頁18。

26 〈敬告會友〉，《會務雜誌》第8期第29號（1910年10月21日），頁2。

27 〈會務發達之實據〉，《會務雜誌》第6期第2號（1908年2月28日），頁1。

28 〈駐足以待〉，《會務雜誌》第6期第1號（1908年2月21日），頁1。

29 〈日增月盛〉，《會務雜誌》第6期第4號（1908年3月13日），頁1。

進行了一些改革，由過去的每月制改為每年制，並分會員（full member）和普通會員（limited member）兩種。前者每年須繳交會費 12 元，後者則為 6 元，所享的權利分別在於可用體育場和浴室與否，但均須以預繳的形式支付。<sup>30</sup>

新會員制度相信有以下的優點：第一、實行預繳會費制度，理論上有助解決會員長期累欠會費的問題；<sup>31</sup> 第二、減省了每月收費帶來的額外行政成本，亦令上海青年會的經費周轉更為靈活；<sup>32</sup> 第三、新制為會員接觸和了解青年會的宗旨和活動，客觀上提供了更理想的條件（更長的會期），有助加強會員的歸屬感。然而，在財政壓力日增的背景下，第一和第二項考慮相信最為重要。

上海青年會遷入四川路會所後，經常支出亦再創新高，令業已沉重的財政壓力更形增加，1908 年 5 月《會務雜誌》報導說：

本會度支部預算今歲之支項，計需二萬五千元，比之上年增多有七千元之譜。本會之用度非不可以撙節也，然一經減少則於進步上障礙殊多，以故不得不勉為支持，然亦端賴熱誠諸君子樂為輔助。現擬於近項外，設法再募洋二千五百元，庶敷全年之支項，故近復集議增加贊成會員

30 〈上海基督教中國青年會規例〉，《會所出入總門 (The Open Door)》（上海：上海基督教青年會，1906），頁17；Annual Report of W. W. Lockwood, September 1908, p. 4, AQRBV.

31 〈公董會議〉，《會務紀聞》第2冊第30號（1904年12月16日），頁2。「按例每屆年終，司事人將會中出入款項彙冊回報，奈因會友付款遲早不齊，礙難劃一，刻屆歲終，凡我會友尚有捐款未經付清者，務請及早繳付是荷。」〈捐款付清〉，《上海青年會報》第1卷第14冊（1903年12月25日），頁2。

32 〈現銀往來之制度〉，《會務雜誌》第7冊第20號（1909年6月18日），頁2。

五十人，每人每年各付會費洋五十元……<sup>33</sup>

可以想像的是，在樂觀的發展形勢下，上海青年會根本不可能開倒車，以削減服務的方法來達致收支平衡。<sup>34</sup> 在不能節流的前提下，開源便成為唯一的選項，上海青年會只好再一次向會員呼籲，徵集名譽會員 50 人。<sup>35</sup> 而按當時的財務評估，以上海青年會的規模而論，要長遠維持經常賬目的收支平衡，更有必要將名譽會員人數維持在 100 人的水平以上：「按本會規模既日臻完備，至少須有贊成會友百人，庶足以擴張其範圍。」<sup>36</sup>

上海青年會在徵集名譽會員的同時，亦派出幹事向會員進行募捐；<sup>37</sup> 然而，財政狀況一直未見重大改善：「本會一切事務待擴充者頗多，無如絀於經費，以致願與心違，日前預算本年經費尚需洋一千五百元，尚乞熱心志士竭力扶持……」<sup>38</sup> 1908 年 12 月 1 日，上海青年會幹事向董事部提交報告，指該年度還欠 1,500 元才能收支平衡。董事部經討論後，12 名董事承諾各人募捐 50 元，其餘則須留待會費填補，並提出於 12 月 31 日以前，徵求 1,000 名會員的目標。<sup>39</sup> 從上述的背景可見，上海青年會正是在捉襟見肘的財政狀況下引入徵求「會員」運動。

33 〈借助他山〉，《會務雜誌》第 6 期第 11 號（1908 年 5 月 1 日），頁 1-2。

34 後來在非基督教運動的衝擊下，上海青年會亦不得不縮減服務：「近查每逢禮拜日，洗澡之人甚少，而耗費甚大，現經董事會議決定，於陽曆四月十五號以後，每逢禮拜日暫停洗澡，特此佈告，務請會員諸君注意。」〈體育部緊要通告〉，《上海青年》第 22 卷第 13 號（1923 年 4 月 13 日），頁 16。

35 〈徵求贊成會友〉，《會務雜誌》第 8 期第 13 號（1910 年 5 月 20 日），頁 1。

36 〈善後計策〉，《會務雜誌》第 8 期第 13 號（1910 年 5 月 20 日），頁 2。

37 「本會經費支絀……上禮拜招待員龔〔伯英〕君又在某某諸會友處募得英洋一百五十元。」〈會友之熱心〉，《會務雜誌》第 6 期第 28 號（1908 年 11 月 20 日），頁 2。

38 〈全賴扶持〉，《會務雜誌》第 6 期第 27 號（1908 年 11 月 13 日），頁 2。

39 "The Shanghai Whirl-wind Canvass", *China's Young Men*, vol. 3, no. 4 (November 1908), p. 95.

### 三、初試啼聲

1908年12月18日，《會務雜誌》報導說：「上星期一晚間，計有會友四十人敘餐於會堂，共商徵求新會友如何可達一千之目的，其法擬分四隊旗幟，以黃、紅、藍、綠四色分之盡力徵求。」（詳見附表5-3）<sup>40</sup> 如上所述，徵求1,000名會員的目標早在董事部會議上通過，故此根本不可能是會員當晚集體創作的成果。<sup>41</sup> 事實上，這種後來被中國青年會普遍稱為「徵求會」的徵求會員運動，是借用自起源於十九世紀末、大盛於二十世紀初，在美國青年會廣泛應用的一種被稱為旋風般（whirlwind）、密集式（intensive）的短期募捐運動。自從美國青年會幹事華士（Charles S. Ward）和皮爾斯（Lyman Pierce）在1905年的短短三星期內，為華盛頓青年會募得85,000美元的巨額建築經費而廣為人知，進而被廣泛推廣，以至往後應用於青年會每年的經費募捐運動（annual budget campaign）。<sup>42</sup> 這種短期募捐運動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據統計，美國青年會在1905年以前約半個世紀，總共募得捐款3,500萬美元；然而，在應用這種新方法募捐以後，1905年至1915年的短短十年間，便已募得捐款6,000萬美元。<sup>43</sup>

40 〈徵新會友之辦法〉，《會務雜誌》第6期第32號（1908年12月18日），頁1。

41 戴威廉曾指出，同宗會員該年在餐廳內曾就一些問題作非正式的討論。Annual Report of W. E. Taylor, September 1908, p. 147, AQRBV.

42 據路義思在回憶錄中指出，他在1903年返美期間，此法尚未普及，他仍沿用人力密集的方式，為上海青年會興建會所的經費進行募捐。Robert E. Lewis, *Search of Far Horizons* (West Conshohocken, PA: Infinity Pub., 2004), p. 87.

43 詳參Scott M. Cutlip, *Fund Rais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ts Role in America's Philanthropy*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38-50; C. Howard Hopkins, *History of the Y.M.C.A. in North America* (New York: Association Press, 1951), pp. 596-599; Richard C. Morse著，袁訪貴譯：〈青年會綜轄機關之籌款方法〉，《同工》第37號（1925年1月），頁9-10。



附表 5-3 第一屆徵求會規則（1908）

舉行日期	• 1908 年 12 月 18 日至 12 月 31 日
徵求目標	• 會員總人數增至 1,000 名（包括舊會友）
徵求方法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設立黃、紅、藍、綠四隊。</li> <li>• 各有一隊長領導，另有一幹事協助聯絡。</li> <li>• 會員可自由加入其中一隊。</li> </ul>
計分方法	• 「以多徵新會員為目的，以分數比較勝負。每洋一元作為一分，如介紹得通常會友一人，會費六元即作六分；特別會友為十二分；贊成會員為五十分，或通常改為特別、特別改贊成，當視繳費之數合計分數。」
獎賞辦法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徵求會後設慰勞軍宴，勝隊居上席，敗隊居下席，並須繳付餐費。</li> <li>• 得勝者合照懸掛會中留念。</li> <li>• 會員得最高分者，得金牌一枚。</li> <li>• 每隊得最高分者，得銀牌一枚。</li> <li>• 任何會員得二十四分，於慰勞軍宴上可免餐費。</li> </ul>

資料來源：〈徵新會友之辦法〉、〈徵求隊〉，《會務雜誌》第 6 期第 32 號（1908 年 12 月 18 日），頁 1。

這種被稱為旋風般、密集式的募捐運動的特點是，在一個較短的時期裡，透過大量的義工密集地進行；而其中不可缺少的要素是：「競爭、小隊領袖、徵募義工、明確的時限、仔細的記錄及有效的宣傳。」<sup>44</sup> 1908 年雖然是上海青年會首次舉辦徵求會，相關的操作技巧仍未成熟，還未將這種短期募捐運動的精髓發揮至極（如沒有利用報章等媒體作宣傳），但是從附表 5-3 中已可

<sup>44</sup> C. Howard Hopkins, *History of the Y.M.C.A. in North America*, pp. 596-599.

窺見其中的一些基本元素。例如上海青年會透過《會務雜誌》作大篇幅的跟進報導，以期引起會員的注意：「徵求會友之競爭，頗有深趣。自四隊開戰以來，各具有爭戰之心，目下綠旗為首，其餘各隊進步亦速，斯時正值四隊鏖戰最烈之時……」<sup>45</sup> 同時，亦要求各徵求隊伍每日報告所得的分數，並作妥善的記錄：「每人每日共徵得新會友幾人，應須每晚來會告知，俾登於廣告牌以供眾覽。」<sup>46</sup> 此外，透過每日更新各隊所得分數，從而吸引參加者的注意力，使各隊的競爭意識持續上升：「各隊勝負之比較，每日詳記於木牌懸於會中按時更換。」<sup>47</sup>

#### 四、一鳴驚人

這種嶄新的徵求「會員」運動，為上海青年會帶來了令人意外的驚喜和收穫：

本會為徵求新會友，特組織徵求隊，分隊徵求……竊思是役實為本會之創舉，竟得全體會友如斯之熱心……且新徵入會之友，亦願隸隊，輾轉往徵其相識進會，是以向來未知有青年會者，今後咸知有青年會矣！數日以來，蒞會者半係新徵之會友，於此可見競爭進步之神速矣！<sup>48</sup>

上海青年會在不足兩星期內，一共徵得 384 名新會員（及後修訂為 400 名，另見附表 5-13），<sup>49</sup> 將會員人數推高至 975 人。<sup>50</sup>

45 〈競爭競爭〉，《會務雜誌》第6期第33號（1908年12月25日），頁2。

46 〈徵求隊規則〉，《會務雜誌》第6期第32號（1908年12月18日），頁1。

47 〈徵求會友之大戰爭〉，《會務雜誌》第6期第33號（1908年12月25日），頁1。

48 〈競爭之進步〉，《會務雜誌》第6期第34號（1909年1月1日），頁2。

49 〈徵求隊揭曉〉，《會務雜誌》第6期第34號（1909年1月1日），頁2。

50 〈一千之目的將達〉，《會務雜誌》第6期第35號（1909年1月8日），頁1。

一篇刊登在英文《青年》雜誌上的文章，總結是次徵求會的意義時，以略帶文學味道的筆觸寫道：

這是結束這年度的一種美好的途徑（fine way），它不僅意味著一千名會員，且有更多的意義——它意味著上海青年會的新生活、新動力和新熱忱。<sup>51</sup>

作者似乎並未將話說完，徵求會同時為上海青年會帶來了逾 5,000 元的經費收入（見附表 5-4），解決了該年度的財政危機，相信亦是它的「美好」之處。

在回顧 1908 年上海青年會的發展時，《會務雜誌》有以下的一段總結：

查前年〔1907 年〕之進項，統計只得洋一萬九千元，上年〔1908 年〕之進項計洋三萬元，較之前年相差甚多。由是觀之，上年之發達不待言而知矣。然查上年之進項，約有三分之一係會費及捐款，三分之一係學費，其餘係由別項撥入。再查上年共得贊成會友六十人，故經濟亦因之稍覺寬裕矣。<sup>52</sup>

從附表 5-5 可見，1908 年的確是上海青年會創會以來，財政狀況最為寬裕的時候，該年度的經費收入和支出均有將近 50% 的增長；增幅雖然未居歷年之冠，但所錄得的 1,800 元財政盈餘，卻是歷年最高。查該年的經費收入較前大幅增加，主要得力於新會所提供的租金收入，以及徵求會帶來的會費收入（見附表 5-6），並以前者所佔的比重較大；但可以設想的是，要是沒有徵求會

51 "The Shanghai Whirl-wind Canvass", p. 95.

52 〈略記上年會務〉，《會務雜誌》第 7 期第 6 號（1909 年 3 月 5 日），頁 2。

附表 5-4 第一屆徵求會成績（1908）

徵求隊	黃旗隊	綠旗隊	藍旗隊	紅旗隊	合計
分數（會費）	2308分	1215分	771分	737分	5031分

資料來源：〈改定結局之分數〉，《會務雜誌》第6期第35號（1909年1月8日），頁2。

附表 5-5 上海青年會經費損益表（1901-1908）

年份	經費收入（元）	年增長（%）	經費支出（元）	年增長（%）	盈虧（元）
1901	6,295.49	-	6,255.19	-	40.30
1902	6,659.20	5.77 %	6,629.42	5.98 %	27.78
1903	10,906.62	63.78 %	10,835.20	63.44 %	71.42
1904	11,205.07	2.74 %	11,109.47	2.53 %	95.60
1905	13,306.58	18.75 %	13,179.76	18.64 %	126.82
1906	16,230.28	21.97 %	16,212.00	23.01 %	18.28
1907	18,685.52	15.13 %	18,471.20	13.94 %	214.32
1908	29,364.72	57.15 %	27,564.48	49.23 %	1,800.24

資料來源：Annual Report of CYMCA of Shanghai, 1901, 1903-1908；D. Willard Lyon to Robert E. Lewis, 7 May 1903, p. 2, COR.

所帶來的額外會費收入，上海青年會即或仍錄得財政盈餘，想必亦仍屬「輕微」。我們已隱約可見，徵求會所帶來的會費收入，在上海青年會的整體財政結構裡已佔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由於首屆徵求會的成績斐然，據報導有會員於翌年建議再辦徵求會，以為上海青年會成立十週年之誌慶：

附表 5-6 上海青年會財政收入結構（1907-1908） 單位：元

年份	會費	捐款	日校	夜校	租金	總收入
1907	4,148.00	2,674.63	8,288.10	1,140.00	1,971.50	18,685.52
1908	7,348.50	3,084.26	10,127.50	1,952.00	5,310.95	29,364.72

資料來源：Annual Report of CYMCA of Shanghai, 1907-1908.

近因十年大紀念之期將屆，且觀上年徵求會友之效力，刻有多數會友擬於是月舉行第二次徵求會，蓋因非此舉不足以彰十年紀念之盛事也。此次徵求會所應行之要務，乃欲得上年新入會之會友續繳會費，故凡續繳會費之會友，皆視為今年之新會友而歡迎之也。<sup>53</sup>

筆者不懷疑這種嶄新、刺激的玩意會為會員所歡迎，但更相信的是，徵求會所帶來的「經濟效力」，同樣教關注上海青年會財務狀況的一眾董事有欲罷不能之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自 1909 年開始，徵求會遂成為既徵求新會員，亦鼓勵舊會員更新會籍的年度盛事。<sup>54</sup>

## 第二節 徵求會的操作形式

在理想上，我們以為美國是世界上青年會最發達的一個國家，那麼他們的徵求會是要怎樣的緊張，熱烈呢！誰知事實上正正相反，不但徵求會的規模沒有我們的宏大，就是

<sup>53</sup> 〈舉行第二次徵求會〉，《會務雜誌》第7期第35號（1909年12月10日），頁1。

<sup>54</sup> 「本會會友內有六百人係去年入會者，至今所付會費已屆期滿，本會不得不設法使各會員連續入會。」〈徵求會之宗旨〉，《上海青年》第11期第33號（1912年12月6日），頁2。

內容和組織亦不及我們的嚴密和熱鬧。<sup>55</sup>

我們在下文會嘗試以較動態的手法，勾勒一個徵求會從籌備到結束的詳細經過，從而深入剖析這種短期募捐運動的操作形式，及其所能發揮巨大「效力」的因由；並以1922年的徵求會作為例子，以反映二十年代中國青年會最典型的徵求會型態。<sup>56</sup>

## 一、事前準備

### （一）預備會議

上海青年會對每年一度的徵求會，均予以高度重視，有關的具體安排例必由董事部議決通過，絕非會員集體創作的成果。<sup>57</sup> 以下是一段有關1912年徵求會籌備情況的記述：

上禮拜六，本會設宴恭請去年徵求會出力人員聚餐於會食堂，並提議本年徵求會事，在座諸人莫不興高采烈……是日主席者為華總幹事曹君，將開會宗旨及一切辦法向眾報告，嗣後聶管臣、龔伯英、張廷榮諸君相繼演說，極表贊成並聲明意見。當時舉定丁汝霖、龔伯英、張廷榮及幹事部李鐘藩、費吳生為執行部，以便選舉職員及分派隊伍，該執行部已經聚議一次，其所指〔主〕張辦法

55 楊恕：〈從我們的徵求會想到美國的善捐〉，《上海青年》第37卷第8期（1938年4月30日），「第卅八屆徵求成績總報告特號」，頁8。

56 「滬會自創始以來，已歷三十三年之久，曾舉行三十三次徵求會，幾無一之不成功。在此數十年中，每年目標不同，而以一九二二年舉行之第廿二屆徵求會之成績為尤佳，共計徵得六萬七千分，是年蓋亦全國青年會事業最盛之時期也。」陸幹臣：〈從滬會本屆徵求的成功說到吾會的徵友運動〉，《同工》第132期（1934年5月），頁3。

57 「……故日前董事部議決於西曆十二月中開第三次徵求大會。」〈聲氣相投〉，《會務雜誌》第8期第32號（1910年11月11日），頁2。另參〈四次徵求會友之預備〉，《上海青年》第10期第33號（1911年11月23日），頁1。

當於下星期宣布。本年仍分藍、紅、綠、黃四隊，去年之隊長、副隊長多半可仍其舊，屆時必有一番踴躍之氣象也。<sup>58</sup>

從上述的報導可見，早在當晚的宴會以前，董事部已就該年徵求會的詳情拍板定案，在宴會上只不過是作出報告而已。值得注意的是，並非所有會員均會獲邀出席，只有上屆徵求會的「出力人員」（當然是指在上屆徵求會中獲得優異表現的少數隊長、副隊長及隊員）才獲得邀請。是次宴會基本上是一次籌辦新一屆徵求會的預備會議，旨在向出席人士報告徵求會的籌備詳情，同時邀請幾位友好會員發表支持言論，鼓勵他們是年再作馮婦。

是次宴會的結果大致符合預期的設想，與會人士大部分答允出任來屆徵求會的核心成員，並隨即成立了一個由中、西幹事和會員組成的籌備委員會，接續執行「選舉職員及分派隊伍」等具體工作。及至 1910 年代以後，隨著華人幹事的素質漸次提升，能獨當一面管理個別部門的日常運作，徵求會的統籌工作漸由會員部的華人幹事全權主理：「會中近有詢及徵求會者，本會今已派會友部幹事李鐘藩君籌備一切，大概須先組織一委辦，不久當能見其通告。」<sup>59</sup>

## （二）邀請隊長

究竟能廁身徵求隊長行列的人有沒有一些共同的特點？這裡借用群體生平學（prosopography）的研究方法，對 1908 年

58 〈徵求大會〉，《上海青年》第11期第34號（1912年12月13日），頁7。

59 〈一九一三年之徵求會〉，《上海青年》第12卷第39號（1913年11月21日），頁14；「……現今會員科正在敦請隊長隊員，以及籌備一切進行事宜。」〈本會徵求會之第一聲〉，《上海青年》第19卷第1號（1920年1月2日），頁3。

至 1922 年間先後多次出任徵求隊長的 97 人（人次），作簡單的生平背景分析（見附表 5-7）。<sup>60</sup> 首先，我們看不見他們有任何明確的籍貫分布或傾向，如第二屆徵求隊長中，宋耀如、鄭遜卿二人均祖籍廣東；第五屆徵求隊長中，聶雲台、聶管臣昆仲均祖

附表 5-7 歷屆徵求隊長背景（1908-1922）

年份	徵求隊長及其從事行業				
1908	張汝舟 仁濟醫院醫生	張子震	戴古臣 美以美會牧師	吳印滋 豐泰洋行？	
1909	張子震	陳忠立 坦文公館律師	鄭遜卿	蘇振廷	
1910	朱馥齡	吳印滋 豐泰洋行？	鍾萼雲 招商局	蘇振廷	
1911	宋耀如 阜豐麵粉公司	王西星 同茂盛號	吳印滋 豐泰洋行？	鍾萼雲 招商局	
1912	聶管臣 恒豐紗廠	丁汝霖 鼎餘絲號	聶雲台 恒豐紗廠	凌潛夫 湖北水泥廠	
1913	卓康成 浚浦局工程師	聶雲台 恒豐紗廠	王閣臣 漢冶萍公司	周錫三 大陸報館	
1914	袁履登 寧紹輪船公司	黃嘉懋 青年會中學	聶雲台 恒豐紗廠	周錫三 大陸報館	
1915	李觀森 捷行公司	余伯才 元芳洋行	聶雲台 恒豐紗廠	張嘉甫 列豐行經理	黃嘉懋 青年會中學
	陳忠立 坦文公館律師	徐紉蓀	林桂慶 青年會中學	周憲章 中華眼鏡公司	周錫三 大陸報館

<sup>60</sup> 有關的研究方法，詳參何佩然：〈群體生平學與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人文學刊》第3期（1994年5月），頁36-41。



1916	聶雲台	徐叔仁	宋漢章	黃榮輝	余伯才
	恒豐紗廠	安利洋行	中國銀行	金星保險公司	元芳洋行
1917	周憲章	黃嘉懋	林桂慶		
	中華眼鏡公司	滬寧鐵路公司	青年會中學		
1917	宋漢章	李觀森	聶雲台	林桂慶	周憲章
	中國銀行	匯發公司	恒豐紗廠	青年會中學	中華眼鏡公司
1919	余伯才	羅泮輝	林齊恩	石運乾	
	元芳洋行	滬甯鐵路	復旦公學	寧紹輪船公司	
1919	周憲章	盧緯卿	聶雲台	吳蘊齋	陳漢明
	中華眼鏡公司	信亨洋行	恒豐紗廠	金城銀行	字林西報
1920	劉錫基	聶管臣	袁履登	林幼城	R. P. Roberts
	先施百貨公司	恒豐紗廠	洋行買辦	慎昌公司	
1920	李揚吾	聶雲台	朱葆三	穆藕初	錢新之
		恒豐紗廠	四明商業銀行	厚生紗廠	交通銀行
1921	駱懷白	盧緯卿	韓玉麟	陳蘭鈞	歐彬
	中法大藥房	信亨洋行	中國運輸公司		先施百貨公司
1921	陳漢明	席聚星	王正廷	張孝若	湯節之
	字林西報	住友銀行	華豐紡織公司	南通紗廠	廣肇公所
1922	林桂慶	田汝霖	唐露園	韓玉麟	王恭寬
	青年會中學	震升恒木號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中國運輸公司	交通銀行？
1922	潘志銓	聶雲台	李觀森	錢新之	袁履登
	怡和洋行	恒豐紗廠	匯發公司	交通銀行	寧紹輪船公司
1922	張嘉甫	徐叔仁	楊梅南	林幼城	許秋驪
	列豐行經理	東方紗廠	匯豐銀行	慎昌公司	江蘇省交涉使
	周茂蘭	王叔賢			
	大牲堂文明藥房	競成造紙廠？			

資料來源：歷屆徵求會資料（1908-1922）

說明：底線代表該隊長為基督徒

籍湖南。其次，徵求隊長亦毋須由同宗會員出任。據筆者不完全的統計，在這 97 名徵求隊長中，可考的基督徒只有 41 名，比重約佔四成二；其中有部分人早在皈信基督教以前便已出任徵求隊長，如前述聶雲台在 1915 年受洗加入教會，但在此前他已出任徵求隊長三次；故此同宗會員的實際比例應該更低。而在這將近四成半的基督徒徵求隊長中，絕大部分均為現職或曾任職上海青年會的董事或職員（另參附錄七）；部分更曾多次出任徵求隊長，如聶雲台多達 9 次、周憲章則有 4 次，相信是與董事或職員身先士卒起帶頭作用有關；當然亦不能排除因為他們是徵求會的「出力人員」的緣故，而被推薦出任上海青年會的董事。

仔細考察歷屆徵求隊長的職業背景，當可發現可考的至少有 60 人任職於工商界，佔全體人數約三分之二強（實際人數相信更多）。<sup>61</sup> 他們所從事的行業，包括工業、金融、零售、貿易、航運、報業等多個不同領域的現代企業，大部分在所屬企業中均身居要職，不少人更是所屬行業的翹楚（宋漢章）；更有經營多個行業的實業家（朱葆三）；從家世背景而論，有與傳統官僚關係密切的紳商（聶雲台）、有白手興家的買辦（李觀森）、曾在外國留學的年輕企業家（錢新之）等，不一而足。總的來說，他們都是當時得令的社會菁英，不僅具有社會聲望和地位，更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及人脈關係。可見，上海青年會最倚重的徵求隊長，主要是來自社會上最具影響力的上流人物，並期望透過他們的社會影響力，發揮吸納會員的最大效益。<sup>62</sup>

61 「徵求隊長均係海上巨商。」〈民國九年即一九二〇年本會全年會務報告〉，《上海青年》第20卷第18號（1921年6月3日），頁5。

62 1910年的一則報導說：「例如其中一人便徵得上一位銀行家。」W. W. Lockwood to My Dear Friends, 4 January 1910, COR.

### (三) 增設總隊長

迨至 1920 年，上海青年會在各徵求隊長之上增設總隊長（*generalissimo*）一職，由上海青年會榮譽會長王正廷出任，翌年則由聶雲台出任。增設總隊長的舉措相信有兩個可能的原因：第一、邀得政、商名流出任總隊長，有助提升上海青年會的社會地位。<sup>63</sup> 上海青年會或許期望以名人效應，發揮招徠會員的廣告作用：「總司令王正廷專使，亦於昨日專乘汽車，往各處徵求，奔波終日。」<sup>64</sup> 第二，挾總隊長在所屬界別的影響力（壓力？），可以發揮一些上海青年會無法達至的效果：

本屆徵求會開幕以來，倏逾二旬，揭曉成績極佳，而總隊長聶雲台君以目前雖得二萬餘分，然離閉幕之期（三月十二）轉瞬即屆，若不急事綢繆，恐難收完美之效果。特於五號午間，假交通銀行樓上聯華總會，邀宴各隊長各參謀籌商最後之勝利……席間由聶雲台君演說，鼓勵精神，在座諸君無不滿意，盡歡而散。<sup>65</sup>

有關此舉所衍生的種種問題，我們在下文評論徵求會的成效時將再作討論。

63 齊守成回憶說：「張學良也就成了青年會的名譽會員，使青年會提高了聲望。」齊守成：〈瀋陽（奉天）男女青年會概略〉，《瀋陽文史資料》第9輯（1985年），頁138。

64 〈青年會徵求會之成績〉，《申報》，1920年3月20日，第3張，第10版。

65 〈徵求之盛況〉，《上海青年》第20卷第7號（1921年3月4日），頁3-4。「武昌青年會最主要的活動是徵友運動，就是把社會上各行各業中所謂『知名人士』大都吸收為會員。如此，一則可以擴大青年會在社會上的影響，另則可以藉此增加收入，一舉兩得。……該會每次徵友皆請政府的負責人做總隊長，以利號召大大小小的公務員為會友。」王同：〈武昌基督教青年會的活動〉，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華文史資料文庫》，第18卷（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頁914。江西贛州青年會後來的情況是，以蔣經國的名義發信，邀請社會人士出任隊長，並附上入會書。蔡智傳：〈青年會與蔣經國〉，《江西文史資料》總25輯（1987年9月），頁155。

#### （四）組成隊伍

接下來討論的是分派隊伍的具體安排。徵求會的其中一項特點是，動員數量龐大的義務隊員進行持續徵募，較傳統的小規模、獨立徵募形式，更能營造徵募氣氛和增強隊員士氣，進而發揮更大的徵募效果，產生所謂的「鯰魚效應」(catfish effect)。<sup>66</sup> 從附表 5-7 可見，早期的徵求隊伍只有 4 隊，迨至 1915 年遽增至 10 隊，往後的隊伍數目時有增減，大體上仍維持在 8 至 10 隊不等，惟在 1922 年卻增至歷屆最多的 12 隊。徵求隊伍數目的多寡，客觀上固然取決於會員的參與意願；但是徵求隊伍的總體數目持續增加，可能反映加劇競爭以締造佳績的傾向：「徵求之所以分隊，當然是為組織，同時亦為競爭。此種服務事業，如能鼓勵競爭，大可增進效率……各隊踴躍上前，爭先恐後，獎勵之道，良有益也。」<sup>67</sup>

附表 5-8 是 1922 年的徵求會組織架構，總隊長由上海青年會總幹事曹雪廣出任，下分徵求隊 12 隊，每隊包括隊長 1 人，下設支隊長 1 至 5 人不等，可能亦有層壓式的分工意味；<sup>68</sup> 此外，每隊有幹事 2 人協助聯絡，另有隊員 50 人。

徵求隊伍的隊員人數和分配準則迭經變遷。1908 年的徵求隊共分四隊，紅隊由基督徒會員組成，綠隊由商界人士組成，藍隊

66 駱維廉形容 1910 年所舉行的徵求會說：「從一開始便充滿競爭 (rivalry)。」W. W. Lockwood to My Dear Friends, January 4, 1910, *COR*.

67 陸幹臣：〈從滬會本屆徵求的成功說到吾會的徵友運動〉，頁 5。「(問) 徵求會為甚麼要分隊？(答) 因為分了隊就有競爭，有了競爭就有精神。」〈關於徵求會的問答〉，《上海青年》第 22 卷第 8 期 (1923 年 3 月 9 日)，頁 3。

68 「據云其全隊 [藍隊] 又分為數小隊，各有工藝、商務、財政、教育等名。」〈藍隊〉，《上海青年》第 11 期第 38 號 (1913 年 1 月 10 日)，頁 2。

附表 5-8 1922 年上海青年會徵求會組織架構

總隊長	青年會總幹事曹雪賡											
隊名	和平隊	建設隊	自由隊	服務隊	互助隊	平等隊	人道隊	解放隊	犧牲隊	正義隊	奮鬥隊	博愛隊
隊長	聶雲台	潘志銓	李觀森	錢新之	袁履登	張嘉甫	徐叔仁	楊梅南	林幼城	許秋驪	周茂蘭	王叔賢
支隊長	張炳榮、馮少山、劉錫基、 陳勇三、吳南浦	袁近初、傅品圭	陳漢明、韓玉麟、卓鏞詩	楊淞生、冷禦秋	李競雄、俞斌祺、 程少白、俞志清、王巧生、	倪文炳、孫蘭生	陸子星、徐雪階		李登輝、沈問梅	楊小堂、 黃宇平、朱廣石、沈卓吾、	樓恂如、 袁履登、石運乾、駱懷白、	卞毓英
幹事	陳維新、李嘉惠	姚繼唐、毛恭亨	郝伯陽、楊舞心	凌希陶、顧光祖	朱文瑞、鮑九思	宋福華、嚴友生	許長卿、童雲六	彭少雲、楊益憲	蕭元恩、吉爾達	費吳生、李峻華	張天培、胡詠莢	朱翅翹、祁士
隊員	各隊五十人											

資料來源：〈青年會二十二週紀念徵求大會職員銜名〉，《上海青年》第 21 卷第 3 號（1922 年 1 月 23 日），「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第二十二週紀念徵求大會第一號特刊」，頁 10。

由體育部會員組成，黃隊則由廣東籍的會員組成。<sup>69</sup> 我們雖然看不到一套客觀的分配準則，但相信並不是毫無章法可言。可以

<sup>69</sup> "The Shanghai Whirl-wind Canvass", p. 95.

推斷，上述的四隊組合應為上海青年會內四個人數相約或同質性（homogenous）較強的群體，這樣的安排相信有助提升隊伍的凝聚力，同時加強競爭氣氛。據當時擔任黃隊聯絡工作的幹事梁小初憶述：

我還記得我隸屬於「黃隊」，以粵籍會友組成，我擔任聯絡，隊長是鄺遜卿。……他對此事極為起勁，識人又多，故此成績非常之好。其他粵籍隊員，也有超乎尋常的表現，全場結果鄺個人得分最多，名列前茅。黃隊成績為各隊之冠。<sup>70</sup>

其他隊伍的實際情況當然有異，但基本原則相信大抵相同。

而當徵求隊伍的基本班底組成以後，其他會員便可以自由加入。大約在 1912 年，其他會員改為平均分配至四隊旗下，相信是以公平競爭為原則：

本次徵求會仍分四隊，每隊隊長一人，副隊長四人，每一副隊長又可挑選軍曹十人，故會中領袖約有二百餘人以外，更擬將全體會員分遞四隊，故每隊中約有五百餘人。<sup>71</sup>

但是在 1914 年又改回自由參與的方法：「凡願入隊徵求者，請至事務所報名可也。」<sup>72</sup> 分配辦法的改變可能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宏觀調控的失效。前面已經指出，上海青年會早期業已存在會

70 梁小初：《未完成的自傳：七七回憶錄》，頁45。查當時黃旗隊隊長為吳印滋，或許是因為鄺遜卿最終以672分摘冠，致令梁氏留下深刻印象，出現記憶有誤的情況。

71 〈領袖〉，《上海青年》第11期第33號（1912年12月6日），頁2。「凡屬會友皆已編列入部協助徵求。」〈各徵一友〉，《上海青年》第10期第34號（1911年11月30日），頁3。

72 〈徵求會友會〉，《上海青年》第13卷第40號（1914年12月25日），頁2。

員流動性高的問題，加上不同的會員各自帶著不同關懷入會，會員的整體投入程度並不太高。要是平均分配會員的舉措僅屬一紙虛文，那倒不如由各徵求隊長自行徵募隊員，會員按各自喜好自由參與，效果可能來得更好。第二、是徵求隊員多寡並非致勝關鍵，「……然最要者係領袖，領袖得人則事半功倍矣」。<sup>73</sup> 要把徵求會辦得成功，最重要的要素是——「領袖得人」。能夠「得人」的領袖，當然是指上述那些具經濟實力、人脈關係的工商界菁英。他們個人的社會地位和聲望，以及伴隨而來的動員隊員的能力，才是決定徵募成績的關鍵。

## 二、正式揭幕

### (一) 時限、目標、獎勵

當人事安排完成後，上海青年會便會邀請各徵求隊伍的核心成員出席開幕大會（pre-drive dinner），正式公布徵求會的目標、規則及獎勵方法等詳情；為隆重其事，往往會邀請具名望的社會人士發表演說，既可吸引公眾關注，亦有助激勵參加者士氣：

中午為各隊隊長、幹事在本會食堂敘餐，籌商徵求會進行事宜，到會者有二、三十人，席間由會長王正廷、總幹事曹雪廣闡述外，並由會員部幹事湯仁熙分送職員名單、徵求簡章，各隊職員互相討論進行方法，……至二時餘始盡興而散。<sup>74</sup>

與此同時，在開幕大會上亦會宣告幾項啟動徵求會的重要元素。首先，是一個短期的時限。據美國青年會的經驗昭示，時限設計

73 〈領袖〉，《上海青年》第11期第33號（1912年12月6日），頁2。

74 〈廿二週徵求會之進行〉，《上海青年》第21卷第2號（1922年1月13日），頁4。

源自宣傳的角度考慮，目的是維持報章持續報導的興趣；要是徵求會為期太長，有關的報導便會成為舊聞，無法持續喚起讀者的注意。<sup>75</sup>

從附表 5-9 可見，上海青年會歷屆的徵求會，除了第一屆為兩個星期，以及偶爾特別延長期限以外，<sup>76</sup> 一般約為時三至四星

附表 5-9 歷屆徵求會會期及目標（1908-1922）

屆次	開始日期	結束日期	期間(日)	目標
1	1908年12月18日	1908年12月31日	14	1,000名會員
2	1909年12月13日	1910年1月3日	22	-
3	1909年12月14日	1911年1月6日	24	1,500名會員
4	1911年12月15日	1912年1月5日	22	-
5	1912年12月20日	1913年1月17日	29	-
6	1913年12月15日	1914年1月10日	27	-
7	1914年12月21日	1915年1月11日	22	2,000名會員
8	1915年12月8日	1916年1月3日	27	2,000名會員
9	1916年12月6日	1917年1月3日	28	1,500名會員
10	1917年12月5日	1918年1月5日	32	1,600名會員
11	1919年2月12日	1919年3月5日	22	2,500名會員
12	1920年2月28日	1920年3月20日	22	2,760名會員
13	1921年2月16日	1921年3月12日	25	45,000元
14	1922年2月8日	1922年3月4日	25	60,000元

資料來源：歷年徵求會資料（1908-1922）

<sup>75</sup> Scott M. Cutlip, *Fund Rais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ts Role in America's Philanthropy*, p. 45.

<sup>76</sup> 「今第五次徵求會開幕以來，各隊甚形踴躍，今將閉會之日改至正月十七號，蓋為時太促，則不能竣事也。」〈徵求會友熱〉，《上海青年》第11期第37號（1913年1月3日），頁4。



期。<sup>77</sup> 至於徵求會的舉行時間，自首屆起均為西曆年尾以迄翌年初，相信有便於編制來年財政預算（量入為出）的考慮；<sup>78</sup> 加上自 1909 年起需解決舊會員會籍屆滿的問題，徵求會的舉行時間遂固定下來。迨至 1919 年，上海青年會為避開年終結算的繁忙時段，徵求會遂改為農曆新年以後舉行：

本會董事部決議，自今年起改定每歲農曆二月，為徵求會正式開幕之期。因在此期內，對於徵求會員之手續為力較易。蓋每當陽歷年終，吾會員各有專司，公務不免加繁，若再欲盡力於本會，雖熱忱所至其如鮮暇乎！故此次徵求會之改期，已得多數會員贊許。<sup>79</sup>

持平而言，時間的改動的確建基於上海青年會所面臨的實際困難，如 1910 年的一則報導說：「歲將暮矣，是月也，既有徵求會之競爭，又須清查全年進支賬目，事務之繁甚於常日。」<sup>80</sup> 但卻並不足以解釋這個遲來的更動；遷就大部分任職商界的徵求隊長，相信才是更重要的原因：「……然本會會員商界佔其多數，每屆年終公務加繁，若再欲其盡力於本會，其勢所難兼顧。」<sup>81</sup>

在宣告徵求時限以後，上海青年會同時會揭櫫一個明確的

77 「徵求會行將開幕矣！徵求期限仍循曩例，以三星期為率。」〈說徵求會〉，《上海青年》第13卷第39號（1914年12月18日），頁10。

78 城市青年會的經濟管理辦法提及籌募經費時間：「當於歲首行之，不得避至歲暮及節下。」《青年會第一次幹事會報告》（上海：基督教青年會，1912），頁10。

79 〈第十一次徵求會員大會簡章〉，《上海青年》第18卷第24號（1919年1月24日），頁10。

80 〈佳節之慶祝忙〉，《會務雜誌》第8期第38號（1910年12月23日），頁2。

81 〈民國七年即西歷一千九百十八年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報告〉，《上海青年》第18卷第16號（1919年5月2日），頁6。另參Annual Report of George A. Fitch, September 1919, p. 2, AQRBV.

目標，以調動隊員的積極性，在徵求期限屆滿前共同向目標奮進（附表 5-9）。為加強徵求隊員的危機感和警覺性，「目標時鐘」（campaign clock）或「目標溫度計」（campaign thermometer）是短期募捐運動不可少的一個工具。它的設計形式不一，旨在將徵求會的時限作一種戲劇化的表達，為隊員在截止日前達成目標添加壓力。<sup>82</sup> 上海青年會大概在 1913 年或以前便開始應用此法：

幹事克樂愷君現在會中置飛艇四艘，代表徵求會中四大隊，此四飛艇將繞地球飛行一周……以上凡得會費洋壹元可行十英里，各隊隊員務須盡力徵求，俾本隊飛艇得早日返滬。<sup>83</sup>

該年的四隊徵求隊伍分別以飛艇（飛機）命名，為進一步營造戲劇效果，西幹事克樂愷特別製作了一個地球模型，同時以四架飛機圍繞地球飛行，代表四隊徵求隊伍的競爭情況；另以徵募得的會費轉化為飛行里數，最快返滬的飛機即代表奪標的隊伍。這種戲劇性的道具頗有噱頭，容易引起公眾和報章的關注。<sup>84</sup>

為鼓勵隊員在期限前達成目標，每年的徵求會均設立不同的獎

<sup>82</sup> Scott M. Cutlip, *Fund Rais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ts Role in America's Philanthropy*, p. 45.

<sup>83</sup> 〈飛艇繞地球而飛〉，《上海青年》第12卷第44號（1913年12月26日），頁1。福州青年會也曾在1911年的徵求會時製造一具「目標時鐘」，有關圖片可見Ryan Dunch, *Fuzhou Protestants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hina, 1857-192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60.

<sup>84</sup> 「其事務所中自南至北，懸有軍艦橫形十具，以分數之多寡定先後……復由海軍署借得鋼製小兵艦一艘，陳列中間，頗增特色，且足鼓勵隊員之豪興。」〈青年會徵求會二次同樂大會〉，《民國日報》，1920年3月13日，第3張，第11版。「……旁置目標轉輪一具，計分十二齒，每齒一隊，標明升降，圓轉如意，自五百分至五十分，按數推移，以表示各隊每次揭曉分數之多寡，即知各隊進行之遲速。」〈青年會徵求大會再紀〉，《申報》，1922年2月10日，第4張，第14版。另參梁小初：《未完成的自傳：七七回憶錄》，頁66。

項予以嘉許（附表 5-10）。仔細研究獎賞的內容和細則，當可發現背後似乎存在巧妙的設計。徵求會以隊制進行，遂設立團體獎項以資激勵；但為了慎防隊員間存有互相倚賴的心態，沒有竭盡所能的動力，故另設更多的個人獎項（為團體獎項數目的三倍）作為誘因。當然，要奪得這些個人獎項並不容易，故在每隊中另設個人獎項，既可增加個人得獎的機會，亦可刺激同隊隊員間互較長短；即或參加者對所屬隊伍沒有歸屬感，他仍可單純為個人而戰；而個人不可同得二獎的規則，大概是為免個別會員獨攬多個獎項，減損個別會員的競爭意欲，無助推高整體的徵求成績。

附表 5-10 徵求會獎賞細則（1922）

獎賞細則	
個人獎項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個人得百分以上，鐫姓氏於紀念銅牌，另贈感謝狀</li> <li>• 個人得分最高三名各得金牌一方</li> <li>• 個人徵得會員最多的三名各得金牌一方</li> <li>• 得童子會員最多得金牌一方</li> <li>• 隊中得分最多得金質表墜一枚</li> <li>• 隊中個人得300-500分贈呢旗一方</li> <li>• 隊中個人得500-1000分得贈金針一枚</li> <li>• 50分以上免費享用慶功宴</li> <li>• 連續五年參加徵求會，同時得百分以上得特別紀念品</li> </ul>
團體獎項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得分最多一隊的合照懸掛於會所</li> <li>• 得童子會員最多贈以紀念旗懸掛會所內</li> <li>• 得勝隊在慶功宴上例推首座</li> </ul>
備註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個人不可同得二獎</li> </ul>

資料來源：〈青年會二十二週紀念徵求大會簡章〉，《上海青年》第21卷第2號（1922年1月13日），頁12、13、15。

平心而論，對於大多數徵求隊長來說，上述的獎項並不十分吸引人，更有隊長自掏腰包贊助獎品。<sup>85</sup> 可見物質的獎賞並不足以解釋會員參加的動機，特別是對於徵求隊長而言，勝利的顯榮、社會地位的肯定可能才是最大的獎賞。<sup>86</sup> 可以說，整個獎賞細則的設計是以物質及名譽作為誘因，激發會員在不同層面進行競爭，從而獲得最佳的徵求成績。<sup>87</sup>

### 三、舉行期間

#### （一）幹事疲於奔命

徵求會揭幕以後，青年會幹事節奏急促的生活才正式展開。上海青年會會所內特設徵求事務所，由會員科幹事主理；另派專人當值，傳達各隊的最新消息，以及收取會費、繕發會證等事宜。此外，為進一步令競爭氣氛升溫，會所內外亦作精心布置，發揮對外宣傳作用：「門首懸有徵求大會旗幟，飄揚空中，光耀奪目。會所內張掛捷足先登四大字。」<sup>88</sup> 由於徵求會的成敗茲事

85 〈江天隊徵求隊員之特別獎品〉，《上海青年》第18期第3號（1919年1月17日），頁4。

86 「自徵求會開幕之始，聶君自朝至暮，專心於此錦標之得，誰曰不宜。」〈聶君管臣奪得錦標歸〉，《上海青年》第10期第40號（1912年1月11日），頁2。「是晚募捐部議長聶君管臣對眾宣言謂，吾料不出陽歷十二月三十一日，定能籌足全數，一時各隊隊長聞之歡欣鼓舞……」〈捐期議定延長〉，《上海青年》第11期第20號（1912年7月21日），頁3。「本會每逢有事，聶君無不熱心贊助。」〈第八次徵求大會之盛況〉，《上海青年》第15卷第1號（1916年1月12日），頁2。唐日安便指出，青年會充分掌握中國傳統慈善行為中沽名釣譽的特點。參Ryan Dunch, *Fuzhou Protestants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hina, 1857-1927*, p. 156.

87 「此次非但獎勵得分，更且獎勵得人，今年會友增加，捐款亦多，深佩全體之努力，亦覺獎勵之得策。」陸幹臣：〈從滬會本屆徵求的成功說到吾會的徵友運動〉，頁5。

88 〈青年會徵求大會再紀〉，《申報》，1922年2月10日，第4張，第14版。「該會門首懸有徵求大會大旗一面，中畫紅三角形標幟，橫列中國之曙光五字，藍地白字。……大堂外高懸造就人格之大運動八大字……」〈青年會徵求會二次同樂大會〉，《民國日報》，1920年3月13日，第3張，第11版。

體大，全體董事、幹事幾近總動員，全力參與，<sup>89</sup> 上海青年會的日常運作難免受到影響：

本會自徵求會後，事務繁瑣，各幹事責有攸歸，殊形忙碌，以故不克與諸君一一把晤，良用歉然。倘荷臨蒞備極歡迎，如需詢問一切，請向事務所接洽，自當竭誠詳告……如有不周之處，尚望勿吝賜教。<sup>90</sup>

在徵求會舉行期間，《上海青年》有時只刊登徵求成績及廣告，其他活動消息亦一概付諸闕如。<sup>91</sup>

此外，早期幹事每日要公布徵求成績兩次：「各部分數每日限上午十二時及下午六時揭出，尚望諸君來會試觀，每日之報告君曾獲得分數否？」<sup>92</sup> 自 1912 年起改為每天晚上六時發布一次：「徵求會開會後，每日下午六點鐘當將成績發表。」<sup>93</sup> 每日更新成績的安排，配合「目標時鐘」製造的戲劇效果，再邀請徵求隊員出席瀏覽，以提升競爭的熱度。<sup>94</sup> 及至 1920 年，徵求會在公布成績安排上再創新猷，改為每星期公布一次，每星期獲

---

89 全國協會有關城市青年會的籌募方法指引指出：「首當同心協力，以收指臂之效，或作短期之募捐競爭，集董事部會員及幹事等之全力為之。」《青年會第一次幹事會報告》，頁10。

90 〈敬告會員〉，《上海青年》第21卷第10號（1922年3月24日），頁3。「該室管理員近日又因徵求會員，不克照常入室照料，今自下星期一起，暫時將該室關閉，俟至陰曆新正再行開放云。」〈藏書室停止開放〉，《上海青年》第22卷第5號（1923年2月2日），頁4。

91 參〈第一次揭曉徵求分數〉，《上海青年》第21卷第5號（1922年2月17日），頁3；〈三次揭曉記〉，《上海青年》第21卷第7號（1922年3月3日）。

92 〈一九一一年之徵求大會〉，《上海青年》第10期第37號（1911年12月21日），頁1。

93 〈發表成績〉，《上海青年》第11期第35號（1912年12月20日），頁2；另〈請到會中來〉，《上海青年》第12卷第44號（1913年12月26日），頁1。

94 駱維廉說：「熱情是具有傳染性，每天的公佈均被密切的瀏覽（closely scanned）」。W. W. Lockwood to My Dear Friends, 4 January 1910, COR.

最高分的三隊，可依排名先後獲加獎分，分數由獨立人士加入。新安排最巧妙的地方是，以獎分作為誘因，為競爭的氣氛進一步加柴添火；同時採取多回合而又各自獨立的形式進行，使一次成敗不足以定輸贏，理論上每星期均是新一場比賽，以維持各隊員長期參與的熱忱。<sup>95</sup> 在每星期公布成績時，更會隆重其事，設有名人演講等節目，以引起更廣泛的關注；<sup>96</sup> 此舉既收宣傳推廣之效，亦有助營造競爭氣氛，出席人數可達六、七百人。<sup>97</sup>

## （二）競爭劇烈

各徵求隊伍在徵求會揭幕以後，例必舉行定期集會，此舉在採取每星期公布成績以後，變得更為重要：

本星期徵求各部均已分派齊備，每部部長參謀司令等，均開特別會議籌畫進行之策，紅旗部會於本星期二，黃藍兩部會於星期三，綠旗部會於星期六，大概各部議定，每星期聚集一次，以便籌商辦法云。<sup>98</sup>

各徵求隊長大多會在酒家設宴款待隊員，同時評估最新情況和檢討未來的策略。此舉旨在凝聚隊員的向心力，維持隊員的士氣。下面會以 1922 年的徵求會作為分析個案，探討這種分階段的競

95 「聞星期三為各隊分數第一次揭曉之時，現在各隊均奮勇進行，冀獲勝利云。」〈青年會徵求大會四紀〉，《申報》，1922年2月13日，第4張，第14版。

96 「屆時務祈各隊全體偕友臨蒞，爭奪錦標並襄盛舉。」〈注意〉，《上海青年》第21卷第4號（1922年2月10日），「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第二十二週紀念徵求大會第二號特刊」，頁8。

97 〈第一次揭曉徵求分數〉，《上海青年》第21卷第5號（1922年2月17日），頁3。

98 〈徵求部分之齊備〉，《上海青年》第10期第35號（1911年12月7日），頁1。另參〈青年會徵求大會三紀〉，《申報》，1922年2月12日，第4張，第14版；〈青年會徵求大會四紀〉，《申報》，1922年2月13日，第4張，第14版；〈青年會徵求大會五紀〉，《申報》，1922年2月14日，第4張，第15版。

賽形式所發揮的效果。

從附表 5-11 可見，這種分階段的獨立競賽設計，為徵求會的最終成績帶來不確定性，例如第一次公布徵求成績時，獲最高分的首三隊最後均鎩羽而歸。一天未作戰至最後一刻，均未知鹿死誰手，提高了參加者的危機意識。值得注意的是，在每次公布成績的時候，總有少數的徵求隊伍未及提交成績，據報是由於「因繳分過時，須應歸下期併算」。<sup>99</sup> 據筆者的觀察所得，在這些未及提交分數的隊伍中，不少在下一次揭曉成績時均躍升至首三名以內，出現這種情況的比例為七分之三（42%）；在每次晉身三甲的隊伍中，部分隊伍所得的分數與前次成績存在巨大的落差（由兩倍、四倍、五倍至最高的二十倍不等），出現這種情況的比例為九分之四（44%）。上述兩種情況存在一定的重疊性，意思是它們可以在同一次揭曉成績時同時出現，出現這種情況的比例為九分之七（77%）。

徵求隊伍定期開會檢討策略，似乎並不是純粹舉酒作樂的聯誼宴會，部分參與者確曾致力設計策略，力求爭勝，例如以暫緩公布分數作為延宕的手段，或刻意壓低某次揭曉時的成績，以減低競爭對手的危機意識，同時累積競爭本錢，以爭奪下一次三甲位置的額外獎分（即或最終未能奪標，短期的榮譽仍是有價值的）。<sup>100</sup> 在 1922 年的徵求會中，前者的典型例子是建設隊，而

<sup>99</sup> 〈徵求大會二次揭曉〉，《上海青年》第21卷第6號（1922年2月24日），「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第二十二週紀念徵求大會第三號特刊」，頁3。

<sup>100</sup> 克樂愷有這樣的觀察：「按照慣例，中國人參加這種競賽〔徵求會〕時，均會隱瞞大部分的分數至最後一天，致使在結束以前，無人能知悉誰人會確實得到獎項。」Annual Report of J. C. Clark, September 1916, p. 7, AQRBV. 一篇文章談及1916年舉行的徵求會時說，得勝者所採取的策略是「拿破崙式的構想和手法」（Napoleonic in conception and execution）。"Shanghai Association", *China's Young Men*, vol. 11, no. 5 (January 1916), p. 233.

附表 5-11 1922 年徵求會各隊分數比較

隊名	和平隊	建設隊	自由隊	服務隊	互助隊	平等隊	人道隊	解放隊	犧牲隊	正義隊	奮鬥隊	博愛隊
揭曉一	<b>2,491</b>	#	863	1,093	1,287	1,019	#	1,780	1,267 (1,265)	587	<b>2,164</b> <b>(2,235)</b>	<b>1,904</b>
揭曉二	#	<b>2,272</b>	<b>4,337</b>	438	1,182	#	1,180	#	774	<b>2,630</b>	1,221	1,666
揭曉三	<b>3,291</b> <b>(3,391)</b>	<b>2,400</b>	168	616	1,013	1,007	630	<b>3,103</b> <b>(3,003)</b>	#	464	#	364
揭曉四	1,268	<b>5,675</b>	<b>3,520</b>	1,534	1,040	910	630	348	1,470	1,981	<b>4,004</b>	2,162
總成績	7,150	<b>10,347</b>	<b>8,888</b>	3,681	4,524	2,936	2,440	5,131	3,509	5,662	<b>7,460</b>	6,096

資料來源：〈第一次揭曉徵求分數〉，《上海青年》第 21 卷第 5 號（1922 年 2 月 17 日），頁 3；〈徵求大會二次揭曉〉，《上海青年》第 21 卷第 6 號（1922 年 2 月 24 日），「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第二十二週紀念徵求大會第三號特刊」，頁 3；〈三次揭曉記〉，《上海青年》第 21 卷第 7 號（1922 年 3 月 3 日），頁 3；〈徵求總結束〉，《上海青年》第 21 卷第 8 號（1922 年 3 月 10 日），頁 3。

說明：粗體數字為獲得最高分的首三隊（所列分數已加入獎分）

# 該隊未對外發表所得分數

\_ 上一次揭曉成績前沒有公布成績

□ 該次為三甲之內而同時與上一次公布成績存在重大落差

( ) 據下次公布之累計成績而推斷的修訂數字



後者則是自由隊。無獨有偶，建設隊和自由隊最後分別名列首二名。當然，上述的假設必須建基於兩個前提之上：第一、徵求隊本身必須具一定的實力，否則用上再精妙的策略亦無補於事；第二、徵求隊所面對的競爭對手的實力確是旗鼓相當，決勝的關鍵可能只繫於些微的分數。<sup>101</sup>

分階段的獨立競賽形式，不僅有助維持各隊的競爭意識，甚至有將競爭熱度推向極致的功能。歷屆徵求會的普遍情況是，徵求會的最後階段往往是競爭氣氛最高漲的時候，各徵求隊在臨近閉幕之際，往往使出渾身解數力爭勝利：「至末一星期尤為踴躍，竟願犧牲個人全日之工夫，專注於徵求會員。」<sup>102</sup>從附表 5-12 可見，在 1922 年徵求會開始的首兩星期，可能是一鼓作氣的關係，競爭的熱度持續上升；當進入第三個星期，競爭的熱度稍減，相信是由於最易應邀的人士已愈來愈少，故部分隊伍已進入強弩之末的階段（如人道、平等、互助三隊，見附表 5-11）。而第四次揭曉成績時，各隊所得的分數合共有 24,542 分，佔是次徵求會所得分數達 36.2 %。可見在徵求會最後階段，往往是各隊競爭的高峰期，亦是入會人數最多的一個星期：「……故近日隊員之到會繳費者，十分擁擠，致徵求事務所辦事各員，大有應接不暇之勢，其盛況概可想見。」而徵求會的高潮當在閉幕晚上：<sup>103</sup>

昨日為該會最終結束閉幕之期，自朝至暮，各隊員分投介紹，更形忙碌，各幹事收費發證，亦有應接不暇之勢，入

101 1909年所舉辦的徵求會，獲得最高分的首三隊相差只在50分以內。W. W. Lockwood to My Dear Friend, 4 January 1910, COR.

102 〈徵求之經過〉，《上海青年》第19卷第9期（1920年3月26日），頁2。

103 〈青年會徵求大會九紀〉，《申報》，1922年2月22日，第5張，第15版。

附表 5-12 1922 年徵求會歷次公布分數及百分比

歷次公布成績	總分數	百分比
第一次揭曉	14,630 ( 14,524 )	21.42 %
第二次揭曉	15,700 ( 15,702 )	23.15 %
第三次揭曉	13,056	19.25 %
第四次揭曉	24,542	36.18 %
總成績	67,824	100.00 %

資料來源：同附表 5-11

說明：括弧內數字為據下次公布之累計成績而推斷的修訂數字

晚八時，在殉道堂開會，雖小雨濛濛，而到會參觀者較前更形擁擠，後至者幾無容足之地。<sup>104</sup>

可以說，上海青年會在籌備徵求會的過程中，從規則的設計、環境的布置，以至各種鉅細靡遺的安排，均可謂費盡心機，成功塑造出一個充滿競爭意識的競技場。但是故事並未在此完結，這種密集式的募捐運動還有一個重要的元素，就是透過傳媒進行廣泛的宣傳。

### （三）啟動宣傳機器

短期徵募運動另一個特點是，在一個短暫的時期，透過鋪天蓋地的媒體宣傳，將它塑造成人所共知的全城盛事，從而達至無人能置身事外的社會效果。<sup>105</sup> 上海青年會對於徵求會的宣傳工

<sup>104</sup> 〈青年會徵求大會閉幕紀〉，《申報》，1922年3月5日，第4張，第14版。「計是晚到會者共有千餘人之多，散會已十一時矣。」〈青年會徵求會總報告〉，《申報》，1920年3月22日，第3張，第10版。

<sup>105</sup> 詳參Scott M. Cutlip, *Fund Rais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ts Role in America's Philanthropy*, p. 45.

作，絕對不敢造次，早在徵求會開幕以前，便會全面啟動整個宣傳機器。<sup>106</sup> 早期的宣傳重任，主要落在會刊《上海青年》身上，有關徵求會的消息，均以較大的標題及篇幅來報導，從而喚起讀者的注意。與此同時，《上海青年》亦會向一些具名望的會員邀稿，透過刊登政商名流、青年會領袖和會員等人的鴻文，介紹青年會的宗旨、活動及入會的益處，為行將舉辦的徵求會製造輿論上的準備。<sup>107</sup> 此外，透過回顧上海青年會的種種成績，以突顯對社會曾作出的貢獻；同時，亦會刊登歷屆徵求會成績的紀錄，暗含鼓勵徵求隊員打破紀錄之意。再者，也會邀請漫畫家繪製一些宣傳漫畫（附圖 5-1），從而吸引會員的注意。後期更會特地出版多冊徵求特刊，以期達到隆重其事的效果。<sup>108</sup>

在徵求會舉行期間，《上海青年》當然會對各隊的徵求成績詳盡報導。值得指出的是，報導的手法不僅將各隊分數臚列比較，亦會將各徵求隊的骨幹成員，以具名的方式與所得的分數並列；從 1916 年底開始，更以大篇幅刊登各徵求隊長的照片。<sup>109</sup> 一方面，提升了徵求隊長的知名度，或許亦滿足了某些人的虛榮心；另一方面，彷彿將其個人榮辱與徵求成績劃上等號，令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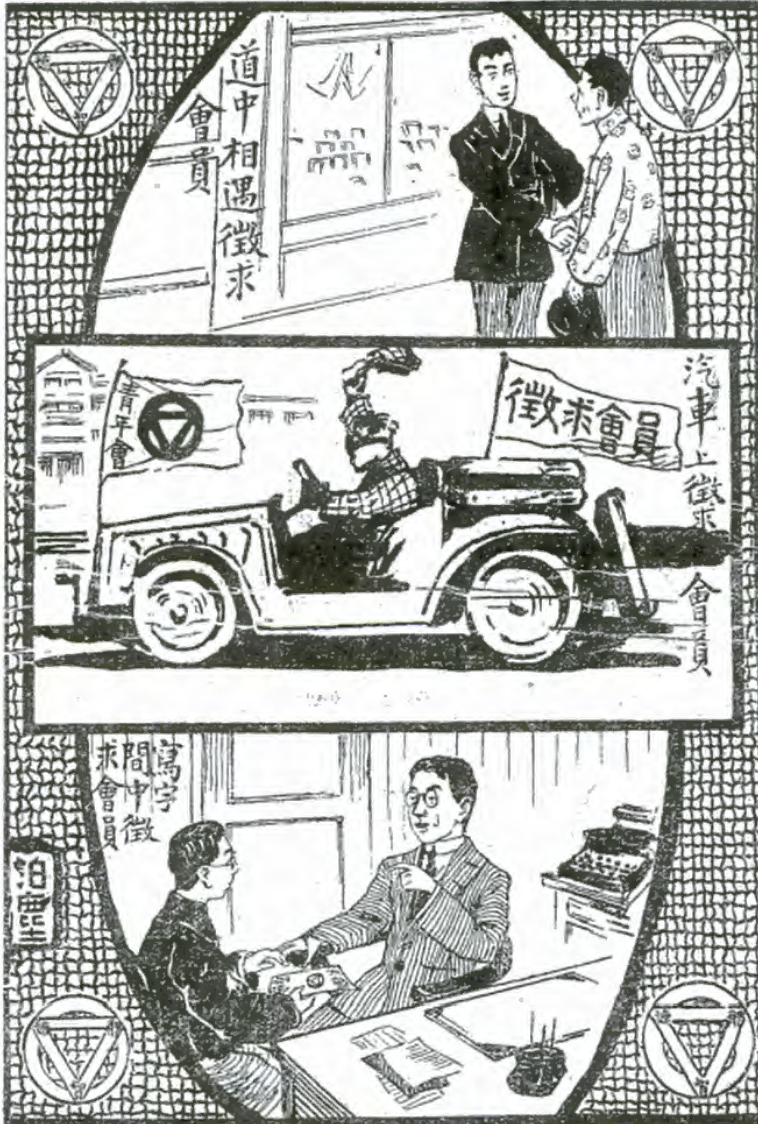
106 1917年，上海青年會總結徵求會之獲得美好的成績時，指出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本會會員部幹事徐可陞君每日會集全體幹事商量組織法，籌備一切印刷品，鼓吹青年會事業與青年之關係。」〈徵求會之圓滿結果〉，《上海青年》第16卷第3號（1917年1月19日），頁4。

107 「上海青年會第二十五週徵求會，開幕期近，總幹事郝伯陽君，函索稿件，插入會刊。」趙錦恩：〈真青年對於青年會之感想〉，《上海青年》第24卷第6期（1925年2月20日），「上海青年徵求特刊」，頁5。

108 詳參張志偉：〈圖像藝術與中國基督教史研究——《上海青年》（1914-1927）中的漫畫應用〉，收入吳梓明、吳小新合編：《基督與中國社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2006），頁349-353。

109 《上海青年》第15卷第39號（1916年12月15日），頁6-9；《上海青年》第15卷第41號（1916年12月29日），頁9-12。

附圖 5-1 徵求會的宣傳漫畫



圖片來源：泊塵（沈伯塵）：《時事新報》，1917年12月20日，第3張，第3版。

必須全力以赴，為個人的名聲而戰。

在早期舉辦的徵求會中，報章並未扮演重要的宣傳角色，相信與上海青年會的社會地位有關。駱維廉在1915年曾指出，報章對青年會的關注，是評估青年會在社區中地位的參考指標之一。他憶述在十二年前剛抵滬不久，曾向報館遞交青年會的稿

件，然而報館回覆是他並沒有附上支票。那時除了一年兩次上海青年會學校開課廣告外，其他消息很少在報章上刊登。他指出這種情況要到1912年後才開始轉變。<sup>110</sup> 駱氏沒有明言箇中因由，但相信與辛亥革命爆發以後，改朝換代引發棄舊迎新的思潮，作為舶來品的青年會愈益得到中國社會的認可等因素有關。

事實上，這種轉變或許早在辛亥革命以前已初見端倪。1911年3月，戴威廉與上海各主要報章的編輯會晤後，獲答允每日免費提供報章給上海青年會。<sup>111</sup> 這側面反映出上海各主要報章對上海青年會的重視，並期望透過向該會提供報章，擴大讀者的數量及層面，進而增加報章的影響力；<sup>112</sup> 更重要的發展是，1915年7月上海青年會獲得《時事新報》<sup>113</sup> 提供一個獨立的專欄版面，作為發布消息的平臺：

本會前為便於會員起見，故有《上海青年》之出版，以記每星期內會務進行情形；惟是比年以來，本會事業日益發展，會員人數亦日益增多，苟非有日刊新報，時為宣布一切消息，恐不足以薪迅速。查上海《時事新報》宗旨正

110 W. W. Lockwood, "Report Letter No. 45", 1915, AQRBV.

111 W. E. Taylor to Mr. Colton, March 9 1911, COR. 「日前承黃君秉脩轉送到時事報館出版新書數種，並時事報贈卷一紙，每日贈報一份，不取報資；又有朱君少屏頒贈畫報十八種，及民立、天鐸兩報館，每日贈報卷各一紙，具見兩君之熱心公益，嘉惠青年。」〈贈書鳴謝〉，《上海青年》第9期第10號（1911年4月21日），頁2。

112 Annual Report of W. W. Lockwood, September 1915, pp. 6-7, AQRBV.

113 《時事新報》於1911年5月18日在上海創刊，該報由原來的《時事報》及《輿論日報》合併而成，以宣傳學術文化和自然科學知識為主，在政治立場上傾向維新立憲，宗旨及內容與《時事報》略同；民國以後，該報成為梁啟超等領導的研究系在上海的機關報刊，以倡議立憲為宗旨。詳參徐松榮：《維新派與近代報刊》（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頁309；馬光仁編：《上海新聞史（1850-1949）》（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頁342-343、349-350、360-362。

大、議論平允，消息又極靈確，久為海內外人士所歡迎，想本會會員中之愛讀該報者亦為數不少。現經本會商允，該報特自七月一日起，添設青年會消息一欄，以輔《上海青年》所不及，凡我會員諸君，皆宜逐日注意該欄內之記載，以資接洽。此布。<sup>114</sup>

近代西方傳教士和基督教團體在中國辦報的歷史悠久，但是在非基督教背景的報章上設立一個定期專欄，卻是中國近、現代基督教史上少有（要非第一次）的一項嘗試。<sup>115</sup>

青年會大約從這時開始愈來愈重視報章的宣傳作用。在舉行徵求會期間，不時會在報章上刊登頭版廣告；<sup>116</sup> 而部分廣告更是由報章免費提供，「……並蒙《新申報》、《時報》送登廣告鼓吹徵求，諸荷盛意銘感莫名……」，<sup>117</sup> 這大抵反映了上海青年會與本地報章已經建立起友好的關係：

本會各種事工，平日藉新聞界宣傳，輿論極佳。現因徵求會期邇，各項消息，尤需披露。爰於六日（星期五）十二時假座三馬路悅賓樓邀請本埠各大日報記者，藉宴聯歡，當由本會郝湯楊米四君出席招待，一時賓主酬酢，備極歡

114 〈本會特別通告〉，《上海青年》第14卷第29期（1915年7月2日），頁7；Annual Report of W. W. Lockwood, September 1915, pp. 6-7, AQRBV.

115 「現在，宣教師和中國教會領導人經常給一百多種報刊寫些一般性的或宗教方面的文章，如果不寫一般性的文章，這些報刊是否願意接受專門宗教性文章那就很難說了，儘管這些編輯也明白這類一般性的文章也是滲透著基督精神。」中華續行委辦會調查特委會編：《中華歸主：中國基督教事業統計（1901-1920）》，下冊，頁1050-1051。

116 〈徵求會員大會〔廣告〕〉，《民國日報》，1919年2月13、28日，第1張，第1版；〈青年會二十二週紀念徵求大會二月八號晚八時行正式開幕禮〔廣告〕〉，《時事新報》，1922年2月8日，第1張，第1版。

117 〈十一次徵求會報告成績並鳴謝各界人士〉，《上海青年》第18卷第9號（1919年3月14日），「第十一次徵求會增刊」，頁13。

洽云。<sup>118</sup>

踏入二十年代，上海青年會舉行的徵求會，甚至成為當時報章的熱門話題。<sup>119</sup> 例如《申報》在1922年2月8日至3月22日期間，便分別以近二十篇報導，就整個徵求會的進展、每星期揭曉的成績、各隊伍的徵求活動、政商界的贊助，以及徵求會的閉幕作出全方位的報導。<sup>120</sup>

還值得一提的，是報章上的報導除了有文字、漫畫以外，還有各徵求隊長的個人照片。例如1915年12月19日及20日，《時事新報》便分別刊登了五位徵求隊長的照片。<sup>121</sup> 翌年12月，該報的「青年會消息」專欄更一次刊出八隊徵求隊長的個人照片，所佔的篇幅更是副刊「教育界」的一半（附圖5-2）。<sup>122</sup> 在徵求會結束後，專欄有時亦刊出獲勝隊長及隊伍的照片（附圖5-3）。<sup>123</sup> 多位社會名流的個人照片登載在報章上，確實發揮了眾星拱月的名人

118 〈新聞記者聯歡宴〉，《上海青年》第24卷第5期（1925年2月11日），頁13。太原青年會的一則報導亦說：「按此次徵求成績，由於隊員熱心將事，亦賴報界聯絡，故收效勝於往昔。會中於徵求啟幕之前一日，為並垣各報記者開茶話會，到者《并州新報》、《晉陽日報》、《山西日報》、《醒世畫報》、《山西公報》、《唐風日報》各記者，商議與青年會交換報章，彼此和衷共濟，務其三育主義，為各界所矚目焉。」〈報界茶話會〉，《青年進步》第23冊（1919年5月），頁86。

119 「中西各日報亦為盡力鼓吹風聲，所傳播滿城皆知。」〈徵求之經過〉，《上海青年》第19卷第9期（1920年3月26日），頁2。

120 張志偉：〈圖像藝術與中國基督教史研究——《上海青年》（1914-1927）中的漫畫應用〉，頁349。

121 〈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第八次徵求大會十隊隊長玉照〉，《時事新報》，1915年12月19日，第3張，第1版；〈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第八次徵求大會十隊隊長玉照（續）〉，《時事新報》，1915年12月20日，第3張，第1版。

122 〈上海青年會徵求會員大會紀〔附照片〕〉，《時事新報》，1916年12月18日，第3張，第1版。

123 〈十隊中得百分以上應鑄入本會紀念銅碑之諸君臺銜列後〔附照片〕〉，《時事新報》，1916年1月17日，第3張，第1版。

附圖 5-3 徵求會得勝隊伍的照片



圖片來源：〈十隊中得百分之以上應鑄入本會紀念銅碑之諸君臺銜列後〉，《時事新報》，1916年1月17日，第3張，第1版。

是所屬社區，甚至國內的一件媒體事件，令原本已很激烈的競爭情緒再以倍數上升。<sup>125</sup>

125 「……且於徵求期內利用當地之報紙，以為鼓吹，而動人之觀念，乃能效果大佳也。」  
〈太原青年會徵求捷報〉，《青年進步》第2冊（1917年4月），頁7。



每年帶來一筆鉅額經費收入。從附表 5-14 可見，歷屆徵求會的會費收入由 1908 年的 5,031 元，遽增至 1922 年的 67,824 元，十四年間的增幅逾十三倍。除了其中四年（1909、1911、1916 及 1921）出現增長倒退外，基本上是持續增長。若以年增長率計算，1914 年以後的年增長率一般在三成以上，1920 年至 1921 年更有高達五成的增長；綜合每年的平均增長率為 23.7 %。這些數字充分反映出，從 1908 年開始，徵求會一直成為上海青年會一項穩定（甚至持續增長）的收入來源。

附表 5-13 歷屆徵求會徵得會員（1908-1922）

年份	徵得會員	年增長率	同年會員人數	徵求會入會佔該年全體會員的百分比
1908	400	-	965	41.45 %
1909	388	-3	987	39.31 %
1910	400	3.1	962	41.58 %
1911	662	65.5	1,662	39.83 %
1912	757	14.4	-	-
1913	798	5.4	2,066	38.63 %
1914	956	19.8	1,778	53.77 %
1915	1,099	15.0	2,755	39.90 %
1916	1,188	8.10	2,774	42.83 %
1917	1,420	19.5	2,874	49.41 %
1919	2,238	57.6	3,391	66.00 %
1920	2,868	28.1	4,470	64.16 %
1921	3,549	23.7	4,471	79.38 %
1922	3,307	-6.82	4,477	73.87 %

資料來源：〈歷年徵求會成績表〉，《上海青年》第 22 卷第 7 號（1923 年 3 月 2 日），缺頁碼。

附表 5-14 徵求會會費佔經常支出百分比（1908-1922）

年份	徵求會會費收入	年增長率	全年經常支出	會費全年支出百分比
1908	5,031	-	29,150.42	17.3 %
1909	3,456	- 31.3 %	35,447.90	9.7 %
1910	5,452	36.6 %	44,796.27	12.2 %
1911	5,435	- 0.3 %	44,151.54	12.3 %
1912	5,850	7.6 %	52,188.93	11.2 %
1913	6,403	9.5 %	65,588.76	9.8 %
1914	8,388	31.0 %	73,231.48	11.5 %
1915	12,053	43.7 %	93,008.64	13.0 %
1916	14,293	18.6 %	96,924.34	14.7 %
1917	18,961	37.7 %	119,553.96	15.9 %
1919	28,850	52.2 %	116,927.36	24.7 %
1920	45,131	56.4 %	152,315.81	29.6 %
1921	62,008	37.3 %	183,442.70	33.8 %
1922	67,824	9.4 %	188,487.30	35.99 %

資料來源：〈歷年徵求會成績表〉，《上海青年》第 22 卷第 7 號（1923 年 3 月 2 日），缺頁碼；*Annual Report of CYMCA of Shanghai, 1908-1921*。

由於上海青年會所舉辦的徵求會，在徵求會員及籌募經費兩方面均成效卓著，不旋踵便為其他城市青年會所效法，早在 1909 年香港青年會即引進試行：「近接香港青年會來函云：該會擬開徵求會友會，其辦法與本會上年徵求隊相仿。」<sup>129</sup> 1910 年 1 月，廣州青年會亦緊接籌辦：「羊城青年會近開徵求

<sup>129</sup> 〈同聲相應〉，《會務雜誌》第 7 期第 27 號（1909 年 10 月 15 日），頁 2。另參〈香港會友之增多〉，《會務雜誌》第 8 期第 4 號（1910 年 3 月 18 日），頁 2。

會友會，共得新會友四百餘人。」<sup>130</sup> 影響所及，這種短期、密集式的徵求會員運動，逐漸標準化，成為中國各城市青年會徵求會員的方程式：「最初京會徵求會員，均照各處通例，組織若干隊，選新穎隊名，備獎品，開公宴會，印刷廣告，作牌表示種種醒目之設備，此乃各處青年會所共同也。」<sup>131</sup> 西安青年會幹事張亞雄亦說：「吾國城市青年會之創立，於今將三十年矣。各會對於徵求會員方法，多係一年舉行一次，其期限之長短不一，有一月者，有二三星期者，所獲成績頗稱優美。」<sup>132</sup> 自此以後，中國城市青年會系統的會員生態及財政結構遂為之一變。

## 二、無所不用其極

如上所述，徵求會既在熱烈的競爭氛圍下進行，會員姑無論是出於何種動機參與，亦難免產生爭勝要強的心態，甚至以不擇手段的方式爭取勝利。早在第一屆徵求會舉行時，有關弊病便已浮現：

自組織徵求隊以來，所施介紹之法頗為良善。有於數日前，邀請十數友敘餐於本會大餐室，藉此得新友十有二人；又有邀友至其家設筵延客，因此又得介紹其友入會；又有用介紹贊成會員之法，借此使其所隸之隊陡增分數六十有餘。惟有一法，乃請其友來會，自上而下遍視一週，然後至事務處介紹其入會，是為最善之法。諸君以為

130 〈好音南至〉，《會務雜誌》第7期第42號（1910年1月21日），頁1。另參〈歡迎四川留學書記員〉，《上海青年》第10期第34號（1911年11月30日），頁3。〈四川駐滬留學書記員〉，《上海青年》第10期第43號（1912年2月1日），頁3。

131 〈京會之徵求會員辦法〉，《同工》第35號（1924年11月），頁8。

132 張亞雄：〈今後青年會應用何法去徵求會員·其一〉，《同工》第35號（1924年11月），頁8-9。

何如？<sup>133</sup>

這些手法雖然使上海青年會會員人數增加，但明顯不是恰當和理想的途徑，以致《會務雜誌》的編者也要婉言相勸，提醒會員在徵求會員的時候，應不忘向新會員介紹上海青年會的宗旨和活動，俾讓他們不致在胡裡胡塗的情況下入會。

上文提及，徵求隊長大部分均是各大企業的最高管理層，部分更是遊走於多個行業的實業家，同時身兼多項公職，要在兩、三個星期內身體力行，全力投入參與徵求活動，委實絕非易事。1920年，王正廷以總隊長的身分致函鼓勵（施壓？）各徵求會隊員云：

昨經肇和隊隊長韓玉麟君等提倡，以各隊隊員，均有職業，斷難專事徵求，現在為期已迫，不得不竭力想法，應請各隊隊員，於此期間，各自提出一日，專為本會徵求，則收效自必可觀。<sup>134</sup>

可見，徵求會員的責任實際上便落在各隊的副隊長和隊員身上，如1922年徵求會舉行期間，在第一次徵求成績公布以後，和平隊暫時取得領先位置（見附表5-11），但該隊隊長未敢稍有鬆懈，並假聯華總會「歡宴隊員」，並請會員科主任幹事湯仁熙報告最新情況，俾讓隊員作進一步的參考及評估。《申報》有以下一段頗堪玩味的報導：

…… 僉以本隊第一期既獲第一之榮譽，務各努力進行，仍

133 〈介紹之法〉，《會務雜誌》第6期第33號（1908年12月25日），頁2：“The Shanghai Whirl-wind Canvass”，pp. 95-96.

134 〈青年會徵求會之公函〉，《申報》，1920年3月18日，第3張，第10版。

爭先著，毋墮令名云云。嗣經在座者當場簽認，預備第二期（今晚）彙繳分數，聞昨今兩日中，該隊隊員之進行，更為猛銳，預料今晚揭曉，尚不止所認之數。其餘各隊，莫不皆然。<sup>135</sup>

當晚和平隊隊長聶雲台因事未能出席，遂委託多位副隊長以宴席「慰勞」隊員，激勵士氣。可以推斷，徵求隊長大宴隊員，隊員為回饋隊長的慰勞，遂透過「簽認」的形式上繳認購新會員的配額，在場的青年會幹事相信亦默許有關的行為。

筆者有理由懷疑上述例子只屬一些細枝末節。1909年2月，《會務雜誌》的一則報導說：

去臘本會徵求新會友之時，因事務冗繁，致使各會員之地址未及登冊者甚多，深為抱歉。嗣後本會每星期送出之《會務雜誌》，如有收不到者，請即駕臨本會告明地址，以便補送。會員中或有遷移者，亦乞將地址以及門牌號數，詳細示明以便通信。<sup>136</sup>

徵求會期間既有專人辦理入會手續，為何連會員最基本的資料卻付諸闕如？1924年的一則報導為我們提供了答案：「查徵求會期內入會之會員，其志願書多半由介紹人填寫，往往於匆促之際將姓名填錯及漏寫地址，或只書姓名未註門牌，致郵寄無從。」<sup>137</sup>可見，在徵求會舉行期間，不少新會員的資料均是由介紹人填

135 〈青年會徵求大會九紀〉，《中報》，1922年2月22日，第4-5張，第14-15版。

136 〈請示地址〉，《會務雜誌》第7期第2號（1909年2月5日），頁2。

137 〈告地址不明之會員〉，《上海青年》第23卷第13號（1924年4月11日），頁6。「本屆徵進之新會員所有志願書，間有未曾填寫明晰，或漏寫地址者，致無從通信。」〈會員部啟事〉，《上海青年》第21卷第9號（1922年3月17日），頁3。

上，並繳付會費而已。「新會員」的真實意願如何，以及是否真有其人，當時均不是要緊的問題，締造佳績才是至關重要。

1911年3月，上海青年會在徵求會以後，擬出版一部會員題名錄，遂向會員索取資料，雖三令五申，卻仍未竟全功：「本會將刊會員題名錄，業經刊發傳單，並於雜誌中一再布告，迄今多日而所收之籍貫單祇三百餘份，所差甚遠。」<sup>138</sup> 在當時逾1,600名會員中，只收回約五分一的回音。筆者當然不排除會員因故未有回覆，但更值得思考的問題是，上海青年會究竟有多少真正的具名會員？可以想像的是，在徵求會舉行期間，各徵求隊陷溺在熾熱的競爭氣氛之中，為求奪標可謂無所不用其極，更沒張倒置的行徑想必所在多有。<sup>139</sup>

對二十世紀美國社會機構的籌款方法素有研究的學者凱莉（Kathleen S. Kelly），將美國青年會這種短期、密集式的募捐形式稱為一種媒體攻勢模式（press agency model）。這種募捐模式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宣傳一場運動，交流的性質是完全的單向（組織者 → 捐款人），組織者對於募捐的對象鮮有深入的研究。<sup>140</sup> 因此，所得的效果是不平衡（unbalanced）以及不對稱（asymmetrical），意思是組織者的目的主要是影響潛在捐款人的行為，主要倚賴的元素是情緒（emotions），而真相並不

138 〈再告同人〉，《會務雜誌》第10期第6號（1911年3月24日），頁2。

139 西安青年會幹事張亞雄在1924年曾經提出多項改革徵求會的建議，其中一項是：「於徵求會員時，應注重預防以往徵求會種種之流弊。」張亞雄：〈今後青年會應用何法去徵求會員，其一〉，頁9。劉廷芳晚至1935年仍說：「青年會募集經費，不完全滿人意處，也未必沒有……」劉廷芳：〈青年會對於中國教會的貢獻〉，頁246。

140 「各會每年一次舉辦之徵求會員大會，利弊相衡，利少弊多。就前者言之，不過一鼓作氣，及作大規模之廣告而已。」〈鄭會對於徵求會員之意見〉，《同工》第35號（1924年11月），頁5。

是一個必不可少的元素；<sup>141</sup> 整個募捐活動的實行方法是建基於操縱（manipulation）和控制（control）。<sup>142</sup> 她甚至認為，這種募捐模式是最不道德（unethical）及沒有社會責任（socially irresponsible）。<sup>143</sup>

### 三、會員素質參差

上海青年會早期對於會員申請入會設有一定的機制：「上禮拜三為本會公董聚會之期，有念五名新會友之報單，已經公同察閱允准入會。」<sup>144</sup> 這種監察機制發揮了多大的篩選作用，當然尚可再議；但自從上海青年會引進徵求會以後，原來的監察機制便變得形同虛設。在這種建基於操縱和控制、訴諸群眾狂熱情緒的情況下所吸納的大量會員，其個人素質參差不齊，自然可想而知：「至於大徵求會所收納之會員，其不合青年會之本旨者，所在多有，急不暇擇，無可諱言。」<sup>145</sup> 在上海青年會第一屆徵求會結束後不久，便有新會員未嘗與會的報導：

本會承熱誠諸君相約入會，日增月盛，已達一千之目的，同人深為欣幸。查會友中每日蒞會雖亦不少，而難得枉顧者尚屬多數，以致同為本會會友，彼此偶然晤面各不相識，深為憾事。此後務祈諸君子不我遐棄，惠然肯來以通

141 「募捐運動要乘著勝利的機會，一鼓作氣，不要等到募捐人的熱忱冷淡下去。熱忱有一種感染力，能夠從一個人傳到別人；短期徵求會最大的作用就在於此。」〈募捐須知——穆德博士的名言〉，《同工》第89號（1930年2月），頁12。

142 「人們對於青年會最大的批評，是牠廣告式的舉動。」陳立廷：〈對於青年會的新年感想〉，《同工》第37號（1925年1月），頁3。

143 Kathleen S. Kelly, *Effective Fund-raising Management*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1998), p. 156.

144 〈會友大增〉，《會務紀聞》第2冊第2號（1904年3月4日），頁1。

145 〈鄭會對於徵求會員之意見〉，《同工》第35號（1924年11月），頁6。

聲氣…… 146

這則報導並不是獨立或個別的例子，類似的呼籲可謂不絕如縷：

本會對於諸新會友，非常歡迎，諸君如能常川到會，則自能多享本會之利益，會中有日夜館、演說、各種書報、健身房、浴室、衛生演說、急救商科、聖經班、論道會，更有足資酬酢，且與眾會友相切磋琢磨，其利益實屈指難數，諸君如不到會，則徒有入會之名，而無入會之實，誠為諸君不取也！<sup>147</sup>

可以說，透過徵求會所吸納的大量會員，大多數只是因為朋友的情面而入會。謝扶雅不諱言：

外界人士的入會，大概看徵求隊隊員的面子；捐款給青年會的人，更不消說要看募捐者的情面大小——恐怕各種團體的募款，都是千篇一律，這是明白清楚的事實，無可諱言。請問有多少人入青年會或捐助青年會，是曾經仔細研究過「青年會在社會上的地位怎樣？」「青年會與社會有何關係？」和「我為甚麼要加入青年會？」大多數是「為著某人」罷了！<sup>148</sup>

他們僅屬掛名會員，對於青年會的宗旨不甚了了，既沒有參與青

146 〈惠然肯來〉，《會務雜誌》第7期第29號（1909年10月29日），頁2。

147 〈敬告新會友〉，《上海青年》第13卷第2號（1914年1月9日），頁2；〈歡迎新會友〉，《上海青年》第12卷第5號（1913年1月31日），頁2。另參李平：〈第十屆新會員歡迎會紀事〉，《上海青年》第17卷第5號（1918年2月4日），頁5。

148 謝扶雅：〈中國社會上最大的需要就是「社會」兩個字〉，《青年進步》第63冊（1923年5月），頁10。「……從此，徵求會不再是一種『湊熱鬧』，『和調』，或『賣面情』，而是一種信念了。」責備：〈報答社會〉，《上海青年》第30卷第9期（1931年3月4日），頁1。



年會舉辦的活動，對於會務消息亦漠不關心。如畢雲程所說：

……或雖以介紹人之情誼而勉強入會，然彼所納會費，全為介紹人之情誼，故終年不到會。……以吾所知，若某君若某君無一非青年會會友，終年不到會，無絲毫利益可得。<sup>149</sup>

可以推斷，為數不少的「新會員」在加入青年會以後，並沒有參加青年會舉辦的活動，遑論接受青年會完全人格的改良：

本會常年徵求會員辦法，似乎已臻完善，然徵求會員方面，只知以多得會費及人數為目的，而對於徵求會員之主要工夫，多無暇兼顧。此其缺點，所以會員對於本會往往不能發生精神上之關係，此徵求會員辦法應改良之一。<sup>150</sup>

上文提及，新會員大多在徵求會期間加入上海青年會，可以想像的是，會員愈來愈沒有誘因，於平日進行聯絡會員或徵求會員的工作；此外，徵求會的設計原則是重「量」不重「質」，「量」的追求既是終極目標，任何無助於達成終極目標的行為（例如徵得同宗會員），自然難免被人忽視。上海青年會對於

149 畢雲程：〈青年會之性質及利益〉，《上海青年》第15卷37號（1916年12月1日），頁3-4。更有不少會員將青年會的活動門券轉交傭人的報導：「凡會友來會，務請隨帶會友證。蓋如用入場券，有時為僕役取去，因至會中冒充會友，而主人反不能與分。本會有鑒於是，因定每次開會，皆以會友證為憑，諸君諒之。」〈交誼會秩序單〉，《上海青年》第13卷第7號（1914年3月6日），頁3。與上述較委婉的勸告比較，馮崇毅後來的憶述便顯得清楚不過：「有的會員很少到會裡來，送給他們開會的入場券，就打發小孩或僱請的傭人來看看熱鬧。此類會員只納會費，不參加活動。」馮崇毅：〈基督教青年會在長沙〉，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華文史資料文庫》，第18卷，頁909。

150 陳壽彭：〈對於會員問題之討論及計劃〉，《同工》第51號（1926年4月），頁27。「……我們在徵求的時候，務須把我們的主義揭示清楚，不然恐怕又要蹈了求人數多的舊轍，結果，大多數人在宗旨方面仍是模糊。」陳立廷：〈努力徵求〉，《上海青年》第29卷第20期（1930年2月20日），頁1。

#### 四、降格成為經濟活動

上海青年會舉辦徵求會最初始的動機，的確是希望增加會費收入，從而解決財政困難；持平而言，要是上海青年會因經費欠缺而無法生存，再偉大的目標亦不過是紙上談兵：

……今復有懇者，惟望諸君各自介紹貴友一二人入會，藉以資助本會，而亦益我青年。蓋會友多而經濟裕如，經濟裕如而會務發達，會務發達斯能自立，而無竭蹶之虞矣。<sup>157</sup>

上海青年會透過舉辦徵求會，既有效吸納更多的新會員，亦提供更充裕的發展經費，「三育」計畫由是得以推展，模造青年人格的大計方能成就：「徵求會所有之效力，即使本會會友增至二千人以上是也。會員既已加增，本會之經濟亦因是而寬裕，經濟既裕，則此一年中本會所辦之事，亦能更有效力矣！」<sup>158</sup>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徵求會所關懷的重點，卻漸漸向財務的考慮傾斜，並惹來社會人士的批評。我們從 1910 年代《上海青年》刊登的一些辯白文字已可知一二：「青年會並無經常費，所需開支全恃熱心義士之捐助會費之挹注。稍知青年會之歷史者莫不知之。而青年會之舉，其表面視之不啻專為謀充經濟起見，不知實為扶助一般有志青年。」<sup>159</sup> 這種傾向的進一步加劇，相信與 1915 年童子部會所落成以後，上海青年會因而出現負債有關（詳參第六章）：

157 〈敬告會友〉，《會務雜誌》第8期第29號（1910年10月21日），頁2。

158 〈徵求大會·效力〉，《上海青年》第13卷第4號（1913年1月24日），頁1-2。

159 〈第七次徵求大會〉，《上海青年》第13卷第39號（1914年12月18日），頁4。

費，無異一種捐款，即青年會幹事也隱然看他們的會員費是一種捐款。」<sup>167</sup> 二十年代以後，甚至有人以「和尚化緣」作比附：

青年會的徵求會與和尚化緣有甚麼分別呢？徵求會是向人索錢，化緣是向人索錢；〔徵〕求會用了「青年會」做招牌，化緣也用了「某寺某觀某菴」做招牌；青年會徵求了錢，做該會的經費，和尚化了錢，也做該廟的經費；青年會幹事們在外徵求，是為了他們自己的薪金，和尚們在外化緣，也是為了他們自己衣食……徵求會和化緣到底有甚麼分別呢？<sup>168</sup>

當經濟的考慮滲入徵求會，甚至成為壓倒性的要素以後，徵求「會員」運動便開始變質，逐漸演變成為庸俗的籌款活動：

現本會會員有多人願付全年會費，專為扶助本會事業，非為享用利益，故平日不恆到會。本會贊成會員現有三十三人，每年付會費五十元，日後能增加至一百人，則本會之工夫藉此可得永久維持矣。<sup>169</sup>

這亦對上海青年會（以至中國青年會運動）構成極負面的影響：

但經濟問題為作事之要素，故青年會採用短期之競爭徵求

---

167 鮑乃德：〈會員對於青年會應具的概念和意識〉，《上海青年》第27卷第1期（1928年1月6日），頁1。「從前社會上對於青年會的組織和事工，尚不十分明瞭，以為每年舉行一次徵求會，專為募捐。」陸幹臣：〈徵求會的意義〉，《上海青年》第33卷第10期（1934年3月13日），「第三十四屆徵求會特刊」，頁31。

168 星如：〈徵求會與「和尚化緣」〉，《上海青年》第24卷第5期（1925年2月11日），頁7-8。「徵求所得之款，不明內幕者，以為工作人員之酬勞，實則不然……」翁國勳：〈對於青年會徵求會之我見〉，《上海青年》第30卷第9期（1931年3月4日），頁8。

169 《上海基督教中國青年會乙卯年（1915）報告》，頁20。

方法，以期會員與經濟，同時而得，法良意美，各會通行。奈行之既久，流弊叢生，其於會員之品格，概置不問，盡趨於經濟之一端，捨本求末，危害孰甚。是以近年各會於此辦法，深感覺悟…… 170

## 五、貶損青年會的聲譽

由於徵求會所帶來的經濟效益顯著，很自然進一步為其他社會團體所效法（附表 5-16）：「徵求兩個字，自從青年會採用了作為每年徵求會的名稱以來，社會上引用這個名稱的，報紙上幾乎日有所見。」<sup>171</sup> 1916 年 12 月，上海工商研究會通過「徵求會友議案」曰：「欲求會務之發達，必須會員之眾多，人才經濟兩利賴之。觀夫本埠青年會每屆年終必舉行之，實可借鑑。」<sup>172</sup> 這些旨在募捐的徵求「會員」運動要是偶一為之，對於上海的神商巨賈而言，也只算是略施小惠，虛應故事；只是當這些徵求「會員」運動，在上海這個全國慈善事業中心重複上演，<sup>173</sup>

170 郭道中：〈今後青年會應用何法去徵求會員·其二〉，《同工》第35號（1924年11月），頁9。

171 陸幹臣：〈徵求會的意義〉，頁31。「不錯，徵求會三個字現在已經家曉戶喻，成功〔為〕了普通名詞，但溯其來源，恐怕是四十年中間青年會對於中國的貢獻之一吧！」《上海青年會徵求會隊員袖珍錄》（上海：上海基督教青年會，〔1932？〕），頁4。上海市檔案館檔案，U120-0-85-[4]。

172 〈工商研究會紀事〉，《民國日報》，1916年12月11日，第3張，第10版。

173 研究北洋時期上海慈善團體的陶木水指出：「為了增加常捐收入，各慈善團體經常的做法是廣泛徵集會員，想方設法鼓勵會員多納會費。」陶木水：〈北洋政府時期上海的慈善組織與慈善事業〉，熊月之、高綱博文合編：《透視老上海：中日青年學人的上海史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頁55。「徵求會」這種募捐會費的形式，不僅在民國時期為不同社會團體廣泛應用，晚至1940年的香港仍可見其足跡。參《南華體育會第廿三屆男女會員徵求隊規則及其獎格》（香港：南華體育會，1940），藏香港中央圖書館。筆者以為，這種徵募活動在民國後期的發展情況及式微的因由，值得學者進一步研究。

附表 5-16 民國初年社會團體舉辦徵求會舉隅

日期	團體	徵求會詳情
1916年12月	寰球中國學生會	「次為徵求團團長朱少屏君報告，第七次徵求團之經過情形，略謂此次徵求幸賴唐君露園、李君登輝、錢君新之，及各隊隊員之贊助，得有良好結果……統計五隊共徵得永久會員五人、贊助會員三十人、普通會員二百九十三人，計洋三千八百八十四元二角四分。」
1917年12月	上海女青年會	「婦女青年會之募捐會自前月十九日開始進行，募捐員共約六十人，分為十隊，各以一人長之，其結果核至本月十日為止……聞此次原擬捐額為五千二百元，而結果乃得五千九百餘元云。」
1921年3月	均益決志會	「文監師路均益決志會，成立一載，頗注意於社會事業，現屆第三次徵求大會……定於本月十號開幕，一月為限，預定五千分（每元作十分），分為五隊……日來著手進行，定今日推舉隊長。」
1921年3月	少年宣講團	「本埠少年宣講團總部，為謀發展起見，發起徵求大會，定本月五日開幕，二十一日閉幕，其分徵求隊為十一隊，向各方面徵求團員，目的數為三百人；並聞該團定六日（星期日）晚，在總部召集各隊隊長顧問，討論進行方法，及發徵求印件，以便著手徵求。」

資料來源：〈工商研究會紀事〉，《民國日報》，1916年12月11日，第3張，第10版；〈學生會歡迎新會員紀〉，《民國日報》，1916年12月9日，第3張，第10版；〈婦女青年會之募捐消息〉，《申報》，1917年12月14日，第3張，第10版；〈均益決志會徵求會員〉，《民國日報》，1921年3月4日，第3張，第11版；〈少年宣講團徵求開幕〉，《民國日報》，1921年3月5日，第3張，第11版。

上述第一和第三項評論，充分說明年復一年舉行的徵求「會員」運動，委實令徵求對象感到不勝其煩，遂有青年會建立永久基金的建議，免除年復一年、無日無之的徵求之苦；<sup>178</sup> 第二項評論則揭示，對青年會幹事而言，每年一度的徵求會亦是一項苦差：

無論那地的青年會，總是要採取徵求會的方法，來維持會中的工作，補助工作的經費；而且不是一二之就可以了事，每年至少終要舉行一次。當那徵求會將來而未來之時，一班幹事們會員們和社會上關心公益事業的諸君，腦筋裡已經感受著一種特別的刺激，那便是——忙碌，煩擾，和討厭。<sup>179</sup>

江文漢後來憶述：「做幹事的對於每年的徵求會感到頭痛，因為在這個時候，就是幹事們向資產階級卑躬屈膝、低頭作揖的時候。」<sup>180</sup> 這樣的描述當然帶有意識形態的味道，但是距離當時的實況似乎不遠：

我們要知道會員富於服務思想的，看每次的徵求大會便知了。在那個時期內，他們都是不怕辛苦，犧牲精力的去尋求會員。他們都了解服務的責任，有時遭遇了社會上無謂

178 如王正廷引述的話：「或謂青年會每年舉行徵求會員頗嫌繁瑣，何不籌募百萬元作為基本金，俾可一勞永逸。」〈徵求大會開幕誌盛〉，《上海青年》第20卷第5號（1921年2月18日），頁5。

179 羅鍾瑞：〈我之徵求會經驗談〉，《上海青年》第24卷第5期（1925年2月11日），頁7。

180 江文漢：〈基督教青年會在中國〉，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華文史資料文庫》，第18卷，頁822。「長沙青年會的經常費用，主要來源是會員會費和當地捐款。長沙青年會每年要搞一次徵募活動，全部幹事及一部分董事和職工都參加。由外國傳教士出面找軍政界首腦擔任徵募會長，再列一個機關、團體、商店、學校負責人捐款名單，由幹事們登門拜訪，收取捐款。」張亞雄：〈西安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華文史資料文庫》，第18卷，頁893。

都恭維你們能以人格救國，你們便在此高興了麼？你們以為這些督軍省長的人格怎樣？你們不敢在他們面前，教訓他們講人格，你們亦不敢主張把這些不講人格的督軍省長打倒，以給他們一種懲罰，只知向著這些平民或青年，講甚麼人格救國。你們故意做這種牛頭不對馬嘴的功夫麼？唉！你們這些「假冒為善者」！<sup>183</sup>

青年會幹事後來的回憶亦印證這樣的說法：

為解決經費問題，我們幾經商議，決定搞一個贛州青年會徵友大會，請蔣經國先生出任名譽會長，並印發了三百頁徵友聘書，扼要說明青年會的性質和任務，分送當時贛州各主要機關團體和省駐贛州的中央銀行、中國銀行等單位，藉以募捐襄助，解決經費。由於徵友大會借助於「蔣太子」身份，不到一個月時間，既募得捐款五千多元，又擴大了贛州青年會的社會影響。<sup>184</sup>

江文漢後來亦說：

有的市會在徵求會時組成許多徵求隊，請地方上的官僚和資本家充當隊長，彼此競賽，得分最多的授以獎品。有些大官就在自己的機關裡下條子，命令所有屬員一齊參加青年會，引起了不少公務人員對青年會的反感。……但它的徵求會員的制度已經形成了一種庸俗的要錢方式，失去了它所標榜的宗旨和會訓的意義。<sup>185</sup>

183 惲代英：〈基督教與人格救國〉，惲代英：《惲代英文集》，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372。

184 蔡智傳：〈蔣經國主政贛南與贛州基督教青年會的活動〉，《贛州文史資料》第3輯（1987），頁45。

185 江文漢：〈基督教青年會在中國〉，頁822。

可見有些擔任徵求會隊長的政界人士，為協助青年會徵求會員，不惜利用一己的權力，挾帥印以令屬員。<sup>186</sup> 這種情況如果在掌握公權力的政府部門內亦如此猖獗，在各大私人企業裡的情況則可想而知。<sup>187</sup>

## 六、小結

1921年1月，全國協會總幹事余日章在上海青年會舉行的徵求會開幕禮上致詞說：

青年會以德、智、體、群四育造就之所，徵求會為製造人格之大機會，徵一人入會即培植一人人格，於是輾轉介紹，由一而十而百千而萬，人人得有完全之人格，徵求之方法在是，救國之道亦在是矣。<sup>188</sup>

從本章的論述可見，青年會會員人數的多寡，與社會人士對她的接受程度並無必然關係；更諷刺的是，會員人數的增加往往與整體素質呈反方向的發展。青年會模造完全人格的口號要不是淪為空談，也開始備受社會人士的質疑。可以說，自從上海青年會引入徵求會以後，各地青年會迭次仿行，中國城市青年會的會員生態亦隨之徹底改變，進一步踏上世俗化的路途。

186 另參Ryan Dunch, *Fuzhou Protestants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hina, 1857-1927*, p. 155.

187 在這裡只能舉一則比較間接的資料：「上禮拜六會友五十四人，蒙聶君管臣邀請同往參觀恒豐紗廠，廠中有招待員八人皆本會會友……」〈工廠規模詢可觀〉，《上海青年》第11期第34號（1912年12月13日），頁8。正如第四章所指出，一般的工人階級根本難以支付青年會的入會費用。

188 〈徵求大會開幕誌盛〉，《上海青年》第20卷第5號（1921年2月18日），頁6。



## 第六章 理想與現實之間—— 「人格出產所」的打造之路

就設備方面言，一九一九年以前，〔中國各大城市青年會〕已有永久之會所十三處，而全國協會之會所則於一九二〇年落成。此等會所，當其落成之時，均為當地最新式之建築物。吾人由經驗所昭示，深覺青年會之保有此等會所實含有下述之價值：（一）表示青年會之永久性，（二）得社會及會員之信賴，（三）表示青年會之現代化，（四）便利各項程序之進行。<sup>1</sup>

只要翻閱二十世紀初年全國協會或城市青年會的出版物，不難發現有關中國各地青年會籌募經費建築會所，以及新會所舉行奠基或開幕禮的報導，可謂不絕如縷：

都城〔北京〕有此會所，造福青年誠無限量。同人聞此佳音，均為脫帽頌北京青年會萬歲。<sup>2</sup>

天津青年會會所業已落成，此屋坐落舊城之東，為交通要道，將來之發達定可預卜。<sup>3</sup>

---

1 梁小初：〈中國基督教青年會五十年簡史〉，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編：《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五十週年紀念冊（1885-1935）》（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1935），頁97。

2 〈北京青年會行落成禮〉，《上海青年》第12卷第32號（1913年10月3日），頁4。

3 〈新聞一束〉，《上海青年》第12卷第27號（1913年9月25日），頁4。

則繼今而後，〔廣州青年會〕對於培養青年，造福社會，尤無窮極，可預卜也。<sup>4</sup>

〔香港青年會會所〕竣工之後，當為該城青年會作偉大之事業，可預卜也。<sup>5</sup>

預會〔全國協會新會所落成開幕禮〕諸君興趣彌濃，對於青年會前途，咸抱無盡藏之樂觀矣。<sup>6</sup>

值得注意的是，在有關的報導之後，總是附上青年會同儕的致賀祝辭，內容大意是新會所落成以後，勢必為未來的發展帶來一片好景。這些祝辭賀語當然不無客套話的意味，但毋庸置疑的是，它們背後的确盛載了由衷的祝福和期許。誠如西幹事赫瑞滿（R. S. Hall）說道：

閱者對上述建築會所情形，必有多數起愉快之感想，以為青年會增添如許物質的設備，必將大有益於事業之推展與精進，因而對於有此新會所之市會，深致其熱烈之賀忱。<sup>7</sup>

二十世紀初，青年會會所作為一種獨特的建築形式，大規模從美國移植進入中國各大城市（附圖 6-1），無論從近代中國基督教史，或從近代中國建築史的角度言，均是一個饒富意義的研究課題。過去研究中國青年會的學者，對於會所建造運動的歷史

4 〈廣州青年會新會所落成致賀〉，《青年進步》第2冊（1917年4月），頁4。

5 〈香港會所行奠基禮〉，《青年進步》第2冊（1917年4月），頁4。

6 聶民：〈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新會所落成開幕誌盛〉，《青年進步》第43冊（1921年5月），頁83。

7 赫瑞滿：〈建築事業之最近發展概況〉，《同工》第39期（1925年3月），頁12。

德、智、體、群四育，推廣會務起見，不能不有宏敞堅固之會所。」<sup>9</sup> 無論是北美協會，或是全國協會，均成立建築部專司其事；在各地青年會籌建會所的過程中，北美協會、全國協會，以及各地城市青年會的書信、電報、圖樣往來的頻繁及迫切性，均不亞於（要非更重要）青年會所推行的各種社會改良活動。<sup>10</sup>

早在三十年代已有青年會幹事指出：「要敘述全國各城市青年會的會所，委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sup>11</sup> 我們在這裡當然無法就整個中國青年會會所建造運動作全面的探討，卻只是嘗試以上海青年會的個案回答以下的問題：究竟青年會會所是一種怎樣的建築物？一座青年會會所的建造歷程是怎樣？會所的落成是否會為青年會事業帶來一片好景？

## 第一節 會所建造運動

### 一、源於紐約青年會

1869年12月2日，耗資接近五十萬美元建成的紐約青年會會所，以一種嶄新的宗教建築形式在美國紐約曼哈頓（Manhattan）下城區最時尚的購物和娛樂區域面世（附圖 6-2）。

9 〈卜、會所建築事業〉，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編：《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年報（1924）》（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1925），頁56。

10 上海青年會童子部會所落成後，駱維廉在給詹金斯（E. C. Jenkins）的信中說：「我相信你定會感到花費大量的時間在建築會所的仔細聯繫是有價值的。」W. W. Lockwood to E. C. Jenkins, 4 January 1917, BR. 明尼蘇達大學喀晤茨家族基督教青年會檔案室所藏的中國青年會檔案中，更專闢了會所檔案（Building Records）一項，予以分類。

11 傅若愚、侯感恩：〈青年會事業簡要調查（續第一百十一期）〉，《同工》第115期（1932年10月），頁64。

附圖 6-2 1869 年落成的紐約青年會



圖片來源：Box 60, YMCA of Great New York, McBurney Branch, Kautz Family YMCA Archive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Libraries.

與美國早期建造的青年會會所迥然不同的是，它的結構並不似一般教會擁有一個大禮堂；而是包含了大禮堂、圖書館、體育館、會客室、講課室、職業介紹所等設施，以一座「世俗—宗教混合物」（secular-religious hybrid）的型態出現，透過德育、智育及體育的培育，傳遞基督教的價值觀。學者稱其為第一個現代青年會（modern YMCA）。<sup>12</sup>

自十九世紀中葉以降，與青年會的誕生地英國一樣，大量的美國青年從鄉間進入城市工作。由於當時大部分教會仍對娛樂和體

<sup>12</sup> Paula Lupkin, "Manhood Factories: Architecture, Business, and the Evolving Urban Role of the YMCA, 1865-1925", in Nina Mjagkij and Margaret Spratt eds., *Men and Women Adrift: The YMCA and the YWCA in the City* (New York;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40. 另參Paula Lupkin, *Manhood Factories: YMCA Architecture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Urban Culture*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0), pp. 37-71.

育持負面態度，城市裡又少有既吸引又廉宜的正派娛樂，加上缺乏家人、牧師、僱主的監管，他們容易流連於酒吧、舞廳等娛樂場所，沉溺在「腐敗」的生活之中。鑑於過去的倫理和價值愈益受到衝擊，部分城市商人開始將目光轉向青年會；然而，青年會有限的設施並不足以應付這些青年的娛樂需要。1865年，紐約青年會選出了一個以知名商人組成的董事部。他們相信一座特別設計的建築物，包含圖書館、學校、禮堂和社交會所等功能，能夠提升青年會與商業娛樂事業的競爭力，有助吸引從鄉間進入城市的青年；其次，亦能吸引公眾、傳媒和青年的重視，使青年會在社會中獲得更永久的地位。再者，在城市商業中心設立這樣的建築物，亦可成為商界人士熱心公益的一種極好宣傳。<sup>13</sup>

當時，北美協會的領導層在紐約青年會領袖的主導下，致力將紐約青年會會所打造成為美國各地青年會的模範，除了聘有幹事巡迴各地推廣外，更印製宣傳小冊子、籌款資料，甚至聘有專門建築師專責設計。<sup>14</sup>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接近 200 座現代青年會先後在美國各大城市落成。在少數幾位建築師主導下，美國各大城市的青年會會所在建築形式上漸趨於一致，均是由磚或石建造而成的長方形喬治亞式（Georgian）或文藝復興式（Renaissance Revival）建築物，門窗布局、飛檐及大門口均為古典的精緻裝飾。<sup>15</sup>

---

<sup>13</sup> Paula Lupkin, "Manhood Factories: Architecture, Business, and the Evolving Urban Role of the YMCA, 1865-1925", pp. 41-45.

<sup>14</sup> 一則紐約青年會的報導說：「一區專置各種房屋圖式，條縷分析，以備會中建築幹事之研究，青年會於此美一洲，每五天必有新營造，每年造屋費約四百萬美金，是以此建築之研究資料頗為緊要。」〈紐約會務〉，《青年》第11卷第9號（1908年12月），頁287。

<sup>15</sup> Paula Lupkin, "Manhood Factories: Architecture, Business, and the Evolving Urban Role of the YMCA, 1865-1925", pp. 49-51.

迨至二十世紀初年，這一場波瀾壯闊的青年會會所建造運動，亦隨著北美協會的海外工作進一步席捲世界各地。1910年10月20日，美國總統塔虎脫應北美協會總幹事穆德的邀請，在白宮向二百多位政商界人士發表演說，呼籲籌募150萬美元在海外興建49座青年會會所。<sup>16</sup>不久，上海青年會出版的《會務雜誌》亦報導了有關的消息：

得美洲來信謂，近有人發起在泰東、西十國之中，創立青年會廿五座，擬籌募美金一百五十萬元，得美總統塔虎脫君之贊成，允假華盛頓之白宮為會場。開會之日，合眾國及坎拿大之富商巨賈，來預斯會者紛至沓來，當時即集得美金百萬元。<sup>17</sup>

在短短的數月後，北美協會即籌得超過200萬美元，將海外青年會會所建築運動推向高峰。<sup>18</sup>馬泰士（Basil J. Mathews）在穆德的傳記中曾經這樣說：

……他〔穆德〕擬定了一種新計劃，要在亞洲和拉丁美洲重要的地點，一直從東京，漢城，北京，馬尼拉到加爾各答，君士坦丁堡與開羅，又從墨西哥與哈瓦那（Havana）到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與倍諾斯愛勒（Buenos

<sup>16</sup> "\$1,000,000 FOR Y.M.C.A.; Rockefeller Offers \$540,000 and Others Give for Expansion in Far East",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1, 1910, p. 1, 網址：[http://query.nytimes.com/mem/archive-free/pdf?\\_r=1&res=9D06E6D91F39E333A25752C2A9669D946196D6CF](http://query.nytimes.com/mem/archive-free/pdf?_r=1&res=9D06E6D91F39E333A25752C2A9669D946196D6CF)·2010年8月16日檢索。

<sup>17</sup> 〈中國青年同沾雨露〉，《會務雜誌》第8期第34號（1910年11月25日），頁1。

<sup>18</sup> 遠囑：〈白宮大會記〉，《青年》第14卷第4號（1910年5月），頁97-99。另參Paula Lupkin, *Manhood Factories: YMCA Architecture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Urban Culture*, p. 143; C. Howard Hopkins, *History of the Y.M.C.A. in North America* (New York: Association Press, 1951), pp. 677-678.

Aires) 都要建築青年會會所，並派幹事去工作。<sup>19</sup>

可見北美協會在世界各地推展青年會會所建造計畫，標誌著青年會的國度在世界各地延展版圖，向異教世界進一步擴張基督教的影響力，帶有擴張主義的時代色彩。

## 二、青年會會所與近代中國

中國作為北美協會高度重視的海外工作地區，自然成為整個世界性的青年會會所建造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據北美協會所制訂的會所建築資助政策，中國各地的城市青年會只需符合以下四項條件，便可透過全國協會向北美協會提出資助建築經費的呈請：

- (一) 該會須自己購有地址；
- (二) 該地基之取得手續，完全清楚，並無債務及其他糾葛等情；
- (三) 地基之大小與位置，業經協會同意；
- (四) 地基之所有權應交給協會，所立契紙，得協會之認可。<sup>20</sup>

<sup>19</sup> 馬泰士 (Basil J. Mathews) 著，張仕章譯：《世界的公民：穆德傳》（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35），頁110。李提摩太憶述在1901年與穆德會面後得到的印象是：「從一開始，他就亮出了一個宏大的工作計畫。在同他乘坐一艘船旅行時，我和他交談過多次，告訴我所確立的最成功的傳教方式已在各省府經由中國的官員和學者得到了貫徹。我敦促他派遣工作人員，在文字工作方面與廣學會進行合作，但他並不同意這樣做。……我越來越清楚地看出，他是一個很專斷的人，是不可能跟任何人合作的。但他又有自己別出心裁的一套工作計畫，要求、希望其他差會幫助他付諸實施。」引自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著，李憲堂、侯林莉譯：《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頁316-317。

<sup>20</sup> 謝扶雅編著：《基督教青年會原理（草版）》（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22），頁58-59。

事實上，早在北美協會的資助政策實施以前，中國青年會對於在北美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會所建造運動，亦都早有所聞：

西歷一千九百零八年，統查美國各城共建立青年會所八十有二，共值金洋一千萬元有餘，內有二十間，每間約值金洋十萬元，或一百零四萬三千元之譜，其外會所尚在建造而未告竣者，共計值金洋九百萬元云。<sup>21</sup>

據北美青年會報告冊云，查美洲往年共造有新會所四十三間，內中最大之會所計值金洋七拾五萬元，統查各會所常年經費共需金洋七百五拾萬元，會友約有五拾萬元。刻下路義思君為臥霞窩省葛英芙蘭城〔Cleveland, Ohio〕青年會總書記，茲將該處舊會所售得金洋五十萬元，並擬再募集金洋五拾萬元建造新會所云。<sup>22</sup>

這些報導不僅讓人看到北美青年會的發展蒸蒸日上，我們甚至不難想像，規模龐大的會所建造運動，以及其所展現的雄厚財力，對於當時普遍活在貧困的中國人來說，想必是令人欽慕不已。難怪後來上海青年會得知受惠於北美協會的會所建築資助政策時，會表現得如此欣喜雀躍：

近聞巴樂滿君在美，與穆德君擬籌美金洋一百五十萬元，為各國建築會所四十九間之用，並擬於此巨款內撥資一半助中國建築會所之用。由是觀之，本會幼童會所之經費不

21 〈美國青年會之發達〉，《會務雜誌》第7期第12號（1909年4月16日），頁2。

22 〈美洲青年會之現象〉，《會務雜誌》第8期第1號（1910年2月25日），頁1。路義思於1907年底自滬返美，出任克利夫蘭青年會總幹事。在他主理期間的發展情況，可參 Paul A. Hillmer, *The Cleveland YMCA: Reflections on 150 Years of Service to the Community* (Cleveland, OH: YMCA of Greater Cleveland, 2004), pp. 71-79.



難遽得矣！<sup>23</sup>

隨著北美協會的會所建築資助政策施行以後，中國青年會會所建築運動於焉展開。來會理如此說道：

此時期中〔1908-1913〕，北美青年會對於中國之青年會事業，發生較大之興味，相與為中國各地青年會建造會所而募捐，共募得美金五十萬圓，惟地基則均由華人自購之。時則北京會所，建築告竣，香港東京二處之學生事業會所亦告落成。一九〇九年上海、天津二處，均舉行短時期的建屋募捐運動，其結果上海募得六萬五千兩，天津募得四萬五千兩，為數之巨，在中國青年會史上，固空前之舉也。<sup>24</sup>

這股建築會所的風潮在 1910 年代一直持續（附圖 6-3），<sup>25</sup> 截至 1929 年，在北美協會的資助下，中國各大城市先後有 36 所青年會會所落成，總值逾 300 萬元。<sup>26</sup> 與此同時，在青年會會所移植到中國的同時，其背後所盛載的理念亦傳到中國：

本埠乃繁華名區，其敗壞青年品格諸業，日新月盛，愈出愈奇。青年子弟閱歷未深，易墜牢籠，故當乘此機會，經營一宏廠完善會所與之抵制，備置閱報、演說、研究、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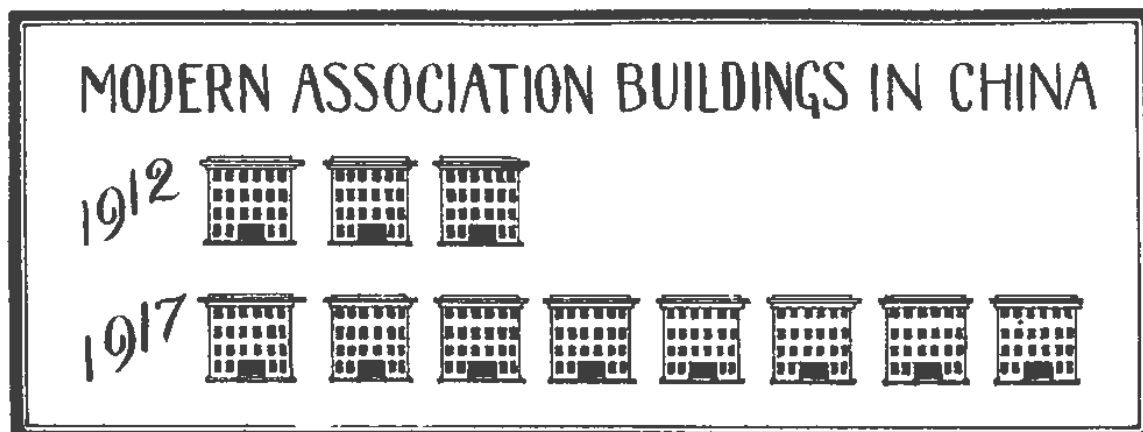
23 〈海外新聞〉，《會務雜誌》第8期第31號（1910年11月4日），頁2。

24 來會理：《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二十五年小史》（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20），頁10。

25 Annual Report of Charles W. Harvey, September 1914, p. 1, AQRLF; "YMCA Building in China", *Another Year's Progress 1913: Annual Report,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s of China*, pp. 1-2; *The Annual Report of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s of China for 1917* (Shanghai: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s of China, 1918), pp. 10-11.

26 傅若愚、侯感恩：〈青年會事業簡要調查（續第一百十一期）〉，頁66。

附圖 6-3 青年會會所的建築風潮在 1910 年代方興未艾



圖片來源：“Modern Association Buildings in China”, *Annual Report of 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of China for 1917*, p. 11

際各種規模，及游藝運動諸器具，為青年、幼童兩等人士  
蒼萃之處所，有賞心樂事，不至蕩檢踰閑……<sup>27</sup>

中國各地的青年會會所外觀或形式不一，但是硬體設施方面  
卻大體一致，並具有相近的西方建築風格和特色：

……上述各會所大都是西式的，這是中國青年會的一種趨  
勢。為應用上的便利起見，會所的內部，都用青年會式。  
……總之，青年會會所和事工的現代化或西洋化，實際  
上是隨著中國社會運動的潮流，而為步趨，青年會對於這種  
趨勢，是沒法禁止的。青年會因有現代式的會所，故對於  
社會的服務，就愈益彰顯了。<sup>28</sup>

可以說，來自北美的青年會會所建築形式，正是在中國步向現代

27 〈擬購地建修新會所緣起〉，《新會所之營造》（天津：天津基督教青年會，1909），缺頁碼。

28 傅若愚、侯感思：〈青年會事業簡要調查（續第一百十一期）〉，頁67-68。西式青年會會所的圖版，散見於天津青年會出版的一部小冊子中，參《新會所之營造》。

化的過程中，以一個饒富西方色彩的面貌，移植至二十世紀初年的中國社會，從而獲得中國人的信服和敬慕：

在調查區的會所，比較其他建築，不但在外觀上和實質上未見遜色，有時且有超勝的可能。……會所的美觀和優點，很能增加人們對於青年會的信仰。<sup>29</sup>

### 三、以上海為濫觴

上海青年會創立之時，北美協會的會所建築資助政策尚未實施。筆者於第二章已經指出，上海青年會早期限於財力，只能在租賃的臨時會址開展工作：

如本會房舍，已卜宅三遷，初寓北蘇州路，再寓大馬路，今寓北京路。大馬路房舍較蘇州路房舍為寬敞，北京路房舍較大馬路房舍尤為高大，更兼清潔光明。電燈照耀，地方適中，四處皆便；不惟此也，即事事日見暢盛……種種之起色，處處之經營，會之興旺，旁觀者諒可概見矣！<sup>30</sup>

上海青年會早期三易其址，租賃的會址在硬體設施和軟體配套方面均持續改善，會務發展亦漸有起色。然而，地理位置優越的會址難免構成沉重的租金和稅務負擔，據工部局董事會的會議紀錄，1903年上海青年會曾致函工部局申請豁免捐稅，惟遭工部局斷然拒絕：「該會〔上海青年會〕幹事來信申請豁免捐稅一事已

29 傅若愚、侯感恩：〈青年會事業簡要調查（續第一百十一期）〉，頁68。「……〔全國協會新會所〕係最新式之西洋構造……」〈全國協會新會所開幕禮〉，《上海青年》第21卷第10號（1921年4月8日），頁3。李石曾嘗言：「抑吾又見夫所謂『青年會』者矣，南洋有之，歐洲有之，而中國尤見其盛大。吾又特於天津見之，其內容雖未知其為何如，然而其建築實宏麗可觀也。」〈會務消息〉，《少年中國》第1卷第11期（1920年5月15日），頁56。

30 〈開堂盛會〉，《上海青年會報》第1卷第3冊（1903年10月9日），頁1。

被否決。」<sup>31</sup> 此外，不時遷移會址亦非長久之計。誠如駱維廉後來提及位處上海的日本青年會時說：「在美國（這裡更甚）租賃的房子中，是不可能使青年會得以永久地成功。」<sup>32</sup>

不過，更重要的是，租賃會址與上述的北美現代青年會會所比較，在硬體設備方面差距極大，致使青年會既無法與商業娛樂競爭，亦無從實踐「三育」理念，發揮「人格出產所」的功能：「其時主持會務者，為路義思、曹錫庚二君，意謂本會胚胎，雖已粗具，然仍未達初衷，是非建築大規模之會所不足以擴充事業。」<sup>33</sup> 因此，無論是出於客觀環境的需要，抑或青年會的理念使然，打造一座符合青年會理念的「人格出產所」，一直是上海青年會念茲在茲的目標。如路義思所憶述：

……可見當時最大最困難的，就是這個會所問題〔興建永久會所〕了。這個問題一旦解決了，不但可以一勞永逸，而且可將會務大加擴張，作推進工作的大本營。所以我們認定這個目標，努力前進。<sup>34</sup>

中國青年會會所建築運動以上海為濫觴：「中國青年會之有新式的會所，這〔上海〕是第一個。」<sup>35</sup> 無論是1907年建成的四川

31 上海市檔案館編：《工部局董事會會議錄》，第1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903年4月15日，頁600。

32 W. W. Lockwood's Letter, October 28, 1913, COR.

33 《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十九年度會務報告》（上海：上海基督教青年會，1931），頁2。另參Annual Report of CYMCA of Shanghai, 1906, p. 5, AQRBV. 第一位來華的青年會幹事來會理，在抵達天津不久便已設想建立青年會會所的價值。C. Howard Hopkins, *History of the Y.M.C.A. in North America*, pp. 664-665.

34 路義思：〈上海青年會第一任華總幹事——曹雪廉先生生平之回憶〉，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編：《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五十週年紀念冊（1885-1935）》（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1935），頁176。

35 〈籌備第九次全國大會意見書〉，《青年進步》第62冊（1923年4月），頁100。

路會所（成人部），或是後來於 1915 年增建的童子部會所，均為中國青年會的先導，極具代表意義。前者的落成雖早於北美協會資助政策實施以前，然而在建築工程的不同環節上均與後者無異。筆者無意縷述這兩項建築工程的各項細節，下文只會勾勒兩項工程中的一些重要環節，從而說明這場目光遠大的世界性青年會會所建造運動，在落實到中國處境時曾經遭遇的一些問題。

## 第二節 艱巨的打造歷程

常言道：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城市青年會要打造一座「人格出產所」委實並不容易，具體實踐牽涉繁複的程序，一座青年會會所由策劃到落成，往往長達數年之久：

嚮者市會取得新會所之辦法，（1）係先由市會籌款購得基地，（2）然後要求協會轉請北美協會補助建築費。（3）北美協會如已允諾，並不舉此建築費以交協會或該市會，乃由該市會以建築內容各要點提出說帖，（4）交由協會建築幹事繪具草圖，（5）送由北美協會建築部彙整核准，（6）然後北美協會選委該市會就地相當之中西人士，組織建築委員會，並委北美協會駐華代表為執行幹事，俟會所完竣後，（7）由該執行幹事代表北美協會將該會所交渡於吾國協會，並訂立合同，（8）然後協會再與該市會另訂合同，而以該會所交渡於該市會使用。〔編號為筆者附加〕<sup>36</sup>

下文我們會以上海青年會打造會所的歷程，管窺中國青年會會所

<sup>36</sup> 駱維廉：〈本會三十五年的歷史沿革〉，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編，《力的創造：上海青年會三十五週年紀念冊》（上海：上海基督教青年會，1935），頁74。

建築運動存在的一些鮮為學者注意的深層問題。

## 一、四川路會所（1901-1907）

### （一）政商界贊助

上海青年會在創會不久便有興建會所的計畫。1901年初，短暫留滬的西幹事畢啟已為興建會所進行募捐，並籌得四千多元作為建築會所的基金。<sup>37</sup>如前文所述，上海青年會的財力有限，為了維持青年會的日常經費支出，已不得不與中外政商名流打交道；耗費甚鉅的會所建築經費，當然自不待言。據路義思指出，早在1901年12月，上海青年會在一個聖誕晚會上，已獲得上海道台袁樹勛（袁海觀）等官員對青年會的認可。<sup>38</sup>《青年會報》對於當晚的盛況有如下的報導：

辛丑冬十一月十三日……上海青年會路君義思大開盛宴，為慶祝救主聖誕之典，主席為美總領事古納君，並承兵備道袁海觀觀察、廣學會李提摩太君，暨中西紳士庶惠臨。宴畢，古納君陳說青年會實事求是之旨，訖復請觀察倡議，幸承觀察不吝齒芬，大放厥辭云：本道蒙各友招赴此宴，心喜之至……<sup>39</sup>

這個晚會相信便是美國駐滬總領事古納協助上海青年會募捐的具體例子。據後來的資料顯示，曾經捐助興建四川路會所1,000元

<sup>37</sup> Annual Report of CYMCA of Shanghai, 1901, p. 1, AQRBV; Robert E. Lewis, "Report Letter: Development in Shanghai", August 1901, p. 2, COR.

<sup>38</sup> Annual Report of Robert E. Lewis, September 1902, p. 1, AQRBV. 有關袁樹勛的生平，可參鍾啟河：〈袁樹勛對上海近代化的重大貢獻〉，《湖南文獻》第25卷第2期（1997年4月），頁36-40。

<sup>39</sup> 〈上海宴集青年會記〉，《青年會報》第1冊（1902年3月），頁2a。

或以上的人士，多為中國的官商名流（附表 6-1）。這亦進一步體現了青年會與中國政商界關係密切的因由，以及由此而生的種種不足為外人道的利益瓜葛。

至1902年8月，上海道台袁樹勛更表達餽贈一塊土地予上海青年會建築會所的意向。該塊土地位處市中心，價值30,000美元。可能是由於有關細節仍在討論階段，或涉及當事人的一些私下承諾，故當時仍未向外正式公布有關消息。<sup>40</sup> 據路義思後來在1907年的報告指出，他當時已獲得中國商人認捐10,000元的承諾；同時，袁樹勛亦答應上海青年會只需出資10,000元，便可獲得南京路的一塊政府土地。<sup>41</sup> 查當時北美協會的會所建築資助政策尚未實施，上海青年會必須站穩陣腳，並籌得經費購置一筆位處市中心的土地後，路義思才能赴美籌募建築經費。<sup>42</sup> 路氏既獲得上海官員餽贈土地的承諾，遂迫不及待向北美協會提出返美休假，順道為上海青年會籌募會所的建築經費。<sup>43</sup>

附表 6-1 四川路會所捐贈 1,000 元或以上者

葉子衡觀察（商人）	蘇葆森觀察（商人）	徐芝雨觀察
李伯行星使	李雲書觀察（商人）	總稅務司赫德君
袁海觀大京兆	李眉清（商人）	中國電報局
海關道瑞莘儒觀察	輪船招商局	端午橋制軍
朱葆珊觀察	嚴筱舫觀察（商人）	拳亂殉道紀念會眾董

資料來源：《會所出入總門》（上海：上海基督教青年會，1906），缺頁碼。

<sup>40</sup> Annual Report of Robert E. Lewis, September 1902, p. 1, AQRBV.

<sup>41</sup> Annual Report of Robert E. Lewis, September 1907, p. 1, AQRBV.

<sup>42</sup> Robert E. Lewis, *Search of Far Horizons* (West Conshohocken, PA: Infinity Pub., 2004), p. 59.

<sup>43</sup> Annual Report of Robert E. Lewis, September 1902, pp. 1, 3, AQRBV.

路義思於 1903 年 1 月離滬返美，抵美後隨即前赴紐約青年會總部報到，第二天便旋即展開募捐之旅。在為期近一年的休假裡，路義思主要在美國（返滬前曾短暫停留英國）各州進行巡迴募捐，以及出席不同會議發表演說，向與會者報告青年會在中國的發展情況。同年 12 月，路義思在美撰寫的年度報告中興奮地說：「我已經為上海華人青年會獲得 33,500 美元的美好承諾，以及北美協會慷慨捐助 16,666 美元，合共獲得 50,166 美元。會所因而有著落了。」<sup>44</sup> 另一方面，路氏為履行對中國商人的捐款承諾，亦必須在 1903 年底前返回上海。

路義思在美募得興建會所經費的好消息，不久亦傳到上海青年會：「聞路君此次旋美為上海青年會建造公所之款，業已募捐洋銀十餘萬元。」<sup>45</sup> 豈料，路義思返滬以後，如第四章所述，美國亞洲協會就美國駐滬領事古納的不法行為，呈交調查報告予美國國務院，路義思因而無法再透過古納與上海道台袁樹勛取得聯絡，以兌現他捐贈土地的承諾，致使整個會所建造計畫陷於膠著狀態。路義思既失信於中國商人，亦爽約於美國的捐助人，陷於進退維谷的尷尬局面。<sup>46</sup> 這個事例當然可視為個案或例外，但卻充分說明了青年會會所建造計畫在突如其來的政治風潮面前，基本上是無能為力的。

## （二）選址講究

上海道台提供廉價土地的計畫胎死腹中，上海青年會只得自行洽購土地。北美青年會對於會所的選址非常講究，必須位處城

<sup>44</sup> Annual Report of Robert E. Lewis, December 1903, p. 3, AQRBV.

<sup>45</sup> 〈路君回中〉，《上海青年會報》第1卷第15冊（1904年1月1日），頁2。

<sup>46</sup> Annual Report of Robert E. Lewis, September 1907, p. 1, AQRBV.



市中心區域，中國青年會亦繼承了這項建築原則。如前文所述，上海青年會以較高昂的地價來換取市中心的優越地段，早在租賃會址時期已初見端倪。據路義思憶述：

未買這塊地之前，有人主張到鄉下去買一塊地，因為地價便宜易於著手。但我們多數人則堅決主張要在一個熱鬧的中心地點，使青年工作可以日夜進行，窮的富的大家可以及得到。<sup>47</sup>

二十世紀初，上海公共租界以中區（Central District）的地價最昂貴，較其他地區動輒高出數倍。<sup>48</sup> 可以推斷，負責統籌興建會所的委員會在討論選址時，雖然有成員提出財務方面的擔憂，但似乎仍無法動搖會所必須座落於市中心的堅持：「……並舉購地委辦多人，磋商於滬中心處購一適宜地點為會所，以便會員交通。」<sup>49</sup> 事實上，這種心態亦充分反映在路義思的選購舉措之上。他親自從工部局專責管理土地的部門處，取得一幅上海中區的地圖，在毫不考慮土地是否出讓及面積大小的情況下，研究過每一塊土地。<sup>50</sup>

迨至 1905 年，委員會最後選定了四川路的一塊土地，該地估價為 63,000 元，<sup>51</sup> 並認為其潛在價值很大，會是會所長

47 路義思：〈上海青年會第一任華總幹事——曹雪廉先生生平之回憶〉，頁177。

48 以1903年為例，中、北、東、西區土地每畝平均估價依次為：13,549兩、4,819兩、2,539兩，以及2,046兩。參〈上海公共租界歷屆地皮估價表（1903-1930）〉，收入羅志如編：《統計表中之上海》（南京：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1932），頁16。

49 〔曹雪廉〕：《上海基督教青年會歷史概論》（上海：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出版年份不詳），油印稿，頁178。另參Annual Report of CYMCA of Shanghai, 1904, p. 2, AQRBV.

50 Robert E. Lewis, *Search of Far Horizons*, p. 98.

51 Robert E. Lewis to John R. Mott., 6 July 1905, COR.

遠座落最佳的地方；<sup>52</sup> 遂計畫與擁有該土地的英國商人漢璧禮（Thomas Hanbury）進行洽商，希望他能以低價出售，甚或作禮物贈予上海青年會。委員會經過半年的洽商，漢氏最終願意以市價的三分之一，即 46,125 元出讓。<sup>53</sup> 四川路的土地雖屬物超所值，但是在時人眼中，卻是一項相當高風險的投資：

過去東方人並沒有為青年會捐贈過這麼大筆金錢，我們的許多朋友均對這項建議感到畏縮……我們不能夠將這座建築物建置在城市外圍，經過一年的調查以後，我們亦確信在上海的中區將不會有任何地方如這塊土地一樣價廉。<sup>54</sup>

然而，在青年會會所必須座落在市中心的原則指導下，上海青年會只得為此理念付出高昂的風險和代價。

同年 6 月，殉道堂委員會（Committee of the Martyrs' Memorial Hall，即附表 6-1 的「拳亂殉道紀念會眾董」）主動接觸路義思，商討在籌建的上海青年會會所中加建一座大禮堂的可能性。事緣殉道堂委員會本欲興建一座可容納 1,500 人的獨立大禮堂，以紀念義和團亂事期間殉道的外國傳教士和中國信徒，卻遇到經費不足的難題。6 月底，上海青年會與殉道堂委員會達成協議，在擬興建的上海青年會會所中建立一個可容納 700 人的大禮堂（取名「殉道堂」），殉道堂委員會必須捐出不少於 9,000 元的

<sup>52</sup> 1906 年的報告說委員會愈來愈意識到該地段的重要性，並進行了人流的調查。Annual Report of CYMCA of Shanghai, 1906, p. 3, AQRBV. 人流統計亦應用在天津青年會購置土地興建會所之時，參 C. W. Harvey, "The Tientsin Land Canvass", *China's Young Men*, vol. 5, no. 1, (February 1910), p. 10.

<sup>53</sup> Robert E. Lewis to Messrs. Ward, Probst & Co., 26 June 1905, COR.

<sup>54</sup> Annual Report of Robert E. Lewis, September 1907, p. 4, AQRBV.

建築經費。<sup>55</sup> 對於同樣面臨建築經費不足和上海青年會來說，與殉道堂委員會達成的協議不啻是一場及時雨。然而，另一波政治風潮再起，同年5月，上海爆發抵制美貨運動，中美兩國的關係愈趨緊張。<sup>56</sup> 上海青年會既不能聯絡中國官員進行募捐；商業活動陷於停頓，亦令不少捐助人無法如期履約捐款。<sup>57</sup> 加上殉道堂委員會的捐款，上海青年會亦只得現金20,000元，最終被迫向銀行抵押借款25,000元，方能讓建築工程展開。<sup>58</sup>

### （三）理想與現實

在會所工程展開後，上海青年會需要處理的是一系列的具體細節問題。路義思在回憶錄中指出，青年會會所的意念是嶄新的：「青年會會所的外觀是怎樣？沒有一位上海建築師曾經看過。」<sup>59</sup> 可見，源自美國的現代青年會會所理念和原型（prototype）早已埋藏在他心裡。正如1905年的上海青年會年報所說：「……座落在中心區的偌大和良好的房子，將會成為青年會的宗教、教育、體育及社交特色。」<sup>60</sup> 由於當時北美協會還未派遣專門的建築師到中國，負責統籌建築會所的委員會最終委託了愛爾德洋行（Algar & Beesley）建造這一種全新的建

<sup>55</sup> Annual Report of Robert E. Lewis, September 1905, p. 3, AQRBV.

<sup>56</sup> 詳參張存武：《光緒卅一年中美工約風潮》（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5），頁91-107；熊月之、袁變銘：《上海通史》，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頁257-267。

<sup>57</sup> Robert E. Lewis to John R. Mott, 12 June 1905, COR.

<sup>58</sup> Annual Report of Robert E. Lewis, September 1907, p. 4, AQRBV.

<sup>59</sup> Robert E. Lewis, *Search of Far Horizons*, p. 95.

<sup>60</sup> Annual Report of CYMCA of Shanghai, 1905, p. 3, AQRBV. 創辦杭州青年會的鮑乃德（Eugene E. Barnett）亦有相同的想法。Eugene E. Barnett, *As I Look Back: Recollections of Growing Up in America's Southland and of Twenty-six Years in Pre-Communist China, 1888-1936* ([Arlington, VA: n. p., 1964?]), p. 154.

築形式。據路義思指出，它是中國唯一一個知悉青年會會所為何物的建築師事務所，其中一名成員曾是蒙特婁、多倫多及溫尼伯（Winnipeg）青年會的會員，並曾於後者興建會所時協助繪畫圖樣。<sup>61</sup>

路義思雖早有青年會會所的美國式藍本，但出於客觀環境的制約，以及實踐上的權宜考慮，會所並未以「複製及貼上」（copy and paste）的形式出現。<sup>62</sup> 以地理環境而論，上海的土地由泥沙沖積而成的軟土構成，<sup>63</sup> 致使新會所無法像部分美國青年會會所般建造地下室；此外，就會所的內部設計而論，青年會會所雖以培植青年三育為鵠的，但由於當時教育和演講在上海最受歡迎，而時人對體育的價值仍未重視，於是新會所的設計亦反映了這方面的時代特點。加上殉道堂委員會與上海青年會達成協議，加建一個可舉辦大型活動的大禮堂，於是原初設計的室內跑道亦被取代。不過，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基於經費的限制。

1905年7月11日，愛爾德洋行向路義思提交了四川路會所的初步設計建議，估計一座樓高三層的會所，造價約為68,000兩；

<sup>61</sup> Robert E. Lewis to John R. Mott, 6 July 1905, COR. 愛爾德（Albert E. Algar）於1888年從英國抵滬，在當時上海歷史最悠久的建築師事務所恒洋行（Whitfield & Kingsmill）當學徒，1897年自立門戶。1901年1月，為上海工程師建築學會少數的建築師之一。及至1906年畢士來（Percy M. Beesley）加入成為合夥人。參婁承浩、薛順生編著：《老上海營造業及建築師》（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04），頁58；伍江編著：《上海百年建築史·1840-1949》（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1997），頁95。

<sup>62</sup> 杭州青年會會所的建築情況亦然，參Eugene E. Barnett, *As I Look Back: Recollections of Growing Up in America's Southland and of Twenty-six Years in Pre-Communist China, 1888-1936*, p. 120。

<sup>63</sup> Harry Hussey, *My Pleasures and Palaces: An Informal Memoir of Forty Years in Modern China*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8), p. 105；婁承浩、薛順生編著：《老上海營造業及建築師》，頁37。

早在 1903 年路義思赴美募得 50,000 美元建築經費時，所談條件之一是其中 10,000 美元作為北美協會所投資的基金，所得利息作為會所的保養費，以及推動日後工作之用；另外 5,000 美元則用於裝修和陳設。<sup>69</sup> 在北美協會給路義思的另一封信件裡更補充，過去建築會所的經驗顯示，工程會有超出預期的額外支出，故建議預留 5,000 美元作備用金，整項工程費用定於 30,000 美元較為恰當。<sup>70</sup> 但是從上述路義思所提交的建築方案可見，現實情況顯然無法兌現原初的承諾，以致他不得不提出以新會所的租金收入，換取北美協會取消設立基金的要求：

雖然能夠從投資在紐約或其他地方的資金，以及會所可租賃的部分支取收入是一件非常幸運的事情，然而上海的會所只籌得 50,000 美元，我們確信這樣的情況並不能實現。……我們建議青年會從建築物的租賃部分獲得基金收入，以及不會有任何金錢從 50,000 美元中扣除，作為投資的基金。<sup>71</sup>

路義思最後不忘為他違反了當日的捐款承諾作出辯護：

要是我們未能滿足你的所有期望，那並不是因為我們已經忘記或誤解它們，僅僅、唯一是由於兩年前當我離開紐約前，所有的特徵 (feature) 和條件在我們看來是可能，而現實的情況是，所提供的金錢在上海並不可能 [建成會所]。<sup>72</sup>

可見，在青年會會所移植至中國的早期，青年會對於理想與

<sup>69</sup> H. P. Anderson to Robert E. Lewis, 25 November 1903, *COR*.

<sup>70</sup> H. P. Anderson to Robert E. Lewis, 25 November 1903, *COR*.

<sup>71</sup> Robert E. Lewis to John R. Mott, 21 August 1905, *COR*.

<sup>72</sup> Robert E. Lewis to John R. Mott, 21 August 1905, *COR*.

現實之間可能存在的落差，似乎並沒有予以足夠的關注。迨至 1905 年 10 月 3 日，北美協會最後的回覆是採納造價較便宜的建築方案。<sup>73</sup>

#### (四) 匯率風險

建築經費不足，已對會所工程造成諸多掣肘，然而，以美元計算的經費資助，因匯價波動所帶來的匯兌損失，勢必對會所工程構成進一步的打擊。1906 年 6 月 1 日，路義思在給穆德的信中指出，5 月 23 日會所建築委員會通過決議，責成他向北美協會轉達有關銀價持續攀升的問題：自 1905 年 12 月獲北美協會授權落實工程開始，銀價大幅上升（附表 6-2），令建築經費的賬面損

附表 6-2 建築經費匯兌情況（美元兌銀元）

日期	美元	銀元(兩)	兌換率
1905年	6,000	11,166.57	0.537318
1906年4月11日	5,000	7,121.98	0.702052
1906年5月22日	5,000	6,884.68	0.726250
1906年6月27日	5,000	7,010.27	0.713239
1906年10月10日	5,000	6,834.00	0.731636
1906年12月10日	5,000	6,602.00	0.757346
1907年1月17日	5,000	6,759.74	0.739673
1907年3月22日	10,000	13,775.00	0.725953
1907年7月13日	3,000	4,088.86	0.733701
	49,000	70,243.20	

資料來源：Robert E. Lewis to H. P. Anderson, 24 August 1907, Appendix A, *COR*.

說明：兌換率由筆者自行計算

<sup>73</sup> John R. Mott to Robert E. Lewis to, 3 October 1905, *COR*.

失已高達 14,840 兩。委員會主席馬士 (H. B. Morse) 作為海關的統計祕書，亦不願意評論未來六個月的銀價走勢。委員會當時面對的最迫切問題是，會所內的設備，如家具、電燈等支出，保守估計亦需 9,750 美元。工程落成後可能出現的情況是，一座沒有內部設施的青年會會所。<sup>74</sup> 路義思進一步指出：

建築委員會在那時指出，北美協會對合約負有責任，沒有你的同意，我們無法展開〔工程〕。我們同意保證根據合約運用你的金錢；然而，委員會並未意識到，我們是在財務上負有法律責任，我們只是為北美協會擔任司庫及代理人，由北美協會為建築物提供經費。<sup>75</sup>

時值穆德外訪，其助手安徒生 (H. P. Anderson) 在覆函說：「我想你清楚明白上海華人青年會唯一可用的資金是為此募捐得的 50,000 美元。」<sup>76</sup> 而穆德亦在同年 9 月 8 日覆函拒絕承擔匯率風險的責任。<sup>77</sup> 路義思在同年的報告中以頗為不滿的口吻說：

有關會所的問題之所以令人產生極大關注，是由於銀元持續漲價，而作為結果的事實是，足供支付建築物的造價和設備的 50,000 美元，如果在合約獲批准時已匯至上海，便不會產生現在的問題。匯價損失已達至數千元，因此並沒有足夠的金錢為會所添置設備。在最早的階段，我們獲得明確的條款保證，這筆款項將會由北美協會承擔，遂勸誘上海〔建築委員會〕購置一塊較他們之前考慮過更昂貴的

<sup>74</sup> Robert E. Lewis to John R. Mott, 1 June 1906, *COR*.

<sup>75</sup> Robert E. Lewis to John R. Mott, 1 June 1906, *COR*.

<sup>76</sup> H. P. Anderson to Robert E. Lewis, 30 June 1906, *COR*.

<sup>77</sup> John R. Mott to Robert E. Lewis, 8 September 1906, *COR*.

土地，我認為你會理解到目前的嚴峻情勢……

我們在 1905 年 9 月 11 日購得土地，作價 45,000 元（折合約 33,000 美元），但我們要以它抵押 26,000 元。在過去一年，我們已將抵押借款減至 19,000 元。……我們透過努力是可以償清的，在奠基禮以前將不會有任何債項；然而，我看不見上海〔青年會〕可以承擔迫在眉睫的建造〔匯價〕虧損。<sup>78</sup>

從匯率問題進一步可見，在建造青年會會所的問題上，無論是在華的西幹事，或北美協會方面，均沒有仔細設想到可能出現的匯價波動風險由何方來承擔。

如附表 6-2 可見，自 1905 年開始銀價持續居高不下。迨至 1907 年 5 月，穆德在訪華出席百年傳教大會（舉行地點即殉道堂）期間，始提出額外資助 9,000 美元作為工程和會所設施的費用，附帶條件是上海青年會必須籌得 21,000 元，用作償付購買土地時所欠的債項。最後，上海青年會在知名商人朱葆三、李雲書等人答允捐助下，接受了有關的條款。<sup>79</sup> 四川路會所工程才得以繼續：「至於本會新屋捐款，前承穆君募集美金五萬元，茲又蒙捐集一萬元，俾新屋得早日落成，不致有欠缺之虞。」<sup>80</sup>

### （五）超支負債

四川路會所最終在 1907 年 10 月落成（附圖 6-4），並於 3、5 及 8 日一連三天舉行了盛大的開幕典禮，政商學界名人到賀，

<sup>78</sup> Annual Report of Robert E. Lewis, September 1906, p. 9, AQRBV.

<sup>79</sup> "Meeting of Committee", 11 June 1907, p. 1, COR.

<sup>80</sup> 〈眾學易舉〉，《會務紀聞》第 5 期第 6 號（1907 年 3 月 19 日），頁 2。



附圖 6-5 童子部會所募捐運動的宣傳漫畫



圖片來源：聿光（張聿光）：〈浮圖合尖之功期諸熱心公益之君子〉，《時報》，1909年5月22日。

第二、大概是由於購地捐款的數額較大，故捐款人毋須一次交付，而是以認捐的形式進行，可以分期付款。<sup>97</sup> 可以想見的是，這種大型的募款購地活動存在捐款承諾無法如期兌現的潛在危機。在是次募捐運動完結後半年，上海青年會發出了以下的公開呼籲：

本會前因募捐購地，蒙諸君認捐贊助，遂得一時湊成數萬金，此皆諸君提倡之功也。然近查捐款尚有多數未蒙擲下，倘能於是月內一列惠繳來會，俾早玉成其事，則感繳寔有涯涘耶。盼甚！盼甚！<sup>98</sup>

97 「各部募得捐款，或隨時交至本會掣付收據，或成數總繳，或按期分繳，極遲至本年十二月三十一號前一律交清。」〈募捐簡章〉，《上海青年》第11期第16號（1912年6月13日），頁7。

98 〈催繳購地捐款〉，《會務雜誌》第7期第32號（1909年11月19日），頁2。

此餘地，更落他人之手，則將來難期珠還，於是眾議設法購置。<sup>100</sup>

上海青年會以機不可失，遂於1909年10月14日迅速購得該塊土地。<sup>101</sup> 不過，由於童子部會所所在的土地借款尚未清償，故上海青年會一直未能獲得北美協會提供建築經費。

豈料，在上海青年會追收捐款的同時，上海正醞釀一場巨大的金融危機。1910年7月，隨著美國採取限制橡膠的消費政策，席捲上海的橡膠股票投機泡沫隨即爆破，致使整個上海陷入一片金融恐慌之中。<sup>102</sup> 上海的金融危機自然對上海青年會收集捐款的進度構成嚴重打擊，戴威廉在1910年的報告提及來年的工作時說：「……繼續積極地推動收集有關土地基金尚未繳付的捐款；由於瘋狂的橡膠投機，上海目前在財政上正處於破產邊緣，這次風潮已暫時緩和下來。」<sup>103</sup> 上海青年會為儘早取得北美協會的經費資助，只得在1912年5月再舉行另一次的短期募捐運動：

幼童部為培植人才之初基，亟宜早日創辦，昨經各議董邀集熱心義務員二十人，開會決議應組織募捐事務部，以便分投募捐，若得捐集銀四萬兩將地價償清，即可開工興築。<sup>104</sup>

100 〈捐款之踴躍〉，《青年》第13卷第3號（1910年4月），「中韓青年合會己酉年報」，頁68。

101 Copy of Title Deed (Cad. Lot 75 - Boy's Building Site), COR.

102 詳參William A. Thomas, *Western Capitalism in China: A History of the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Aldershot, England;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1), pp. 145-172; 徐華：〈從1910年橡皮股票風潮看清末的金融市場〉，《臨沂師範學院學報》第23卷第1期（2001），頁41-43；閔杰：〈清代「橡皮股票風潮」始末〉，《中國金融家》第11期（2004），頁102-106。

103 Annual Report of W. E. Taylor, September 1910, p. 5, AQRBV.

104 〈議決開會募捐〉，《上海青年》第10期第14號（1912年5月30日），頁1。

是次募捐運動最後雖然只籌得 24,161 元，<sup>105</sup> 然而已足夠支付童子部會所的土地基金，建築工程遂得以展開。上海青年會亦正式成立童子部會所建築委員會，建築圖則由全國協會建築部幹事愛騰生（Authur Adamson，又譯鄢盾生）主理，完成後再交由北美協會專門委託的建築師事務所夏德卡與黑三（Shattuck & Hussey，又譯薛德與赫錫）提出修改建議：

萬國青年會本部派以下諸君為建築本會童子會所之委辦，即李德白拉克、聶雲台、華乾史多乾、王閣臣、費啟鴻、賀嘉立、駱維廉諸君，更請愛騰生先生為建築部總理，打樣者為支加哥之黑三與夏德卡。現委辦諸君正在籌備中，不久當即動工云。<sup>106</sup>

1912 年 9 月，建築師赫錫<sup>107</sup> 在致北美協會的信中，就上海青年會提交的規劃圖則提出了相當嚴苛的批評：第一，擬建童子部會所的地段座落於窄巷，不能夠給人一個良好的景觀，對於捐款人而言將會非常失望（尤其是為了紀念他的妻子而興建的）；<sup>108</sup> 第二，上海青年會會所作為中國青年會的模範，新會所對體育部的照顧非常不足，面積尚不及美國的小型會所，但卻非常荒謬地希望成為中國青年會體育教練學校，以及負責管理成人部及童子

105 《上海青年》第10期第20號（1912年7月21日），頁1。

106 〈建築童子會所〉，《上海青年》第12卷第26號（1913年6月27日），頁4。「薛德、赫錫二君，美國支加哥城建築專家也，本會童子部新會所之圖樣為二君所繪刻。」〈建築專家〉，《上海青年》第14卷第35號（1915年10月22日），頁3。

107 有關赫錫的生平及其參與青年會會所建造運動的經過，可參 Jeffrey W. Cody, *Building in China: Henry K. Murphy's "Adaptive Architecture", 1914-1935*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70-72; Paula Lupkin, *Manhood Factories: YMCA Architecture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Urban Culture*, pp. 146-147.

108 晚至三十年代此事仍被人重提。C. A. Herschleb to L. T. Chen, 5 June 1931, BR.

部的體育活動；<sup>109</sup> 第三，按照目前的規劃，成人部及童子部將不足以應付四至五年後的發展，加上兩座會所中間為體育館所分隔，對於將來任何一個會所的擴張發展均構成障礙。赫錫最後的建議是，將四川路會所與新購置的地方一併發展為童子部會所，並認為它足供未來多年的使用；與此同時，另購一個地方興建成人部會所，才是長久之計。他最後甚至毫不客氣地指出，北美協會為遠東城市的工作計畫多年，上海作為一個最有需要的地方，如不能興建一座足夠大的會所以應付即時的需要，他認為對於作為中國門戶（gateway）的上海來說，特別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sup>110</sup>

赫錫提出的專業意見並未受到重視，上海青年會仍多番催促北美協會責成赫錫儘早修改圖則。<sup>111</sup> 後來當擴建會所的事宜塵埃落定以後，夏德卡與黑三建築師事務所在給北美協會的信中，一針見血地指出：「上海青年會無法購得四川路毗連的地方興建會所，固然是因為與業主協商失敗，但更主要是由於沒有資金購買額外的土地。」他同時批評駱維廉對於建築圖則的關心，只是從建築物的結構及有效性來考慮。<sup>112</sup> 可見，上海青年會在財力不足的情況下，只得在建築細節的問題上削足適履，迫在眉睫的現實考慮凌駕了長遠發展的思想關懷。

109 「新會舍之健身房較現有之健身房略小，然能多一健身房……」〈新會舍之內容〉，《上海青年》第12卷第45號（1913年12月19日），頁7。體育幹事晏斯納亦提出了相近的批評。M. J. Exner to J. M. Clinton, September 22, 1912, p. 2, BR.

110 Harry H. Hussey to J. M. Clinton, September 19, 1912, p. 2, BR.

111 J. M. Clinton to H. H. Hussey, 30 September 1912, BR.

112 Messrs. Shattuck & Hussey to Dear Sirs, 25 February 1913, BR.

### （三）超支負債

1912年9月，上海青年會接獲北美協會通知，童子部會所的建築經費資助增至50,000美元：「〔北美協會〕已為本埠童子會聘請打樣師構成建築之圖樣，並云前本擬撥四萬金洋作本會童子會建築之費，今又添撥一萬金洋，前後共計五萬金洋為童子會建築之費。」<sup>113</sup>翌年10月，駱維廉在給穆德的信中詳細交代了工程的招標進度，指出為童子部會所的主體工程招標時，多個承建商提交的報價由52,000兩至114,000兩不等，均大大超出了原來經費預算的40,965兩（見附表6-3）。於是只得改用較廉價的建築材料（如不要柚木樓梯、部分樓層棄用隔音物料等），然後再行招標，承建商之後提交的標價隨即下調至42,000兩至91,200兩不等。由於委員會對最低標價的承建商並不信任，故接納了次低標價的承建商，但是工程費也要52,120兩，仍然超出預算多達12,000兩，於是只得再將擬建的五層新會所減為四層，並將頂層的宿舍改為山形屋頂，修訂後的標價也要42,400兩；另外再加上鋼鐵、金屬板條等材料4,600兩，總數仍高達47,000兩。<sup>114</sup>然而，這個數目還未包括新會所必需的家具、設備等為數近28,000兩的支出（附表6-3）。

駱氏同時指出，是次上海青年會獲北美協會資助50,000美元興建童子部會所，以當時0.66美元兌1兩銀元換算，可得建築經費折合為75,757兩；而按北美協會的規定，只有其中95%可用，故實得建築經費為71,869兩。此外，他在將報價提交建築委員會前，曾接觸董事部並獲承諾負擔5,000兩，亦即合共可用的建築經費為76,869兩，勉強足夠支付整項工程的預算開支。駱維

113 〈童子會之消息〉，《上海青年》第10期第23號（1912年9月26日），頁2。

114 W. W. Lockwood to John R. Mott, 28 October 1913, BR.

附表 6-3 童子部會所的估價與得標價

項目	北美協會的估價 (兩)	上海的得標價 (兩)
暖氣、抽水馬桶、污水管	5,030	4,454
電線及配件	1,078	2,000
家具	10,780	8,000
監工及建築師	3,952.79	3,957
小型的工程合約及備用金	10,060	6,974
泳池鍋爐及配件		1,000
過濾器		1,000
太平門		1,000
電鈴		100
主體工程及鋼鐵、金屬加固物	40,965	47,000
	71,865.79	75,485

資料來源：W. W. Lockwood to John R. Mott, 28 October 1913, *BR*.

廉在給穆德的信中指出，只要得到北美協會的首肯，便會立即與承辦商簽訂工程合約。<sup>115</sup>

駱維廉在信中頗費周章地陳述了上述各項支出的數目，以及背後的來龍去脈，力圖說明上海青年會已為平衡預算付出了最大的努力。然而，他筆鋒一轉，提到上海青年會董事部和建築委員會非常不願意將童子部會所擬作為宿舍的第五層從設計中刪去。首先，當時上海青年會已在附近租用地方，用作 50 名日校寄宿生的住處，上海青年會的學生宿舍可以成為中國青年會的模範。其次，該層原本預留了部分空間作為留學生出國前或歸國後的住處，上海青年會在去年已協助 200 名學生出國留學，旅館成為從事留學生工作的重要條件。再次，屋頂花園將會是一個令會員賞

<sup>115</sup> W. W. Lockwood to John R. Mott, 28 October 1913, *BR*.

心悅目的地方，尤其是中國人並不獲准進入上海的公共花園。駱維廉最後總結說：「有鑑於這些考慮，因為缺乏像是 15,000 兩（約 10,000 美元）而要刪去第五層，看來是一件憾事。」<sup>116</sup> 駱維廉增加資助的要求最後得到北美協會的同意。

最後，童子部會所建築工程於 1913 年 11 月簽約定案，<sup>117</sup> 至 1915 年 10 月落成（附圖 6-7）。上海青年會為隆重其事，亦分三天舉行開幕典禮，堪為當時盛舉：「聞該童子部開會三日，各界來賓都四千餘人，亦可謂近日滬上之盛舉也。」<sup>118</sup> 不過，童

附圖 6-7 童子部會所



圖片來源：PHO

116 W. W. Lockwood to John R. Mott, 28 October 1913, *BR*.

117 〈建屋合同業已簽約〉，《上海青年》第12卷第40號（1913年11月28日），頁2。

118 〈青年會童子部開幕之圓滿〉，《申報》，1915年10月19日，第3張，第10版。用字完全相同的報導，另見〈青年會童子部開幕三誌〉，《時事新報》，1915年10月19日，第3張，第2版。

子部會所在風光的開幕典禮背後，同樣離不開負債的厄運：

童子部新會所原議之建築費，因歐戰發生各物昂貴，承造人遂有改作四層樓之議，嗣經董事部決議以五層樓宿舍萬不能少，材料漲價固是實情，當允於落成後另提銀五千兩作購置屋中器具之用，今新屋雖幸完全工竣，而本年之經費不免更形支絀。查本會現有實產計銀廿一萬八千兩，尚有地產銀一萬七千兩未曾清償。<sup>119</sup>

### 三、小結

從上述的討論可見，「人格出產所」的打造之路之所以步履維艱，大致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時局不穩。由於青年會堅守會所必須座落於市中心的原則，會所座落的土地價格勢必高昂，上海青年會必須花上極大的氣力進行募捐。然而，由於二十世紀初年中國政治、經濟情勢持續不穩，政治、社會運動此起彼落，無論政界抑或商界，往往會因突如其來的政治或經濟風潮，左右他們的捐款意願，或是窒礙他們兌現捐款承諾：

本會未能按年提出一定之數目作為修理改裝房屋之用者，蓋每年終結總有盈餘必當提出抵償前欠之地產金，即童子部地基金二萬七千兩，運動場三萬兩，此數當募捐時雖目的已達，奈有數巨商承諾後未能踐約，以致本會尚有二萬五千兩之債項未清，故每歲年終時必提出三千元攤還前

<sup>119</sup> 〈經費支絀之由來〉，《上海青年》第14卷第45號（1915年12月31日），頁5。另參〈民國五年上海基督教中華青年會報告〉，《上海青年》第16卷第8號（1917年3月2日），頁10。



欠，因此無的款存儲以作修理之用也。<sup>120</sup>

誠如幹事楊恕在 1938 年介紹美國各大城市各慈善團體每年舉行的普捐（Community Fund Campaign）時，不無感慨地說：「……認捐後不付款的可以說是絕無僅有……平常百分的九十九點七是不成問題。在這一件事上，相信我們不論如何是萬難做到的。」<sup>121</sup> 駱維廉在 1916 年的一份報告裡，提及會所的捐款由 1907 年的 18,471 元累積至 1915 年的 93,008 元時特別強調：「必須要緊記，在這個時期實際上一直是財政上不穩定的時間，這個國家在政治上一片混亂，造成的結果是紛擾的商業情況。」<sup>122</sup> 可以說，中國青年會在二十世紀初年動盪不安的環境下進行青年會會所建造計畫，政治或經濟風險從來都是一個常數而非變數。

第二、眼高手低。毋庸置疑，北美協會開展的世界性青年會會所建造運動，無論在氣魄抑或眼界均堪稱遠大；然而，具體實踐起來卻予人眼高手低之感。持平而言，北美協會資助中國青年會的會所建築經費，與英、美青年會會所的建築經費相比，不啻是雲泥之別：

斐拉德亞青年會因廓充會所，於十二日中捐集金洋一百萬元……

英京倫敦近建築新會所一間……其費用約值金洋一百萬圓……

120 〈本會無預備金之原因〉，《上海青年》第14卷第45號（1915年12月31日），頁4-5。

121 楊恕：〈從我們的徵求會想到美國的普捐〉，《上海青年》第37卷第8期（1938年4月30日），「第卅八屆徵求成績總報告特號」，頁8。

122 W. W. Lockwood, "An Additional Story for Shanghai Men's Building", 1 August 1916, p. 6, BR.

羊城青年會募得墨洋六萬元為地址經費。

福州青年會擬募地址費洋四萬六千元，刻已集有成。<sup>123</sup>

中國青年會要用相對少很多的建築經費，打造一座如英、美青年會般宏偉的會所（見附圖 6-2），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幾近是不可能的任務。如路義思所說：

建築委員會知道以現在的金額（少於 68,460 兩），根本不能夠在中國的商業都會建成這種建築物。他們並沒有擴充各種計畫，而是一貫地減少和省略它們，使它們維持在可能的數字範圍以內。<sup>124</sup>

眼高手低換來的結果不外是因價就貨，理想中的會所無法在現實環境中成就。北美協會為免上海青年會因資金不足無法建成會所，而敗壞了北美協會在捐款人心目中的聲譽，很多時也只得設法提供額外資助。

第三、匯率風險。北美協會的會所經費資助以美元為單位，美元兌銀元的匯價可升可跌；加上為保障北美協會與捐款人的利益，往往會在工程的不同階段迭次匯款，匯率的波動自然對所得的建築經費構成極大的潛在風險。事實上，1910 年代前後銀元的價格已頗為平穩：「這些年〔1902-1911〕的匯率相對穩定……

123 〈寰球會務紀略〉，《上海青年》第9期第16號（1911年6月1日），頁1。另可參〈中美兩國基督教青年會之比較〉，《青年會事業概要》（香港：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1918），頁68。

124 Robert E. Lewis to John R. Mott, 21 August 1905, COR. 郭偉傑指中國青年會會所較少採用中國式的建築形式，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興建中國式的會所需要更大的建築面積，工程費用亦更為高昂。參 Jeffrey W. Cody, "Striking a Harmonious Chord: Foreign Missionaries and Chinese-Style Buildings, 1911-1949", pp. 7-10.

過去二十年間，匯率曾大幅下跌……本期卻以匯率穩定為標誌。」<sup>125</sup> 然而，踏入1910年代中期以後，亦即是北美協會的建造會所計畫公布，並在中國各地的城市青年會競相展開之際，銀元匯價卻出現了很大的波動（附表6-4）。銀元價格一旦急漲，一項原本收支平衡的會所工程，在極短時間內便可變成入不敷出。<sup>126</sup>

第四、權不在我。青年會會所的建築經費既由北美協會供給，在任何牽涉金錢的問題上，必須獲得北美協會的批准方能落實；<sup>127</sup> 上海青年會在沒有資金在手的情況下，作具體決策時便顯得非常困難。<sup>128</sup> 1905年8月抵制美貨運動爆發期間，路義思在準備簽約開展四川路會所工程前給穆德的信中說：

現在，得到你的電報回覆以前，我們必需要等待一個月。我們勢將陷入一個尷尬的位置，除非承辦商即時簽約，……基於杯葛（boycott）或價格的波動，他或許會在一個月內拒絕有關的工程。這些事實將顯示立即以電報傳送確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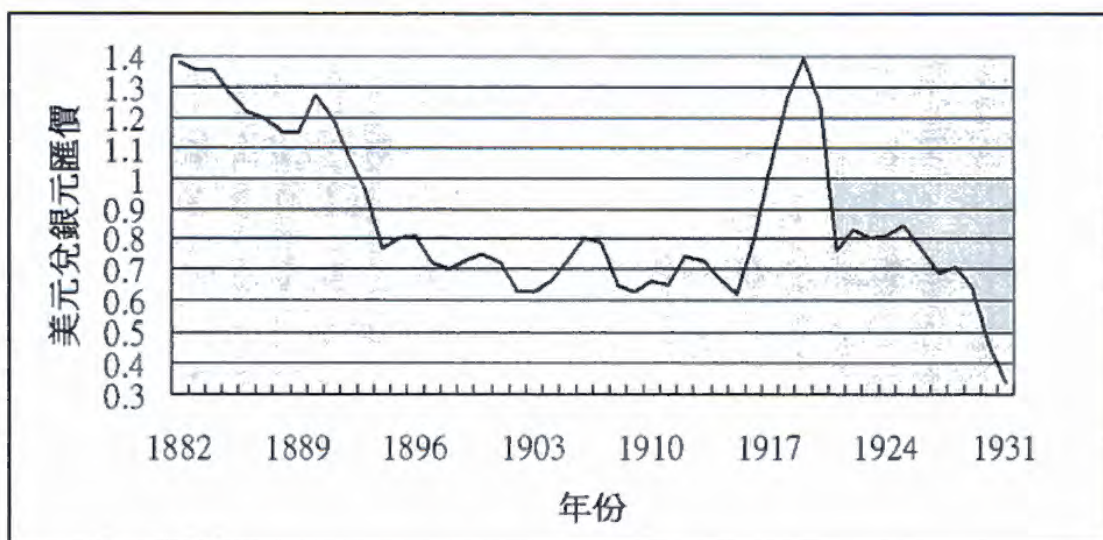
125 徐雪筠等譯，張仲禮校訂：《上海近代社會經濟發展概況（1882-1931）——《海關十年報告》譯編》（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頁336。

126 嶺南大學的財務狀況與青年會有些相似，沒有差會固定的財政支持，相當部分的經費來自美國的捐款，美元貶值對該校的財政帶來重大的影響。參Dong Wang, *Managing God's Higher Learning: U.S.-China Cultural Encounter and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Lingnan University), 1888-1952*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7), p. 91.

127 筆者以為，就中國青年會一向所強調的自立精神而論，建築事業不啻是青年會運動中自立精神最薄弱的一項：「至論自置之會屋，則上海、北京、香港、漢城、東京，皆已陸續告成，美輪美奐，足壯觀瞻。雖建築費由美捐助，而購地費則皆自行募集……要之則於自立之本旨，毫無舐觸也。」〈基督教青年會第六次大會總委辦之報告〉，《青年》第16卷第1-2號合冊（1913年3月），頁45-46。

128 Annual Report of A. Q. Adamson, September 1917, p. 7. AQRBV.

附表 6-4 美元匯兌銀元的走勢圖 (1882-1931)



資料來源：徐雪筠等譯，張仲禮校訂：《上海近代社會經濟發展概況（1882-1931）——《海關十年報告》譯編》，頁 351。

合約的必要性。<sup>129</sup>

在緊急情況下，上海青年會與北美協會當然可以透過電報通訊，但是從上述略帶累贅、繁瑣的論述可見，建築工程不僅牽涉很多技術性的問題，在作決定時亦往往涉及複雜的考慮，只得以書信詳細交代。查當時中國與美國之間的郵遞時間動輒需時一個月，西幹事在瞬息萬變、充滿變數的環境下，肩負起建造會所的重大責任，委實是舉步維艱。

### 第三節 「大白象」工程

全國協會副總幹事鮑乃德在 1927 年評論青年會會所時說：

<sup>129</sup> Robert E. Lewis to John R. Mott, 21 August 1905, COR.

按會所對於青年會運動有下列種種的便利：（一）為市會一部分經濟來源；（二）使會員得有一個永久的聚集場所；（三）可作種種服務社會的根據地。然同時亦使青年會感覺下列種種的需要：即（一）須僱用相當的幹事和職工；（二）須籌募相當的基本金以資維持；（三）須為會員及非會員舉辦種種程序，庶會所不至於虛設。<sup>130</sup>

可見，一座來之不易的青年會會所不啻是一把兩面刃的利劍，它雖然有助於青年會事業的全面發展，但同時衍生了不少新問題。鮑乃德所指出的三項新問題，簡而言之就是青年會會所的落成，勢必加劇業已沉重的財政負擔。在這裡要指出的是，愈大型、愈華麗的會所，所承擔的財政壓力便愈沉重；會所所在的城市物價指數愈高，有關支出亦會愈大。頗具諷刺意義的是，上海青年會在這兩方面均是全國的「模範」。

### 一、沉重的財政負擔

如前所述，四川路會所和童子部會所兩項工程均衍生了負債的問題，帶來的結果是上海青年會必須為表面的繁華付出沉重的財務代價：「……總之本年中有童子部會所落成，及種種事業上之改良，誠可謂最好之氣象，惟經濟上則因之大受困難矣。」<sup>131</sup> 1915年的年報指出：

本會於年終時，為前所購買之地，尚欠銀一萬四千一百十八兩三錢，於建築童子部會所時，又因材料昂貴，前訂價

130 鮑乃德：〈為一九二七年市會事業統計表告同人書〉，《同工》第81期（1929年4月），頁16。

131 《上海基督教中國青年會乙卯年（1915）報告》（上海：上海基督教青年會，1916），頁3。

目不敷支配，故將本年應付地基費五千兩，充作建築童子部之用，應付地基費則由董事部議決攤派，故目下尚欠地基費一萬三千五百兩，希冀從速償清後，每年可將的款作為修理房屋之用矣。<sup>132</sup>

可見，由於童子部會所工程超支，上海青年會只得將原擬償還地基費的款項，權充建築經費使用，而原來地基費的還款則由董事部來承擔。此外，隨著會所的規模擴大，對各種配套設施的要求亦隨之增加，這樣對於業已負債的上海青年會來說，其財政狀況無疑雪上加霜：

本會今歲有特別原因，當求諸君協力襄助。本會分部眾多，事業益加推廣，再加以童子部新屋落成後，兩部區域當然劃清，於是一切器具等均須另備未使公用矣。在舊屋之三層樓改作宿舍，閱報室、藏書樓等亦遷移至三層樓上，二層樓又特闢一個客廳，樓下新開會食堂、理髮所、售書處，此皆為便利會員起見，因此用費過於預算約六千元。<sup>133</sup>

事實上，「人格出產所」的確是一項相當昂貴的事業。如前文所述，一個城市青年會的日常經費開支已耗費不菲，要達至全年經費收支平衡一直並不容易：

有人謂「青年會為富於經濟之機關」。此言也，僅就表面

<sup>132</sup> 《上海基督教中國青年會乙卯年(1915)報告》，頁20。

<sup>133</sup> 〈徵求會之大原因〉，《上海青年》第14卷第45號(1915年12月31日)，頁4。「本年曾備預算表，將一年中之收支款目詳細預算，惟因新屋落成，各部分事業一律推廣，所定之款勢難限止，其工夫之發展致有不敷支出之憾。」《上海基督教中國青年會乙卯年(1915)報告》，頁20。

上觀察而立論，徵諸事實誠毫釐千里之相差……本會會所雖有兩大部分，巍峨宏闊，似足敷應用。然年來會務發達，校務亦日進，頗有「嫌狹」之狀況；更於公共便利上，力圖增加以內部極大之廳堂，假之各界應用，名雖租賃，實則常行表費，即收入亦屬寥寥，而歲修、保險、稅金等等，每年需款甚巨，所得者尚不及十之一二；其日夜學校收入支出兩相衡較，毫無羨餘；會員部所入之會費比之會員所享用之利益計，數尚難及半。誠以會費所取極廉，而炭直金屑，水比玉液，積珠累黍，所虧不貲。<sup>134</sup>

上海青年會建成屬於自己的會所以後，無疑節省了既高昂又持續增加的租金支出；然而，會所既屬上海青年會永久擁有，從長遠發展的角度看，很多在租賃會址時代不曾成為關懷的問題均紛至沓來。如馬文綽所說：

會所委員每年應該提出一筆修理費，請董事部通過，至少照本年的收入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五作為經常修理費。新會所內的重要修理品，就是熱水爐、汽水爐、鐵水管、馬達等，至多只可用十年，因十年以後，就成為硬性物，必要更換新的。會所外部的油漆，因雨打日曬，至少二年一次，內部或須五年一次。所以每年的修理費，就成為一個支出的重要問題了。<sup>135</sup>

134 〈民國八年即一九一九年會務報告(續前期)〉，《上海青年》第19卷第18號(1920年6月4日)，頁7。

135 馬文綽：〈怎樣善用青年會的新會所〉，《同工》第73期(1928年5月)，頁5-7。「本會會所落成以來……共用去八千三百三十五元〔修理費〕，平均每年為一千三百八十九元，約當常年預算百分之五，而為全部建築費百分之一·五。」伍立夫：〈杭州青年會管理會所之經驗譚〉，《同工》第56期(1926年11月)，頁10。

上海青年會擁有全國最大型的會所，卻沒有設立任何維修基金，對其財政所構成的負擔之大，當然可想而知：

……吾國現有會所，均為西式，價值甚昂，至少亦三萬四千元（蘇州），多則達十八萬元（上海）。市會得此巨構，外觀固甚添色，而實際上覺與一般人民程度相差甚遠，會所中有許多不適用處，非特不足副該會利用之方，反重增該會負擔之累。<sup>139</sup>

如前文所述，青年會愈益受人歡迎，入會人數便愈發增加，其經常支出亦愈來愈大：

本會遷進新會所時，只有會友三百八十三人，年來日前增多，刻下共有會友千六百七十人，較四年前幾增多五倍，會務之發達於此可見，經費亦因之而加增，會務亦藉以擴充……<sup>140</sup>

而現實上，會費收入的增加根本追不上經常費用開支的升幅：

查現有會員二千數百人，其到會享受利益者實居少數，故本會得以供應一班寒素有志之青年，即平日之開支亦賴以敷衍。若人人欲享受利益，每日同時到會，則不特開支不敷，亦不能將所有利益一一供應。現在統計特別會員在本會應享之利益，每年每人需費在三十元以上，普通會員亦年需十五元始敷開銷。<sup>141</sup>

---

139 〈籌備第九次全國大會意見書〉，頁100。

140 〈會友源源而來〉，《上海青年》第10期第32號（1911年11月16日），頁2。

141 〈為本會會員即所以為青年謀幸福〉，《上海青年》第14卷第44號（1915年12月24日），頁3-4。



上海青年會只得設法增加收入以補助會費的不足。

## 二、增加收入

上海青年會為應付日益沉重的財政負擔，以及償還會所工程超支所衍生的債務，遂不得不想方設法增加經費收入，而直接和明顯的辦法無過於增加會費：「本會自新屋落成後，為注意會員權利起見，添置各種器具，應有盡有，所費甚鉅。職此之故，不得不將會費略為加增。」<sup>142</sup> 事實上，各種有助開源的方法均暗地先後出爐：

商界最妙之招徠法，非登廣告不為功。本會會員半為商界中人，本雜誌每次發行約二千紙，於本年起推廣篇幅，擬代登各行號廣告。凡我會友欲推廣事業委登廣告者，請向本會庶務處面議刊登，當格外從廉以副賜顧之雅意。<sup>143</sup>

今所有代錢簿，每本售洋一元，而用時則可作一元二角五分之用，且無論欲飲荷蘭水，或欲打彈子，或用大餐，皆可通用。本會之所以設會食餐廳，非為金錢主義，實欲便利會友起見，會友諸君諒皆知之。<sup>144</sup>

本會現在刷印理髮票一千張，每紙售洋一元，可作四次剪髮之用……售得之資可先作為裝修之用。……深望吾會員能體貼本會之誠意，互相幫助，成此美舉也。迨理髮票印就後，如有熱心會員願出力擔任發售者，尤所感激。<sup>145</sup>

142 〈本會重訂會員新章〉，《上海青年》第14卷第28號（1915年8月13日），頁3-4。

143 〈絕妙招徠法〉，《會務雜誌》第9期第9號（1911年4月14日），頁3。

144 〈會食廳〉，《上海青年》第12卷第33號（1913年10月10日），頁4。

145 〈青年會理髮處〉，《上海青年》第14卷第15號（1915年4月16日），頁14。

及成立夜校作為收入來源時隱晦地說：

這並不是要令它〔夜校〕成為收入來源，然而，我們的確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從這個角度看，對於紓緩董事們在過去幾乎是每年的年終，籌措足夠的經費來結束〔財政〕年度的責任，是在很大程度上的助力。<sup>149</sup>

在某個意義上說，上海青年會與當時的商業機構或娛樂場所無異，同樣在售賣各式各樣的服務，自難免引來社會人士的批評：「顧一般輿論，間有不免一二誤會……謂青年會行事，近於營業性質。」<sup>150</sup>

在募款購地興建會所的過程中，青年會幹事當然要千方百計進行募捐：「本會近因購地經費不足，特派幹事員曹雪賡赴漢募捐，藉資補助。茲曹君業已公畢回滬，共計籌集洋三千餘元。」<sup>151</sup> 但是會所落成以後，並不代表募捐的壓力可得紓緩，青年會幹事仍得為日常經費多方張羅：

本星期二晚董事部開會討論〔民國〕八年之預算，已經各

149 Annual Report of George A. Fitch, September 1912, p. 2, AQRBV. 蔡智傳指出南昌青年會營辦寄宿舍的經驗是：「雖然收入低，但仍有利潤，可以供給青年會經常開支的40%。」蔡智傳：〈南昌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26輯（1987年11月），頁36。

150 〈譯丁文彪君原文大意〉，《上海青年》第18卷第4號（1919年1月24日），頁4。「〔中國青年會〕……所賴以挹注者，全在於他項收入。這所謂他項收入，是包括各項的營業費，像上節所舉寄宿舍人數之增加，尤屬顯易而見。其餘如理髮所、食堂、電影等都是，有幾處市會在革命時代募款維艱的時候，經濟上所以能夠維持過去，全靠這些營業費的收入。這固然是一樁好事，然其最大的危險，就是使我們只注意擴張附屬的事務，而忽略最重要的工作了。」鮑乃德：〈為一九二七市會事業統計表告同人書〉，頁14。

151 〈同聲相應〉，《會務雜誌》第8期第31號（1910年11月4日），頁2。

董事通過，謂本年之預算表內，除收付外尚少洋一萬三千餘元。該數擬在今年從事捐募，俾得補足各部之預算。<sup>152</sup>

如第五章所指出，由於短期徵求會的募捐效力，與傳統的個人募捐不可以道里計。上海青年會幹事在徵求會期間例必傾巢而出，正是因為徵求會在維持經費收支平衡方面起了極重要的作用。在財政緊絀的情況下，與上述各種開源方法所得的蠅頭小利比較，徵求會必然成為平衡收支的重要工具：

本會各部所辦事業需款頗巨，又當上年銀根緊急，本會經濟仍能支持，且稍有盈餘，以理前欠，誠為可賀之事；然苟無董事會員暨各幹事之互相聯絡扶助，又焉能如是。上年正月間之徵求會收入款項頗多，又交誼會亦能略見生色，以充會中他部分之經費。<sup>153</sup>

在剖析上海青年會愈益走向世俗化的因由時，為了滿足會員的喜好，向教育、休閒娛樂等事業傾斜固然是事實，而擴充此等事業以增加青年會的經常收入，相信也是背後的重要考慮。誠如赫瑞滿所說，為了平衡青年會的財政預算，一眾幹事不得不長年投身在一個龐大的會所機器裡：

經驗詔吾人曰，壯麗之會所，恒使青年會事業日流於奢侈而不自覺。其究也，則幹事終歲僕僕奔走於募捐，方能免於竭蹶而陷入告貸之窘境。且往往因而需用浩繁之故，幹事以應用於培養人格之心思才力，不得不移用於徵求經費之一事。不特此也，青年會以會所之故，漸漸變為售賣

152 〈八年之預算〉，《上海青年》第18卷第7號（1919年2月28日），頁12。

153 〈民國四年即西歷一九一四年本會全年報告〉，《上海青年》第14卷第10號（1915年3月12日），頁5。

教育需求強勁，空間不敷應用，令上海青年會不能不積極推展會所建築工程：「……於是感觸會中辦事委辦之新思，擴充會務廣闊堂舍，不能置為緩圖，或另擇寬敞之所，或新建廣大之堂，俾會務振興，教育普及，以補今日之缺憾。」<sup>156</sup>

四川路會所落成以後，上海青年會的教育事業仍廣受歡迎，只得將課室稍事擴充，以解燃眉之急：「教育部主任者現已決議，加增學額數十名，並將課堂鳩工放大，不日工成，課程亦重加改良，以惠來者。」<sup>157</sup> 然而，教育事業持續增長，上海青年會只得不斷擴充會所中課室的空間：

本會附屬半夜學堂，本學期共有三百三十五人，而來者仍絡繹不絕，奈堂地狹隘，未能遍容，以致咸抱向隅，現議於壬子年起擴充課堂，足可容五百人。<sup>158</sup>

但是四川路會所的空間終究有限，小修小補終非長久之計，擴充會所的呼聲可說是一直存在，「……以故建築新屋已不容少緩」。<sup>159</sup>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四川路會所落成不足兩年，遂有增建童子部會所的提議：「本會幼童會友部業已成立，奈屋宇狹隘，諸多不便，故擬設法擴張地基，建築幼童會所，俾得從容布置。」<sup>160</sup> 迫在眉睫的現實需要，在不少時候可能較任何偉大的理念來得更為重要：

156 〈溢額新思〉，《會務紀聞》第3冊第2號（1905年3月3日），頁2。

157 〈欲培植子弟者注意〉，《會務雜誌》第6期第17號（1908年6月12日），招頁。另參〈擴充學室〉，《會務雜誌》第6期第18號（1908年9月11日），頁2。

158 〈附送夜學章程〉，《上海青年》第9期第44號（1912年2月8日），頁5。

159 〈會友之數大增〉，《上海青年》第12卷第34號（1913年10月17日），頁5。另參〈推廣校舍〉，《上海青年》第13卷第7號（1914年3月6日），頁6；〈本會之進行〉，《上海青年》第16卷第25號（1917年5月29日），頁4。

160 〈推廣幼童部〉，《會務雜誌》第7期第10號（1909年4月2日），頁1。

附表 6-5 寰球中國學生會董事部成員 (1906-1925)

年份	正會長	副會長	書記董事	會計董事	查賬董事	總幹事
1906	李登輝	顏惠慶、方守六	嚴鶴齡、唐介人			
1907	李登輝	唐露園、黃佐廷	曹雪廣、嚴鶴齡			
1908	李登輝	唐露園、黃佐廷	張爾雲、刁德仁			
1909	李登輝	唐露園、黃佐廷	徐崇欽、張爾雲		龔伯瑛	
1910	李登輝	唐露園、黃佐廷	徐崇欽、張爾雲		龔伯瑛	
1911	李登輝	唐露園、黃佐廷	徐崇欽、徐善祥			
1912	李登輝	唐露園、黃翌昌	曹雪廣			
1913	鍾紫垣	唐露園、曹雪廣	楊錦森		夏霆軒	
1914	鍾紫垣	李登輝、王正廷	楊錦森、何林一		郭仲良	
1915	鍾紫垣	李登輝、王正廷	楊錦森、王寵惠	韓玉	郭仲良	
1916	李登輝	唐露園、王寵惠	徐紉蓀、王立才	錢新之	郭仲良	朱少屏
1917	余日章	李登輝、唐露園	周越然	錢新之	曹雪廣	朱少屏
1918	李登輝	唐露園、曹雪廣	吳和士	錢新之	郭仲良	朱少屏
1919	薩福懋	唐露園、李登輝	吳和士	錢新之	郭仲良	朱少屏
1920	唐紹儀	李登輝、鍾紫垣	朱友漁	吳和士	錢新之	朱少屏
1921	楊攸川	李登輝、錢新之	俞希稷	吳和士	沈叔玉	朱少屏
1922	許秋風	李登輝、鍾紫垣	邵仲輝	嚴直方	俞希稷	吳和士
1923	許秋風	方椒伯、李登輝	邵仲輝	陳光甫	袁履登	朱少屏
1924	虞洽卿	方椒伯、許秋風	李登輝	陳光甫	袁履登	朱少屏
1925	許秋風	李登輝、方椒伯	吳蘊齋	陳光甫	袁履登	朱少屏

資料來源：《上海青年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青年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頁 376。

說明：粗體字代表上海青年會的職員、董事或徵求會隊長等重要支持者。

隨著上海社會的發展，上海青年會所創辦的不少事業亦為不同社會團體所仿效，「……甚有數團體採本會各種事業而仿行之者」。<sup>169</sup> 其中更不乏基督教團體：

基督教女青年會創辦以來迄今數載……，其宗旨專於青年女界上，講求德、智、體三育，與本會宗旨無殊……目下所組織者只演說會、交際會及聖經班等，其餘俟遷入新屋即當推廣其範圍，及增設新舉動矣。<sup>170</sup>

此外，亦有些傳統教會開始效法上海青年會所辦的交誼活動：

本月十八號星期六晚七時半，思婁堂進德會特開交誼會歡迎本會會員，該會原有會員四十二人，現擬請其友人及本會會員中住在鄰近者加以其中，是晚有駱維廉先生之演說，及饒有興味之其他事序。<sup>171</sup>

可以說，在後浪推前浪的壓力下，上海青年會若要維持領導地位，所辦的各種事業必須持續走在最前。會所既然是推展各種會務和招徠會員的基礎設施，擴充會所的規模當然成為增強競爭力的不二法門。誠如俞友仁所說：「在城市必須有寬大之會所，方能吸引當地人的注意。」<sup>172</sup>

#### （四）模範包袱

上海青年會所辦的各種事業均為全國各地青年會的模範，這

169 〈民國八年即一九一九年會務報告〉，《上海青年》第19卷第15號（1920年5月14日），頁5。另參Annual Report of W. W. Lockwood, September 1917, pp. 8, 11, AQRBV.

170 〈女青年會成立〉，《會務雜誌》第7期第30號（1909年11月5日），頁2。

171 〈思婁堂歡迎本會會員〉，《上海青年》第18卷第33號（1919年10月17日），頁4。

172 俞友仁：〈青年會亟宜推廣其事業於農村方面〉，《同工》第44號（1925年9月），頁13。

種特殊的身分和地位，既為上海青年會提供了發展動力和助力（如在建築工程超支時作為爭取增加撥款的說詞），但亦構成了有形的歷史包袱。如費吳生所說：「當想到上海〔青年會〕的預算佔全國各地青年會總數的一半，全國的目光放在她的工作之上，將她視為模範，遠超過任何城市青年會……」<sup>173</sup> 專責上海青年會童子部的克樂愷說得更具體：

在上海，這項為少年而設、由少年參與和與少年一起的工作，正被發展為全中國的一個模型和實驗區。我們發現成功的東西已使其他青年會模仿，中國每一個青年會正渴望開展童子部的工作。所以，很重要的是，我們在上海的工作必須維持在高水平的效能。……我認為將上海的工作維持在高水平的效能，較開展一個新地方更為重要。我們不能容許最首先的幾個〔城市青年會的〕童子部低於標準以下。<sup>174</sup>

事實上，他們的擔憂並非杞人憂天或庸人自擾。上海青年會座落在全國經貿最發達的城市，無疑具有一定的發展優勢，但她的模範地位並非牢不可破：「接近來廣州青年會徵求會曾收入三萬三千元，已為首屈一指矣，而本會此次竟超過定額，實非始料所及。」<sup>175</sup> 因此之故，上海青年會必須持續發展，以保持全國的領導地位：

近接羊城、香港兩處青年會來信，謂該兩處近因購地募捐

<sup>173</sup> Annual Report of George A. Fitch, September 1918, p. 3, AQRBV. 「上海各種事業，每為全國之模範。吾願上海之青年會，亦將為全國之標準也。」李平：〈第十屆新會員歡迎會紀事〉，《上海青年》第17卷第5號（1915年2月4日），頁3。

<sup>174</sup> Annual Report of J. C. Clark, September 1916, p. 16, AQRBV.

<sup>175</sup> 〈徵求之經過〉，《上海青年》第19卷第9號（1920年3月26日），頁5。

者異常踴躍，故會務亦因之發達……緣本會為各埠青年會之先導，他處會務發達既如此，本會當益形增進。故此次徵求會尚冀全體會友共表熱忱，庶不愧為他人之模範也。<sup>176</sup>

本會新會所工程業將告竣，課堂及童子部已定三月一號移入，現在提議將舊會所內上層所餘空房改作寄宿舍，以便會員假寓……按此項會員寄宿舍，北京、天津青年會會所已先我而有，極為發達，將來本會之宿所諒亦如之。<sup>177</sup>

可見，城市青年會之間競爭比拼的心態，亦成為上海青年會發展會所建造計畫的重要推動力。<sup>178</sup>

總的來說，在北美協會會所建築資助政策的間接鼓勵下，中國城市青年會只需籌得購地經費，北美協會便會提供會所的建築經費，變相鼓勵了一種以小搏大的槓桿式投機活動：

查美洲定章，凡欲建築青年會所者，不論何處，倘能自籌購地款項，則該國即能助以建築費。上年本會議建幼童會所，已將購地款項籌集，現正向美洲勸募造屋費。<sup>179</sup>

二十世紀初年，中國政局動盪不安，這種大型的會所建造計畫使得青年會承擔不少財務風險；加上會所建造事業牽涉不少技術問題，中國與美國的國情不同，以及整個建築資助計畫的運作機制

176 〈粵東消息〉，《會務雜誌》第8期第33號（1910年11月18日），頁2。

177 〈會員寄宿舍〉，《上海青年》第15卷第7號（1915年2月12日），頁3。

178 高舉鄉土意識的旗幟亦是青年會進行募捐時的宣傳手法之一，參Ryan Dunch, *Fuzhou Protestants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hina, 1857-192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57.

179 〈兩會志士咸具熱腸〉，《會務雜誌》第8期第34號（1910年11月25日），頁1。「本會幼童會所地基已早購定，刻下日夕所望者，美洲之造屋經費耳。」〈會友越多越好〉，《會務雜誌》第8期第34號（1910年11月25日），頁1-2。



在溝通和執行上均存在不少弊病，在建造「人格出產所」的良好願望未達到以前，已為青年會帶來額外的財政負擔，致使幹事花上大量的心力和時間在推展各種工作、籌募會所的日常經費，以及償還債務。不難想像的是，上海青年會不得不更戮力增加各種可能的收入，尤其是愈益倚重徵求會的經濟成效，其業已世俗化的發展趨向勢必進一步加劇。

## 第七章 結論

### ——基督教化與世俗化的掙扎

作為青年會的會員，為一場中國青年的偉大運動奠立基礎，非常必要的是，我們必須能夠清楚全面回答這個問題——基督教青年會是甚麼？<sup>1</sup>

青年會是甚麼？這個問題，凡新入會的會員都應該自己問一問；即已經入會的舊會員，也應該隨時加以審察。因為會員對於青年會能否有所貢獻，以及青年會對於會員有沒有真正的價值，其關鍵全在於會員對於青年會有沒有一個清晰的概念。<sup>2</sup>

筆者相信，「青年會是甚麼？」這個提問的適用對象，不僅限於昔日的青年會會員或幹事；對於研究中國青年會歷史的學者來說，在回答這個提問以外，深入理解這個提問背後潛存的根本問題，對於我們真正了解二十世紀初年中國青年會的歷史面貌，更是至關重要。

在前面的各個章節，筆者已就上海青年會的幾個重要面向，作了相當詳盡的析論；在本書的結論部分，會嘗試換一個角度，以上海青年會的歷史經驗作為取樣，進而為二十世紀初

---

<sup>1</sup> "What is 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China's Young Men*, vol. 1, no. 1 (April 1906), p. 6.

<sup>2</sup> 鮑乃德：〈青年會是甚麼〉，《同工》第82期（1929年5月），頁8。

年中國城市青年會運動作出較全面的描繪，特別是從組織行為（organizational behavior）的角度來考察城市青年會的運作機制（mechanism），從而為「青年會是甚麼？」這個提問背後所反映的青年會定位問題，在中國城市青年會運動的內在歷史脈絡下提供解答。

誠如我們在導言所指出，上海青年會作為中國城市青年會運動的首個試點，被北美協會賦予了重要的示範意義。二十世紀初年，青年會在中國廣泛流傳的各種活動程序和設施，絕大部分均是由上海青年會首先倡議和實行，為中國城市青年會運動奠定了基本的運作模式和發展型態。與此同時，作為中國青年會運動最早的一個幹事訓練基地，上海青年會進一步透過幹事的培訓，將「上海經驗」傳送至中國各大城市的青年會，在形塑中國城市青年會運動的組織文化方面，同樣有至深且鉅的影響。

就目前存世的資料可知，在中共建國前成立的三十多個城市青年會中，無論在中國方面出版的刊物，或是在美國保存下來的檔案資料，均以上海青年會最為豐富；加上她在中國城市青年會運動中的特殊意義，我們絕對有理由相信，以上海青年會作為一個研究取樣，試圖為二十世紀初年中國城市青年會運動的誕生、運作、發展、成就及影響，勾勒一幅粗糙的歷史拼圖，大抵是有若干的解說和參考意義的。

當然，我們亦不排除中國各大城市的青年會可以因地制宜，從各地的實際情況出發，對「上海經驗」作出不同程度的修正或改良；<sup>3</sup> 這亦是任何宏觀性或整體性的解說模型必然存在的限

---

<sup>3</sup> 「……所以關於青年會的宗旨和事業的解說，是沒有一定的程式的，即以我中國而論，各市會因環境需要的不同，事業上各有其注重點，因而對於青年會宗旨的觀念，也各有不同。」〈青年會之宗旨與事業〉，《同工》第41號（1925年5月），頁13。

制。如同其他城市青年會一樣，上海青年會肯定不會是一個十全十美的研究樣本，但我們仍可不至於太武斷地指出——「上海經驗」的涵蓋或說明能力必較其他城市的經驗來得大。上海青年會過去賴以自詡的主要原因亦正在於此：「……上海青年會向為各埠青年會之冠，一舉一動俱為各埠分會之模範，故可預卜各埠青年會亦將有踵而行之者。」<sup>4</sup>

### 一、青年會的發展進程

十九世紀末，西方傳教士在中國開展的傳教事業轉眼已近一個世紀，不無失望的是，皈依的信徒仍在少數，且多屬社會上的低下階層人物，基督徒仍是社會上的邊緣群體，中國的基督化／福音化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願景。如湯仁熙所說：

溯自基督教入華，百有餘載，其範圍僅及於中下社會，未能遍及於上流士夫者何哉？追其原始，基督教所持主義，未免偏狹，當傳教士初來中華，未諳國俗，與上流士夫，尤少接近，所收教徒，又大都下流社會，俗子村夫，居其多數。<sup>5</sup>

適時，北美協會派遣青年會幹事前赴中國，考察在華開展青年會工作的可能性，頓然為當時的傳教困境帶來了憧憬。同樣在十九世紀末葉，青年會在北美的發展如日方中，除了組織起全國跨院校的聯合事工外，更與海外學生志願運動配合，建立了龐大的傳教工作系統，這正好為當時的在華傳教事業注入新的發展動力。青年會在寓華傳教士的呼籲下，遂以一個嶄新的面孔進入清末的

<sup>4</sup> 嚴康侯：〈拳術〉，《上海青年》第10期第34號（1912年12月13日），頁12。

<sup>5</sup> 湯仁熙：〈青年會之宗教事業〉，《同工》第46號（1925年11月），頁3。

中國社會。

青年會西幹事進入中國之初，與早期來華的傳教士一般，同樣面對文化、語言的隔閡。當時國人普遍視基督教為洋教，青年會更被視為潛在的顛覆政權組織；加上中國青年會沒有任何發展經驗及歷史基礎，一切工作皆由零開始，西幹事要在這樣的情況下，在中國城市設立一個由中國人自治、自養及自傳的青年會，委實是舉步維艱。鮑乃德憶述杭州青年會耗時四年的籌備經過時說：

上面說過，作者於一九一〇年已奉全國協會派遣到杭州，一九一一年一月就到杭州來住，那末杭州青年會為甚麼到一九一四年才組織起來？……一方面是因為作者須有相當的時間研究中國語，並且須以一部分的時間擔任全國協會的工作。但是最重要的原因還在於……（一）必須得到對於青年會運動確有了解和信仰，而願意出力來維持它的幾位領袖作為本會的中堅分子。（二）必須有才具幹練，為社會所信任的中國幹事，來主持全會的事工。<sup>6</sup>

從跨文化或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研究青年會的學者，為了突顯青年會作為一個成功的研究個案，往往過分強調清末民初的改革氛圍，在推動青年會早期入華的發展所起的促進作用。無論是從本書的討論，還是鮑乃德的說法，均可見這種浪漫化的說法不僅忽視了青年會幹事筚路藍縷之功，與客觀的歷史實況亦肯定並不相符。

首位由北美協會派遣來華的西幹事來會理，這樣形容 1907 年青年會全國大會舉行以後，社會人士普遍對青年會的觀感：

<sup>6</sup> 鮑乃德：〈杭州青年會開創時期的回憶〉，《同工》第130期（1934年3月），頁21-22。

## 二、青年會的靈活應變

二十世紀初年中國青年會的高速增長，除了得力於上述的宏觀有利因素外，青年會幹事在微觀歷史場景中所作出的種種反省和努力，亦不應該輕易抹煞。早期的西幹事來到中國開展青年會工作，除了要面對人地生疏、語言不通等困難外，與早期來華的多數傳教士不同的是，他們並沒有差會的經濟支持，從一開始便要財務自立。青年會在草創時期知名度不高，社會人士對她的了解有限，只有少數的教會學校畢業生或留學生會員，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雖然正逐漸冒升，但是經濟能力畢竟有限。城市青年會早期多僅能租賃臨時會址開展簡單的工作，與 1910 年代以後，青年會的聲譽日隆，不少城市的官員爭相提供會址興建會所，以及呼籲全國協會派出幹事設立青年會，當然不能同日而語。

由於青年會以城市中心作為工作據點，租金、稅捐等支出已所費不貲，其他燈火之資亦當然少不了，對於在財務上實行自負盈虧的青年會來說，從一開始便不得不徵收比較高昂的會費，並設定城市裡的中產階層為服務對象。青年會採取「城市先行」的發展策略，當然帶有發展進程方面的考慮，如全國協會總幹事余日章所說：

有許多人批評青年會為貴族式的，不能向平民中去服務，這種批評固然也有道理，可是青年會自有其產生的歷史。當初創立中國青年會運動的領袖們，覺得中國一般人士對青年會運動多不明瞭，必須先在重要的城市樹立模範，然後逐漸推行到各地和海外的華僑方面去。他們定下這個方針，實在是很有見地的。<sup>13</sup>

<sup>13</sup> 余日章：〈青年會今日之責任與工作〉，《同工》第87期（1929年12月），頁27。

但是更重要的原因相信是，只有城市裡的中產階層才能夠供給青年會的日常運作經費。余日章在別處不諱言：

中國青年會過去的事工，大半是注重於中年以上的人們，這裡面固然也有一種不得已的苦衷，便是因為他們是社會的中堅分子，是能生利的人物，從他們的身上，可以直接的去為社會服務，並且可以得著所需要的捐款。<sup>14</sup>

二十世紀初年，青年會之名尚不見經傳，入會費亦不便宜，她必須要提供足夠的誘因，才能吸引會員加入。誠如天津青年會幹事格林早在1902年的報告中所說：「據經驗顯示，要是青年會的利益是具價值的話，更多人願意繳付和願意繳付更多。當他們看見有所回報時，中國人是願意繳付的。」<sup>15</sup>青年會能否招徠會員入會，除了關乎她能否在中國兌現使命外，亦是她能否生存下去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說，青年會必須要滿足中國社會的需要，才能在中華大地上存活，並進而發揮其影響力。這亦解釋了青年會較一般教會，在社會觸角方面特別靈敏，時刻緊貼中國社會發展的原因所在。如陸幹臣後來所說：「青年會是進步的，要隨著潮流轉移的，所以我們的憲章，除宗旨是不能更動的以外，其餘的都要跟著社會的變化去應付潮流……」<sup>16</sup>

西幹事早期來到中國，很自然將美國青年會的經驗在這個古

14 余日章演講，星如記：〈今日之中國青年會〉，《同工》第38號（1925年2月），頁5。「……但其〔青年會〕服務對象主要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上層人物，這是歷史的局限。」康志杰：〈武漢群眾運動的發起者宋如海〉，《武漢文史資料》第1期（1997），頁52。

15 Annual Report of Robert R. Gailey, September 1902, p. 1, AQRBV.

16 陸幹臣：〈大會與上海〉，《上海青年》第33卷第3期（1934年1月23日），頁3。「本會歷年所辦各事，首以迎合社會上之心理為要義。」〈無從答覆之函件〉，《上海青年》第18卷第24號（1919年6月27日），頁9。

老的東方大國付諸實踐；但他們不久已發現南橘北枳，部分活動程序在美國取得成功，不必然保證在中國會達致相同的效果：

中國青年會之組織，略仿美國制，其所成立之城市青年會，規模亦與美國相等。所異者在美國以體育事業見稱於社會，在中國則以智育事業受人之歡迎也。<sup>17</sup>

因此之故，青年會幹事不得不花上極大的心思，將青年會這個舶來品的內容和涵意加以調整，方能招徠中國青年的垂青。如前文所述，青年會的活動內容紛陳並舉，令人大有眼花撩亂之感，但基本上離不開以下三種特點：

（一）政治化。如所周知，救亡圖存是近代中國不少知識分子的主要思想關懷，青年會能否受到知識分子的青睞，與其能否在救國問題上為他們提供出路密切相關。饒富時政色彩的演講和辯論、強國強種的體育活動、救國的布道訊息，都是在這個歷史脈絡下的產物。政治化的活動有效打響青年會的名號，甚至使其可以救國機關自居，招徠了不少滿懷愛國熱忱的知識分子；部分甚至皈依成為基督徒，透過他們個人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不同領域的影響力，大大提升青年會的社會地位和能見度。

（二）功利化。近代中國城市除了是政治運動的潛在火藥庫，亦是不少青年追求進身之階的尋險地。隨著二十世紀初年中國社會日趨西化，中外貿易日趨頻繁，社會上對於精通英語及商貿技能的人才需求甚殷，由於通曉這些知識不難獲得高薪厚職，不少青年自然對這些學問趨之若鶩。青年會充分把握這些青年期望在事業上更上一層樓的心態，大力發展教育事業：「本會設

---

17 柯樂克：〈青年會亟宜注重體育事業〉，《同工》第41號（1925年5月），頁3。



立夜館，初僅供商界青年補習之助，然以求學者眾，應接不暇，爰變通辦法，倡立日館，而各地會所，遂一變而為學術之淵藪。」<sup>18</sup> 青年會的教育事業尤其有助吸納大量會員，壯大青年會的社會影響力，進而確立其在社會啟蒙的領導角色，以及作為白領階層的搖籃地位；<sup>19</sup> 同時，有助爭取商界的財務支持，提供重要的經費收入來源，挹注青年會的日常經費。

（三）中產化。在近代中國城市經濟發展日趨蓬勃之際，西方的娛樂文化亦同時輸入，遂催生了休閒娛樂生活的需求；無論是傳統社會的紳商名流，或是新興的中產階層，他們均有足夠的消費能力享受饒富西方色彩的文化生活。<sup>20</sup> 二十世紀初年，即便是中國的神商名流，亦無法參與西人總會的娛樂活動，青年會作為一個為華人而設的西式會所，遂成為他們理想（若非唯一）的西式休閒娛樂場所。青年會所辦的各種社交、娛樂活動和設施，

18 〈學務之勃興〉，《青年》第13卷第3號（1910年4月），頁67。「英語夜校常常是青年會開展的第一項工作，無論在何處，它都被視為一扇通往機會的大門（an open door of opportunity）。」Dwight W. Edwards, "The Chines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39 (January 1912), p. 113.

19 謝扶雅憶述：「……又如現任副總統謝東閔，屢次公開證言：他生命的轉捩點是全繫於上海青年會及筆者的一為援手，因他於民國十四年，由日據的臺灣隻身奔滬，欲謀升學，但以語言不通，人地生疏，蹣跚黃浦江頭，而筆者為當日上海青年會中唯一能採日語者，探知其來意為之安插於特種補習學校，旋因苦讀勤學，一年後即獲考入東英法學院……一帆風順直上青雲。其實如謝東閔青年人的情況，中國各地青年會照顧安排，一年蓋不知凡幾……」謝扶雅：〈基督教青年會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地位與貢獻〉，《傳記文學》第257號（1983年10月），頁128。另參謝東閔口述：《歸返》（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頁60。

20 Xiaoqun Xu, *Chinese Professionals and the Republican State: The Rise of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in Shanghai, 1912-1937*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art I, pp. 21-78.

而對其他較次要工作的關注勢必減少。誠如一位幹事所說：

青年會幹事職務至忙，往往所有時間僅能辦十件事，而待辦之事則有十五件，以故對於衛生教育，每每無暇兼顧，彼於應辦之事工中，儘時間之所及，選擇較重者而為之，而於衛生教育則視為較不重要。<sup>25</sup>

為何衛生教育被視為不重要？除了因為它不是最受社會人士或會員稱許或歡迎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它既不能為青年會提供穩定的經費收入，還會成為額外財務負擔。

一般而言，除了宗教事業以外，青年會在開辦不同事業時，基本上一直離不開財務的考慮：「青年會尚未籌得一種計畫，使無款收入的事業能積極進行，不受經濟影響。」<sup>26</sup> 與此同時，在市場導向的大原則下，青年會亦無可避免被會員的喜好牽著走：

大抵青年會之「部務幹事」（departmental secretary）其舉辦一種事業，恒向易受歡迎之人求之，不問其為會員或非會員也。以故為會員者反致事業落後，彼等每每懷疑，青年會會員除年納會費及列名於會員簿外，究竟有何意義？<sup>27</sup>

持平而言，財務自立不必然導致青年會勢必走上世俗化的道路，唯有青年會的事業快速增長，財務負擔愈益增加，但卻無法（或不願意）放慢發展步伐；為了達致財務上的收支平衡，種種世俗化的行徑便由此催生。然而，更壞的情況是，青年會幹事在開展不同事業時，忙得連宗教事業也無法兼顧。1926年，鮑乃德在訪問一處青年會後說：

25 畢德輝：〈城市青年會之衛生教育程序〉，《同工》第47號（1925年12月），頁6。

26 〈如雅德君致余日章博士函〉，《同工》第51號（1926年4月），頁21。

27 鮑乃德：〈青年會之統計〉，《同工》第46號（1925年11月），頁9。

該會之會員狀況，與其他市會大致相同。……幹事人數不多，於籌劃經費，管理會中行政，以及舉辦團體集會（主要之集會為電影同樂會）已覺鞅掌勞形，至對於會員個人的接觸，僅能偶一為之而已。<sup>28</sup>

謝洪賚似乎很早便已察覺青年會正朝這個方向發展：

……是以青年會以宗教事業為必不可少，其他各項事業，皆所以輔助之，以達救世之目的而已，苟舍本逐末，取積而還珠，其與世俗之俱樂部，又何別哉？<sup>29</sup>

中國青年會運動早已存在捨本逐末的危機。

### 三、昂貴的青年會事業

事實上，青年會本來就是一場耗費甚鉅的基督教信仰運動，其所服膺的一套標準化的模造人格程式，無論對硬體設施（如會所選址、構造、設備），或軟體配套（如圖書、西餐、運動用品），均非常講究及頗有要求，這對於一個自負盈虧的組織來說，所構成的長期財務負擔必然相當鉅大：

青年會在社會間，行各種善工，不可無金錢以資挹注，倘無所需要，即不復能有所成功，故謂青年會常要錢者，無異謂青年會之常作善工，即因見果，豈不然乎？<sup>30</sup>

青年會雖然致力招攬會員，以維持日常經費的開支；但是現實上，會費收入根本不足以支持經常費用的支出：

<sup>28</sup> 鮑乃德：〈解決青年會會員問題之又一計劃〉，《同工》第53號（1926年6月），頁7-8

<sup>29</sup> 謝洪賚：〈宗教事業為青年會之命脈〉，《青年》第16卷第1-2合冊（1913年3月），頁27-28。

<sup>30</sup> 恂如：〈對於青年會之感言〉，《青年》第16卷第8冊（1913年9月），頁161。

關於會員費有一極可注意之事；即會員若人人充分享受其權利，則會費之收萬不足以抵開支。……然而本會所以能維持現行之會費而無須增加者，則以會員中有三四成，未嘗用此權利故也。<sup>31</sup>

一個弔詭的現象是，青年會愈受社會人士歡迎，愈多人入會並使用會所內的設施，青年會的支出便愈大。但會費收入畢竟有限，既不足以維持青年會的日用開支，遑論購地興建會所，募捐遂成為青年會幹事不可或缺，甚或是最重要的日常工作。<sup>32</sup>

與英、美青年會誕生的背景迥然不同，清末民初，基督徒在中國社會仍是邊緣群體，富裕的信徒更是少之又少，負責管理青年會的董事會當然沒有太大的例外。西幹事早期面對的一大困境是，他們不得不向異教徒進行募捐，以異教徒的金錢來實踐基督化中國的偉大事業。<sup>33</sup> 青年會與中國官商名流的種種利益瓜葛，便在這種客觀情勢下催生。中國青年會運動派生自北美協會的海

31 〈上海青年會財務問答〉，《同工》第51號（1926年4月），頁18。

32 有青年會幹事似乎對募捐工作頗有微言，以致胡貽穀在一篇文章中有的放矢地說：「我們且別作夢想，以為擔任青年會幹事的，不一定要負擔經濟上和行政上的責任的。北美青年會前輩功臣麥盤尼不能這樣做法，北美青年會的當代偉人穆德亦不能這樣做法；就是為孤兒請命的慕勒和大佈道家慕翟也不能在這件事上處身局外；非但不能處身局外，並且常須為這件事勞心焦慮，或接連三四點鐘的在募捐的信上簽名，或專用幾星期的工夫，為解除經濟困難而嘔心血絞盡腦汁哩。」任夫（胡貽穀）：〈青年會當前之大問題〉，《青年進步》第64冊（1923年6月），頁71。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也面對相同的困境：「……美國捐款人的心理，總是要與一個有關機關或學校的校長或社長來往。因此，以後的幾年間，我就不斷來往北京與紐約之間，把我的工作時間用在美國，作一些我並不很適合的事，而同時又忽略了似乎是我最初本份的事。」司徒雷登著，閻人俊譯：《在中國五十年：司徒雷登回憶錄》，上冊，頁55。

33 巴樂滿由抗拒轉至接納向異教徒募捐的經過，大概反映了早期西幹事在募捐方針上的轉變過程，詳參F. S. Brockman, *I Discover the Orient* (New York, London: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35), pp. 78-91.

外工作，既受惠於當時美國政府支持對華傳教的政策，復得到美國駐華領事的協助，得以打開通往中國各地官府衙門的大門；與此同時，亦通過建立中外商貿訊息平臺，籠絡中國商人，將青年會打造成為中外政商名流的利益交易場所，從而換取他們的慷慨捐輸。青年會在財務上倚賴非基督徒政商名流的捐助，難免要遷就他們的關懷及喜好，這亦是青年會進一步邁向世俗化的成因。據三十年代全國協會所做的一項調查指出：

青年會從非基督徒方面所徵求到的經費要佔一大部分。我們很容易看出，基督徒會員是不能單獨負維持青年會的責任。關於這一點，總幹事的報告中，表示青年會為要向非基督徒得到經費，不能不於事業程序中，多注重社交性的事工，而不克嚴格的採取傳教的政策。另有幾位幹事則認為這種情形，使青年會道德的意味日漸喪失了。<sup>34</sup>

此外，青年會為增加收入，亦不得不對部分設施或服務實施使用者付費的收費制度，不僅希望可以收回成本，更期望所得的額外收入，可以資助其他工作的發展，或補貼某些虧本事業的支出。青年會的會費本來已不算便宜，享用部分設施或服務還要額外收費，青年會勢必進一步貴族化。<sup>35</sup> 也就是說，並不是社會上所有青年均有接受青年會模造人格的可能，而是只有具經濟能力

34 傅若愚、侯感恩：〈青年會事業簡要調查（續第一百十一期）〉，《同工》第115期（1932年10月），頁61。任夫不諱言：「青年會為社會服務，是為全體社會服務，不以人的有錢沒有錢，有權勢沒有權勢，有學問沒有學問而分甚麼等級。但就事實而論，對於有聲望有勢力的人，終不免顯得多注意些，叫人疑我們也中了階級主義的毒，與資本主義者一鼻孔出氣。」任夫：〈青年會當前之大問題〉，頁72。

35 晏陽初早期為青年會推介他編制的平民教育課本時亦說：「……況且我青年會素抱『乃役於人』的宗旨，應為一般服務，更當注重平民教育，才不致受旁人批評說，你們青年會是貴族式的。」晏陽初：〈平民教育課本啟事〉，《青年進步》第51冊（1922年3月），頁90。

的人才能入會。<sup>36</sup> 在這個意義上，青年會便與一般商業化的俱樂部無異。關錫斌引述社會人士的批評說：

會員入會分等級已惹起許多人懷疑，青年會已入了商業化，曾聽會員說：「青年會是如同店舖旅館相似，有錢可照顧，除了享物質上的些須利益外別無所得。」青年會宗旨是為甚麼？為甚麼徵求會員？徵求來會員而分等級？青年會是在乎會的大小嗎？<sup>37</sup>

事實上，這的確是不少會員的真實寫照。羅鍾瑞不諱言：

希望每一個會員，都能了解加入青年會的價值。……若是一個人加入青年會，拿出幾塊錢來不過是專供洗澡費用，或只作別種權利的代價，以謀一己之舒服，為唯一目的。那麼，我可以實實在在奉勸諸君，青年會不是洗澡堂，也不是貿易所，不但諸君入會不上算，就是把青年會和做會員的價值完全破產了。<sup>38</sup>

當會員視加入青年會為一種有買有賣的交易時，兩者之間便只存在單純的利益關係，青年會的盛衰榮枯便與會員毫不相干。早在 1910 年代便已有人指出：

竊以為今日青年會之大患，非各界之不予贊同也，乃一般會員，皆持一不冷不熱之態度耳。是故會員對於會事，有如隔河觀火，不關痛癢，無進取之銳氣，乏戰勝之毅力，

36 「……祇是會費以全年計算，都在十八元以上。也許會費是太高了，使好多經濟力量薄弱的人，就不敢貿然入會……」新夢：〈青年會在上海〉，《上海生活》第3卷第5期（1939年5月），頁10。

37 關錫斌：〈青年會要走那一途？（其一）〉，《同工》第67號（1927年12月），頁7。

38 羅鍾瑞：〈對會員們說幾句話〉，《上海青年》第25卷第21期（1926年6月11日），頁1。

為各地青年會所樂用。然而，徵求會的引入，卻徹底改變了中國青年會運動的內在生態及會員面貌，不僅進一步加劇了原來的世俗化傾向，更使青年會運動變得庸俗化。

徵求會的運作機制是，透過種種誘因塑造競爭氛圍，激發會員間的競爭行為，從而達致短期內吸納大批會員及會費的目的。然而，參加者為求爭勝，往往無所不用其極，青年會此舉其實變相鼓勵會員的種種不良行徑，與其模造人格的宗旨背道而馳。<sup>41</sup>此外，大量的會員在競賽的氛圍下加入青年會，青年會幹事根本不可能與個別會員（要是真有其人的話）一一接觸，遑論向他們灌輸基督教的價值觀。如李邦耀所說：「眾意我青年會在過去，對於社會尚未盡其最大之貢獻。其最大原因，在於會員制之不良，蓋會員人數過多，則接觸少而感化不易故也。」<sup>42</sup>當這種情況年復一年持續下去，青年會會員的整體素質必然每下愈況：

青年會為了募捐徵友等事，幹事精神才力耗去許多，而於培養人才，聯絡會員，建樹人格，各人團契的工夫，就無形受莫大的影響。徵友時，只要有錢入會即可，入會以後會員與青年會有何關係，有甚麼感情，卻無以善其後，有的會員入會兩三年，不知那裡是會所，也有的會員根本與青年會宗旨上衝突，因為有錢可入會，何及其他。像這樣拜服經濟勢力之下，精神方面可想而知。<sup>43</sup>

41 「……也使我們知道以前所用以激動會員志趣的方法，如獎品、榮譽等，是危險的；因為這使他們在不正當的事情上得到滿足。」華樂知：〈應用於青年會事業的幾個教育原理〉，《同工》第64號（1927年7月），頁12。

42 〈協會秋季幹事會議紀略〉，《同工》第65期（1927年10月），頁8。

43 關錫斌：〈青年會要走那一途？（其一）〉，頁7：「然此次會員，多係初入會者，其多年入會，及廢績去年者，每不多見，此實與本會宗旨不無偏馳。」〈會員繼續入會之理由〔長沙青年會〕〉，《青年進步》第12冊（1918年4月），頁80。

而徵求會一旦成為平衡財務預算或解決財務赤字的工具後，青年會實際上便落入飲鳩止渴的困境。<sup>48</sup>

徵求會愈益演變成為一種庸俗的募捐運動，加上不同的社會團體爭相效尤，社會人士對於徵求會愈益厭惡，更進一步貶損了青年會的聲譽。從這個角度看，青年會與一般的慈善團體亦再無太大的分別：「……而這種向非基督徒徵款的制度，也使外界認青年會為一種普通的社會的團體而非基督教的團體。」<sup>49</sup> 在這樣的情況下，青年會改造青年人格的口號叫得愈響亮，她在社會人士眼中的庸俗程度便愈高，如胡庭樟所說：

只知向社會上要錢……打著人格教育的旗子，服務社會的招牌，廣告寫的滿好，未必是貨真價實，日子一久了，不能不露出馬腳，演至門前冷落車馬稀的景況，是誰之過歟？<sup>50</sup>

## 五、青年會的競爭壓力

青年會的會員制度屬於短期性質，會員身分能否維持，主要取決於繳交會費與否：

青年會的成員有會員和會友兩種。會員必須是基督教徒，會友是非教徒。但是，無論會員或者會友，都不是永久性的。一般是一年徵收一次，發給會證，期滿換證，如不按

48 「如其已達募款目的，本年取消徵求會員之舉動，如不能達到目的，至十一月初旬再行徵求會員云。」〈京會之徵求會員辦法〉，《同工》第35號（1924年11月），頁6-7。

49 傅若愚、侯感恩：〈青年會事業簡要調查（續第一百十一期）〉，頁61。

50 胡庭樟：〈關係城市青年會而今而後的幾個問題〉，《同工》第66期（1927年11月），頁4。



期換取新證者，青年會就不再承認他為會員、會友。<sup>51</sup>

1917年3月，《上海青年》的一則報導說：「本會於本年底共有會員二千七百七十四人，……本年若聯同告退之會員，一併核算可得會員三千六百〇八人。」<sup>52</sup>可見青年會會員是一個流動性頗高的群體，每年公布的會員人數其實只是反映某一個時期的歷史情況，會員人數於此只具有相對而非絕對意義。為鼓勵會員每年更新會籍，青年會除了透過每年的徵求會外，亦得在服務內容、設施上推陳出新，方能持續保持會員的興趣。從積極的方面而言，這當然進一步加強了青年會與時俱變的能力。

然而，從消極的方面看，整合會員的最大公約數並不是青年會所揭櫫的偉大宗旨，反倒是迎合不同人士喜好、期望的各種舉措。由於入會的會員太多，各自懷有不同的入會動機，青年會為了滿足他們的需要，便只得以一個極多元化的面目示人：

夫所謂青年會者，乃一高格完全之會所也。名為基督教，實無宗教之界線，亦可謂為體育會，以提倡青年之體育為宗旨；亦可謂為半夜學堂，所備各界青年研求學問；亦可謂遊學之寄宿舍；亦可謂之育才館、廣交場。<sup>53</sup>

謂青年會為社會之公共機關也可，謂青年會為包括社會種種之機關亦無不可。總之，青年會能容納人民種種建設之精神，應付社會種種正當之需求……<sup>54</sup>

51 趙立教：〈我所知道的貴陽基督教青年會〉，《貴陽文史資料選輯》第9輯（1983），頁160。謝扶雅回憶說：「會員是流動性的，每年徵求一次。」謝扶雅：〈基督教青年會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地位與貢獻〉，頁128。

52 〈民國五年上海基督教中華青年會報告〉，《上海青年》第16卷第8號（1917年3月2日），頁3。

53 〈何為青年會〉，《上海青年》第10期第13號（1912年5月23日），頁1。

54 陳立廷：《基督教青年會釋要》（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27），頁13。

年會會所，都是受了美國的影響，而趨向於高大華美的建築。……但我以為這不是我們所當欽羨模倣的，我們若是建造會所，必須審察一番，當使與中國現在人民生計程度相合方可……<sup>60</sup>

余氏在這裡大概是有隱惡揚善的意味，上海青年會作為全國的模範，亦是興建華麗會所的始作俑者，更為中國各地的城市青年會所效法。青年會會所建築運動愈益貴族化，與上海青年會的倡導大概不無關係。

按照有關的規定，中國各地的青年會必須先自行購得興建會所的土地，北美協會才會提供建築會所的經費資助。各地青年會為了籌措鉅額的購地經費，一方面只得將徵求會的運作模式應用到會所經費募捐運動中，使得徵求會的籌款意味愈益濃厚；另一方面自然是向社會上的官商名流進行募捐，青年會不僅難免進一步向他們的利益傾斜，更予社會人士與上流人物糾纏不清的形象。在 1910 年代以後，由於青年會在中國的社會地位日高，部分城市青年會獲得當地官商鼎力支持，以較廉的地價出讓土地，甚或乾脆餽贈土地，她們對募捐的倚賴程度較少，所背負的財務包袱亦較輕，但是在興建會所的態度上卻變得更為進取。

要建造一座青年會會所委實並不容易，既牽涉不少技術性的問題，亦涉及很多繁瑣的程序，由籌劃到落成動輒歷時數年之久。與美國一般的青年會會所比較，中國青年會的建築經費其實相當有限，青年會為工程進行招標時，往往已大大超出原來的財務預算。此外，由於北美協會的建築經費是以美元計算，在兌換成中國的銀元時，存在匯價波動的風險；不幸的是，在 1910 年

60 余日章演講，星如記：〈今日之中國青年會〉，《同工》第38號（1925年2月），頁4-5。

代中期以後，中國各地青年會大規模開展會所建造計畫之時，正值銀元大幅漲價，不少青年會頓失預算，最後或持續進行募捐，或向北美協會要求增加撥款，部分更只能抵押借款，在因價就貨的情況下，打造一座又一座的「人格出產所」。<sup>61</sup>

然而，青年會會所落成後，並不意味財務問題得以解決，既要添置設備，亦要增聘人手，燈火之資亦勢必大增，令本已捉襟見肘的財務狀況雪上加霜：「……且維持新式之會所其需費自較大於舊式會所，而會員既然增多，斯財務能力亦加厚，否則安足以副之耶？」<sup>62</sup> 為了維持青年會會所的日常支出，幹事不得不四出募捐：「多數青年會，因有鉅大之會所，故不得不設法勤捐款項，以資維持。每年因募款而耗費了時間精力，固已極為不經濟。」<sup>63</sup> 個人募捐的成果有限，青年會只得進一步倚賴每年的徵求會所帶來的會費收入；要是青年會本身欠下鉅額債項，徵求會更成為償還債項的工具。在 1910 年代以後，徵求會的規則愈趨細緻，競爭氣氛愈益激烈，或許側面反映了青年會的財務困難程度。青年會倚賴徵求會作為收入來源，當然進一步貶損了青年會的社會形象。如吉林青年會幹事楊逸山說：「費用宜亟求永久獨立，勿依每年募捐，蓋每年募款，不惟於會務無宣傳之利，反招輕蔑。」<sup>64</sup>

此外，為了紓緩財務困難，青年會只得將會所內的設施和服務，採取使用者付費的原則，使青年會的商業色彩更為濃厚。不

61 「協會新會所，建於民國八九年間，維時美金匯水底〔低〕落，以故祇能建造中南兩部房屋。後北美協會又捐助美金五萬元，由協會另籌同樣數目，添建北翼房屋，現已落成。」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編：《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第十次全國大會全國協會報告書》（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1926），頁91。

62 鮑乃德：〈民國十四年會務統計表之研究〉，頁10。

63 徐寶謙：〈從日內瓦塔頂觀察我國青年會〉，《同工》第98期（1931年1月），頁4。

64 楊逸山：〈對於青年會事業感想〉，《同工》第40號（1925年4月），頁18。

用說，青年會幹事更無暇從事青年人格道德的改良工作，這未嘗不是青年會的悲哀：

青年會建築最新式高大會所，經濟同人才兩相需要，於是人才沒有預備好，經濟不得〔不〕去募捐，籌款，聯帶著把青年會重要工作無暇去作。找了些人也想生財之道，開飯館，電影園，髮館等等。這究竟是增進我們事業真價值呢？還是阻礙呢？<sup>65</sup>

先後出任廣州青年會和全國協會總幹事的梁小初，在回憶錄裡有一段意味深長的話：

照本人的意見，一個青年會的宗教事業，若要有所成就，會中負責人，必須認定青年會目標，在培養青年的基督化人格。透過人格，受了基督化的人物，使社會基督化。糾合同志，共同努力，這就是基督教青年會的靈魂。失去靈魂，只存軀殼，是沒有生機的。肉身死後，表面上一時可能膨脹起來，但不過是腐化初期的現象而已。我們如果以會員人數日增，會所陸續添建，服務地區伸展，工作活動頻忙，經濟狀況充裕，公共關係攪好而自滿，自己便犯了很大的錯誤。誠然，上述的幾種情形，是一個健全青年會應有的表現。然而萬一離開宗旨，失卻重心，便有捨本逐末，名存實亡的危險。<sup>66</sup>

可以說，追逐「失去靈魂的卓越」<sup>67</sup>正是二十世紀初年不少中國

65 關錫斌：〈青年會要走那一途？（其一）〉，頁7。

66 梁小初：《未完成的自傳：七七回憶錄》（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69），頁117。

67 這裡的說法當然是取自Harry R. Lewis, *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How a Great University Forgot Education*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6)。

城市青年會的真實寫照。陸幹臣亦不諱言：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運動，在過去之三十年中，由一地之肇倡，而漸漸遍布於全國。通都大邑，市會之設置殆遍，崇闋壯麗之會所，呈現於吾人之眼簾，其發展之迅速，組織之美善，不得不令人贊許。但在此數十年中，時會適合，處境順利，事業雖發達，而缺點亦多。蓋吾人只知增廣事業，而不加研究如何使此等事業得以確實實現吾人之主要目的。此目的維何，則「人格教育」是已（以基督之人格為標準養成成年及少年之完全人格）。所以直至今日，會員雖多，而志趣不一；事業雖繁，而目標未明。社會尚不知青年會究為何等機關，是豈非一大缺點乎？<sup>68</sup>

上述的批評反映出更根本的問題是，青年會無法致力於將基督教信仰內化為會員的思想價值的工作之上，尚愛物（E. H. Mancon）說：

我們都腐心於建築程序，衛生活動，平教和公教事業。這些固然也是很重要的。我不曾少〔小〕覷了這些事工對於國家的貢獻。不過我們似乎把最重要的事遺漏了，就是引領個人和耶穌基督的同工。<sup>69</sup>

青年會的分工體制似乎進一步加劇了這種傾向：「蓋德育為一會之樞紐，事既專屬，辦事上固無虞掣肘；惟其他幹事未免有不在其位，不謀其事之慨。如是則不獨有違青年會之宗旨，於德育進行上亦多所障礙矣。」<sup>70</sup>

68 陸幹臣：〈青年會教育地位之我見〉，《同工》第63號（1927年6月），頁4-5。

69 尚愛物：〈請基督教同人注意個人佈道的事工〉，《同工》第57號（1926年12月），頁11。

70 湯仁熙：〈青年會之宗教事業〉，頁3。

我們可以看見，青年會宗旨不明、會員素質參差、入會動機蕪雜、歸屬感薄弱等積弊，在在構成二十世紀初年中國青年會運動的潛在危機；只是在繁華盛世的時代，青年會根本不可能拿出改革積弊的決心和勇氣。

## 六、青年會的身分危機

1922年4月1日，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借用北京清華大學召開第十一屆年會。在會議尚未召開前的3月9日，一群上海學生以「非基督教學生同盟」為名，反對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借用中國的大學校址開會；他們又攻擊基督教為資本主義殖民政政策的先導，奴役中國人民。這群學生通電全國各校要求支持，各地紛紛回應。及至1924年8月，反教浪潮再起，上海一群青年重組「非基督教同盟」，共產黨員唐公憲為主席，國民黨元老吳稚暉起草憲則。他們召開大會攻擊基督教的侵略性質，又通電全國要求各界支持。至1925年初，南京、長沙、廣州、蘇州、九江、紹興、太原、寧波、青島等地相繼成立同樣的組織。在國、共兩黨的策動下，加上「五卅慘案」所引發的高昂民族情緒，非基督教運動在全國進一步發展，一直要到1927年以後，蔣介石展開清黨行動，掃除共產黨分子及激進派，並大力壓制各地的社會運動，非基督教運動才漸告平息。<sup>71</sup>

71 中外學者已有不少討論，詳參Ka-che Yip, *Religion, Nationalism, and Chinese Students: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 of 1922-1927* (Bellingham: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80)；Jessie G. Lutz, *Chinese Politics and Christian Missions: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s of 1920-28* (Notre Dame, IN: Cross Cultural Publications, Cross Roads Books, 1988)；葉仁昌：《五四以後的反對基督教運動》（臺北：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2）；葉仁昌：《近代中國的宗教批判：非基運動的再思》（臺北：雅歌出版社，1993）；楊天宏：《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楊天宏：《基督教與民國知識份子：1922年-1927年中國非基督教運動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在反教風潮影響下，青年會當然無法獨善其身，同樣遭受反教人士猛烈的指控及批評：

各資本家在中國設立教會，無非要誘惑中國人民歡迎資本主義；在中國設立基督教青年會，無非要養成資本家的良善走狗。簡單一句，目的即在於吮吸中國人民底膏血。<sup>72</sup>

基督教青年會在中國，以教育，娛樂等利益引誘中國青年使受美國資本主義化，附設商業科為美國銀行及商店造就學徒；宣傳中美親善，為美國資本家推廣市場。青年會之與中國舊勢力結合又可於彼之與中國官僚互相籠絡中見之。<sup>73</sup>

……所以我們認定基督教是資本主義的化身；教會，青年會是資本主義間接掠奪無產階級的工具；基督教徒，青年會會員便是資本主義的黨徒，或是獵人的獵狗。<sup>74</sup>

影響所及，中國各地青年會在會員人數、經費收入方面均大幅減少：「按普通會員所以減少者，大抵受非教運動之影響，而市會財務之收入，即不免因而稍受打擊，此所以不得不縮小預算也。」<sup>75</sup> 部分城市青年會的工作更大受影響，出現了自義和團亂事以來前所未有的危機：

當此時局發展劇烈之秋，數處之市會，處境頗覺困難，如經濟支絀，籌款不易；如非教運動之攻擊，反對青年會的

72 〈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宣言〉，《先驅》第4號（1922年3月），頁1。

73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大會紀略〉，《新青年》第9卷第6號（1922年7月），頁128。

74 盧淑：〈基督教與資本主義〉，《先驅》第4號（1922年3月），頁2。

75 鮑乃德：〈民國十四年會務統計表之研究〉，頁3。

宣傳，皆足使本會事工之進步，遭受阻礙，尤以廣州、香港、福州、南昌、武漢、長沙等處為甚。<sup>76</sup>

無庸諱言，非基督教運動的確對中國青年會的各種事業造成頗為沉重的打擊。但值得注意的是，置身在歷史場景中的青年會當事人，並不單純認為青年會事業的衰落，可以完全由外在的環境因素解釋。鮑乃德在1927年談及青年會宗教方面的工作時說：「青年會宗教事業的退落，究竟是因為外界的攻擊非難所致呢？還是因為基督教運動的本身缺乏道德和宗教的原動力呢？或許是兩方面都有的。」<sup>77</sup> 華人幹事關錫斌甚至說：「近年各地徵求會員同募捐都感困難，固然是因為時局不定原因，而大原因也恐怕是會中本身問題。」<sup>78</sup> 從兩位中、西幹事相近的說法可見，將二十年代青年會的衰落單純歸因於非基督教運動的打擊，或是從前有利青年會發展的外在環境因素的褪去，似乎並無助於廓清歷史的全貌；反倒是過去備受學者忽視的青年會的內部種種問題，才是更根本的核心所在，非基督教運動只不過將青年會本身一直潛在的弊病進一步引發出來而已。筆者以為，唯有先審視中國城市青年會的內在生態環境，才能更客觀持平地理解二十年代以後，不同政治風潮對中國青年會運動所造成的種種衝擊。

同樣重要的是，非基督教運動對青年會所造成的最大打擊，並不在於會員人數或經費收入下降，只要青年會一日仍然保持不可取代的社會地位，在反教風潮過後，必能回復舊觀。青年會所面對的嚴峻危機其實是，她在社會上的影響力頓然大幅減退，由

76 陸幹臣：〈記余日章博士在青年會少年事業會議中之演說大旨〉，《同工》第60期（1927年3月），頁5。

77 鮑乃德：〈為一九二七年市會事業統計表告同人書〉，《同工》第81期（1929年4月），頁14。

78 關錫斌：〈青年會要走那一途？（其一）〉，頁7。



完了…… 84

梁啟超甚至說：

青年會歷年所辦各項事業，因求普及，故甚膚淺。青年會幹事能辦教育，能講演，知職工，善體育……但專精一藝而於某種學問獨有深造者，則渺乎不可得其人。此種情形若不加以糾正，則青年會在社會上，不久將無立足地。<sup>85</sup>

二十年代以後，中國知識分子受到「到民間去」的思潮影響，尤其是開始思考到農村／社會下層才是國本之所在，捨此別無救中國之法；而青年會卻是以城市／中產階層為主的組織型態，更不啻是走在時代的對立面：

回憶十數年前，青年會之初設於中國時。中國社會，到處都需要服務，同時青年會領袖被服務熱忱促使著，自不免「急不暇擇」，信手作去，做些應時的工作；加以青年會之地點，因為時勢和環境的關係，只能在城市中——且是大的城市中——設立。本來青年會的創始者，是應了他見到的城市需要而設立的；而其所服務的人們亦多是上流社會份子。結果若說無益於社會國家，誠然是太刻薄而又太冤枉的批評；然而平心論去，恐怕「工作散漫，不切中事實，工作區域多為局部的，而把工作應有遠大的目的，一貫的統系，為社會造就真正適用的人才以及服務應當注意需要更急的區域——鄉間——和急待救濟的下級社會……諸要點忘記了」的評論，是逃不脫的吧！<sup>86</sup>

84 關錫斌：〈對於青年會具體改進的意見〉，頁10。

85 〈梁任公先生對於青年會的期望〉，《青年進步》第84冊（1925年6月），頁96。另參俞友仁：〈青年會亟宜推廣其事業於農村方面〉，《同工》第44期（1925年9月），頁12。

86 蔡景琳：〈對於青年會今後進行方針的一點意見〉，《同工》第82號（1929年5月），頁2。

更糟糕的是，青年會向以各種利益招徠會員，但是隨著不同的社會團體相繼成立，它們亦同時提供了部分青年會過去獨有的服務。青年會會員既多單純以利益（而非對青年會的信仰）作為入會的主要考慮，青年會在面對外來的挑戰時，其抵抗能力自屬薄弱：

前十幾年中國社會不大進步，各種新式建築很少，學校同體育界都很幼稚，所以青年會在那時，對於物質上的利益，很能引起許多人注意。因為沐浴室，理髮所，體育室，地球，檯球，等等的益處，都是社會上很缺少的。因此入青年會的很踴躍。但是現在這種物質上的利益，不獨青年會所有，其餘街市上旅館，澡堂，球房都發達起來，人人都有隨時去的機會，不必入青年會亦可享同樣的利益。從先學校體育的不發達，游藝會、運動會等都是由青年會來提倡。但是現在各學校都有體育場，遊戲室，各班有班會，各級有級會，彷彿也用不著青年會了。<sup>87</sup>

總的來說，「青年會是甚麼？」這個提問的發出，當然並不代表青年會幹事對於他們所投身的組織一無所知；它的真實意涵是——在二十年代的非基督教風潮下，青年會幹事面對前所未有的外在和內在危機，迫使他們重新思考過去發展的路徑，以及如何為前面要走的路重新定位時，所反映出的茫然及困惑：<sup>88</sup>

87 關錫斌：〈對於青年會具體改進的意見〉，頁9-10。「吾會從前以灌輸近代的體育教育為社會所稱頌，近年來的情形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注意而設法加以補救。」鮑乃德：〈為一九二七年市會事業統計表告同人書〉，頁12。

88 研究組織認同(organizational identity)的學者指出：「當目標和價值的討論變得熾熱，以及存在深度和長久的分歧或混亂，有人可能會問一個認同問題：『我們是誰？』『我們正從事哪一種事業？』或『我們想變成怎樣？』……認同問題的提出，典型地發生在容易、較具體、可以量化的解決方法已經無效的時候。」Stuart Albert and David A. Whetten,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in L. L. Cummings and Barry M. Staw, eds.,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vol. 7 (Greenwich, CT: JAI Press, 1985), p. 265.

青年會的誕生，代表基督教面對城市化衍生的道德衝擊，所作出的一項信仰回應行動。青年會期望擺脫傳統教會畫地為牢、故步自封的心態，毅然走入最繁華但同時也是道德最「敗壞」的城市中心，與攏絡青年的種種世俗娛樂事業進行比拼，透過一套特有的模造人格方程式，引領青年皈依基督教、加入教會，在在反映出基督徒在時代的挑戰面前竭力兌現信仰的一項嘗試。1912年12月，《上海青年》的一則報導說：

吾人於徵求會友一事，必以為其事甚少，熟知其效果甚大。有時一少年既入青年會，其為人即較前有進步，蓋入會之後，或在夜館肄業，或入健身房體操，或在聖經班讀經，其三育即因是而發展，然則諸君蓋往介紹貴友入乎？<sup>92</sup>

這裡當然是一種相當理想化的說法，但我們並不能排除在現實的情況裡曾經發生。

回憶三十年前，我是一個十六歲的鄉曲少年，從內地到上海洋布店裡做學徒，得著人家的指導，加入上海青年會，同時又做了青年夜校的學生。每天除了做學徒生活外（倒痰盂擦地板洗煙筒），便到青年會求知識，參加了各種有益身心的活動；他的環境，就成了我的生活中心，最後得著研究宗教的機會，結果使我認識了基督的真理，並且把我的思想，逐漸的演進。我的職業問題，亦得到真確的改變，這都是青年會陶養所成。<sup>93</sup>

余姓陳名慶生，年十九歲，籍貫寧波。父業銀匠，於二年

92 〈各人皆有義務〉，《上海青年》第10期第36號（1912年12月27日），頁1。

93 陳己生：〈青年會與我〉，《上海青年》第37卷第16期（1937年4月28日），「上海青年第三十七屆徵求大會特刊」，頁17。

前去世。三年前余至上海，進協成銀箱廠學習銀箱業，現已卒業，在該廠工作。三年之內，所得青年會之利益實非淺鮮，蓋余曾入該會在廠內所設之智育班、聖經班、演講會及檯球隊等，現今余為檯球隊隊長、聖經班領袖，余並時向同事演講余之思想，學識自覺頗有進步。余前時作謊語或生私見，今則如有此種惡念，即至坐臥不安，此皆青年會幹事諸君潛移默化之力也。<sup>94</sup>

一九一七年春，余始為青年會會員，時聆名人教益，知基督教與世道人心大有裨益，心焉慕之，乃入聖經學校研究聖道。一九一八年復活節聽陳維屏博士演說……是年聖經學校暑假期聽王正廷先生演說……自是之後，余遂決意信耶穌為世人之救主，乃到教堂做禮拜焉。一九一九年復活節，友人葛觀采君顧謂余曰：子慕道有年矣，惜未正式受洗禮，仍不能作真正耶穌之信徒……余感其言，於五月七日在虹口救主堂受洗禮焉。<sup>95</sup>

梁小初在任職青年會半世紀以後，這樣描述服務青年會多年來為他帶來的愉快經驗：

……當你看見青年到青年會去參加正當的娛樂，有益身心的活動，與好人為伍的團契，而不致流入於邪途，你一定感覺滿意的。當你看見青年利用公餘之暇去青年會求學和補習，因而職位高陞事業上進，你一定感覺愉快的。當你看見青年到青年會去參加體育運動的發展，體格增進健

94 慶生：〈余與青年會之關係〉，《上海青年》第22卷第17號（1923年5月11日），頁8-9。

95 容劍鳴：〈余入基督教之由來〉，《上海青年》第18卷第21號（1919年6月6日），頁3。

康，有體育道德，在遊戲中表示出公正合作的精神，你一定會感覺高興的。當你看見青年由青年會而認識真理，獲得了人生意義，表現高尚人格，你不由不感覺快樂的。當你看見青年由青年會的影響，而皈依基督加入教會，你必會得著與天使同歡之感。當你看見青年由青年會的鼓勵和訓練，為青年會，為教會，為社會擔任義工，任怨任勞，你必定衷心快慰。這些快慰的體驗，感謝上帝，兄弟已經在青年會多多獲得。<sup>96</sup>

不過，必須指出的是，這些例子在青年會裡並不算太多。如前文所述，上海青年會裡的基督徒會員比例，基本上一直只維持在一成左右（詳見附表 4-9）。<sup>97</sup> 要是我們將眼光擴展至全國層面來看，統計資料亦顯示相同的情況。附表 7-2 是 1922 年中國城市青年會同宗／同志會員人數的統計，從中可見在 36 個城市青年會中，約有 4,500 名基督徒會員。除了少數規模較小的青年會外，在其他會員人數超逾 1,000 人的青年會中，同宗會員的比例基本上在百分之十或以下；而綜合全國城市青年會的統計數字則為 8.5 %。與鮑乃德後來的說法大體一致：「現在會員中，基督徒僅佔十分之一。」<sup>98</sup>

96 梁小初：〈服務青年會五十週年感恩會席上講辭〉，梁小初：《梁小初博士演講集》（香港：中華基督徒送書會，1972），頁67。

97 這個比例大抵只會更少，楊恕在1929年說，非基督徒會友「其數斷何祇十倍於同宗（基督徒）會員」。恕（楊恕）：〈同宗會員與年會〉，《上海青年》第28卷第4期（1929年3月28日），頁1。

98 鮑乃德：〈青年會之統計〉，《同工》第46號（1925年11月），頁7。據1925年全國協會所做的統計，同宗會員佔全國青年會會員總人數為12%。鮑乃德：〈民國十四年會務統計表之研究〉，頁3。

附表 7-2 中國城市青年會同宗／同志會員人數統計（1922）

城市	同宗會員	百分比	同志會員	百分比	會員總數
廈門	117	15.7	626	84.3	743
安慶	0	0	15	100	15
安東	32	100	0	0	32
廣州	322	26.0	918	74.0	1,240
長沙	173	5.9	2,738	94.1	2,911
煙台	167	7.2	2,155	92.8	2,322
鄭縣	45	7.5	559	92.5	604
成都	45	2.7	1,625	97.3	1,670
周村	60	7.59	730	92.4	790
重慶	58	20.4	226	79.6	284
福州	166	7.5	2,058	92.5	2,224
杭州	202	6.2	3,044	93.7	3,246
哈爾濱	-	-	-	-	-
興華	59	51.8	55	48.2	114
香港	376	9.0	3,798	91.0	4,174
開封	135	7.4	1,685	92.6	1,820
建寧	77	5.5	1,323	94.5	1,400
吉林	72	2.6	2,743	97.4	2,815
瀋陽	27	81.8	6	18.2	33
南昌	107	12.4	756	87.6	863
南京	207	7.6	2,506	92.4	2,713
寧波	78	6.9	1,060	93.1	1,138
保定	102	9.4	980	90.6	1,082
北京	330	11.9	2,443	88.1	2,773
上海	496	10.3	4,302	89.7	4,798
西安	52	5.1	975	94.9	1,027

況。<sup>100</sup> 因此之故，要是加上存在大量掛名會員（假設亦包括掛名基督徒會員）的因素一併考慮，我們絕對有理由相信，青年會同宗會員的比例雖然偏低，但也不無被低估的可能。不過，純粹從統計數字而論，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整體而言，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城市青年會運動如果不是完全失敗，也不見得怎樣成功。

不過，在這裡值得我們補充幾點：首先，常言道：「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持平而言，人格模造是一項曠日持久的工程，絕不可能一蹴而就。如華樂知所說：「人格發展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神祕的，魔術似的。」<sup>101</sup> 青年會作為美國進步時代的產物，對於大規模塑造青年人格的可能性持樂觀的態度，並期望以一套標準化的模造人格方程式，回應城市化衍生的道德衝擊：「青年會的工作有一種標準化的特性，譬如德智體群四育程序，便是一種標準。標準化有它的壞處，但能使工作易於推行，並達到預定的目標。」<sup>102</sup> 但問題是理想的程序並不代表必然會達致美滿的目的，會員不一定跟隨青年會幹事的魔術棒來起舞：

我們想說，一個活潑潑地的程序，如演講會，大運動，研究班，比賽遊戲等，每能影響青年會的生活而助其發展；其實這是靠不著的。舉一個例來說：從前青年會學校曾定查經為必修課，宗旨原欲助進學生的德育。然在學生方面

100 「就表面而言，會員之入會，為培養人格也，為服務社會也。然究其實際，則試問徵員之以此相號召者若干？而會員之以此加入者又若干？此係事實問題，當有調查之可能。論者或將答曰：『會員之加入，大多數雖係由於面子，然吾人不妨於其加入之後，對之作一番引導工夫』是種理想，未始不高大，其如實際何？」徐寶謙：〈從日內瓦塔頂觀察我國青年會〉，頁5。

101 華樂知：〈應用於青年會事業的幾個教育原理〉，頁10。

102 梁小初演講，王齊興、蔡昭修筆記：〈對於青年會運動的再檢討〉，頁4。

則視查經課為學校所訂的規章不能不遵守的，並且修習了此課，則可得相當的學分。其能於聖經中真心尋求以期獲得人生問題的解決則很少。我們稱這種功課為宗教教育，那就名不副實了。學生們對於經課所認為有益而且引為滿意的，不過借此練習英語，或可與教員辨難而駁倒他。而其聯帶的弊害，則為：一、厭棄聖經；二、蔑視宗教；三、養成詭譎的習慣。查經原是最好的事，然其效果尚且要看我們辦理的合法與否來決定。他如乒乓球，會員徵求會，公民教育班，體育班，少年團等，當然也逃不脫這個例。問這些事業能夠輔助青年瞭解並實行基督化的生活嗎？我們只能回答說：「能夠的，但是不一定。」這些種種活動，能夠引導青年生活向上發展，但若是施之不善，也能夠使他們更加放佚，自私，怠惰苟安，依賴他人，而失卻勤奮的精神。<sup>103</sup>

梁小初亦認為，青年會所提供的只是為善的基本條件，並不是所有的充分條件：

同樣的青年會運動的特殊貢獻，是為青年會設備一個良好的環境，安排多種有益身心的活動，養成高尚志趣和習慣。有時比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的說教，收效更大。是以青年會是一個重視環境與行為的團體。不過我們對於環境，不但要盡護衛青年的責任，更要進一步使青年知道怎樣選擇環境，怎樣改善環境。至於行動是善是惡，視乎動機如何，態度如何。這二者不能單靠良好環境，不經自擇，被動行善的行為，自然會轉入（carry over）純正的動

---

103 華樂知：〈應用於青年會事業的幾個教育原理〉，頁10。



機，和良善的態度。必有賴於宗教、知識、情感、和動力所引致的判斷和決心。是以青年會只做一些有益的事，還是不夠徹底的。<sup>104</sup>

青年會雖然不一定能夠如前面的漫畫所宣傳般，將入會者脫胎換骨、改造成一個充滿有基督化人格的青年，但並不代表青年會在模造青年人格方面無所貢獻。蕭公權憶述他在上海青年會中學親見的傳教情形說：「無如過於努力傳教而學識不高深的教員，有時講授非宗教的課程也節外生枝把『上帝』、『耶穌』強拉進來。」<sup>105</sup> 他在別處又說：

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應為童子部幹事，疑誤。〕（美國人）克先生（Mr. Clark）有一天約我到他的辦公室去談話。他問我對於基督教的感想如何。我說基督教是一個教人敬天愛人的優良宗教，幾百年間新舊教徒，不避艱難，不遠萬里，到中國來傳教，他們的信心和熱忱令人佩服。他說：「你願意入教嗎？」我答覆他說，「我對於基督教現在只是一點理智上的認識，並不曾發生精神上的信仰，形式上的受洗是無多意義的。」他點頭承認我的看法不錯。<sup>106</sup>

可以說，青年會在培植基督化青年人格方面所付出的努力，並不能夠完全反映在青年會會員數目的統計上。正如當時有評論說道：

常聽人說，青年會雖然是不能積極供給青年多少益處，但是從青年會消極也學不了壞處，在社會上許多青年能不為

104 梁小初：《未完成的自傳：七七回憶錄》，頁118。

105 蕭公權：《問學諫往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2），頁27。

106 蕭公權：《問學諫往錄》，頁79。

所誘，而有所作為的，會員實在佔不少數。<sup>107</sup>

其次，在近代中國基督教史上，除了極少數地區或群體曾出現異常高的基督徒比例外，基督徒佔中國總人口比例從來都是絕對的少數。也就是說，近代中國從來不存在一個傳播基督教的理想環境。巴樂滿早在 1903 年便指出，維持城市青年會的宗教氣氛存在極大的困難：

…… 在設有青年會的異教的大城市裡，只有少數的基督徒可以吸納成為同宗會員；即便是我們同宗會員，在經驗和訓練方面，均遜色於美國城市青年會的平均水平。抑有進者，我們的財務支持大部分必須從非基督徒商人獲得。再者，青年會的整體環境是異教的。這樣對青年會帶來很大的影響是，令她無法對會員的宗教生活發揮重大的影響力。<sup>108</sup>

當然，我們不能將中國青年會的會員人數與中國基督教徒人數作簡單的類比。筆者想指出的是，以二十世紀初一般中國人對基督教的接納程度作為考量的基準，中國城市青年會運動縱使不見得太成功，也絕非一敗塗地。如周冠卿說道：

青年會的會員雖然大多數是非基督教徒，但是宗主會員也絕不是同一個教會的教友，差不多青年會的宗主會員，要包括當地所有教會的教友在內。雖然不一定所有教會的教友全是青年會的會員，可是至少每一個教會都有一部分教友是青年會的會員，這是已成的事實。<sup>109</sup>

1924 年上海青年會的報告說：「介紹入教會者，一年計三十餘

107 關錫斌：〈青年會要走那一途？（其一）〉，頁6。

108 Annual Report of F. S. Brockman, September 1903, pp. 37-38, AQRBV.

109 周冠卿：〈青年會與教會的關係〉，《同工》第134期（1934年7月），頁27。

但這其實是錯誤資料，因〈佛化新青年會在武漢成立宣言〉明明說：「定名為『佛化新青年會』，意味基督教青年會為十九世紀以前受基督教舊化的舊青年；而二十世紀以後之世界，必為受佛法新化的新青年……」，兩者針鋒相對，而前者被視為將被後者取代，哪裡是參酌？另外，陳維東，〈佛化新青年的說明〉，全文也未提到任何與基督教青年會有關的字眼。<sup>115</sup>

筆者以為兩者即或彼此競爭，但卻並不妨礙佛教徒施行「以夷變夏」的策略。該會在《佛化月刊》上刊登的〈佛化新青年會募捐公啟〉曰：

各位大善人你們看，那些外國人他們遠涉重陽，梯山航海，為甚麼能在中國地面上成立很壯麗巍峨的禮拜堂，青年會學校醫院等機關？考查他們的歷史，必先有一二個大澈大悟的大布施家，作了大大的捐助，才能收此效果……請看上海北京的青年會協和醫院皆是一人出的款資，我們想多人多不信佛，何以大資本家大聰明人都生在他們裡頭？……我們中國的善士仁人若有大仁者照他們那種精神來幫助吾會，那麼，我們亦可止旗息鼓了。<sup>116</sup>

中學教師招勉之在 1927 年 12 月 15 日致函魯迅，曾談及成立孔教

115 參江燦騰：《日據時期臺灣佛教文化發展史》（臺北：南天書局出版社，2001），頁276-277，註54。

116 詳參〈佛化新青年會的靚面〉，《佛化月刊》第1年第1期，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3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6），頁9。更有趣的是，佛化新青年會還設立一個俱樂部，設施包括說法場、圖書館、佛化學校、體育場、素齋室、沐浴室等，儼如一所佛教版本的「人格出產所」。詳參周浩雲：〈佛化新青年會俱樂部宣言〉，《佛化新青年》第1卷第2號，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13冊，頁8-9。

青年會的問題。魯迅的覆函中引述該會的籌設宣言曰：

人心敗壞，道德淪亡；世運浩劫，皆由此生。今我國青年處此萬惡之漩渦，聲色貨利濡染於中，邪說暴行誘迫於外。……同人深鑒於此，爰有孔教青年會之設，首辦宣講，音樂，遊藝，體育各科，借符孔門六藝之旨。一俟辦有成效，再設學校圖書館等，使我國青年皆得瞭解孔子之道，及得高尚學術之陶熔。<sup>117</sup>

從宣言內容觀之，孔教青年會與基督教青年會的宗旨，不僅是殊途同歸，基本上更是模仿後者的發展方略，只不過是將「三育」換上「六藝」的牌子而已。值得注意的是，魯迅對此會的宗旨卻不以為然：「三祖六宗，千秋萬歲。獨惜『藝』有『宣講』，稍異孔門，會曰『青年』，略剽耶教，用夷變夏，尼父曾以失眠，援墨入儒，某公為之翻臉。」<sup>118</sup>

中國青年會對於青年產生的直接或間接影響，同樣可以從二、三十年代以後，她成為部分國、共兩黨人士致力打擊的對象得到部分印證。1927年6月，《同工》引述一份雜誌談及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對付青年會的策略時說：

因為在青年會學校讀書的青年，大部是為了物質的利益與受了好奇心的驅遣；基督教的教義，實在對他們沒甚吸力。我們共產主義青年團對於這般人，應把他們拉到我們方面來，引起他們的政治興趣，乘機使他們知道青年會與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區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重任

---

117 魯迅：〈補救世道文件四種〉，魯迅：《集外集拾遺補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頁231。

118 魯迅：〈補救世道文件四種〉，頁233。

就在使中國的青年不受青年會的支配。<sup>119</sup>

晚至 1930 年 4 月，在南京舉行的全國教育會議上，有部分代表臨時提出將青年會收歸自辦的議案：

青年會純屬教會訓練青年教徒一特種機關……血氣未定之男女，慕青年會之美名，踴躍加入，尤以學生為最。迨置身其中，受環境包圍，耳濡目染，無力自拔，遂誤信教旨而不自覺，教各地青年會會員無形中已變成基督教準教徒……<sup>120</sup>

可見在國、共兩黨反對青年會的人士眼中，青年會即或不能使青年成為基督徒，但在潛移默化的環境下，不少青年仍在一定程度受其影響，在這個意義上，反證了青年會以「環境布道」的策略薰陶中國青年的成效。<sup>121</sup>

中國青年會作為通往教會的階梯，在二十世紀初的表現的確並不十分稱職，前述種種世俗化的行徑，無疑阻礙了她發揮引領信徒加入教會的作用。<sup>122</sup> 但得指出的是，教會內青年會會員人

119 〈共產黨對青年會的陰謀〉，《同工》第63期（1927年6月），頁8-9。另載《上海青年》第26卷第23期（1927年7月1日），頁2。共產國際代表在策動非基督教運動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對青年會的敵視態度，詳參陶曉亞：〈共產國際代表與中國非基督教運動〉，陶曉亞：《邊緣的歷史：基督教與近代中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68-89。

120 〈青年協會的要函一封〉，《上海青年》第29卷第20期（1930年5月22日），頁48。

121 梁家麟亦指出：「為甚麼中共在當時特別視青年會為眼中釘？原因很簡單，因為青年會的事工非常成功，在青年中間有巨大的影響力，故為後起的共產黨視為最大的競爭對手，非將之抹黑打擊，無法建立其在青年裡的獨佔性的革命形象。」梁家麟：〈宗教工具論——中共對宗教的理解與利用〉，《建道學刊》第22期（2004年7月），頁7。

122 「……更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艾迪博士所到的地方，總少不了到那完全失去基督教氣味，只是演戲劇，映電影，開理髮館，浴室，辦寄宿舍，食堂，聯絡貴人，勸募捐款，同時仍掛著『基督教』招牌的『青年會』禮堂中去演講。」王明道：〈艾迪博士是傳福音的麼？〉，王明道：《真偽福音辨》，第2版（香港：晨星書屋，1982），頁46-47。

數比例偏低的現象，必須同時從近代中國基督教的獨特生態環境來理解。二十世紀初年，中國教會信徒（包括牧師、傳道）的知識水平一般並不理想，傳統教會根本無法吸納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分子加入。如劉廷芳所說：「差會的會所，與教堂便成為一個小社會的本營，這一條圍牆，雖天天開大門，宣傳福音，已不知不覺的成為一條與社會隔離的障礙。」<sup>123</sup> 加上部分保守派教會人士，由於神學立場上的分歧，對青年會心存抗拒，致使青年會不得不由本來的教會中轉站，轉而成為教會本身：「奉天教會不願青年會引人加入教會，因其含有革命性，乃不得而思其次，另組小團體以容納之，於是教會又大鬥〔鬧〕謂，青年會自造教會，脫離教會而獨立……」<sup>124</sup>

在二十世紀初年，曾經多次造訪中國各大城市青年會的大來（Robert Dollar）船長在回憶錄裡憶述：

中國青年會的工作看來是吸引中國青年轉向基督教的其中一種最成功的方法，當我這樣說的時候，並不是暗示傳教士在中國開展的事業，在任何程度上較青年會所作的不重要，但是遊戲、運動、體育館和浴室的確成為中國青年的

123 劉廷芳：〈青年會對於中國教會的貢獻〉，頁260-261。這一點與八十年代中國教會重開以後出現的「文化基督徒」現象不無相似之處。詳參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編：《文化基督徒：現象與論爭》（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7）。

124 〈青年會特別會議紀錄〉，《同工》第50號（1926年3月），頁7。劉廷芳說：「實行社會福音，便是個人福音的充分實現，其中含有革命的烈性……」又說：「雖然有些宗派，觀點與立場，不贊成青年會全部的工作與觀點……」劉廷芳：〈青年會對於中國教會的貢獻〉，頁255、266。保守派教會人士對青年會的批評，除了可參考王明道《真偽福音辨》一書所收錄的多篇文章外，另見宋尚節著，利未摘錄整理：《失而復得的日記：主僕宋尚節日記摘抄》（香港：宣道出版社，2006），頁215。

一大吸引力。<sup>125</sup>

我們若考慮到青年會所吸納的對象，主要是傳統上不會步入教會的知識分子或上流人物，即或他們所佔人數不多，但卻是社會上的菁英分子。從擴展中國基督徒的社會層面、提升中國基督徒的社會地位，以及在中國主流文化方面的影響力而言，中國青年會運動誠然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如梁小初所說：「當時的教會對於智識界的青年，沒有甚麼接觸。此種需要須由青年會去負責應付。」<sup>126</sup> 用劉廷芳的說法：

青年會在圍牆之外建立，與圍牆之外的社會交接，將圍牆裡面的人拉出來與圍牆之外的社會得一點接觸。要使他們與有些非基督徒交往，同聚餐，同在一個健身房中體操，同在遊藝會中娛樂，同辦社會公益的事，這是給基督徒一個可以與他自己的民族相接，相合的場所，卻仍在基督的名下，共同謀社會的利益。<sup>127</sup>

可以說，中國青年會運動在近代中國基督教史上的貢獻，似乎不在信徒數量的增加，而在素質的提升以及影響力的擴大。

回看近代中國青年會的歷史，一場目光遠大、氣魄恢宏的信仰運動，卻因為內部的種種世俗化行徑，而走上與始創宗旨愈益背馳的道路，實在令人不無感嘆。最後，茲引杭亭頓（Samuel

<sup>125</sup> Robert Dollar, *Memoirs of Robert Dollar*, fourth edition (San Francisco: The Bruce Brough Press, 1925), p. 123. 有關他的生平，另參Robert Dollar, *Memoirs of Robert Dollar* (San Francisco: W. S. Van Cott & Co., 1918)。至於他在二十年代中國長江流域經營的航運業務，可參David H. Grover, *American Merchant Ships on the Yangtze, 1920-1941* (Westport, CT: Praeger, 1992), pp. 75-83.

<sup>126</sup> 梁小初演講，王齊興、蔡昭修筆記：〈對於青年會運動的再檢討〉，頁4。

<sup>127</sup> 劉廷芳：〈青年會對於中國教會的貢獻〉，頁261。

# 附 錄



## 附錄一 中國青年會與「三育」話語 ——「德育」、「智育」、「體育」



本會〔青年會〕所用徽章，人皆不知其意，往往有函詢本會者……徽章中之圓圈表合一之意，其三角形表德、智、體三育，內中聖經一冊，翻在約翰十七章廿一節，其文曰：「致彼輩可合而為一」，更有希臘字母二，乃為希臘文耶穌二字之首二字母，此二字母一八九五年教會中已有用為圖章者，青年會萬國總委辦更加三角形而用為徽章。<sup>1</sup>

<sup>1</sup> 〈青年會之徽章〉，《上海青年》第12卷第38號（1913年1月10日），頁3。有關青年會會徽的意念和發明經過，可參C. Howard Hopkins, *History of the Y.M.C.A. in North America* (New York: Association Press, 1951), pp. 251-257.

如所周知，青年會本著基督教的精神，以德育、智育、體育養成青年的完全人格為宗旨：「青年會原有之旨趣，以其表號三角形為代表，曰：以智育、體育、德育造成完全人格是也。」<sup>2</sup>對於研究中國青年會的學者而言，這種說法既不陌生，更可說是一項基本常識，似乎並沒有加以深究的必要。

劉禾在《語際書寫：現代思想史寫作批判綱要》一書中，提出了「互譯性」（*translatability*）這個中國現代思想史寫作的新領域：

現代思想史的寫作能否落實在語言和語言之間所建構的「互譯性」之初（如 A 語言中的某詞何時開始等於 B 語言中的另一詞？），落實在語言和語言之間的互相碰撞、交融、衝突和翻譯的歷史過程中去研究？現代漢語本身即是這樣一個過程的產物，現代思想史的寫作亦然。那麼，我們就不能不問：漢語和其他語言之間的所謂「互譯性」是如何歷史地建構起來的？如「文化」何以等同於 *culture*？「個人主義」何以等同於 *individualism*？「國民性」何以等同於 *national character* 等等？……<sup>3</sup>

一直以來，「德育」、「智育」、「體育」這三個詞彙／觀念基本上已被本質化或常識化，學者均望文生義，又或是想當然地，將它們視為美國青年會所提倡的「*Spirit*」、「*Mind*」和

<sup>2</sup> 任夫：〈十年來吾國青年會之重大變化〉，《青年進步》第100冊（1927年2月），頁237。

<sup>3</sup> 劉禾：〈個人主義話語〉，劉禾：《語際書寫：現代思想史寫作批判綱要》（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7），頁20-21。當然，劉禾的說法並非放諸四海而皆準，不過對於本文的論述未嘗沒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Body」的對等翻譯。<sup>4</sup>事實上，只要翻閱十九世紀以來出版的中文詞典，不難發現「Spirit」、「Mind」和「Body」三字早期的中文翻譯（附表一），基本上與「德育」、「智育」、「體育」三詞沒有任何明確的傳承關係。「互譯性」引領我們進一步反思的問題是：「德育」、「智育」、「體育」何以等同於「Spirit」、「Mind」和「Body」？這兩組詞彙的「互譯性」何時又如何進入中國青年會的歷史裡？<sup>5</sup>

與其他從跨文化角度切入的青年會研究不同的是，筆者嘗試借用「跨語際實踐」（translingual practice）的分析框架，探討中國青年會的「三育」話語構成（discursive formation）問題——也就是將「Spirit」、「Mind」和「Body」被翻譯成為「德育」、「智育」、「體育」三詞的經過，置放在近代中國語言翻譯的歷史脈絡下作審視，歷史地重構「三育」話語在現代漢語被建構和紮根的歷程，為了解中國青年會運動的政治化歷程提供一個具體的註腳。

---

4 唐日安在研究福州基督徒時，首先注意到青年會「三育」話語與梁啟超和嚴復的民族主義論說的關係，惟並未作出深入的探討。參Ryan Dunch, *Fuzhou Protestants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hina, 1857-192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71, 122.

5 曾為商務印書館編輯《英華大辭典》的顏惠慶在回憶錄裡說：「回到上海後……帶回來的新知識、新觀念，都是通過英語學到手的，我不知如何用漢語來表達。當時，根本就沒有與這些英語詞彙相對應的中文術語。」顏惠慶著，吳建雍、李寶臣、葉鳳美譯：《顏惠慶自傳——一位民國元老的歷史記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頁44。

## 第一節 觀念與詞彙的緣起

### 一、觀念的揭櫫——嚴復

不少學者指出，嚴復由於受到甲午戰敗的刺激，自 1895 年 2 月開始，接連在天津《直報》上發表了多篇議政文章。<sup>7</sup> 在 3 月發表的〈原強〉一文指出，世界歷史上的強國未嘗沒有遭遇過戰敗的厄運，但只要重新振作精神，不旋踵便可重登強國的地位。他認為甲午戰敗並不是最可悲的事情，教人更悲歎的是，中國在民智、民德及民氣的衰敗景象，最終會使中國遭遇印度、波蘭等國的下場：

所可悲者，民智之已下，民德之已衰，與民氣之已困耳，雖有聖人用事，非數十百年薄海知亡，上下同德，痛刮除而鼓舞之，終不足以有立。而歲月悠悠，四鄰耿耿〔眈眈〕，恐未及有為，而已為印度、波蘭之續。<sup>8</sup>

嚴復認為，中國之所以衰弱不振，不僅由於軍事技術或政治制度的落後，更根本的原因在於國民素質的不濟：「今夫民智已下矣，民德已衰矣，民力已困矣。」<sup>9</sup> 他認為清廷應採取「標本並治」的改革策略以圖自強：

第由是而觀之，則及今而圖自強，非標本並治焉，固不可也。不為其標，則無以救目前之潰敗；不為其本，則雖治

<sup>7</sup> 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42-43; 馬勇：《嚴復學術思想評傳》（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頁54-87。

<sup>8</sup> 嚴復：〈原強〉，王栻主編：《嚴復集》，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9。

<sup>9</sup> 嚴復：〈原強〉，頁13。

細目錄如下：

1. What Knowledge is of Most Worth?
2. Intellectual Education
3. Moral Education
4. Physical Education

《教育論》全書可分為兩部分：第一章處理的是有關課程（curriculum）的問題，而第二章至第四章則是有關教學方法（method）的討論。<sup>15</sup> 從原書的名稱與目錄可以推斷，嚴復所提出的「民智」、「民力」和「民德」，若非譯自《教育論》一書的分題，便是譯自該書的三個主題篇章。

事實上，早在 1882 年，於上海聖約翰書院任教的顏永京便已將斯賓塞爾的《教育論》翻譯成中文，取名《肄業要覽》：

間嘗考悉英國之肄業，在大書院中所誦習者，則重希利尼、羅馬之古時著作，及本國之舊文，皆無當於實用者也。昔咸豐時，有英國名士史本守〔Herbert Spencer〕先生，目擊情形慨然有感，思欲挽救於將來，普之於冊，名曰：《肄業要覽》〔《教育論》〕。今取而讀其書，亦不激不隨；其所論列又確中時弊。凡歐洲法、德、意、俄、荷、丹、恒諸國深知其益，而譯以本文。若美國本係同文，可不必贅其後，肄業之中具有實用，而國家因之，寢昌寢熾臻於富強。恨吾華人曾未之見也。我中土學問之弊，固有不類而類者，雖曰：「以之自鏡，未必盡同。」然於其別弊詢法，亦足餉我無窮，予因暇時譯以成書，以

---

<sup>15</sup> Richard Silberman, "Herbert Spencer on Education - Prophet of False Prophet?", *Journal of Education*, vol. 184, no. 2 (2003), p. 86.

效芻蕘之一得。<sup>16</sup>

不過，《肄業要覽》大概沒有廣泛流傳（或只在教會圈內流傳），<sup>17</sup> 以致後來的人多以為嚴復所譯的《群學肄言》，才是斯賓塞爾最早傳入中國的著作。<sup>18</sup> 我們並不清楚嚴復有沒有讀過顏譯的《肄業要覽》；但與顏永京相同的是，為中國走向富強提供外來參考資源，是他譯介《教育論》的主要動機。

不過，顏、嚴二人在譯介《教育論》時卻採取了截然不同的方式。綜觀《肄業要覽》全書，當可發現顏永京其實只翻譯了《教育論》原著的第一章「What Knowledge is of Most Worth?」。斯賓塞爾在該章裡批評英國的古典主義教學觀，並認為科學（顏譯作「格致」）才是最有價值的知識。顏氏的選擇性翻譯，相信是自強運動時期強調器物、技術層面改革的時代反映。但教嚴復感興趣的，卻是該書所提及的三種教學方法的「名稱」（注意只是名稱）而已。甲午戰敗以後，嚴復將個人的救國關懷讀入

16 顏永京：〈肄業要覽序〉，史本守著，顏永京譯，《肄業要覽》（上海：美華書局，1882），收入求自強齋主人輯：《西政叢書》，卷一（上海：慎記書莊，1897）。有關顏永京的生平，可參W. P. Bentley, [ed.], *Illustrious Chinese Christians: Biographical Sketches* (Cincinnati, OH: Standard Publishing Company, 1906), pp. 47-58；謝洪發：〈顏永京先生事略〉，謝洪發編：《名牧遺徵》（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1915），收入中國宗教歷史文獻集成編纂委員會編纂：《東傳福音》第23冊（合肥：黃山書社，2005），頁17-23（總頁69-71）；徐以驊：〈顏永京與聖公會〉，《近代中國》第10輯（2000年6月），頁193-215。

17 筆者發現該書收錄於一本由中國教育會1907年出版的書目中，其中有簡介提及適合在教會學校任教和從事牧職的中國人閱讀。*Monthly Bulletin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 no. 5 (September 1907), p. 22.

18 「《社會學研究法》一卷Study of Sociology刊於一八七三年（案此書即侯官嚴氏所新譯，題為《群學肄言》言也，今僅譯成其半。斯氏書入中國，以此編為嚆矢。）」該文又說：「中國尋常學者之知先生，不過自十年以來。先生所著書，其由原文直接譯出者，惟《群學肄言》之上半卷，出版後未及半歲而先生逝。」慧：〈大哲斯賓塞略傳〉，《新民叢報》第38-39號合本（1903年10月），頁7、18（總頁101、112）。

(read into) 這部教育學的著述裡，並將該書所提出的三種教學方法，闡釋成「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救國主張；該書的三個主題篇章，亦被大幅度約化為「民智」、「民力」和「民德」三個綱領性的詞彙。從附表二可見，嚴復選用的三詞皆語出經典，且兼採平行、排比的句式，與英語原來的排列頗有異曲同工之妙。不過，三詞在中國語境下的具體內容，卻由《教育論》所指涉的教學方法，搖身一變成為救國方略。

王爾敏認為，嚴復是介紹「德育」、「智育」和「體育」三個觀念到中國的重要譯介者。<sup>19</sup> 但嚴格而言，嚴復並沒有將

附表二 「民智」「民德」「民力」的典故與嚴復的詮釋

《教育論》的說法	嚴復的翻譯	典故出處舉隅	嚴復的詮釋
Intellectual / Intellectual Education	民智 聰明智慮	人的聰明才智。《韓非子·顯學》： 「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謗， 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	引入西學、 改革科舉制度
Moral / Moral Education	民德 德行仁義	民眾的道德。《書·君奭》： 「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 惟其終。」	設議院
Physical / Physical Education	民力 血氣體力	人的體力。《禮記·月令》： 「[季秋之月]寒氣總至，民力不 堪，其皆入室。」	禁鴉片、廢纏 足

資料來源：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編：《漢語大詞典（普及本）》（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0），頁1740-1741；嚴復：〈原強修訂稿〉，頁27-32。

<sup>19</sup> 王爾敏：〈德、智、體、群四育的緣起〉，王爾敏：《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續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頁139-140。顏永京的外孫女曹舒麗安亦說：「……顏永京曾將英儒斯賓塞爾（Herbert Spencer）的名著《教育論》（*Education: Intellectual, Moral, Physical*）譯成中文，刊行問世。使當時興學人士，對於智、德、體三育之意義，有所認識。」曹舒麗安：〈我的外祖父顏永京牧師〉，顏惠慶著，姚崧齡譯：《顏惠慶自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3），頁293。

《教育論》一書裡「Intellectual Education」、「Moral Education」和「Physical Education」三個觀念的內容譯介至中國。他雖然指出「濬智慧、練體力、厲德行」乃是來自斯賓塞爾的著作，但目的大概只是訴諸西方的學術權威而已；對於他的讀者而言，「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大概只能被理解為一種救國主張，而非教育哲學。事實上，嚴復乃是竄改了「Intellectual Education」、「Moral Education」和「Physical Education」三詞的原來意義，改以三個充滿救亡意涵的詞彙作為載體，使其以一種救國主張在中國社會流傳。

從往後的歷史觀之，「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救國主張在近代中國社會產生了極大的政治能量，開啟了二十世紀初年的國民性改造思潮，並由此派生出各種不同的社會改良運動。嗣後在中國社會迭次出現的各種改良運動，雖然規模不一、重點迥異，但仍擺脫不了嚴復所設下的改造議程。<sup>20</sup>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梁啟超後來發表的「新民說」便深受嚴復此說的影響：

今論者於政治、學術、技藝，皆莫不知取人長以補我短矣；而不知民德、民智、民力，實為政治、學術、技藝之大原。不取於此而取於彼，棄其本而摹其末，是何異見他樹之蓊郁，而欲移其枝以接我槁榦；見他井之汨湧，而欲

<sup>20</sup> 晚清小說《轟天雷》(1903)有以下的一段情節：「雲仲問仲玉道：『現在有些少年都講革命，你以為如何？』仲玉道：『吾前日遇見一個侯官〔今福州，嚴復家鄉〕朋友，吾也將這事問他。』他道：『革命何嘗不是堂堂正正的旗，但民智不開，民力不足，民德不修，這三樣沒有，決不能革命。就便僥倖成事，革了這個，還有那個，事情更糟了。革命是先要立定基礎的。』……」藤谷古香(孫景賢)著，董文成、王明琦校點：《轟天雷》(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7)，第14回，頁122。另參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袁洪亮：《人的現代化：中國近代國民性改造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汲其流以實我智源也。故採補所本無以新我民之道，不可不深長思也。<sup>21</sup>

值得追問的是，「Moral Education」、「Intellectual Education」和「Physical Education」三詞後來在中國普遍被翻譯為「德育」、「智育」及「體育」。究竟「民德」、「民智」和「民力」如何過渡至「德育」、「智育」和「體育」？要解答這個問題，必須先由《教育論》被譯介至日本說起。

## 二、詞彙的緣起——日本製造

查「德育」、「智育」和「體育」三詞乃是以日語漢字的型態先在日本誕生。從明治時期（1868-1912）開始，西方文化透過翻譯大量介紹到日本，由於日語本身沒有足以表達這些嶄新觀念的詞彙，遂大量借用了中國漢字鑄造成日語新詞。<sup>22</sup>「德育」、「知（智）育」及「体（體）育」三詞便是其中的典型例子。<sup>23</sup>

明治初期，在文部省的推動下，譯介西方教育理論在日本蔚為風氣。<sup>24</sup>就筆者所見，最早的《教育論》日譯本是尺振八於1880年譯成的《斯氏教育論》。<sup>25</sup>尺振八將原著的書名分題

21 梁啟超：〈釋新民之義〉，收入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2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頁658。另參嚴復：〈與梁啟超書（一）〉，王棧主編：《嚴復集》，第3冊，頁514。

22 實藤惠秀著，譚汝謙、林啟彥合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2），頁199-200。

23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編：《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1），頁46、259、344。

24 參李文英：《模仿、自立與創新：近代日本學習歐美教育研究》（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頁48-49。

25 〈斯氏教育論翻譯緒言〉，斯本色著，尺振八譯：《斯氏教育論》（東京：文部省，1880），扉頁。按本文所引用的日文書籍，皆參考自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明治時代數

Education」、「Physical Education」三章分別譯作「知育」、「德育」、「体育」的第一人。有賀長雄的譯本後來似乎頗受歡迎，至1892年已發行至第四版。<sup>29</sup> 可以推斷，日語「知育」、「德育」和「体育」作為「Intellectual Education」、「Moral Education」和「Physical Education」三詞的對等翻譯，大概在這樣的情況下於明治時期的日本教育界落地生根。

當然不能忽略的是，提倡「智育」、「德育」和「體育」的教育家並不止斯賓塞爾一人；具相同主張的教育思想家，如裴斯泰洛齊（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的著作，在同一時期亦被廣泛譯介至日本，「智育」、「德育」和「體育」的教育思想由是席捲明治教育界。<sup>30</sup> 事實上，二十世紀以前，分別以「智育」、「德育」或「體育」為題的專著亦已迭次在日本面世（見附表三）。

隨著「德育」、「智育」和「體育」三詞愈趨流行，將它們合併並簡稱為「三育」的說法亦在日本出現。早在1880年代末，日本學界便有「三育」的說法。<sup>31</sup> 嗣後以「三育」作為演說主題、歌曲名稱，甚至是教學團體的名稱亦相繼出現。<sup>32</sup> 可

29 有賀長雄譯注：《教育論（斯氏）》，四版（大阪：三木佐助，1892）。

30 李文英：《模仿、自立與創新：近代日本學習歐美教育研究》，頁51-52、124。

31 詳參菊池熊太郎：《道德新論》（東京：金港堂，1888），頁96-97；花房庸夫：《明治女大学》（福岡：磊落堂，1889），頁2；生駒恭人：《普通教育提要》（東京：尚友社，1889），頁4-6。

32 詳參欠手輪楠内：〈三育必ず完備せざるべからず〉，篠田正作（秋野散史）：《子供演說》（大阪：鐘美堂，1891），頁20；奧好義編：《唱歌萃錦（第一）》（東京：中央堂〔ほか〕，1889），頁36-37；三育舎編輯所編：《少年龜鑑》（東京：三育舎，1897）；久津見息忠：《兒童研究》（東京：三育舎，1897）；Friedrich Adolph Wilhelm Diesterweg 著，立柄教俊譯：《教育要義》（東京：三育舎，1899）；久津見息忠：《實地応用小教育学》（東京：三育舎，1899）。

國的古代典籍，<sup>36</sup> 但是將前三者個別與後者結合為「德育」、「智育」和「體育」三詞，開始為人認識並進而較廣泛地應用，卻是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事。<sup>37</sup> 自從甲午戰敗以後，不少中國人均以為日本的勝利，端在於明治改革的奏效，教育普及更是重要的原因；加上中日兩國在文化傳統、政治體制、地理條件等方面深具淵源，遂產生了以日本為師的想法，並通過留學日本、赴日考察、聘用日本教習，以及翻譯日本書籍四種途徑來實現。<sup>38</sup> 「三育」話語正是這個時代背景下，從日本展開中國之旅。

就筆者所見，最早將「德育」、「智育」和「體育」三詞作為教育學術語引入中國，可能是來自清末中國官員赴日考察後撰寫的報告。1898年1月，湖廣總督張之洞最早派遣姚錫光赴日考察學制，姚氏在同年7月發表的文章中便指出：「竊案日本教育之法，大旨蓋分三類：曰體育，曰德育，曰智育。故雖極之育啞，推及女子，亦有體操，重體育也；言倫理，言修身，在德育也；凡諸學科，皆智育也。」<sup>39</sup> 1901年赴日考察的羅振玉在翌年發表的〈日本教育大旨〉一文中亦指出：「今教育家言……又體育與德育知育當並重。」<sup>40</sup> 事實上，稍後出版的教育考察報告，如吳汝綸的《東遊叢錄》（1902）、林炳章的《癸卯東遊日

36 詳參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編：《漢語大詞典（普及本）》（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0），頁225、930、1620、1712。

37 當然，在部分人眼中，中國早在上古時代便有有實無名的「三育」教學內容。「……則是古時雖未標三育之名，而有三育之實。」郭希汾：〈中國體育史序例〉，郭希汾：《中國體育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20），頁1。

38 呂順長：〈前言〉，王寶平主編：《晚清中國人日本考察記集成·教育考察記》，上冊（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頁1。

39 姚錫光輯：〈日本各學校規則（續第六十六冊）〉，《時務報》第67期（1898年7月），頁4504。

40 羅振玉：《扶桑兩月記（附日本教育大旨、學制私議）》，收入王寶平主編：《晚清中國人日本考察記集成·教育考察記》，上冊，頁235。

的是，「三育」話語在二十世紀初年已通過官方教育系統初步進入國人的眼簾。

清廷在厲行學制改革期間，亦從日本聘請數以百計的教習到中國各地的學堂出任教習或顧問，在 1906 年的高峰期，日籍教習人數更高達約五、六百人。<sup>45</sup> 據附表四顯示，1902 年至 1910 年間，先後有 211 名（人次）日本教習在 48 所師範學堂任教，其中 7 人更出任該學堂的總教習。他們的任教年期不一，但足跡卻遍及廣東、福建、江蘇、浙江、山西、山東、陝西、四川、貴州等多個省份。可以推斷，這批日本教習大抵亦曾將風行日本教育界的「三育」理論，不同程度地介紹給中國各地的師範學堂：「本堂學生為三江師範之望，位置既高，關係亦重，學生宜認定宗旨：於智育、體育外，尤重德育……」<sup>46</sup> 不過，有關詳情仍待學者進一步研究。

1896 年，清廷首次派遣學生赴日本留學，往後留日學生人數持續增加，至 1906 年更增至 8,000 人。<sup>47</sup> 據李傑泉的研究指出，速成師範是清末留日學生的熱門選讀科目。<sup>48</sup> 可以推斷，在日學習師範的留學生，對於在日本教育界流行的「三育」理論必定有所涉獵，甚至受其影響頗深。他們在返國後，將東渡所學透過教育實踐回饋祖國，亦屬順理成章。1901 年，上海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前身）的師範生陳懋治、杜嗣程和沈慶鴻等人編寫的

---

45 實藤惠秀著，譚汝謙、林啟彥合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頁44。

46 〈附錄一：三江師範學堂章程（1904）〉，蘇雲峰：《三（兩）江師範學堂：南京大學的前身（1903-1911）》（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166。

47 實藤惠秀著，譚汝謙、林啟彥合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頁1；周谷平：《近代西方教育理論在中國的傳播》（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頁11-17。

48 李傑泉：〈清末的師範教育（1897-1911年）〉（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哲學博士論文，1997），未刊稿，頁147-149。

《蒙學課本》新訂本，<sup>49</sup> 其中的編輯大意云：

泰西教育之學，其旨萬端，而以德育、智育、體育為三大綱。德育者，修身之事也；智育者，致知格物之事也；體育者，衛生之事也；蒙養之道，於斯為備。是編故事六十課，屬德育者三十、屬智育者十五、屬體育者十五。<sup>50</sup>

查當時「德育」、「智育」和「體育」三詞在中國尚未普及，他們應用「德育」、「智育」和「體育」三詞，大抵反映了他們受到日本教育界的「三育」理論所影響，並嘗試應用到南洋公學的教育實踐裡。<sup>51</sup>

另一個更明顯的例子發生在湖南師範學校。1904年12月，《新民叢報》刊登了一篇來自湖南師範學校的教學講義，其中有「寄者附語」云：

前速成師範畢業生十人，歸而謀振起教育思想，師範為教

49 根據最新的考證研究指出，《蒙學課本》實有兩個版本：編寫本（1897）和新訂本（1901），很多教育史資料集和論著均受蔣維喬的記述影響，將新訂本誤作編寫本。詳參〈南洋公學蒙學課本四件〉，宋原放主編：《中國出版史料·近代部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頁522-528。另參蔣維喬：〈編輯小學教科書之回憶（1897-1905年）〉，陳學恂主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教學參考資料》，上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頁647。

50 南洋公學：〈蒙學讀本二編編輯大意〉，陳學恂主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教學參考資料》，上冊，頁661-662。

51 目前至少可以肯定沈慶鴻一人曾留學日本，不過具體時間不詳。周浩泉於1909年入讀南洋公學，他回憶說：「最嚴的老師要算沈叔遠（名慶鴻）……所有同學對他格外害怕，背地裡有的叫他『閻羅王』，也有的叫他『東洋叫化子』（因他留學過日本，長於唱歌，曾用沈心工名字出版幾本唱歌書，內容採取日本調子，譜上中國字句）。」又說：「沈叔遠對小學的『教育惟嚴』政策是有思想基礎的。他不但採用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小學教育制度……」周浩泉：〈回憶南洋公學十二年〉，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華文史資料文庫》，第17卷（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頁169。

育之先導，遂於湘省設五校，中路為長沙府所建之師範學校。日人江口氏，教育學之講師也，其講議言言皆有來歷，句句皆可動人，皆就中國利害而言，議論確實非空論可比，茲由該校生徒某某君等聽講時筆記者，文字之工拙非所計也，因無刻本，故寄登諸貴報，以供眾覽焉。<sup>52</sup>

而在該份「講議」中便有如下的內容：「教育學，分體育、智育、德育三種。體育善而後身體強，智育善而後思想高，德育善而後品性正，三者俱備，教育全矣。」<sup>53</sup>

在二十世紀初年的中國學堂裡，「德育」、「智育」和「體育」作為教育學術語大概有萌起之勢。據 1903 年所做的一個有關上海學堂的調查顯示，上海強恕（原文作強恕公學，疑誤）公學的辦學宗旨為：「擴蒙養始基，立致用大本，斟酌近世智育、德育、體育之旨，以因材施教。」<sup>54</sup> 蔣夢麟於 1904 年考入南洋公學，他憶述：「包括德、智、體三要素的斯賓塞爾教育原則，這時已經介紹到中國。」<sup>55</sup>

在同一期間，留日學生亦以個人或團體形式大量翻譯日本書籍，致力向國人介紹西方文化。<sup>56</sup> 大約自 1903 年開始，介紹「德育」、「智育」和「體育」的譯著漸次面世，如該年上海廣智書局出版了久保田貞則所著的《德育及體育》。<sup>57</sup> 同年，泰

52 江口辰太郎講演：〈教育學汎論〉，《新民叢報》第58號（1904年12月），頁1（總頁51）。

53 江口辰太郎講演：〈教育學汎論〉，頁4（總頁54）。另有一個例子，可參〈教育論〉、張錕口譯，楊度筆述：〈華族女學校學監下田歌子論興中國女學事〉，皆收《游學譯編》，第1冊（1902年12月），頁1-13（總頁29-41）。

54 〈上海學堂一般〉，《江蘇》第3期（1903年6月），頁160（總頁590）。

55 蔣夢麟著，傅佩榮導讀：《西潮》，第7版（臺北：業強出版社，1991），頁67。

56 詳參實藤惠秀著，譚汝謙、林啟彥合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頁135-170。

57 譚汝謙主編：《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頁300。

者並施，毋或編廢，則民生自優，國勢自強；反是則未有不衰弱者也。<sup>62</sup>

1903年6月，前述介紹泰岱源所輯《體育學》的廣告說：「今日世界文明教育分德育、知育、體育三大綱，而吾國救時之要，尤以體育為急。……凡有志強種保國者，不可不家置一編也。」<sup>63</sup>可見教育理論的價值是由「強種保國」來衡量。廣告作者更認為，從「救時」的角度看，發展「體育」最為迫切。可以說，不論從思想淵源或傳遞過程看，在二十世紀初年輸入中國的「三育」話語，基本上在教育救國論的框架下被理解和譯介至中國，根本無法豁免於國家主義色彩。

順帶一提，「三育」一詞亦在同一時期開始在中國流傳。1903年，〈奉化教育研究會開會簡章〉云：「德智力三育，學堂本應具備……」<sup>64</sup>辛亥革命以後更日趨流行：「查學校教育，系為兼有德智體三育而言，考試僅足以觀人之智識，德育、體育弗能及也。」<sup>65</sup>周世昌在1916年亦指出：「德智體三育為目今教育界之三大綱。」<sup>66</sup>此外，不少團體亦樂於冠以「三育」之名作為名稱，以收宣傳之效。1913年，美國復臨安息日會便將在河南周家口興辦的學校改名為「三育學校」。<sup>67</sup>1916年12月，上海青年會幹事彭少雲、謝強公等十餘人，甚至以「三育」為

62 〈興醫學論(通)〉，《湖北學生界》第2期(1903年2月)，頁61(總頁235)。

63 〈國學社已刊書目廣告(廣告)〉，《江蘇》第4期(1903年6月)，缺頁碼(總頁629-630)。

64 〈奉化教育研究會開會簡章〉，《浙江潮》第10期(1903年12月)，頁8(總頁132)。

65 〈教育部不朽之盛業—不刊之文章〉，《庸言》第2卷第3號(1914年3月)，頁6(總頁4672)。

66 周世昌：〈三育論〉，《上海青年》第15卷第25號(1916年7月7日)，頁2。

67 顧明遠主編：《教育大辭典》，增訂合編本，下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頁1313。

名，發起成立專售學校用品的「三育公司」。<sup>68</sup> 1923年，上海聖方濟學院畢業生程貽澤創辦三育足球會，翌年易名為三育體育會。<sup>69</sup> 誠如郭希汾所言：「自歐風東漸，智德體三育之說並重，喧騰一時。」<sup>70</sup>

## 二、梁啟超的述介

不能不提的是，梁啟超在傳播「三育」話語所發揮的催化作用。在梁啟超的著作裡，「德育」、「智育」、「體育」和「三育」等詞，基本上從未作為關鍵詞（如「新民」）而佔有顯赫地位；<sup>71</sup> 但是在他的著述裡，「德育」、「智育」和「體育」三詞的出現頻率卻是前所未有。單以「新民說」為題的系列文章所作的統計顯示，「德育」、「智育」和「體育」三詞一共出現了29次（「德育」17次；「智育」7次；「體育」5次）。<sup>72</sup> 這與同期或以前相對零星的譯介或引用，無論從「量」（出現頻率）或「質」（影響力）的角度看，均不可以道里計。

早在1899年1月，梁啟超在流亡日本初期創辦的《清議報》上，發表了〈政變原因答客難〉一文，並首次使用了「德育」一詞：

68 〈三育公司之發起〉，《民國日報》，1916年12月8日，第3張，第11版。

69 薛理勇主編：《上海掌故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頁338。

70 郭希汾：〈中國體育史序例〉，頁1。

71 唯一的例外是，梁啟超於1906年3月至1907年1月間，在《廣益叢報》上連載以〈德育鑑〉為題的系列文章。參梁啟超：〈德育鑑〉，收入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3冊，頁1487-1536。

72 參梁啟超：〈新民說〉，收入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2冊，頁655-735。有關統計還未包括「新民說」以外的其他例子，參如：「孔子實於將來世界德育之林，占一最重要之位置，此吾所敢豫言也。」〈保教非所以尊孔論（1902年）〉，收入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2冊，頁769。



……且也學堂之中，不事德育，不講愛國，故堂中生徒，但染歐西下等人之惡風，不復知有本國，賢者則為洋傭以求衣食，不肖者且為漢奸以傾國基，如是則有學堂反不如無學堂。<sup>73</sup>〔底線為筆者所加，以下同。〕

可見梁啟超抵日不久，亦受到教育界的「三育」話語所影響，並旋即借用了「德育」這個趨時的教育術語入文。從該文的上下文可見，「德育」的意思基本上等同漢語的「道德」一詞，梁氏只不過換上一個時髦的新名詞而已。迨至 1902 年 2 月，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一篇有關教育宗旨的文章談到「英國之學校特注重於德育、體育，而智育居其末……」，<sup>74</sup>可見梁氏在日本伏櫪數年以後，對「三育」話語似乎已有進一步的認識。

事實上，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發刊辭已指出：

本報取大學新民之義，以為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中國所以不振，由於國民公德缺乏，智慧不開，故本報專對此病而藥治之，務採合中西道德以為德育之方針，廣羅政學理論，以為智育之原本。<sup>75</sup>

由此可見，梁啟超對於「德育」一詞的理解已經有所擴充，進一步從國家的高度提出有關「公德」的說法。他將「德育」分為「公德」和「私德」兩個層面：「公德者，私德之推也。知私德而不知公德，所缺者只在一推；蔑私德而謬托公德，則並所以推之具而

73 梁啟超：〈政變原因答客難〉，收入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1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頁220。

74 中國之新民：〈論教育當定宗旨（未完）〉，《新民叢報》第1號（1902年2月），頁1（總頁61）。

75 引自丁文江、趙豐田合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頁271-272。

不存也。故養成私德，而德直之事思過半焉矣。」<sup>76</sup> 他認為中國歷來只重「私德」，並未管窺「德育」的全貌：「要之，吾中國數千年來，束身寡過主義，實為德直之中心點。」<sup>77</sup> 梁氏的看法當然很可能是受到明治時期的公民教育思潮所影響，但事實上，在嚴復的文章裡早有這樣的看法，梁氏大概不可能不知。<sup>78</sup>

梁啟超認為傳統的儒家思想，在改良「德育」方面所發揮的作用有限，必須揉合西方的道德學說才能臻於完善：「吾固知言德直者，終不可不求泰西新道德以相補助。」<sup>79</sup> 他指出「德育」與國家的富強存在密不可分的關係，西方國家對於德育的重視便是明證：

昔吾常謂景教為泰西德育之原泉，其作用何在？曰：在祈禱。祈禱者，非希福之謂也！晨起而祈焉，晝餐而祈焉，夕寢而祈焉，來復乃合稠眾而祈焉。其祈也，則必收視返聽，清其心以對越於神明，又必舉其本日中所行之事，所發之念，而一一紬繹之。其在平時，容或厭然，捨其不善而著其善。其在祈禱之頃，則以為全知全能之上帝，無所售其欺也。故正直純潔之思想，不期而自來。於涵養、省察、克治三者之功，皆最有助力。此則普通之慎獨法也。日日如是，則個人之德漸進；人人如是，則社會之德漸進。所謂泰西文明之精神者，在是而已。<sup>80</sup>

76 梁啟超：〈論私德〉，收入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2冊，頁714。

77 梁啟超：〈論公德〉，收入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2冊，頁661。

78 嚴復在談及「民德」時說：「是故居今之日，欲進吾民之德，於以同力合志，聯一氣而禦外仇，則非有道焉使各私中國不可也。顧處士曰：『民不能無私也，聖人之制治也，在合天下之私以為公。』」嚴復：〈原強修訂稿〉，頁31。

79 梁啟超：〈論私德〉，頁720。

80 梁啟超：〈論私德〉，頁724。

這種強調宗教與西方人德行之間的因果關係，與嚴復的說法亦無二致。<sup>81</sup>

梁啟超同時指出，中國的衰弱不振，除了由於「公德缺乏」外，亦與「智慧不開」有關，他認為解決之道是「廣羅政學理論，以為智育之原本」。可見「智育」在這裡的意思是泛指吸納廣義的西方文化，這既與前人提出的變法主張相同，亦與嚴復的「講西學」以開民智的說法同出一轍。梁氏或許以為時人在「智育」方面已有不少討論，故毋須多費唇舌；他較關心的倒是「德育」與「智育」兩者間的關係。他在〈論公德〉一文指出：「苟不及今急急斟酌古今中外，發明一種新道德者而提倡之，吾恐今後智育愈盛，則德育愈衰，泰西物質文明盡輸入中國，而四萬萬人且相率而為禽獸也。」<sup>82</sup> 他認為中國在引入西學的同時，亟需注重「德育」日趨敗壞的問題，否則中國人只會淪為物質文明下的禽獸。

梁啟超的擔憂其實亦不無道理，他認為目下提倡「德育」的人很多，可是並沒有帶來明顯的成效。究其原因，乃是由於「德育」被視為一門學科，置放於「智育」的框架下審視，於修養道德毫無裨益：

竊嘗觀近今新學界中，其斷斷然提絜德育論者，未始無人，然效卒不睹者，無他焉。彼所謂德育，蓋始終不離乎智育之範圍也。夫其獯祭遍於汗牛充棟之宋元、明儒學案，耳食餒乎入主出奴之英法德倫理學史，博則博矣，而

81 嚴復：〈原強修訂稿〉，頁30；W. W. Lockwood to John R. Mott, 30 January, 1906, pp. 2-3.

82 梁啟超：〈論公德〉，頁662。

於德何與也？……夫吾固非謂此等學說之不必研究也，顧吾學之也，只當視之為一科學，如學理化，學工程，學法律，學生計，以是為增益吾智之一端而已。若曰德育而在是也，則所謂聞人談食，終不能飽。所謂貧子說金，無有是處。率斯道也以往，豈惟今日，吾恐更閱數十年百年，而效之不可睹如故也。嗚呼！泰西之民，其智與德之進步，為正比例，泰東之民，其智與德之進步，為反比例。今日中國之現象，其月暈礎潤之幾既動矣，若是乎，則智育將為德育之蠹。而名德育而實智育者，益且為德育之障也。以智育蠹德育，而天下將病智育，以「智育的德育」障德育，而天下將並病德育。此寧細故耶？<sup>83</sup>

梁氏總結說：「有志救世者，於德育之界說，不可不深長思矣！」<sup>84</sup>可見梁啟超提倡重新界定「德育」範圍，並認為德育與一國興亡關係密不可分。

梁啟超應用「體育」一詞，主要在〈論尚武〉的文章裡，其與救國的關係更是昭然若揭。他引述了古代的斯巴達和現今的日本作例子，說明兩國重視國民的「體育」鍛鍊，是她們能從小國一躍成為地區霸主的重要原因：

而獨不見斯巴達乎？斯巴達之教育，一干涉嚴酷之軍人教育也。嬰兒之生，必由官驗其體格，不及格者，撲滅之。生及七歲，即使入幼年軍隊，教以體育，跣足裸體，惡衣菲食，以養成其任受勞苦凌犯寒暑忍耐飢渴之習慣。……彼斯巴達一彈丸之國耳，舉國民族，寥寥不及萬人，顧乃

83 梁啟超：〈論私德〉，頁722。

84 梁啟超：〈論私德〉，頁722。

能內制數十萬之異族，外挫十餘萬之波軍，雄霸希臘，與雅典狎主齊盟也。曰：惟尚武故。<sup>85</sup>

近且汲汲於體育之事，務使國民皆具軍人之本領，皆蓄軍人之精神。彼日本區區三島，興立僅三十年耳，顧乃能一戰勝我，取威定霸，屹然雄立於東洋之上也。曰：惟尚武故。<sup>86</sup>

「體育」一詞在這裡的意思均是指兩國所實行的兵式操練，以及隨之而來的尚武精神。他更指出歐洲諸國的強大莫不得益於「體育」：

德皇威廉第二之視學於柏林小學校，其敕訓曰：「凡我德國臣民，皆當留意體育。苟體育不講，則男子不能擔負兵役，女子不能孕產魁梧雄偉之嬰兒。人種不強，國將何賴？」故歐洲諸國，靡不汲汲從事於體育，體操而外，凡擊劍、馳馬、踰躅、角觝、習射、擊鎗、游泳、競渡諸戲，無不加意獎勵，務使舉國之人，皆具軍國民之資格。昔僅一斯巴達者，今且舉歐洲而為斯巴達矣。<sup>87</sup>

在梁啟超的筆下，「體育」一詞被理解為當時德、日兩國的兵式操練，與一國的強弱關係密切，「體育」與國家的尚武精神更是劃上等號。

從上述的分析可見，「德育」、「智育」和「體育」三詞在「新民說」裡，基本上不帶任何教育色彩，卻隱約可見嚴復所謂

85 梁啟超：〈論尚武〉，收入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2冊，頁709。

86 梁啟超：〈論尚武〉，頁709。

87 梁啟超：〈論尚武〉，頁713。

「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影子（特別是前二者）。梁啟超同樣從國家的高度來演繹「德育」、「智育」和「體育」三詞，無疑為三詞多披上一重政治外衣。

如所周知，無論是梁啟超的「新民說」或《新民叢報》，均對二十世紀初的中國知識分子產生深遠影響。<sup>88</sup> 據周佳榮的研究，《新民叢報》於1902年創辦伊始，在中國的銷售處已多達97個，並遍及49個縣市。他以該報首年銷量9,000份，估計實際讀者為銷量的二十倍，推斷該報早期的讀者人數高達18萬人，高峰期更逾20萬人，而這個數字還未包括各地近十種的翻刻本。<sup>89</sup> 梁氏除了對思想界深具影響外，同樣不能忽視的是，他對普及近代漢語新詞的貢獻。誠如蔣英豪所說：

梁啟超三個報刊出版的那十二年〔《時務報》（1896-1898）、《清議報》（1898-1901）、《新民叢報》（1902-1907）〕，是近代漢語新詞出現最頻密的一段時期。由於梁啟超出於政治考慮的設計和努力，配合他非凡的宣傳技巧，透過他所辦的有巨大影響力的報刊，大量使用從日文借用的新詞，也使許多新詞在漢語中固定下來；這個歷史階段出現的新詞，不但數量多，使用頻率極高，在社會上也得到廣泛的接受……<sup>90</sup>

88 周佳榮：〈《新民叢報》與中國新知識分子的形成〉，周佳榮：《言論界之驕子：梁啟超與新民叢報》（香港：中華書局，2005），頁51-56。

89 周佳榮：〈《新民叢報》與中國新知識分子的形成〉，頁10-14。

90 蔣英豪：〈梁啟超與近代漢語新詞〉，《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44期（2004），頁402。另參李運博：《中日近代辭彙的交流：梁啟超的作用與影響（日文版）》（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1915年，留日學生彭文祖在《盲人瞎馬之新名詞》一書說：「『取締』二字之見用，由於吾國現號稱為大文豪之梁啟超也。梁之文章中，新名詞故多不可數，以《新民叢報》為嚆矢，是其建功於國之第一階也，國人不可不佩服而宗仰者也。」引自實藤惠秀著，譚汝謙、林啟彥合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頁14。

筆者相信，梁啟超在推廣「德育」、「智育」和「體育」三詞在中國流傳方面的貢獻，一如同期他所使用的其他新名詞一般，透過他在思想界的影響力，特別是在 1902 至 1903 年間所發表的「新民說」，以及《新民叢報》的廣泛流傳，從而使它們為當時的知識分子所知曉，甚至加以模仿應用。<sup>91</sup>

### 三、「三育」話語的認識

二十世紀初年，「德育」、「智育」和「體育」三詞雖然在中國社會已愈益普及，但時人對「三育」並重的觀念仍沒有深入的認識。早在十九世紀末，「三育」理論傳入日本不久，熟諳中國文化的日本學者便已用西方的教育理論框架審視中國的教育狀況。西村茂樹在一篇以漢語書寫的序言中指出，中國歷來只有「德育」和「智育」而缺乏「體育」，可謂三分得其二：「知行兩全，支那人既言之矣。至於強體之教，未嘗言之也。然則支那之教育，得三分之二，西國之教育，得三分之三矣。」<sup>92</sup>及至二十世紀初，「三育」話語傳入中國以後，不少中國知識分子亦持相同的看法：「今觀吾國之所亟亟者，皆在於智育，次則德育耳，至體育則尚未問津也，是何異鑄鼎而缺其一足，冀其自立，豈可得乎？」<sup>93</sup> 陳獨秀在 1904 年亦說：

91 《新石頭記》(1908)有這樣的一段情節：老少年道：「那另有個道理。我們重的是德育，就德育而論，只有公德是男女一樣的。至於私德，女子與男子就有點不同了。所以讀的書，男女都不同，何況將來的專門學，又與男子迥別的呢？」吳趼人：《新石頭記》，收海風主編：《吳趼人全集》，第6卷（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第36回，頁289。文中將「德育」分為「公德」與「私德」兩個層面，便明顯受到「新民說」的影響。有關吳、梁二人相過從的經過，可參夏曉虹：〈吳趼人與梁啟超關係鉤沉〉，《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30卷第6期（2002年11月），頁636-640。

92 西村茂樹：〈教育學序〉，伊沢修二：《教育學》（東京：丸善商社，1883），頁1。另參西周：〈教育學序〉，伊沢修二：《教育學》，頁1。

93 〈興醫學論（通）〉，《湖北學生界》第2期（1903年2月），頁62（總頁236）。「要之三育

強壯而後學問道德之進修勇而收效遠。於吾人研究之中，宜視為重要之部。「學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之謂也。<sup>96</sup>

可見，不少中國知識分子均認為，「體育」在過去一直備受忽視，以致造成今日國力落後於人的困境；中國要與西方列強看齊，便必須加倍推廣「體育」，始能迎頭趕上。

與此同時，在部分人眼中，「德育」在教育方面的重要性亦不能忽視，黃炎培在 1909 年的一次演講中說：

夫校設諸科者，於智育一方面者太半，學程立之於前，考試督之於後，知識上殆弗慮無進步。所難者德育及體操耳。而斯二者，適佔道德教育、國民教育之重要部分，又為垂亡之國之救急要藥，匪可忽也。<sup>97</sup>

黃氏以為在當時的學校課程裡，主要以「智育」內容為主，令人擔憂的是，對於國家前途同樣重要的「德育」和「體操」似乎備受忽略。《黃繡球》裡有一段非常相近的情節：

黃通理嘆了口氣說：「這些話我不等畢大嫂子說，我就聽見得不少，看見的也多。從前外間的風氣怕的是不開。如今一年一年的，風氣是開了，卻開的亂七八糟，在那體育德育上，很有缺點……」<sup>98</sup>

96 毛澤東：《體育之研究》（北京：人民體育出版社，1979），頁3-4。

97 黃炎培：〈體育大會之趣旨〉，田正平、李笑賢編：《黃炎培教育論著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頁3。

98 顧瑛：《黃繡球》（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第10回，頁72。《黃繡球》自1905年3月起於《新小說》連載，1907年由新小說社發行單行本。



則。<sup>105</sup>

嗣後，「德育」、「智育」、「體育」三詞持續曝光。例如1905年4月，《會務紀聞》報導上海青年會的情況說：「至於德育、智育、體育尤見進步云。」<sup>106</sup>同年9月，另一則報導亦說：

本會會務近已蒸蒸日上，大有一日千里之概。近更值此開會之期，一切均已預備，如文藝、交遊、智育、體育、德育，各公董均講求有素，以便即日施行。<sup>107</sup>

可見「德育」、「智育」和「體育」作為「Spirit」、「Mind」和「Body」三字的對等翻譯，於此業已在中國青年會的官方翻譯中固定下來。

迨至1909年，「德育」、「智育」、「體育」三詞，更開始被青年會簡稱為「三育」，成為一個綱領性的詞彙、公諸社會大眾的標語。是年12月，上海青年會提及該會的宗旨時說：「基督教青年會為青年之薈萃部，其宗旨以德、智、體三育為培植青年唯一之方法。」<sup>108</sup>雖然中國傳統固有「四維」、「八

105 〈路君講義〉，《會務紀聞》第2冊第16號（1904年6月10日），頁2。「青年會初立於英國，純屬宗教的運動，久且漲及社會之領域……移植美國之後，乃兼有四重之性質，即物質的、社會的、心的、靈的四方面是也，此四方面者，皆在基督之靈感，而得完滿之發達，其他諸國，因皆則而倣之。」亦青：〈世界青年會事業之發展（上）〉，《青年》第11卷第4號（1908年5月），頁65。

106 〈報抄大會〉，《會務紀聞》第3冊第8號（1905年4月14日），頁2。

107 〈駿圖將啟〉，《會務紀聞》第3冊第21號（1905年9月15日），頁1。

108 〈青年會之宗旨〉，《會務雜誌》第7期第35號（1909年12月10日），頁2。「〔上海女青年會〕其宗旨專於青年女界上，講求德、智、體三育，與本會之宗旨無殊。」〈女青年會成立〉，《會務雜誌》第7期第30號（1909年11月5日），頁2。

德」等道德、倫理的說法，但青年會有關「三育」的說法，如上文所述，大抵同樣是從日本借用而來。

在這裡擬重提本文開首的問題，「德育」、「智育」、「體育」何以等同於「Spirit」、「Mind」和「Body」？1903年出版的《商務書館華英音韻字典集成》對「Spirit」、「Mind」和「Body」三詞有如下的譯法：<sup>109</sup>

英文	漢譯
Body	身、體、肉身、形體
Mind	心、衷
Spirit	神、靈

可見，單純從語言翻譯的角度來看，青年會早期以「身」、「心」、「靈」作為「Body」、「Mind」和「Spirit」三詞的對等譯名，大抵繼承了十九世紀以來的翻譯傳統（另見附表一），亦明顯較「德育」、「智育」和「體育」三詞翻譯得更為準確。上海青年會在1915年全年報告裡亦說：「然欲培養完全人格，非注重三育不可，三育者何？心、靈、體是也。而其相當之社交工夫亦宜顧及之。」<sup>110</sup> 因此之故，以「德育」、「智育」、「體育」作為青年會宗旨的官方譯名，肯定不是語言翻譯的自然結果。

109 羅存德(William Lobscheid)原著，企英譯書館增訂：《商務書館華英音韻字典集成》，第9版(上海：商務印書館，1910)，頁179、1064、1514。

110 〈甲寅全年報告〉，《上海青年》第14卷第11期(1915年3月19日)，頁1。「青年會幹事多方翼助之，為謀心、身、靈三者之幸福。」〈赤三角旗無遠弗屆〉，《青年》第22冊(1919年4月)，頁95。

用「德育」、「智育」和「體育」三詞，除了反映後者日趨流行，他亦不能免俗外；<sup>116</sup> 值得注意的是，詞彙雖被嚴復換掉，但文章背後的思路與他早期的救亡思想，基本上並無二致。

《新石頭記》裡有以下一段有關政體討論的情節：

寶玉道：「原來專制政體，也有這樣好處。」老少年道：「又不能一概而論。那沒有德育的國度，暴官汙吏，佈滿國中，卻非爭立憲不可。」寶玉歎道：「沒有德育就難說了，就是立了憲，還不上富家政體，不過個惡紳政體罷了。」<sup>117</sup>

引文論及「德育」於一國政體的重要意義（並非作為教育內容的重要性），便充分流露了嚴復「民德」說的痕跡，這裡只不過將「民德」換上較時髦的「德育」罷了。陳獨秀後來亦說：「現今歐美各國之教育，罔不智德力三者並重而不偏倚，此共同之原理也。」<sup>118</sup> 可見「民智」、「民德」、「民力」與「智育」、「德育」和「體育」兩組詞彙之間的界線存在一定的模糊性。要是曾讀過《教育論》原著的嚴復，仍傾向從教育救國論的角度理解和詮釋「德育」、「智育」和「體育」三詞，則時人的情況大

116 徐彬在1929年撰文說道：「日本譯自西洋之科學名詞及其他學藝之術語。如『經濟』、『倫理』、『哲學』之類，皆為梁氏用入己文，此類譯名，即隨梁氏之文勢而普習於中國。嚴幾道氏（嚴復）雖亟自立，創譯『計學』、『名學』、『愛智學』，然至今仍以不甚通透之日本譯名最為通行，梁文有力焉。」彬彬（徐彬）：〈梁啟超〉，收入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增訂本）》（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17-18。黃克武在一篇文章中對此問題有很好的綜論，詳參黃克武：〈新名詞之戰：清末嚴復譯語與和製漢語的競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2期（2008年12月），頁1-42。

117 吳趸人：《新石頭記》，第26回，頁208-209。

118 陳獨秀：〈今日之教育方針（1915）〉，陳學恂編：《中國近代教育文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頁395。

概亦可想而知。

「三育」話語愈益政治化的另一個原因，可能與《教育論》中譯本未曾出版有關。如上文所述，顏永京早期所譯的《肄業要覽》只為節譯本。究竟《教育論》於何時全面譯介至中國？據1900年12月出版的《譯書彙編》書末〈已譯待刊各書目錄〉所示，該社已將斯賓塞爾的《教育論》等十餘部西方著作譯出，並行將出版；<sup>119</sup>但至翌年8月，該書仍然列於待刊欄內。<sup>120</sup>事實上，這個書目已刊印近一年，已有多名讀者來函垂詢各書的出版日期。<sup>121</sup>由於史料佚失的緣故，該社曾否將《教育論》中譯本連載刊出，或是最終以單行本發行，我們至今仍不清楚知悉。<sup>122</sup>

據可考的資料顯示，斯賓塞爾的《教育論》中譯本，最早要到1923年才由上海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譯者在該書的序言說：

斯氏諸論，意在鍼砭當時西方教育之積病，故辭多猛恣，不稍迴護。今其言已入於成功者之序矣，而吾國之中病，則與半世紀前之西方相若，乃以語言之隔，使吾教育界，不得親炙此名論而受其攻錯，寧非恨事？<sup>123</sup>

119 〈已譯待刊各書目錄〉，《譯書彙編》第1期（1900年12月），頁103。

120 〈已譯待刊各書目錄〉，《譯書彙編》第8期（1901年8月），頁325。

121 〈簡啟〉，《譯書彙編》第7期（1901年7月），頁220。

122 「英國碩儒斯賓塞，其哲學之理論，已稍稍傳播於東大陸；而其關於教育上之卓識精議，猶未發現。」吳治恭：〈泰西教育家語錄一：斯賓塞語錄〉，《江蘇》第1期（1903年4月），頁39（總頁51）。譚汝謙所整理的近代中譯日書目錄並沒有《教育論》一書的條目。參譚汝謙主編：《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頁274-303。

123 任鴻雋：〈譯者序〉，斯賓塞爾（Herbert Spencer）著，任鴻雋譯：《教育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頁1。

若上述的說法正確，晚至二十年代初，《教育論》中譯本仍未於中土面世。斯賓塞爾的「三育」思想，雖早在二十世紀初已在中國流傳，但是《教育論》中譯本卻到新文化運動以後才正式面世，難免予讀者過時的印象，以致譯者在序言裡為可能引來的質疑作出解說。<sup>124</sup> 值得注意的是，這部譯本只譯出原著的第一章及第二章，有關「德育」和「體育」兩章仍付諸闕如。<sup>125</sup> 這部遲來的《教育論》中譯本似乎頗受讀者歡迎，後來多次再版，但均未對該書內容作出增譯。<sup>126</sup>

在二十世紀初年，曾閱讀過斯賓塞爾原著的相信只限顏永京、嚴復等少數人，時人大多是從當時的評論家輾轉認識「三育」話語，能夠真正從教育角度理解「三育」理念的人大抵不會太多。傅任敢在三十年代嘗言：

我們的教育學的課程裡面，西洋教育思想或哲學史是一門重要的科目，可是學教育的人有幾個看到過人家的經典的原作？我自己近來的一些經驗就可以證明這一點。為要得譯裴泰洛齊的《賢伉儷》，找遍北平，就只有燕大一本；

124 「讀者有疑原出版已久，無與近代思潮之事者，則請注意下列諸點……」任鴻雋：〈譯者序〉，頁1。

125 有趣的是，在教育學者的眼中，沒有譯出的兩章才是斯著最具原創性的部分。參 Frank P. Graves, *Great Educators of Three Centuries: Their Work and Its Influence on Modern Education*, pp. 282-283。而這種看法亦見諸1925年出版的中譯本：「最新穎而具創造力的要算他關於德育與智育的兩篇。」參格萊夫斯 (Frank P. Graves) 著，莊澤宣譯：《近三世紀西洋大教育家》（上海：商務印書館，1925），頁179。

126 參斯賓塞爾 (Herbert Spencer) 著，任鴻雋譯：《教育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再版；1933再版；1939再版）。晚至1968年，由臺灣商務印書館重印的版本亦無例外，參斯賓塞爾著，任鴻雋譯：《教育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教育論》的全文譯本，晚至六十年代才正式面世。參赫斯賓塞著，胡毅譯：《教育論：智育、德育和體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

育意涵，卻似乎一直並未真箇廣為人所理解。

事實上，在新名詞的了解和應用之間存在嚴重落差，當時屢見不鮮。時人對於眼花撩亂的新名詞，多只限於表面的認識，對其內容缺乏真箇的理解：「自新名詞輸入中國，學者不明其界說，僅據其名詞之外延，不復察其名詞之內容……」<sup>130</sup> 這樣的情況同樣適用於時人對「三育」話語的理解之上。1904年，天津《大公報》刊登了〈婦女纏足於德育智育體育全有妨害〉一文，除了標題以外，內文只有「美德」、「智慧」的說法，完全沒出現「德育」、「智育」和「體育」三詞，大有賣弄新名詞、趕時髦的嫌疑；其次，從題目可見，作者硬將纏足瞎扯到「德育」、「智育」和「體育」的討論，內文除了提及纏足有礙女子上學外，基本上與教育方面毫不相干。<sup>131</sup> 可以想見的是，嚴復、梁啟超等評論家對「德育」、「智育」和「體育」所做的詮釋，對時人的確有不容低估的影響力。

吳蘊瑞回首近代國人對於「體育」一詞的理解時，大有「不堪回首」的慨歎：

甲午戰後，庚子辛丑，頻年受辱，上下痛心。辛亥革命，國恥未雪，全國人士，狃於尚武國之說，即以練兵式體操

130 漢（劉師培）：〈論新名詞輸入與民德墮落之關係〉，《申報》，1906年12月13日。引自劉師培著，萬任國輯校：《劉申叔遺書補遺》，上冊（揚州：廣陵書社，2008），頁457。茲多舉一例：「自由之說倡於歐西，為極文明之名詞，中國則因是而誤會者甚多，而自由之說，遂為世所詬病，幾以自由為忠孝等事之反對……」〈箴言〉，《會務雜誌》第6期第33號（1908年12月25日），頁1。

131 〈婦女纏足於德育智育體育全有妨害〉，《大公報（天津版）》，1904年10月30日、11月2日及5日。迨至1910年代，在《新青年》仍可看到這種說法：「查早婚之弊……必至德智體三育，一無增進，人種薄弱，至不可思議之點為止。」程宗泗：〈北京清華學校參觀記〉，《新青年》第2卷第3號（1916年11月），頁3。

1904年5月，傳教士林樂知（Young J. Allen）在《萬國公報》上發表了〈新名詞辨惑〉一文，批評反對應用新名詞的士大夫思想陳腐：

由是以譯，中國今日，於譯書之中，苦名詞之枯窘，而借日本所已譯者用之，正如英文偕德文法文之比例；且日本之文，原祖中國，其譯書則先於中國，彼等已幾費酌度，而後定此新名詞，勞逸之分，亦已懸殊，何樂而不為乎？然頑固之士夫，其眼目為科舉場中，禁用僻書之功令所印定，一見新名詞，即若芒刺之入眶，其守舊拘墟之態，誠令人莫解其故也。<sup>141</sup>

青年會若沿用舊名詞，就算未予人思想守舊的形象，亦很難與當時的新知識分子建立起對話或溝通的切入點。誠如路義思所說：

日本是遠東的一塊天然磁石。究竟中國學生在那裡尋得甚麼？他們返回中國時會帶回甚麼思想？那些思想美國人是否明白？他們是從泥土中獲得，或日本人從美國歐洲挪用過來？為了知悉如何第一手應付少年中國，我們必須要回答這些疑問。<sup>142</sup>

路氏在回憶錄裡指出，上海青年會早期被視為一個具進步性（progressive）的組織：「這是令人鼓舞的，要是我們追隨傳統，我們將會很容易被一位不耐煩、對傳統忍無可忍的才智之士撇棄。」<sup>143</sup>

<sup>141</sup> 林樂知著，范祿譯述：〈新名詞辨惑〉，《萬國公報》第184卷（1904年5月），頁24a-b（總頁22595-6）。

<sup>142</sup> Robert E. Lewis, *Search of Far Horizons* (West Conshohocken, PA: Infinity Pub., 2004), p. 41.

<sup>143</sup> Robert E. Lewis, *Search of Far Horizons*, p. 64.

其次，青年會選擇這三個饒富救亡意義的詞彙作為宗旨的官方譯名，亦可能反映出青年會期望投身到當時方興未艾的救亡大潮中。救亡圖存是近代中國不少知識分子的主要思想關懷，青年會選用「德育」、「智育」和「體育」三詞作為官方譯名，可以視為對於這股救國潮流的正面回應。青年會為爭取愛國之士的支持，除了使用他們可以理解的語言，同時要就他們所關心的議題提出說法。若沿用「身」、「心」和「靈」作為會旨，既無法突顯出青年會在救國問題上所持的立場及定位，亦不容易與愛國之士打開溝通、對話的大門。適逢其會，在梁啟超著述中曝光的「德育」、「智育」和「體育」三個新名詞，既具有嚴復所表達的救國思想，亦有助青年會向社會人士宣示其作為愛國、救國團體的社會定位：

青年會者，於國家社會有絕大之影響也，何則？子弟當青年之際，苟能端其趨向，啟其靈明，充其體氣，致力於德、智、體三育，不第可為預備立憲國民之領袖，且更可為實行立國民之代表……<sup>144</sup>

另一方面，青年會提倡的「Body」、「Mind」和「Spirit」，與斯賓塞爾所提出的「Intellectual Education」、「Moral Education」和「Physical Education」其實亦不無暗合之處。在理想人格塑造的問題上，兩者同樣以三分法作為理論框架，同時亦以為三者應平衡發展、缺一不可，此等相同之處，自然為合理化兩組詞彙的

<sup>144</sup> 強黃：〈吾所理想之青年會·四〉，《青年》第10卷第1號（1907年2月），頁21。全國協會總幹事余日章後來亦說：「曩者社會先進之士，感於國勢之凌夷，由於民力之未發展；爰集其注意力於西方，以期獲得強國新民之方劑；而青年會適於此時應運而起，以德智體群四育事業相號召，故能不脛而走，深得國人贊助。」余日章：《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史略》（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27），頁9。



「互譯性」創造了有利的客觀條件。

這樣難道不會扭曲（或至少轉移）了青年會本來的宗旨？筆者的答案是——既是又非。單從字面意義看，「德育」一詞的確無法突顯青年會的基督教色彩。<sup>145</sup> 不過，我們亦不能將它單純視為一樁赤裸裸的政治投機行為。早期來華的青年會西幹事均曾參與美國學生志願運動，並深受該運動背後的社會福音神學所影響。<sup>146</sup> 他們深信基督教是美國富強的根本，基督教信仰不僅拯救個人的靈魂，同樣拯救個人所身處的社會或國家，前者與後者既不能嚴格二分，兩者的共同實現同樣是天國在地上的彰顯。在不干涉政治的前提下，西幹事十分樂意為中國知識分子改良社會或重建國家提供間接的助力。如路義思所說：「青年會不會討論和組織革命，我們希望這個地方的特有精神是，透過教育、娛樂、社交及宗教活動以強化青年，讓他們以自己的方法振興及挽救他們的國家。」<sup>147</sup>

對於中國青年會的華人董事或幹事來說，他們與同時代的知識分子一樣，既無法豁免於救亡圖存的時代關懷，<sup>148</sup> 亦難免自覺或不自覺地將救亡的關注投射到青年會運動中。上海青年會中

145 1928年，全國協會書報部出版了一本《青年德育叢書》，書中收錄的全屬朱熹、曾文正等人的文章，與基督教完全沾不上邊。筆者在這裡欲指出的是，按一般人（甚至是青年會幹事）的理解，「德育」一詞並沒有特別指向某一個宗教的含意。參青年協會書報部選輯：《青年德育叢書》（上海：青年協會書報部，1928）。

146 Clifton J. Phillips, "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and Its Role in China Mission, 1886-1920",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102-103.

147 Robert E. Lewis, *Search of Far Horizons*, p. 64.

148 上海青年會董事黃佐庭在美國考察時的感受是：「我國物產之富，地土之廣，如能竭力提倡實業，數十年後，必能占優勝之地位……」黃佐庭：〈北美通信〉，《青年》第11卷第1號（1908年2月），頁29。

學的校歌有以下的歌詞：

- (一) 勉、勉青年、體育、富、強壯精神。做、完全新世界、尚武國民。
- (二) 勉、勉青年、智育、重、學識開通。順、文明新潮流、為國效忠。
- (三) 勉、勉青年、德育、備、景仰先賢。佐、共和新國家、力任仔肩。
- (副) 美滿前程、我青年。同來就學、努力、須爭先。  
春誦夏弦、愛惜光陰、莫流連。秋去冬來，願效祖  
逖、著先鞭。  
莫流連。莫流連。美滿前程、我青年。<sup>149</sup>

這首校歌共分三節，每節上半部分別以「德育」、「智育」和「體育」作主題。值得注意的是，每節歌詞的下半部均是充滿愛國情懷的闡釋。更有趣的是，全首校歌的歌詞基本上不帶任何基督教色彩；要是將歌詞中「德育」、「智育」和「體育」置換成「民德」、「民智」和「民力」三詞，對整首歌曲所表達的意思根本沒有絲毫的影響。我們雖然不清楚這首校歌的寫成年代，但其內容基本上是嚴復的「民德」、「民智」和「民力」影響下的產物。

1912年12月，《上海青年》刊登了一篇題為〈共和之基礎〉的文章。文中有一段頗堪玩味的話：

要是，共和為最高之政體，以國民作主位，求共和之建立穩固，則必以民力、民智、民德為之基礎。基督教者，實

---

<sup>149</sup> 〈青年會中學堂校歌〉，《上海青年》第12卷第27號（1913年7月4日），頁3。

這類衝突的場所，在這裡被翻譯語言不得不與譯體語言對面遭逢，為它們之間不可簡約之差別決一雌雄，這裡有對權威的引用和對權威的挑戰，對曖昧性的消解或對曖昧性的創造，直到新詞或新意義在譯體語言中出現。<sup>152</sup>

筆者以為，「德育」、「智育」和「體育」三詞，就是在這種充滿矛盾及張力的歷史衝突現場裡建構起來（見附表六）。

附表六 「三育」話語建構圖

中國青年會				
嚴復	梁啟超		斯賓塞爾	美國青年會
	← 救國的訴求	VS	青年會宗旨 →	
民德 =	德育 →	德育 ←	Moral Education ≈	Spirit
民智 =	智育 →	智育 ←	Intellectual Education ≈	Mind
民力 =	體育 →	體育 ←	Physical Education ≈	Body

#### 第四節 餘論

最後，我們會稍稍討論與「群育」一詞有關的問題，以進一步印證本文的說法。在後來的青年會論述中，多提及青年會以發展青年的「德育」、「智育」、「體育」和「群育」（簡稱「四育」）為宗旨。如前所述，「四育」並不是青年會早期的主張。那麼，「群育」是何時進入中國青年會，並衍生了後來的「四育」話語？就筆者所見，「群育」一詞最早見於 1919 年 5 月附

<sup>152</sup> 劉禾：〈個人主義話語〉，頁 29。

刊於《上海青年》的童子部會務報告。<sup>153</sup>翌年12月的另一段記載說：「青年會事業始僅有德、智、體三種，繼增社交事業一種名為群育。」<sup>154</sup>筆者認為，大約在1920年青年會全國大會以後，「四育」逐漸取代了「三育」的地位，成為中國青年會運動的官方宗旨，有關「四育」的說法便隨之不脛而走：「〔青年會〕以提倡德、智、體、群四育培植青年完成其人格為宗旨。」<sup>155</sup>

事實上，美國青年會在「Body」、「Mind」和「Spirit」三字以外，並沒有「群育」這個觀念，只有「Social」這個說法（中國青年會譯作「社交」或「交誼」），形成了所謂的「四重計畫」。那麼，「群育」一詞又是如何產生？上海青年會幹事謝強公說：「……至其〔青年會〕各種之進行，皆團體的，而少單獨的，則又可歸之以群育。」<sup>156</sup>這明顯並不是一個充分的解說，並有將「Social」詮釋作「群育」的企圖。<sup>157</sup>他在1922年發

153 〈上海青年會童子部一九一八年中各項事業之報告〉，《上海青年》第18卷第20號（1919年5月30日），頁8。

154 〈青年會之第五種事業〉，《上海青年》第18卷第43號（1920年12月26日），頁6。

155 〈未來之青年會全國大會〉，《上海青年》第19卷第5號（1920年1月30日），頁9。「就德智體群四方面……以新四育之發展，養成其完全人格……」（壺、廿五年之回顧及現在之地位），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編：《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報告第八次全國大會書》（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1920），頁3。至於「群育」一詞如何成為後來教育界的「四育」之一，以及與青年會有沒有任何傳承關係，尚待學者進一步研究，僅就所見多引一條材料：「辨志屬德育；離經敬業，博習，與論學屬智育；樂群，親師，取友，屬群育。故求學最重德育與群育，智育次之，與今重智育而輕德育與群育不同。」陳啟天：〈學記通義〉，《少年中國》（1923年8月），頁6。

156 強公：〈青年之明星〉，《上海青年》第19卷第8號（1920年3月8日），頁2。

157 楊益惠亦說：「青年會的徽號是個三角形，是表象德、智、體育的意思，三角形之外還透著一個圓圈，是表象群育的意思。」他在介紹群育的具體內容時說：「群育的界說極廣，簡稱之就是人群的聯絡，再簡稱之，就是會員的交際。」楊益惠：〈基督教青年會是甚麼？續第一期〉，《上海青年》第20卷第9號（1921年4月1日），頁5、7。

表的另一篇文章說：

近年來，復感於新文化之思潮，所貴者貴應時代之要求；而人類為好群動物，社會以互助而進化，故於原有之新道德、新智識、新體格之三育外，更增群育，合定為本會四育之大宗旨。<sup>158</sup>

這與任夫在 1927 年的說法大抵一致：「十年前增一群育，所以使個人不獨立己，兼須立人，不獨講求行己之道，兼須明白處群之方。」<sup>159</sup>

新文化運動與青年會之提出「群育」有何關係，我們對此並不十分清楚。可以推斷的是，「群育」一詞的建構，或許是青年會對於新文化運動期間所體現的團結力量的一項回應。當然，與孫中山描述中國人為「一盤散沙」的說法或許也有一定的關係。裴雲卿在 1934 年說：「我們的國父孫中山說：『我們中國人如同一盤散沙』，這就是我國不合群的寫照。人不團結，社會和國家怎麼會好？……青年會有鑒於此，乃於德、智、體三育之外，加以群育的工作。」<sup>160</sup> 因此之故，青年會將「Social」與「群體」建立起「互譯性」，同樣不是翻譯的自然結果。<sup>161</sup> 青年會

---

158 強公：〈二十二週紀念徵求大會開幕宣言〉，《上海青年》第21卷第3號（1922年1月23日），頁5。

159 任夫：〈十年來吾國青年會之重大變化〉，《青年進步》第100冊（1927年2月），頁237。

160 裴雲卿：〈我對於青年會的群育事業〉，《上海青年》第33卷第10期（1934年3月13日），頁46。在三十年代的背景下，這段話也許有為三民主義背書的意味。邢福增：《基督信仰與救國實踐：二十世紀前期的個案研究》（香港：建道神學院，1997），頁404。

161 「單就青年會主要目標一看，雖然在德育之外先成了一個三角形的團體，就是平常人所說甚麼德育、智育、體育那三部分；然而，照現像去看，差不多要成四角形，就是德智體之外，又添一種群育。」柴連復：〈我對於青年會念年來的聞見（一續）〉，《上海青年》第22卷第17號（1923年5月11日），頁7。

在二十世紀初瞬息萬變的中國社會，善於緊貼時代脈搏，並作出相應的策略轉變。筆者以為，青年會「三育」、「四育」的話語構成，基本上是對於當時救國訴求的積極回應。<sup>162</sup>

在這裡茲引用美國文學理論家德曼（Paul de Man）在《對理論的抵抗》（*The Resistance to Theory*）裡的一段話，作為本文的總結：

當路德翻譯聖經時，某些事發生了——在那一時刻，某些事發生了，並不是說從那以後發生了宗教戰爭，然後歷史的進程被改變了，這些只不過是副產品。真正發生的是翻譯。<sup>163</sup>

王成勉認為中國青年會愈趨政治化，是二十年代提出「人格救國」主張以後的事情：「……自人格救國到公民教育運動，可以看出越來越走向政治化。」<sup>164</sup> 在此筆者想指出的是，早在二十世紀初年，當「體育」、「智育」和「德育」設定成為「Body」、「Mind」和「Spirit」三字的對等翻譯時，某些「事情」（occurrence）其實亦在中國青年會運動裡發生了——政治（救國）的元素早已隱然注入中國青年會運動的血液裡。

要是筆者的分析離事實不遠的話，這對於我們了解近代中國青年會運動的歷史發展，可謂至關重要。

162 「今日人心險譎，青年會以德育挽救之；今日民質衰弱，青年會以體育挽救之；今日民智頑昧，青年會以智育挽救之；今日合群性不發達，青年會以群育挽救之。」楊益惠：〈基督教青年會是甚麼？〉，《上海青年》第20卷第1號（1921年1月28日），頁6。

163 Paul de Man, *The Resistance to The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引自劉禾著，宋偉傑等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頁45-46。

164 王成勉：〈余日章與公民教育運動〉，收入林治平編：《基督教與中國現代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宇宙光出版社，1994），頁519。

## 附錄二 全國協會歷任會長

任期	任職人
1896-1906	潘慎文 (Richard A. Parker)
1907-1910	黃佐廷
1911-1915	王閣臣
1916-1925	鄺富灼
1926-1930	朱成章
1931-1933	張嘉甫
1934- 解放後	黎照寰

資料來源：《上海青年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青年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頁340。

---

1914	杭州
1914	開封
1914	西安
1915	太原
1915	運城
1916	南昌
1917	安東
1919	安慶
1919	鄭縣
1919	寧波
1919	蘇州
1920	建寧
1920	青州
1922	大連
1922	蕪湖
1923	錦縣
1923	重慶
1923	汾陽
1923	青島

---

資料來源：〈民國十三年中華基督教城市青年會成績統計表〉，《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年報（1924）》（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1925），摺頁。



附錄六 上海基督教青年會  
歷任總幹事

任期	總幹事
1900-1907	路義思
1908-1917	駱維廉
1917-1922	曹雪賡
1922-1924	郝伯陽
1924-1928	湯仁熙
1929-1932	陳立廷
1929- ?	陸幹臣

1906	會長：王閣臣 (粵漢鐵路公司)	副會長：黃佐廷 (南京美國領事館翻譯)
	書記：顏惠慶 (聖約翰書院教員)	司庫：唐介臣 (粵漢鐵路公司)
	韓玉麟(時報館幹事?)、蕭智慶(?)、 夏瑞芳(商務印書館總理)、謝洪賚(《青年》雜誌主筆)、 張汝舟(仁濟醫院醫生)、凌潛夫(湖北水泥廠?)、 彭少雲(履泰洋行)、陸鴻飛(捕房譯員)、 宋耀如(阜豐麵粉公司總理)、鍾惠霖(大律師)	
1907	會長：王閣臣 (滬寧鐵路公司)	副會長：黃佐廷 (南京美國領事館翻譯)
	書記：顏惠慶 (聖約翰書院教員)	司庫：唐介臣 (粵漢鐵路公司)
	謝洪賚(《青年》雜誌主筆)、彭少雲(履泰洋行)、 韓玉麟(時報館幹事)、夏瑞芳(商務印書館總理)、 凌潛夫(湖北水泥廠?)、張汝舟(仁濟醫院醫生)、 陸鴻飛(捕房譯員)、宋耀如(阜豐麵粉公司總理)、 吳鏡寰(高等實業學堂)、鍾惠霖(大律師)  備註：其中二人在任期內請辭，由董景安(浸禮會聖道學堂)、吳鏡寰(高等實業學堂教員)補上。	
1908	會長：王閣臣 (滬寧鐵路公司)	副會長：黃佐廷 (滬寧鐵路公司)
	書記：李登輝 (復旦公學教員)	司庫：韓玉麟 (時報館幹事)
	宋耀如(阜豐麵粉公司總理)、夏瑞芳(商務印書館總理)、 陸鴻飛(捕房譯員)、鄭富灼(商務印書館)、 謝洪賚(《青年》雜誌主筆)、張汝舟(仁濟醫院醫生)、 楊振驥(湘餘公司、豫豐公司?)、刁德仁(聖約翰書院教員)、 鍾惠霖(律師)  備註：後王閣臣離任，黃佐廷改任會長，宋耀如改任副會長。王培元(守真學堂教員)、趙士北(高等實業學堂教員)、王仙華(中國公學教員)三人亦獲增補為董事。	

1909	會長：黃佐廷 (滬寧鐵路公司)	副會長：鄭富灼 (商務印書館編譯)
	書記：李登輝 (復旦公學教員)	司庫：韓玉麟 (時報館幹事)
	宋耀如(阜豐麵粉公司總理)、夏瑞芳(商務印書館總理)、楊振驥(湘餘公司、豫豐公司?)、凌潛夫(湖北水泥廠?)、王仙華(中國公學教員)、趙士北(高等實業學堂教員)、張汝舟(仁濟醫院醫生)、許傳音(南洋公學教員)、史悠明(工部局翻譯)、王培元(守真學堂教員)、張廷榮(上海孤兒院院長)	
1910	會長：黃佐廷 (滬寧鐵路公司)	副會長：鄭富灼 (商務印書館編譯)
	書記：李騰飛 (李登輝，復旦公學教員)	司庫：韓玉麟 (福和公司總理)
	張廷榮(上海孤兒院)、凌潛夫(湖北水泥廠?)、鮑濟川(湖北水泥廠經理)、曹聞達(?)、史悠明(工部局翻譯)、黃澤生(?)	
1911	會長：宋耀如 (阜豐麵粉公司)	副會長：鄭富灼 (商務印書館編譯)
	書記：徐維繪 (中國聖教書會)	司庫：韓玉麟 (福和公司總理)
	許珊友(稅關)、包文信(中國教育器材館?)、鄔挺生(英美煙公司)、史悠明(工部局翻譯)、林幼誠(慎昌公司?)、丁榕(律師)、張汝舟(同濟醫院醫生)、黃佐廷(滬寧鐵路公司)、李登輝(復旦公學教員)、鮑濟川(湖北水泥廠經理)  備註：鍾文川(滬寧鐵路局?)、陳敏修(?)後來填補了史悠明、黃佐廷離任後的職位。	

1912	會長：鄭富灼 (商務印書館編譯)	副會長：韓玉麟 (福和公司總理)
	書記：徐繪榮 (加拿大商務代理)	司庫：鮑濟川 (湖北水泥廠經理)
	徐維繪(中國聖教書會)、林幼誠(慎昌公司)、 丁斐章(丁榕, 律師)、凌潛夫(湖北水泥廠)、 范子美(全國協會幹事)、張汝舟(仁濟醫館醫生)、 鍾文川(滬寧鐵路公司)、林步瀛(新關造冊處)、 奚伯綬(全國協會幹事)、李登輝(共和西報主筆)、 宋耀如(阜豐麵粉公司)	
備註：王吉紳(?)補上宋耀如離任後的空缺；及後王閣臣、陳敏修補上王吉紳(?)、徐繪榮的空缺。		
1913	會長：鄭富灼 (商務印書館編譯)	副會長：王閣臣 (漢冶萍公司)
	書記：林步瀛 (新關造冊處)	司庫：韓玉麟 (捷運公司)
	鮑咸亨(商務印書館)、范子美(全國協會幹事)、 奚伯綬(全國協會幹事)、丁榕(高易公館律師)、 許珊友(海關)、張汝舟(仁濟醫院醫生)、 朱成章(滬寧鐵路公司)、徐維繪(中國聖教書會)、 鍾文川(滬寧鐵路局)、 卓康成(滬浦總局) 李登輝(共和西報主筆)	
備註：卓康成請辭，由倪文炳代替。		
1914	會長：?	副會長：?
	書記：?	司庫：?
	鄭富灼(商務印書館編譯) 李登輝(復旦公學校長)、 王寵惠(中華書局編輯主任)、鮑咸亨(商務印書館)、 范子美(全國協會幹事)、余日章(全國協會總幹事)、 韓玉麟(福和公司)、袁履登(商務印書館)、 張嘉甫(列豐行經理)、朱成章(滬寧鐵路公司)、 林幼誠(慎昌公司?)、丁榕(律師)、徐維繪(中國聖教書會)、 張汝舟(仁濟醫院醫生)、倪文炳(海關)、 王閣臣(滬寧鐵路公司)	

1915	會長：鄭富灼 (商務印書館編譯)	副會長：王閣臣 (漢冶萍公司)
	書記：李觀森 (捷行公司)	司庫：張嘉甫 (列豐行經理)
	李登輝(復旦公學校長)、王寵惠(中華書局編輯主任)、 丁榕(律師)、聶雲台(恒豐紗廠經理)、袁履登(商務印書館)、 周錫三(大陸報)、鮑咸亨(商務印書館)、 朱成章(滬寧鐵路公司)、韓玉麟(捷運公司)、 余日章(全國協會總幹事)、蕭智吉(五洲大藥房醫生)	
1916	會長：鄭富灼 (商務印書館編譯)	副會長：李登輝 (復旦公學校長)
	書記：李觀森 (捷行公司)	司庫：韓玉麟 (福和公司)
	王寵惠(中華書局編輯主任)、蕭智吉(五洲大藥房醫生)、 丁榕(律師)、徐叔仁(東方紗廠)、聶雲台(恒豐紗廠經理)、 袁履登(裕昌煤號)、周錫三(大陸報)、鮑咸亨(商務印書館)、 張嘉甫(列豐行經理)、朱成章(滬寧鐵路公司)、 余日章(全國協會總幹事)、倪文炳(海關)、 歐彬(先施公司經理)	
1917	會長：鄭富灼 (商務印書館編譯)	副會長：李登輝 (復旦大學校長)
	書記：李觀森 (捷行公司)	司庫：韓玉麟 (福和公司)
	蕭智吉(五洲大藥房醫生)、徐叔仁(東方紗廠)、 聶雲台(恒豐紗廠經理)、周錫三(商務印書館編譯)、 張嘉甫(列豐行經理)、朱成章(滬寧鐵路公司)、 歐彬(先施公司經理)、金邦平(農商總長)、 梅華銓(律師)、鍾拱辰(律師)、陳維屏(美以美會牧師)	

1918	會長：聶雲台 (恒豐紗廠經理)	副會長：?
	書記：?	司庫：?
	梅華銓(律師)、周錫三(商務印書館編譯)、 李登輝(復旦大學校長)、朱成章(滬寧鐵路公司)、 林齊恩(復旦大學教員)、鄭富灼(商務印書館編譯)、 韓玉麟(福和公司)、李觀森(匯發公司)、 徐叔仁(東方紗廠)、聶雲台(恒豐紗廠經理)、 張嘉甫(列豐行經理)、歐彬(先施公司經理)、 金邦平(農商總長)、梅華銓(律師)、鍾拱辰(醫生?)、 陳維屏(美以美會牧師)	
會長：聶雲台 (恒豐紗廠經理)	副會長：朱成章 (滬寧鐵路公司)	
1919	書記：周錫三 (商務印書館編譯)	司庫：韓玉麟 (福和公司)
	梅華銓(律師)、吳在章(吳蘊齋, 金城銀行)、 張嘉甫(列豐行經理)、凌潛夫(湖北水泥廠)、 李登輝(復旦大學校長)、劉錫基(先施百貨公司)、 李觀森(匯發公司)、倪文炳(海關)、 鄭富灼(商務印書館編譯)、徐叔仁(東方紗廠)、 張廷榮(英文滬報主筆)	
	正會長：王正廷 (華豐紡織)	副會長：朱成章 (滬寧鐵路公司)
1920	書記：張廷榮 (英文滬報主筆)	司庫：韓玉麟 (中國運輸公司)
	聶雲台(恒豐紗廠經理)、張嘉甫(列豐行經理)、 倪文炳(海關)、王正序(和豐銀行)、梅華銓(律師)、 鄭富灼(商務印書館編譯)、李登輝(復旦大學)、 李觀森(匯發公司)、徐叔仁(東方紗廠)、 劉錫基(先施公司)、趙晉卿(英美煙公司)	



過去有關中國基督教青年會（YMCA）的研究，若不是置放在近代中國社會改良運動的歷史脈絡下審視，便是以跨文化的分析框架作解讀，致使中國青年會運動既多元又複雜的內在生態面貌備受忽視。

本書以中國城市青年會運動的揭曉者——上海青年會——作為研究個案，從「機構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的角度入手，徵引多種中、外文獻檔案，追溯上海青年會如何創立、發展，並進而對社會發揮影響力的歷程；也揭示它在實踐使命的過程中，如何徘徊在基督化與世俗化之間的困境。本書的論述周詳、嚴密，其研究使中國青年會這個課題邁入一新境界。



臺大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GPN : 1009903396 定價：新臺幣500元